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7

2007年第7期



黄克剑

黄克剑，1946年1月生于陕西虢镇。1969年毕业于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水利系，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曾任教并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于华中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著有《两难中的抉择》、《寂寞中的复兴》、《挣扎中的儒学》、《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百年新儒林》、《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黄克剑自选集》，译有《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编有《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等。

《两难中的抉择》一书后记有谓：“治学的底蕴原在于境界。有人凭借聪明，有人诉诸智慧，我相信我投之于文字的是生命。”《政治家》译序中亦有谓：“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之光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这些说法，当可视为其人治学之心迹的吐露。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Academic Research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社　长：张国仪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陶原珂　雷比璐

学术研究 (月刊)

2007 年第 7 期　总第 272 期　出版日期：7 月 20 日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赵凯荣　5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

——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张秀琴　13

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　李广昌　18

抽象人的突破与历史的“人道”建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解读　周　峰　周　霞　25

深入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　韩民青　31

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　史永隽　36

集群企业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广东传统产业集群为例　岳芳敏　42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李渝萍　甘寿国　49

入世以来我国学界对管理环境与管理转型问题的研究　郑英隆　杨向艳　54

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化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基于系统整合理论的改革新思维　李习彬　59

城市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袁　政　63

提升城市功能与合理发展人口初探

——以深圳为例　王世巍　69

都市圈化中的“三农”难题及其破解　刘范一　74

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朱国城　79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政法 gzphilaw@yahoo.com.cn
哲学 gzphl@yahoo.com.cn　　历史 gzhist@yahoo.com.cn
经济 gzronger88@yahoo.com.cn　　文学 gzliter@yahoo.com.cn

(1958 年创刊)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孔祥吉 83

省河之南的鏖战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　郑永华 95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

——“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李　强 103

论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响　曹胜高 110

20 世纪西方文论嬗变趋向探微　黄克剑 116

中国当代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想象　王本朝 127

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　纪德君 132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左鹏军 137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杜运通　杜兴梅 143

•文化与传播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梅琼林　连水兴 148

近代报业怪杰　文界革命先锋

——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　许翼心 153

•学海酌蠡•

“朱垠”即珠崖考　李　勃 158

英文摘要　159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S

No.7, 2007

Re-comprehension of Marx's Criticism in Ideology ····· Zhao Kairong (5)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Theory: a comparison among Adorno's, Horheimer's and Marx's theories ····· Zhang Xiuqin (13)
On the Subjectivity Principle Applied in Marx's Philosophy Localized in China ····· Li Guangchang (18)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Domain of Abstractive Pers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Humanity ····· Zhou Feng and Zhou Xia (25)
A Deep Comprehension of the Mechanism of Human Development ····· Han Minqing (31)
A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talian Enterprise Clusters ····· Shi yongjun (36)
On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aths of Enterpris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y Clusters ····· Yue Fangmin (42)
Theories of Middle-and-small Enterprise Cluster: a Comment on Theoretical Schools ····· Li Yuping and Gan Shouguo (49)
A Comment on the Chinese Studies of the Problems of Management Environment and Management Transition after China Jointed WTO ····· Zheng Yinglong & Yang Xiangyan (54)
The Scientiz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Concept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 Li Xibin (59)
The Theory of City Governance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 ····· Yuan Zheng (63)
On How Enhancing the Urban Function and Reasonably Developing Population ····· Wang Shiwei (69)
Three Agricultural Cruxes in Urbaniz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 Liu Fanyi (74)
The Main Force for Constructing the New Countryside ····· Zhu Guocheng (79)
A Comment on Zhang Fengxiang, a Legendary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on the Letters and Telegraphs Collected by Him ····· Kong Xiangji (83)
Another Textual Study on the Chinese Maps Stored in English National Archives concerning the Hard Fight in the Hongbing's Rebellion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 Zheng Yonghua (95)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al Tricks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 Li Qiang (103)
Relaxation of the Curfew Rul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 ····· Cao Shenggao (110)
A Probe to the Change Tendenc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 Huang Kejian (116)
The Literary Popularized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ss's Writing ····· Wang Benchao (127)
The Effect of Popular Story Telling in the Spreading of Ancient Chinese Popular Stories ····· Ji Dejun (132)
On the Legendary Poetic Dramas Created by Mr. Wu Mei's Student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Poetic Dramas History ····· Zuo Pengjun (137)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ur Society' and 'the Sun Society' ····· Du Yuntong and Du Xingmei (143)
Open a New View on the Studies of Communication from an Angl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 Mei Qionglin and Lian Shuixing (148)
On Mr. Zheng Guan-gong as a Person Talented at Journalist Industry and Revolutionary Vanguard in Morden China ····· Xu Yixin (153)
English Main Abstracts ····· (159)

·哲 学·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 赵凯荣

[摘 要] 通常人们对意识形态主要是从意识方面来理解的，结果，意识形态问题同意识问题一样，也仅仅具有真假对错或唯心唯物之意义，并据此形成了关于意识形态的贬义、褒义、中性三种主要理解。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的关键却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它还同时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并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实践力量。正是这一点至关重要而又很少被学术界注意到。尽管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不太一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本人也承认，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初期，过于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晚年，东方问题的特殊性，使他不得不重新去理解意识形态的特殊作用。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方向——正如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共性、普遍性、简单性、一般性一样，历史的个性、特殊性、复杂性、混沌性则主要是由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按照这种理解，过去长期以来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将不再有特殊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问题。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形而上学 实践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05-08

一、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以及存在的问题

通常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纯粹意识的范畴内，并主要将意识形态从意识方面来理解，从与现实的存在相对应的意识来理解。按其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大致可有中性、贬义、褒义三种。因此，没有比意识形态这个词更让人褒贬不一的了。

所谓的“中性”说是指，意识形态就其总是与存在对应的意识来说，它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不正确的；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落后的；可以据此来褒贬它，但却不能对意识形态本身进行褒贬。这种观点在我们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并被写入了权威的工具书《辞海》中。《辞海》关于意识形态一词的解释是：一方面，它“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式”；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1](P112)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一来有正确与否的问题，二来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这种观点由于将意识形态化归为意识，因此也就将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划归于一般的意识性和意识的一般性中，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意识形态本身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只有意识问题研究而并无意识形态的研究。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苏联。在上个世纪苏联哲学的研究中我们曾经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其权威的《简明哲学辞典》（罗森塔尔、尤金编），还是其权威的教科书（诸如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亚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编的《历史唯物主义》等），竟然都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辞条。

有学者说，这与特拉西（Distutt de Tracy，1754-1836 年）提出意识形态的初衷比较接近。实则不然。对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只能是褒义的。毋庸置疑，特拉西将意识形态确实定义为“Science des Idees”，即“观念的科学”，虽然科学具有中立性，但并不能因其名为“科学”就将其视为是中性的。在这里，意识形态恰恰是作为积极的、肯定的、真理的东西被推出的。这与形而上学的传统相关，我们接下来会详

作者简介 赵凯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430072）。

谈。必须指出，当第二国际讲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时，尽管也冠之以“科学”，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同理，列宁、毛泽东、斯大林也都是在这个“科学”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个词的。

因此也就难怪，任何一种反对上述两种观念的努力，几乎都会被视为一种创新（正如现在一些人正在做的那样）。于是“去意识形态化”就成了眼下近乎最时髦的话语之一。理由很简单：意识形态根本就是“虚假的意识”，或者就直接等同于唯心主义（Ideologie=Idealismus），而且，这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2][3]

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写有一本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书稿。但是，从这本书稿就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话，显然失之轻率。因为就这本书而言，如果它确实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某种批判的话，那也只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还不能说就是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批判。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罗森塔尔、尤金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没有意识形态（一切意识形态）的辞条，却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辞条。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哲学界在绕开和回避问题：只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有问题的，而尽量不涉及或不去碰一般意识形态如何的问题。为什么要回避？因为它也将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因此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一般地说意识形态统统是有问题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自然成了问题。因此任何一种主张取消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思想都是正确的和不能反对的（事实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反对取消意识形态）。

但这还远不重要，或者说远远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对意识形态消极性的理解——与所有的积极性理解一样，仍然是片面的，仍然是局部性的，因为仍然没有走出关于意识形态传统的对与错、进步与落后的理解。这种理解仍然是传统的（不是创新的），仍然是囿于一般的意识理解的局限中（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与意识的不同之处）。唯其如此，它既把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同时也把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论题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那么，意识形态在什么意义上才是一个真假对错与先进落后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意识形态局限于这样一种理解中？在当时，马克思确实是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虚假的、落后的意识，而且这样做时，也确实将意识形态从真假对错先进落后方面进行了理解。同理，马克思确实是将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唯心主义，而且这样做时，也确实将意识形态从真假对错先进落后方面进行了理解。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过去长期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军对垒方面去理解意识形态诸问题，教训不能不说是沉痛的。而今天，哲学的发展已经使得任何只是将意识形态问题从真假对错先进落后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方面加以区分的做法失去了意义。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极赋意义的方面，那就是：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是另有所指的。正是这一方面却长期被忽略了，自然其意义也就被一直遮蔽了，而这一方面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所在及其意义

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马克思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除了真假对错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方面的考虑外还另有所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意识”中这个“虚假的意识”。

马克思是通过将意识问题化归为存在问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识从来只是意识的存在”，因此，没有单独的、独立的意识问题，而只有与存在相对应的意识问题。因此，虚假的意识，就是同对应的存在不相符合的意识。马克思批判德国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完全恪守这一原则：德国意识形态是不符合实际存在的虚假意识。

但是，马克思主要的所指却不在这里，而在形而上学那里。为此，就必须首先知道，形而上学是如何看待虚假意识的。在形而上学那里，虚假意识之为虚假意识，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意识就其是意识，就其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历史而言，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黑格尔说得很清楚，自己构成自己

的道路意味着“一切都是推论”：Everything is a syllogism。[4](P314) 也即是说，它必须符合自身的逻辑。金岳霖说哲学是研究“通”的，如果是指形而上学，那是十分贴切的。近来有一些著名的学者误解了这一点，将哲学理解为是专门研究各个对象之间的相通性、统一性的。关于这种错误，黑格尔曾有专门的批评，他说“统一”是一个“不幸的字眼”，是从外在反思中、从比较中寻找关系，与对象的内在性无关的。可以说，形而上学正是从这种“通”开始的，尽管包括文德尔班、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学者主张这种研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但真正的开创人应该是巴门尼德。正是他而不是别人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形而上学的原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条原则后来竟然成了“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如此，符合这个“是”的，就是“通”的，正确的意识；否则就不是“通”的，也就是虚假的意识。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说得很明确：“凡是我十分清楚、极其分明地理解的，都是真的。”[5](P28) 洛克也认为：“所谓的虚假就是：名称的联合异乎其所表示的观念的联合”。[6](P571) 这个“是”，在英语中就是Being或to be，过去一般译为“存在”，近来有学者认为译作“是”更为妥当。[7] 因了这个是，一切是其所是地“绽”出来。不过，虽然巴门尼德提出了“是”之路，但将其真正推向极致的却是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是绝对优先的，甚至优先于上帝，上帝也不是一个分有“是”的“是者”。

马克思当然是反对这种“是”的、“正确的意识”的，用的也当然是唯物主义的方法，然而更主要的是黑格尔的方法，即辩证的方法。按照黑格尔的方法，“是”这个词可以有四种词性。一种是名词性。“是”即真理，“是”即上帝（与海德格尔不同），即主体。同时它也具有动词性，一切由它是其所是地展示出来。这几乎是所有形而上学家共通的。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自因，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是’，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是着’”。由此也就有了第三种词性，即动名词性。也是黑格尔最感兴趣的词性，一个让黑格尔相信西方优于中国的一个词性。“重要的多的，是思维规定在一种语言里表现为名词和动词，因而打上了客观形式的标记；德语中有些字非常奇特，不仅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有相反的意义，以至于使人在那里不能不看到语言的思辨精神”。[8](P8) 按照这个词性，“是”与“不是”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体的两面，相互转化，互为中介的。于是也就有了第四种词性：连接词性。

当黑格尔打破了“是”与“不是”的这种绝对界限时，同时也就打破了所谓虚假意识与正确意识的这种绝对界限。因此，说马克思反对这种虚假意识是对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则意义就不大了。对马克思真正有重大意义的是：如果真像形而上学所说的，那么一切是如何“是”起来的？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甚至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它们除了以感性对象为依据来批判虚假的意识外（注意），在这方面并没有做什么。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也同样理解为对这种虚假的意识的批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马克思认为，恰恰相反，正是唯心主义，正是形而上学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可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因为它们主张，意识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起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形而上学家确实是这样回答的：一切都是推论，一切都是“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真正虚假的：意识不可能自己实现自身，它要想实现自身，就必须有实现自身的人的实践力量。所以，马克思才说他“颠倒”了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辩证的、实践的、革命的力量就来自于意识自身，相比之下，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不过是狡猾的意识的工具；马克思则反过来：意识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力量，意识如果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只能诉诸人的实践力量，而不是相反。马克思说，理论可以变成物质力量，但要通过彻底即要说服人。这才是真正的颠倒：辩证地颠倒而不是唯物地颠倒（注意在颠倒问题上的片面唯物主义的理解）。

这才是意识形态的真面目，意识形态的真面目就是形而上学，也只能是形而上学。特拉西的意识形态也概莫能外。他所谓的科学观念，说到底，就是想为经济学、道德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确立一个理论基础，确立一个说得通的基础，确立一个使上述学科能够“是”起来的基础。因此，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于其是否是虚假的意识，而在于这种东西能否具有实践力量。对意识形态来说，重要的恰恰

不是意识（不能囿于意识中），而是实践，至少，“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表示任何一种注重实践的理论，或者根据一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和企图。”[9](P101-102)

意识形态确实有一个真假对错的问题。或者是意识违背了现实；或者是意识违背了意识自身，违背了意识的逻辑。在这里，意识形态确实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但是，对马克思来说，重要的却不是这一点，谈论意识的真假对错以及意识和存在谁先谁后要么没有什么意义，要么也只有微小的意义，至少没有我们过去强调的那么重要。因为，马克思不仅尖锐批判了不符合存在的虚假的意识，同时也尖锐批判了符合存在的所谓不虚假的意识。正是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却又被彻底忘却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主要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因为费尔巴哈正是从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来看问题的，因此，费尔巴哈确实达到了对存在的正确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正确的意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不是实践的也不是革命的。因为它只会跟在现实的后面跑，只会迁就现实。这正是科学的主要特点。难怪康德会说，自然科学不需要天才。这种意识根本不会创新，也根本不需要创新。因此，这种唯物主义在哲学中是不可能被真正重视的，它有太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在这种唯物主义中很难有什么新发现，因为迁就现实，所以懒惰了思想，而只会对现实迎合，这种意识至多只是对现实的阿谀奉承，至多只是对现实的歌功颂德，因而只能成为消极和保守的力量。相反，唯心主义却是对现实批判的，因而是主动的、实践的、革命的。但是，却是虚假的意识，因为它必然不符合现实。更主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识并不是真正革命的和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说，唯心主义不知道真正的革命和实践的力量，这是虚假的意识。实际上，这已经不再是不符合现实的那种虚假意识了，它之所以是虚假的意识，完全是因为这种意识根本不可能是实践的且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就算是符合现实的真实的意识，就其仍然只是意识而言，就其仍然不是实践而言，就其仍然不能自我实现而言，它们仍然是虚假的意识。

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符合现实的正确意识，把其称为真理时；当我们把其称为实践哲学或实践本体论时；当我们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时，我们就犯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对手犯的同样的错误。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意识就其是意识而言，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因此，不存在什么“理论的实践”这种东西（见阿尔都塞这一概念），理论并没有实践的品格。马克思主义就其是意识哪怕是正确意识，也同样不具有实践的功能。如果非要说它可以意识变物质，那么，也必然会成为虚假的意识。

不能说马克思把实践引入哲学从而就实现了哲学革命（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么说），如果马克思把实践引入哲学，只能是使其哲学成为实践哲学，成为实践本体论，只能使实践成为一种理论的实践。马克思要做的恰恰相反，是把实践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从哲学家的清谈中解放出来，还其本来的非理论的特性。也就是说，对马克思来说，理论上如果说得通，实际上做不到，就等于理论上也说不通，就等于理论也是错误的，就等于根本不是真理。所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要不是或根本不是在主张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任何相关讨论根本是无意义的或意义是很小的。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已经达到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但这根本没有意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说的是，对理论不能讲真理，只能就实践讲真理，只能对实践讲真理。对任何一个实用主义民族来说这几乎不成问题。同马克思一样，美国的萨谬尔逊也说，理论上对实际上不对，就是理论也不对。这就把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揭示出来，也许，对意识形态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是虚假意识，而在于在实践中如何行得通。

三、意识形态：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在实践中行得通

意识形态不是一般意识，而是被认为具有实践能力的意识，因此才被马克思认为是虚假的意识。在这点上，英国百科全书的辞条是对的，意识形态被认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功能。这种功能恰恰是形而上学的一般功能。因此对意识形态来说，重要的不是真假对错而是在实践中是否可行，或者，如果非要说真

假对错也只是可行与否的真假对错而不是与现实是否符合的真假对错。

当马克思说解释世界不是改变世界时，当海德格尔说解释世界就是改变世界并以此批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时，[10] 他们都说出了部分真理。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并不自身具有实践力量，意识要产生实践力量，必须要有实践的人。对海德格尔来说，解释世界也确实可以改变世界，但同样要有实践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当马克思引入实践时，并不是将实践范畴引入哲学，而是恰恰相反，主张哲学要同实践相结合，主张哲学与实践的联盟。这就是马克思反复强调晚年也一再坚持的《德法年鉴》的原则。这不是主张一种实践的哲学或实践的本体论。主张一种实践的哲学或实践的本体论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基本主张，是德国唯灵论的基本主张，是马克思父亲的基本主张——他反对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显然是由于他相信意识形态有这样的实践功效而拿破仑根本否认意识形态会有此功效。实践是外在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本身所内在具有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了形而上学，反对了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科学观念。这也正是拿破仑反对的重要方面，也是马克思反对的重要方面。

但是，意识形态虽然自身不具有实践力量却可以通过影响实践的人和影响人的实践发生革命性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在晚年总算是有所领悟。事实上，他本来应该更早就了解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头，他就已经提出，在德国，再没有比唯灵论更危险的敌人了。这里，马克思没有说德国的专制政权多么危险，没有说德国的警察多么危险，没有说实践多么危险，而单单说，没有什么比唯灵论更危险，也即单单说没有什么比某种意识更危险。为什么？显然它已经是在承认，唯灵论，作为意识形态确有强大的实践力量。因为在德国，唯灵论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意识。马克思自己也承认，德国人是一个偏执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因此，对德国人来说，唯灵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实践的力量（海涅在《论德国的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中已经说明）。

当然这确实是一种虚幻，意识形态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自我实现的实践力量。然而，马克思在反对意识形态中走向了另一极端，贬低了意识形态的价值与意义。这个错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晚年都予以了承认。他们承认，为了强化唯物主义以反对唯心主义的猖獗，早年他们确实反对意识形态反过了头。而在晚年，他们承认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反作用。然而，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意识形态仅仅只是反作用吗？对这一问题的反思竟蕴涵着一个革命性的结论：历史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的历史。只不过，这里不再是意识形态自身自我实现的历史罢了。问题必须这样理解，正如马克思早年所说的，意识固然不会自动具有实践功能，但意识却可以通过说服人而变成物质力量。但这时的意识已经不再是意识，已经不再是那种反映现实的意识，而是支撑并决定着人向哪里行动以及如何行动的价值导向、审美趣向、道德要求、宗教情感、坚定信念，一句话，已经是意识形态。所以，对意识形态而言，重要的不是真假对错，而是行动，是实践。意识形态不仅仅只有真假对错，更重要的是超越真假对错。真假对错只是一种唯物主义态度，只是一种物的尺度，只是一种科学意识。而马克思说，只有动物才按照物的尺度，而人按照美的尺度来创造。美、艺术等是超越真假对错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只有第二国际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等少数人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

> 他（李卜克内西）反对把经济基础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作为基础划分出来。……他认为，在马克思的体系中，“经济因素”被理解得过分狭窄和不正确；“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没有得到足够的规定，甚至可以说规定得不正确。意识形态和“经济关系”之间的关系被理解得不正确。[11] (P363)

问题直接关涉到唯物史观，关涉到如何看待经济决定论。所谓经济对历史的作用，所谓经济对任何人、任何民族都发生的共性的、一般的、简单性的作用（因此它不主导历史的特殊性和特性的历史性。也正因此，无论是五形态说还是三形态说都无太大意义，我们根本不能据此来预测任何真正的、因而必然是与之不同的独特的历史），仅仅是基础和前提，仅仅是复杂系统在近平衡态的一种状态。在系统的近平衡态，人由于必须依靠物质而生存，因此，经济追求无疑是决定论，是最稳定的。但是，一旦远离平衡态，一旦经济的基础条件被超越，一旦人们摆脱了最起码的经济条件的束缚，历史马上就成了自由的历史。在

那时，经济仍然会起作用，但那种作用，至多只能是作为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意识形态而在历史中起作用。所以有学者说，甚至连美国这样的国家，完全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也不会超过35%，也就是说，更多的人根本没有从事单纯的经济行为。

历史复杂性所表现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和规律性），一定深深困扰了马克思。以至于他完全丢下了对唯物史观最为重要的《资本论》第2卷及其他诸卷的出版工作和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去关注东方问题，并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抄录诸如爱尔兰、印度等大部头历史书籍。正是在这些国家，马克思发现了一个历史新世界：这些国家根本不是按照唯物史观构建的，因此同唯物史观的一般性、简单性、共性相比，它处处显示了特殊性，因而根本不可能从唯物史观推断出来或预测出来。在这里，不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所以，马克思还活着的时候，《资本论》第2卷已经很难出版了，因为马克思自己在给查苏利奇和《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也已经承认，至少东方俄国的历史之路已经确实不同于西方了。

意识形态这种直接指向实践的特点，使它成为真正主导历史的东西。关于创造历史，马克思说得最好的一句话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这句话寓意是深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因此不是意识形态实现的；但是，人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已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这已有的条件主要就是：中国人只能以中国意识形态的方式创造自己的历史，西方人只能以西方意识形态的方式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已有的经济条件确实起作用，但这种作用，也只是通过经济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起作用，在一个根本反对这一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下，是不可能起作用甚至是起反作用的。因此，中西方走过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确实是按照对财富的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斗争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却恰恰相反，是在反对这种逐利竞争并主张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中走过自己的历史的。

因此，必须重新理解人类史，必须重新认识人类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人类史就是民族史，而所谓世界史就是各民族相互联系的世界史，是更大范围的民族史。正是在这点上，马克思才提出了“否定民族特性”这个概念，将民族性一般地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阻碍力量。而列宁则在反对俄国民粹主义时完全站在马克思的一边，将民族“同化”绝对地视为一种历史进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主张必然会导致“去意识形态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对“去意识形态化”如此反感。恰恰相反，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同路人，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于“民族同化”、“去意识形态化”。因此，在当今世界三大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它们之间在这一点上并无什么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注意我们过去一直以来的结论），相反，在这点上它们是同盟军，它们的真正敌人则是民族主义并由此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公敌。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复杂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复杂。与之相比，建立在衣食住行等经济基础上的历史则要简单得多。因为，无论是什么民族，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都是一样的（要不马克思也不会认为它是普遍规律了）。但构成历史的，却恰恰不是这些共性的、普遍性、一般性的东西，而是特殊的、民族的、意识形态特色的东西。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基础无关或关系甚小，而与语言关系最为密切。过去斯大林将民族问题归纳为四个方面：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社会心理、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语言。实际上语言且只有语言才构成真正的民族性或才真正构成民族性。人类一开始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已经萌发，不同的人类历史也就开始了。

钱穆说的是对的，不能按地理环境或其他因素来说明人类史，而只能诉诸文化。但文化正是被人们创造的，因此，每种文化因不同的人而必然不同，哪怕是产生于一个共同的地域。中国就曾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其实何止于百），只是后来，由于文字、语言的统一，多元的中国文化也开始趋于统一。

与任何创造一样，首创是最重要的，它构成各民族历史的真正基础，决定了各民族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历史（当然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改变历史）。因此，当西方人说“being”这个词决定了它们的历史时

(真理之路)，中国人则差不多可以说“德”这个词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人伦之路）。在复杂性演进中，这一般被称为“一旦—永有”机制。最近，《科学》(Science) 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M.Waldrop 将其概括为“拥有者获得”。他举 QWERTY 键盘为例说明。这个键盘本是一位名叫 Christopher Scholes 的工程师于 1873 年设计的，为的就是放慢打字速度，因为那时如果打字太快，打字机很容易卡壳。但“一旦”这种打字机大批量生产，及“一旦”人们广泛采用后，也就差不多结束了其他键盘的历史（一旦—永有）。[12](P33-34) 中国恰好有了这样的语言而不是别的语言，中国恰好产生了孔子和老子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也就产生了只能在此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历史。因提出夸克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盖尔曼教授后来成了专门研究复杂性的科研机构圣菲研究院的创始人，他说过这样一件事:

>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只使用一门世界语就能促进普遍的和平？他向我描述了在两百年以前的文艺复兴与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复兴人物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德国思想家赫德（Herder）的一段话：有必要为保护语言多样性而拯救处于威胁之中的拉脱维亚语与立陶宛语，这是两种非常古老而且与古代印欧语系很接近的语言。[13] (P335)

确实，语言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但是，用“同化”、“一体化”来解决问题，根本不是办法。不同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不同的语言，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同时更是一种人类的历史，更是一种人类的历史经验，是保证人类不致灭亡的多样性的、绝对性的前提，更是人类在不同条件下的生存智慧。这种生存智慧使得人类多次面临灭顶之灾而没有灭绝。至于单一性如何容易灭绝，森林的历史已经给出了说明。俗语说，独木不成林。现在的问题是，同木不成林——就算不是独木——只要它是同一物种（同木)，它就不可能成林。因为任何一次病虫害就会将它灭绝。但是，只要不是同木，就总会有树木逃过此劫。同样的，对人类也是如此，在历史上，人类经过了许多依当时人们的技术水平根本不以应付的传染性极强、破坏力巨大的瘟疫的侵扰，死了许许多多的人，但却没有被彻底毁灭。甚至原子弹也没有做到：日本遭原子弹袭击后，仍有不少生命幸存下来。

因此，当代的一个重要任务不是“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是要保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反映在具体历史中就是，不是“否定民族特性”(马克思、列宁)，而是要“保护民族选择性”(卢森堡)。吉登斯说，在当代，平等就是接受对方，不平等就是排斥对方。这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十分恰当。

最近，有学者在一些场合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必须重新理解。过去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找原因，而我们则认为，关键在意识形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学会与不同意识形态同生同处，而不能试图去简单地加以取代。在这方面，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沉痛的教训。在中国，无论是“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是“四清”，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不管绕多大的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意识形态。这个教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本土化。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不错的，甚至是卓有成效的。在这方面，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必须重新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只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才真正开始注意历史的个性、特殊性、复杂性的方面，并且也只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才真正开始注意历史个性、特殊性、复杂性与各民族特殊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卡尔•李卜克内西才认为，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尽管在马克思晚年抄编印度编年史时，已经开始了这个方向的努力。

沿着这个方向可以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可以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从而也才能真正回答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解过于囿于真假对错上，因而将意识形态问题完全转化为一个科学问题，而科学的特点是有且只有一个唯一的真——有且只有唯一的一个真的物理学、有且只有唯一的一个真的化学，也就有且只有唯一的一个提问方式，那就是，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且只能有一个。于是也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谱系内部的长期的、没完没了的所谓“正统”和“修正”的论争。这个问题确实由来已久，因为马克思自己就曾多次强调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之分。然而正如悉尼•胡克（Sidney Hook）说的那样，这本身可能就违反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既然意

识形态只是特定条件、特定利益的产物，那么，就不可能企求只有唯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说没有一个最初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的，而是说，既然马克思主义也是特定条件、特定利益的产物（有人可能会不同意此点，但正是马克思而不是别人明确指出，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时代），那么，它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特定条件和特定利益的不同，马克思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种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也不可能只是一种唯一的真假关系，而是一种多样性的谱系关系，也就是一种血缘世袭关系。它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传统的理解在这方面是非常贫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种理解中，只有一个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只有一个唯一的物理学和化学一样；同样的，正如没有物理学的中国化，没有化学的中国化一样，也应该没有也不会有那唯一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可以中国化，那么结果必然是产生新的特定条件和特定利益下的新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也就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关注的不应当是以意识形态狭隘理解（真假对错）为基础的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谱系问题。马克思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包括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曾持批判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列宁学”等，甚至包括柯尔施（Karl Korsch）所谓的在马克思主义团体之外的个体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谱系的一支。它们作为马克思基因的遗传，都会历史地（这点特别重要）具有马克思的血液和基因，但无论它们如何像马克思（或多么不像马克思），它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克思，然而它们却都是马克思主义谱系分支中的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炙手可热的“回到马克思”的种种说法十分可笑。从谱系分支看马克思主义，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马克思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都会有别于马克思，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和分支的扩展，它们基因中的马克思的东西必然会越来越少；相反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基因和新血液将会越来越多地溶入马克思主义谱系的机体中。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时，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时，恰恰主要不是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说的，而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谱系说的。

[参考文献]

[1] 辞海：哲学分册 [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2]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 李毅嘉，王娅．马克思恩格斯的理念体系概论 [J]．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4).

[4] G.W.F.Hegel. The logic of Hegle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5] 笛卡尔．谈谈方法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洛克．人类理解论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 张驰．西方哲学核心词“是”的误译问题 [J]．学术研究，2006，(6).

[8]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Z]．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10] 海德格尔．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J]．哲学译丛，2001，(3).

[11] 布•恰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修正主义斗争史 [M]．北京：三联书店，1964.

[12] 米歇尔•沃尔德罗．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 [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3] [美] M. 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 [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罗 苹

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阐释模式

——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 张秀琴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也即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辩证”式阐释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辩证”阐释模式主要包括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阐释维度——在本体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问题；在认识论维度，主要讨论的是主客体二分法与“辩证法”或“否定”性认识方法问题；在方法论维度，则主要讨论的是“音乐拜物教”与“商品、资本和货币拜物教”问题。在以上三个领域中，阿多尔诺、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都存在着异同点。

[关键词] 意识形态　“辩证”　阐释模式　马克思　阿多尔诺　霍克海默

〔中图分类号〕 B0-0;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7-0013-05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本体论维度：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是否为一种本体论的存在

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坚持“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即把启蒙精神以及其在现实层面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性的存在；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则没有赋予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以本体论的意义。前者在讨论具有本体论性质的启蒙精神和工具理性问题时，所涉及的批判对象（即意识形态批判目标）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有相似之处，即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然而，首先，前者主要是从德国近现代哲学的批判（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入手，上溯到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其次，前者在对哲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是将主要批判点放在了传统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非同一性特征以及非批判性特征，而马克思则将焦点放在了传统哲学（尤其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所具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上（尽管阿多尔诺在进行非同一性批判时，也多少涉及到了对黑格尔等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的批判，并还因此而被西方学者称为“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兴趣却并不在对唯心主义性质的揭示上）。第三，在进行这样的意识形态批判时，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纯粹哲学的“天上”层面，而是将批判理论付诸“尘世”生活，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入手，深入分析了导致精神文化层面异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根源，而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则仅仅停留于艺术美学等文化工业层面（尽管他们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将批判的矛头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异化了的和意识形态化了的被操控的世界）。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维度，主要是从批判德国近现代哲学（如阿多尔诺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以及霍克海默对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批判）开始构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当然，这一构建工作的基石，就是赋予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以本体论式的存在意义。他们所说的“启蒙”，并非仅仅指起源于 17-18 世纪的那场特殊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进程中所发生的

* 本文系 200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论”（06CZX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秀琴，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哲学博士（北京，102249）。

所有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的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历程”。在他们看来，“以理性和技术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对自然的统治权为宗旨的启蒙最终走向了反面，走向了理性的启蒙的自我毁灭和理性对人的统治的悲剧”。[1] (P133-134) 也就是说，启蒙理性意识形态化了，并变成了工具本身，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对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进行批判。

他们所进行的这一批判活动本身不仅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经过卢卡奇改造后的“物化”概念）那里借用了“异化”概念用来表达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而且还沿用马克思的批判路径，将对现实的批判延伸到对这一现实的理论根源——即对哲学思维根源的探讨之中。也就是说，他们都将理性认识或启蒙精神的意识形态化视为是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由此，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的批判，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这里也就演变成了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阿多尔诺指出，“当代哲学最终在海德格尔这里以一种貌似革命的形式与资本主义制度、物化世界达成共谋”。“为了能够实现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内在批判，‘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自己’”，阿多尔诺采取迂回战术，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了克尔凯郭尔及其生存概念。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击败’黑格尔的同一性体系”，哲学人类学“不过是人类学生存论维度上的内在化的异化史观”。克尔凯郭尔不是把唯心主义祛除了，而是把它“‘内在化’了。“现实的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恶’受到了批判和扬弃，而是作为人的新的本性被肯定下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阿多尔诺是在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补写‘圣克尔凯郭尔’章”，因为克尔凯郭尔“生存哲学的逻辑结构其实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史观是极其一致的：异化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质不是消失了，而就存在于异化之中，只不过是以颠倒的形式存在着罢了，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异化中认识、领会人的本质，而是要通过对异化的认识扬弃异化，回复人的本质、找寻到生存的意义”。就此而言，克尔凯郭尔的理论是黑格尔学派解体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支，在阿多尔诺看来，“现象学体现了一种新的‘哲学精神的努力’，即在‘唯心主义体系消解之后并沿用唯心主义的工具，自主理性力图获得关于存在的超主观的有约束力的规则’”。[2] (P129-153)

关于唯心主义，在阿多尔诺看来，尽管“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在外在形态上已经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有了巨大差别”，但“现代哲学并没有因此能够逃脱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窠臼”。因为，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的理念是研究，哲学的理念是解释”。“真实的哲学解释不遭遇已存在于问题之后的混合的意义，而是突然地、暂时地照亮它，同时消耗它”。因此，“哲学的现实性、真正哲学性的解释是‘揭谜’。这个谜就是资本主义永恒化或历史的自然化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哲学的真正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去改造海德格尔哲学，‘哲学意识的真实改变才能成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黑格尔对康德进行的批判的主要功绩，在于他着手‘将从内容方面进行思考的权利与能力再次给与哲学’这个课题”。而且，在他看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也具有“在思想中”“避开内容的倾向”。[2] (P184-193)

可见，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都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他们发现了各种唯心主义与资本主义实践及其意识表现形式之间的同一性或共谋关系，从而对其客观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深刻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几乎全部西方哲学流派都囊括进了他们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严守马克思（同时也是黑格尔）的立场，将文明的进程同时视作启蒙的进程”，“启蒙只能凭借自身的手段，即控制本性的精神来超越并实现自我”，因此，“哲学就是‘通过概念而超越概念的努力’”。他们在进行这样的批判时，所遵循的“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并且他们寄希望于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则尝试着将保守主义者们对文明所进行的反启蒙批判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理论中去”。也就是说，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试图将启蒙批判这一传统重新应用到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某种极端化的启蒙中去”。[3] (P8-9)

从上述关于阿多尔诺、霍克海默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诸多方面所存在异同点（特别是差别之处）上，我们不难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何没有赋予意识形态化了的“启蒙精神”或“工具理

性”以本体论的色彩了。

二、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维度：主客体二分法与“辩证法”和“否定”问题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是反对主客体二分法，为此，他们还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错误的反映论思想，即坚持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说，认为这是对主体性的质疑；但同时，他们又以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结果得出结论说，现代工业社会里，人的主体性被片面地摆到了新的神话的地位，因此，目前的任务是要偏向客体的方面（主要是阿多尔诺的观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本来就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是具有非同一性的，因此，任何关于主体和客体同一的理论（包括反映论或符合论）都是错误的和虚假的，并因而都是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

建立在这样的认识论基础上，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对“辩证否定”的新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一种绝对的否定（即“大拒绝”式的或总体性的批判）。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关于“辩证法”和“否定”的理解，和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和否定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了。

有些学者看来，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重建自己的辩证理性阐释模式时，就像是“张起‘限定的否定’、‘模仿’、‘非同一性事物’等概念之帆，在忧郁的波涛中自由自在地行驶”，并因此而试图“超越”“古典的主体概念的崩溃，而最终达到了新的主体概念‘非同一性主体’”。[4](P4) 如果说“作为战斗着的唯物论者’的霍克海默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为问题，其立场是对乍一看抽象的、普遍的理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有意识批判的整体意识形态批判”，那么阿多尔诺则“是站在更为内在性的理论立场上”，即他认为，“相对于理论的社会现实不是存在于理论之外的，而是存在于理论内部”的。因此，要“去探求理论自身在无意识情况下所记录的社会性现象的痕迹”。为此，他求助于本雅明和弗洛伊德，在前期对现代思想——启蒙理性或工具理性思想进行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祛意识形态之魅的新哲学的任务问题：在他看来，过去“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像黑格尔哲学所体现的那样，根据理性把现实作为一个总体去把握”，但实际上只是一种幻想。因此，现在应该是面对“哲学的现实性”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即“哲学已经不能解决‘存在’与‘全体’这一根本问题”，而是要以“解释”的立场，为“哲学打开与个别科学间相联系的一条道路”。这里所说的解释，就是一种“解谜画”式的态度。也就是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去探究隐藏在现实中的意图，而是‘解释无意识的现实’”。“哲学将个别科学取得的成果作为新的谜，作为没有密码的‘解谜画’去探究”。这样一来，阿多尔诺就试图“通过内在的批判”来“‘消解’古典问题”。然而我们知道，“哲学所面对的各种历史问题和理念，与著作外部的历史现实决不是毫无关系的”，因此，阿多尔诺认为“通过哲学解释取消古典问题，就必须要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现实进行变革”。于是，在《哲学的现实性》中，阿多尔诺“将这种变革现实的思想命名为‘唯物论’，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语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相关的哲学理论进行引证。而且，这种理论（解释）与实践的互相联系，毫无疑问就是‘辩证法’”。而在此意义上，所谓的“辩证法”，就是“彻头彻尾的意识相对于同一性的非同一性”。[4](P41-56、150)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中，实践唯物主义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而实践唯物主义所坚持的是在实践中坚持主客体的互动关系，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强调客体的第一性和主体的第二性。但这并不是否定主体性，反而是对主体性的科学认识，因为这是在坚持唯物论基础上的对主体能动性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强调。尽管有学者也认为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也强调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性，但他们的那种缺乏唯物论基础的并因而也是缺乏实践精神的主客体互动性永远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他们在理论上左右摇摆与对主体与客体的强调以及一方面在理论上拒绝主客体二分法和反映论，另一方面又在理论论述中不得不运用着自己所反对的认识论观点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辩证法”和“否定”范畴有着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不同的理解：辩证法不再仅仅被理解为革命或批判，而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论和世界

观，否定也不仅仅再是绝对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是一种扬弃。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这是在试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关于文明发展史的范式稍加变化，以便人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形成的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某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他们试图揭示：“从进步到镇压的社会辩证法中无法找到‘自然的’出路，因为上演着这一辩证法的舞台正是人类主体自身。在人变成主体的过程中，已经注定了对人的罢黜，这仿佛是一种着了魔的辩证法。因此假设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个时刻，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可以给每个人自由和丰衣足食的阶段，此时也就不存在能够得到社会财富并获得解放的主体了”。因此，对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而言，“启蒙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理性的历史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在文明的史前史之中，理性从一开始便受到了统治和意志的感染，获得了自持”。在解释理性和统治的统一时，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试图从康德和尼采的眼光（认识论批判）出发来看待马克思，而与此同时又试图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眼光（唯物主义）出发来看待康德”。[3](P155-156) 在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维度的这一矛盾性，必然导致其最终在方法论上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之间走向不同的关注领域。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论维度：从“音乐拜物教”到“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其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出发，坚持一种“冬眠式”的艺术美学解放之路（如阿多尔诺关于音乐拜物教的分析）；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将意识形态批判付诸物质实践领域（马克思对资本、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来推翻意识形态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美好家园。

由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哲学纲领已和自身的困境互相纠缠在一起”，因此他们的新哲学既然“是对问题的解谜”，而这种解谜又“以问题的消除而结束，而消除各种问题的最终途径，必须是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进行变革”。但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最终并没有寄希望于“无产者通过社会革命实践进行变革”。[4](P56-57) 也就是说，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想实际化为无产阶级与政党的存在，而是对事态进行了内在的批判”，尽管他们“是在由实践的现实变革而带来的哲学的自我扬弃这种古典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延长线上，思考‘哲学’的”，但“只要哲学是对更好的生活、更正确的生存而进行的沉思，实现这个目标就成为了哲学的任务。与通过实现所带来的现实取得一致，才是哲学的真正目标”。[4](P84、144)

于是，艺术、美学以及文化领域便成了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实践”领域。他们把“艺术看作是社会总体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操纵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而扮演的却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当他们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反艺术”特征之时，他们实际上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在进行其意识形态批判的。与此同时，他们又赋予艺术以否定异化社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批判的并不是艺术本身，而是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下的艺术的异化形式，也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艺术”。[5](P178-193)

由此出发，阿多尔诺还提出了“音乐拜物教”概念。他“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认为拜物教不仅是心理学范畴，它也是经济学范畴，其根源在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使用价值统治的社会中的商品特性”。阿多尔诺“模仿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过程——从商品的消费追溯到商品的生产，并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发现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也从文化工业的消费上溯到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然而这样的分析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观的实践态度，因为在阿多尔诺看来，“艺术并不能做到它所要做的事情，并不能实现它想要达到的理想。艺术所能做到的只是否决或否定它在其中构成一部分的那个异化了的社会”。因为，艺术本身已经被异化了、被操纵了，一句话，被意识形态化了。看来，“艺术一方面作为异化的意识构成统治者的同谋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为否定异化而否定它自身。艺术的矛盾地位使它保持下来，使其自身履行既否定社会又保存自身的责任。然而，保存艺术自身又必然导致保存现有社会，因为现有社会

的一个组成部分恰恰是艺术”。[5] (P194-197)

因此，阿多尔诺“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艺术仅仅归结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形式。”他认为，“如果把艺术只归结为一种反映形式、一种意识形态，那就等于忽略了艺术的独立的自在性。艺术具有一种珍贵的本质，就是可以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存在，并引导人们在为未来的理想奋斗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真正的艺术是合法的利益的代表形式，是人类的未来幸福的表达形式”。在阿多尔诺看来，“作为一个整体，艺术的空想可以把人类领到遥远的、幸福的未来，因而可以无限地否定现实，使人们领略到现实的可恶，因而痛恨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艺术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它的功能应与人类理性和情感的功能相适应；它远远地超出物质的功能”。——然而他关于艺术异化的分析，又表明：“阿多尔诺在反对反映论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反映论应用到自己的理论分析中”。[5] (P198-199) 为此，阿多尔诺认为“在现时代，艺术与美学历史地具有了认识真理的功能，但是它们不应当‘在现存世界的梦想中忘却，而是要以形象的力量去改造它’，即它们应当成为现实革命的前奏”。“音乐之于阿多尔诺，犹如经济学之于马克思”。在他看来，“音乐的解放、人类的解放”才是人类脱离同一性苦海的必经之路。[2] (P36-37,57)

可见，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坚持的是一种建立在艺术美学层面上的文化解放论（尽管他们也对资本、商品和交换等经济现象以及政治统治形式做了十分类似唯物主义的分析，但他们做这一分析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经济领域的这些异化或意识形态化现象，而是为了说明进行冬眠式文化艺术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马克思则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物质实践解放观（马克思对资本、货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领域，而且也涉及到了精神文化领域甚至是宗教领域，其分析的目的最终落脚点依然是物质生活实践而非精神领域）。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反映了其在意识形态批判最终目的上的天壤之别：对于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来说，或许批判本身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说已经足够了；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批判只不过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发点而非结果，其最终结果是要将人类引入自由和解放之境，而且，为了这一目标，马克思还为我们指明了现实可行的或者说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而在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却多少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尽管艺术美学之路（即文化的祛意识形态化之路）多少对于我们今天的“物欲横流”的商品化世界有警醒作用，但同时也只能是一种安慰剂，因为缺乏物质生产力的最终发展，即物质的解放，所有的精神的和意识的解放都将最终落空。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等.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 [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 张亮. “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尔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 [M]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 [德] 阿尔布莱希特•维尔默. 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辩证法——遵循阿多诺的理性批判 [M] . 钦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日] 细见和之. 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 [M] . 谢海静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 马驰. 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M]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

◎ 李广昌

[摘　要]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自觉过程。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检视中，主体性原则强调只有理解我们自己，才能理解马克思；只有在“理解自己”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理解，才能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一原则以中华民族自身主体性的展现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释放的载体，在“自觉觉我”与“自觉觉他”的民族性理论自觉中，力求以思维方式的转变开辟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现代视野，并且以此探究当代中国哲学的学术方向。

[关键词]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　主体性原则　自觉觉我　自觉觉他

〔中图分类号〕 B27；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18-07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以这样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为前提的：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不经“中国化”的哲学是无效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传统中的一部分；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理念，我们还远未完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所提及的事实与命题之间，必然有着一条由此达彼的逻辑通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是在这条通道中的一种理论考究。在考究中，我把主体性原则规定为“以中国人的主体性展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它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在“自觉觉我”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自觉觉他”为基本内涵的。

一、主体性原则建立的前提

一种新原则的确立，一定是批判性的。它既包括对旧有原则的批判，也包括对旧原则指导下所展开内容的批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主体性原则的批判性所指，就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过程，是在中国独特政治话语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交织中，展开其全部内容的。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服膺于社会意识形态发展需要的政治语系的应用，还是沿着理论发展固有逻辑展开的学术对话，都服从于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前提：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能够为中国人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对象化”存在。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创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不同原则。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过程，就是这些原则指导下的理论构筑过程。

众所周知，伴随马克思主义传播而引进的马克思哲学，首先是对一种经验事实所确立的榜样的认可。苏俄革命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的救亡历程提供了现实航行中的灯塔，而且也顺理成章地把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哲学作为“开启民智”的思想传入中国。显然，马克思哲学是以一个已经为“经验证实”的“经验对象”身份在中国出场的。这种出场语境决定了从一开始“引入”时，马克思哲学就已经必然地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过程。尽管经历了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但传统文化中“学以致用”的实用理性，已经根植在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外来文化接受的目的，必须在“是否有用”、“能否解决已有文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一个简单标准的校验后，才能为国人认同。这表明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历程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这段历史中，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先驱们毫不迟疑

作者简介　李广昌，沈阳大学社科部副教授，吉林大学哲学博士生（辽宁　沈阳，110034）。

地把马克思哲学“化为”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再把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具体化”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努力，作为接受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路径。

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理论的特殊命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漫漫里程，在其初始阶段就已经取得了足以令共产党人引以为自豪的骄人成就。政治上，它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为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搭建了最有说服力的舞台。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这个期间“中国化”得以成功的关键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接受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未怀疑过马克思哲学的传播是要服务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的。这意味着，“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自发地存在于每一个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做出贡献的人身上。第二，在这个前提下，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决定了当时中国人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关注程度和理解水平。在诸如民族问题、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等问题上，马克思哲学开辟了中国传统文化未曾给予的新视野，因而也在理论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赢得了中国人极大的尊重。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初始阶段得以实现的两个重要条件，培植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经验性原则。经验性原则与中国文化独特的实用理性有着相通的一面，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马克思哲学被当作一种以经验事实（苏俄革命的成功）为基础确立起来的“经验对象”，以中国式的思维习惯和表述方式来解说马克思哲学的新模式形成了。但在经验性原则引领下，被我们所理解、解说和应用的马克思哲学带有明显的素朴实在论和经验论的色彩。理论的先天不足似乎没有影响中国化的进程，但它所包含的内在缺陷，却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未来历程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经验性原则的理论根基是经验论，人类认识史表明，经验论只能是一定阶段下认识水平的标志，当社会发展超越这个阶段时，它的局限性便表现出来了。

当中国共产党人把自身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时，意味着在中国人眼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去了经验性的示范作用。但是，因革命成功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权威性，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动摇。榜样的颠覆虽然终结了作为“经验对象”的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生长之路，但通过已经中国化了的教科书哲学体系，却把马克思哲学由“经验对象”演绎为“先验对象”：马克思的理论成为无需证明（或已经证明了）的先验真理体系或先验知识论体系。“经验实在性”的马克思被改造成先验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成为“已经为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因而先验地统摄着我们全部行为的指导纲领。先验原则的特点是无需以经验事实去检验这种理论，反过来，它要求所有的经验事实必须融于先验的框架之中。在这个原则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演化为“实际联系理论”，如何学习、领悟、贯彻和执行马克思的理论，是当时所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在先验原则指导下理解马克思哲学时，必然地把对马克思哲学的学习态度置于知识论的话语之中，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可为经验事实的认知提供指导的“先验知识”。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活力被消解，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精神被搁置于知识框架之外，因而也被严重扭曲。先验原则的确立离开了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具体语境，也使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按照不破不立的原则，对马克思哲学这样一种外来文化的接纳并设定为指导思想的企图，必须破除旧有的文化理念。这意味着，在衔接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并且逐渐放弃自身民族倾向的过程中，我们已经自觉地、有意识地降低了主体性的身份，淡化了主体性原则。当我们以泯灭自身生存土壤作为两种思想传统对接的代价时，实际上已经人为地颠覆和终结了我们的传统。它的最终结果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运作为“中国‘马克思哲学’化”。

任何先验体系构架的最终指向，一定是一个超验的目标。上个世纪60年代中晚期，马克思哲学不仅被理解为先验的知识体系，而且也被当作信仰的终极。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也由原来的先验原则转为以信仰为核心的超验原则。而马克思哲学引入初始阶段自发形成的主体性原则，在这个时期已经丧失殆尽。与此同时，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超验对象”、其自身的理论递进、思想转变和历史发展过程完全被忽略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总汇”定位，终于把马克思哲学推向了神圣化的舞台。

以超验原则确立信仰体系的做法，并不是我们的创新。康德对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界，同样是以超验原则的确立来解决认知对象与信仰对象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康德看来，认知理性不能“纯粹”，它只能在“感性杂多”的材料中完成“先天综合判断”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实践理性必须“纯粹”，它必须在舍弃所有经验性的解说之后，才能在诸如自由、道德等纯粹理念的支撑下完成目的论的建构。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姑且不论，但康德提及的理性发展路径问题，却能引发我们对超验原则的重新思考。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我们所设立的“超验原则”实际上是来源于经验世界，并且力图用经验的事实和经验的知识来揭示被奉为超验对象的马克思哲学。“超验”与“经验”的硬性对接，并不能创造出“理想的”信仰体系，它的结果只能是以信仰的形式推行现代迷信。这种迷信首先以超验权威的一元解说取代甚至扼杀其他声音，其次在以经验事实解释和维护超验权威过程中，又以理论的随意性遮蔽了现实中种种问题的探求路径。迷信的结果是：“把人类托付于来自九霄云外的神秘统治者，而这种莫名其妙的统治却足以否定掉人间的正常法制。迷信总是群众性的。而在迷信盛行的时代，即使智者也不得不服从于愚人。”[1](P118) 无视于5000年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历史事实所确立的超验原则，不可能化为中国人的具体行为准则。信仰的对象未能得到信奉者的认同，信仰的光环一定会黯然失色。马克思哲学变为一种“口头上”信奉的理论时，它的崇高与神圣，便在理论接受者复杂的心理错位中，失去意义了。我们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哲学所做出的种种“创造性误读”，终于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悲剧。“文革”十年是一个理性蒙羞、思想蒙垢、学术蒙辱、历史蒙耻的时代，而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的批判，还远没有达到马克思当年对德国所做的批判那样：“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2](P4-5) 历史不会因为耻辱的“遗忘”或问题的“悬置”而遮蔽了自身所经历的曲折。理论前进的路向中，用冰冷的手术刀解剖自己是个痛苦的过程。但唯有经历此种痛苦，才能克服前进中的羁绊，实现思想的提升。

未曾了结的历史任务，已经成为今天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因为，超验原则不仅完全放弃了主体性原则，而且实际上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主体性原则的丧失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进程被中断。对马克思哲学的执著坚守不得不流于现实中的无奈，理念的匮乏与理想的缺位，终于导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在现实社会中失去平衡。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百余年的历史曾充分显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力量，而我们所经历的挫折与失误也必然引发对已经存在于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的重新思考。我们所提出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命题，既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又是它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

主体性原则的历史性批判，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呈现出它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命题不仅仅是历史的反省，它更是一个基于现实中国的理论重建过程。

二、主体性原则的理论主张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主体性原则的理论主张，强调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只有理解我们自己，才能理解马克思；只有在“理解自己”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理解，才能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一思想的规定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被理解为“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理论自觉”。任何一种理论自觉都包括“自觉觉我”与“自觉觉他”两部分。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主体性原则的视域中，“觉我”是“觉他”须臾不可分离的前提。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听懂对方”当然是对话的前提，但它不是对话的全部，更不是对话的目的。“中国化”的目的是丰富与拓展思想的自由度，为思想找到更为深厚的现实基础。在“听懂对方”基础上考虑我们自身的问题，才是“中国化”的现实出发点。因此，对我们自身问题的理解与认识程度，决定了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决定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层次与水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 以“觉我”为核心的主体性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身“国家需要”的了解。对于现代中国来说，马克思哲学的存在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经验事实，更是我们民族基于这种经验事实基础上的理解与认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认知不是一个简

单的客观对象的认知，而是对一个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和研究历史的“对象”的反思。为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提出的首要任务不是怎样认识马克思，而是怎样认识中国。只有参悟当下中国，才能在中国的角度上理解马克思，并推进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没有这种理论上的“自觉觉我”过程，任何形式的“觉他”都是毫无意义的。

高清海先生曾经说过，创建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创建当代中国哲学理论乃是中国人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寻找自己发展未来道路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3](P235) 对于中国当代哲学来说，“觉我”是对中国已有理论、思想和文化的反思，同时也是对中国现实生活世界的觉解和觉悟。这意味着，“觉”的含义不只是认识，在更深的层面上还包含着自身的体认和领悟。中国传统哲学中，无论是程朱理学对“理”的“体认”，还是陆王心学关于“心”的“省悟”，都把“认识”(格物) 与“体认”做了极为高明的区别。这种丰厚的传统给养无疑是当代中国人理解马克思及其当代西方哲学得天独厚的基础。

“觉我”是主体性的伸张。把“觉我”当作主体性原则的第一要素，既是源于对哲学及哲学自身历史的理解，又是源于对现实中国的哲学考虑。从前者来说，自马克思“颠倒”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路径以来，任何构建先验或超验哲学的努力，都已经在现代社会世界性的“终结”中失去了时代意义，而面向生活世界则几乎成了现代哲学的理论共识；从后者来讲，游离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任何一种“形上关怀”，同样已经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中陷于绝境。它不仅会在实践中酿造出民族性的历史悲剧，而且也会因为切断理论的生活给养断送哲学的未来。

“觉我”对生活世界的理解，首先是一种主体在内省中展现主体性的过程。当思想在广袤无垠的生活草原上策马扬鞭之际，哲学所关注的也许不仅仅是鞭头所指的未来。它同样会留意身侧的烂漫山花和绿草清泉，在生活世界所能给予的一切中，咀嚼着现实的甘美，品味着由“人”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为“人”所带来的一切美好和幸福。哲学的批判精神，不只是对人类社会罪恶渊薮的挖掘、昭示和讨伐，它更应该有着对今天生活的讴歌与赞颂。哲学不应永远是不问收获独自耕耘的悲壮努力，它同时应当在对“人”的认可中找到欢乐的土壤，并且以自己的方式肥沃着这块土壤。人类的家园总是植根于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植根于人的创造之中。哲学以“觉我”的姿态对家园的寻觅，是以反思的形式证明着自身存在的理由。在这里，所谓“终极”的设定，与其说是逻辑理路演绎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现实欲求的非理性张扬中所表露出来的生活渴望。现代哲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诺齐克晚年对哲学就做出这样的结论：“哲学不仅是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思想所充满、所改变的生活方式。”[4](P12)

从这个意义上说，“觉我”的目标所指，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实经验着的生活世界的认识，它更着眼于对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感受和体验的再认识。作为“对象”的人的生活经验与客观事物不同，它已经是一种人生体验，不纯粹是经验性的，而是包含了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之后所形成的一些素朴的生活理念。换句话说，它要考虑的不仅是人的生命本质、存在方式等人生基础问题，更要反思人的生活意义，人的内在精神，人的价值追求、信仰目标、精神状态、生活感受及其和现实生活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主体性原则即是中国人自己对自身生活世界理解的原则，它不屈从于外在的规范和解释。以生活方式为思想表征的哲学，不应该依靠外来的文化或语言作为现实生活的唯一载体。

“觉我”的内省方式必然涵盖着对“我”之局限的理论认知。历史上，马克思哲学的引入，就是渴望能以新的思想注入，激活已经僵化了的文化、凝固了的文明和在新世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的传统。因此，在对自我局限性克服的努力中，“自觉觉我”一定涵盖着主体的“自觉觉他”过程。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选择。毫无疑问，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初衷，与今天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着“中国化”的“马克思哲学”，不仅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且涵盖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如何探求和规定主体视域中的马克思哲学，就成为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哲学改革，开始了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认识。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走进（走近）马克思”的理论主张。这种主张首先说明过去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种种失误，我们的“创造性误读”如何造就了中国现实中的种种悲剧；其次以文本的考证与新的诠释来试图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期待着在“正本清源”的努力中，找到“回到马克思”的正确路径。

我毫不怀疑“回到马克思”的努力对于马克思原初理论真实性考究的意义。但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这种努力所开辟的方向却值得深思。这种做法同样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已有的历史的经验对象来解说，不是要把对象主体化，而是又一次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应当尊奉的主体，在“纠偏”过程中，强化“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规范。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考究固然会在汲取马克思丰厚思想资源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获得了发展马克思哲学、进而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权力。“走进马克思”的理论由于模糊了“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因而只能在文本本真意蕴的探究中“贴近”马克思，它完全忽略了中国人对自身当下生活世界的认知、领悟与感受，因此再度解说和重新认识的马克思，只是提供了马克思哲学的“真切度”，而不会对“中国化”的进程有多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马克思哲学原初语境的努力，也许会使马克思哲学更加远离21世纪发展着的中国。

对马克思哲学的“自觉觉他”不能仅仅以文本——哪怕是马克思的重要文本——为基础。这不是由于文本解读多元性的可能会使我们的思想在一个“不确定”的标准中陷于无谓的争执，也不是由于我们曾有过根据不同“需要”推崇不同文本、从而降低了文本严肃性的历史；而是由于，任何一种历史文本都不可能提出我们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更不可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任何方案。这不是说，马克思哲学及其人类思想的资源失去了现实意义，恰恰相反，唯有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而不是历史的文本中，才能真正挖掘出、体味到经历了历史陶冶与筛选所留下的伟大思想的不朽意义。任何思想都是在历史运动中得以产生的，当我们在历史背景已经得以转换的今天，仍然把历史思想凝结所形成的文本作为出发点时，只能把马克思哲学看作是一种观念体系，一种不依赖于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而对这种思想的研究，就只能在“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2](P138) 马克思本人对德国政治理论派也曾批评道：“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你们成了书籍的附属品”。[5](P38) 拘泥于文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使我们在“回到马克思”的高亢曲调中，断送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程。从学术角度上说，马克思哲学引进中国，应当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应该取代或终结我们的思想传统。

基于思想传统体认和反思基础上的主体性原则，不只是一个新的理论视窗的开辟，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站在“自觉觉我”角度上对马克思哲学的“自觉觉他”，重新梳理了当代中国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以中国人的理论自觉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起点和努力方向，这意味着我们将在中国的视野与世界视野统一的层面上，重新创造我们的历史。当我们以自觉的方式理解并贯彻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主体性原则时，实际上是在对历史的反省中摈弃了主体性原则的自发形式，纠正了历史上一度搁置主体性原则的做法，把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转化为现实的主体性要求。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性原则中，马克思哲学意义的释放，必然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主体性展现之中。

三、主体性原则中的“生体性”陈述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方向，标志着涵盖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觉醒”的内涵是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的问题，探求中国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应当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或文化，都必须经历“中国化”的历程来确立其合法性地位。

主体性原则不是传统认识论所给出的“生体原则”。主体性原则中的“生体性”，是在一个新的理论视域中对主体做出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主体性表现为民族本性在时代发展的不同阶段逐渐展开、逐渐实

现、逐渐完善的过程，它既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自性”的标度，又是民族展现自身并力图超越自身努力程度的标度。以民族自省方式展开的主体性，已经超越了传统哲学中主客体的两极对立。

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是民族自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文化，是民族自性的基本载体或存在方式，它的历史就是它存在的理由。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不是理论中铺就的历史，而是实践中展开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我们没有经过西方认识史中主客体分离的痛苦裂变，它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和生万物”等理念，已经在自觉状态中把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置于社会不同阶段的实践之中。但是，近代社会伊始的历史剧变，却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了重创。在痛定思痛的过程中，我们把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先进文明样式的任务，作为实践托付理论的历史使命。对马克思理论的历史选择，就是这一使命的实践过程。对于现实中国来说，马克思哲学理论最大的感召力是它所倡导的“实践的思维方式”，它不仅超越了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争执，而且也超越了主体、客体对立的两极。这种“超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接续关系，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放在中国传统文化厚重土壤上加以理解与反思时，其意义在于找到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契合点：在现代社会里，中国的民族自性不是以我们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主客对立”为前提，而是在实践中超越“主客矛盾”，并以此重新规定自身主体性为基础的。

主体性的现代规定必须溶于现代社会的整体认识之中。当人类社会由地域性和民族性规定自身的时代，走向在世界的总体图画中显现自身的时代时，“理解自身”的认识参考系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主体性”以自身生发的世界性基础为独立性的标度，因此既不会在排他性的客体性规定中找到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不会仰仗康德“哥白尼革命”式的主客关系易位来凸现主体的特征或作为主体的标度。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88)“现代性”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孤立的环境中生存发展，主体性原则，就是要在人类文明共性的探讨中，寻觅、理解并展开我们自身的主体性规定。

超越了“主客对立”的民族自省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世界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无论是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思想的历史传承，还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地位，都已经把中国作为世界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关于自身主体性的认知，就必须融入到世界参考系中重新审视自身。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身份标识，必须在新的文化参照背景之中得以标定。显然，由于“主体性”的伸张已经改变了“主体”的狭隘框限，主体性原则必然是超越了主客体两极对立的一种新的原则。

新原则的确立克服了历史上中西文化关系认识中的一些理论纠缠。在传统“体用关系”的诸种解说模式中，都是把主客体的对立作为理解中西学关系的前提。众所周知，中学西学关系争执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的“体用”之争，迄今仍影响着我们对待西学的态度。甚至在我们今天对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解释中，仍然可以感觉到缠绵于传统体用关系模式中的情感困惑。在中国哲学对待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哲学的态度上，能否摆脱“体用关系”之说的缠绕，不仅决定了中国哲学当代视野的开阔程度，而且也决定了它采撷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精华的基本层次。

主体性原则自觉地把主体性溶于“世界历史”的规定之中，因而走出了特殊语境下所产生的理论偏执，也使“体用关系”这一历史问题得以消解。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恰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理论自觉中必不可少的前提。马克思理论的历史传承来自于西方，中国人的思维特质却因袭了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对接也许有着许多偶然因素，但当我们把中国理解为世界中的中国，把中国的历史作为“世界历史”来加以考究时，意味着当初从“中体”出发对马克思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今天已经超越了民族、地域的界限，成为一种必然性和世界性的选择了。当代中国哲学生长在世界发展到今天的理论语境之中，它必须以人类文化已有的全部历史成果为基础，并广泛地吸纳别国一切有价值的先进思想，这当然包括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现实选择。

超越了主客体及其体用关系两极对立的主体性，绝不是要模糊主体的界限。它所强调的是，只有超越了主客体的对立与体用关系的狭隘规定，才能真正认识到现代社会主体的地位并凸现主体的价值。当代中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囿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理论，而是在现实中经过中国人的实践咀嚼、夯实完善、发展创新的新理论。马克思所开辟的学理致思之路，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合法性根据的理论承担，它的理论命运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的历史需要反思。尽管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摈弃马克思哲学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更有自己的生活基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致思路向，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鲜明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曾经被遮蔽过，在今天文化觉醒的时代背景中，应当作为时代的特征，因而也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特征凸显出来。

哲学离开了“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中国人所奉行的生活理念、个人的行为准则和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主张、理论宗旨融为一体。也许马克思说得对，在这些问题上，一方面要考虑“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2](P11)

因为，毕竟是我们选择了马克思，而不是相反。因为，毕竟是现实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为先进的思想引领，而不是相反。

[参考文献]

[1] 培根随笔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参见高清海．高清海文存续编（卷一）[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 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 [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何蔚荣

抽象人的突破与历史的“人道”建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解读*

◎ 周 峰 周 霞

[摘 要] 通过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人道主义构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的重要资源。唯物史观之所以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就在于它扬弃了人道主义对抽象人、人性和理性的崇拜，确立起实践的社会历史观念。与资本主义人道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扬弃人道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世界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上的先验性，确立起了革命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人道观念。对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道”观念将会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人道主义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25-06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说道，马克思在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的 1842——1844 年时期，他是受制于人道主义总问题的支配的（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的总问题的根本规定是：“从人的本质，从自由的人这个主体，从需求、劳动和愿望的主体，从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的主体出发，企图从理论上来解释社会和历史”，由此，“人与非人这对矛盾是一切人道主义的隐蔽本原，这一本原无非是体验、经受和解决该矛盾的方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把人作为一切理论的本原”[1](P320)、[2](P206)），而在 1845 年之后，马克思才抛弃人道主义的问题框架，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2](P25-26) 对于阿尔都塞的指认，我表示赞同。因为，作为一个身于西方近代主体性哲学传统中的马克思，他不可能不拥有那种以“人”的研究为主导倾向的主体性哲学研究思路，事实上，在其从青年时期的未来宣言中，从其给他父亲的信中，从他的《博士论文》中，都可看出这种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底线。

在争议最多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中，马克思更表现出从主体性哲学出发的“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价值观话语逻辑来表述其对历史、社会、人本身及自然的新的哲学认识。不过，也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也力图突破人道主义的总问题结构，要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意识。

但是，对人道主义的突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建中就完全抛弃了人道主义的所有内容，即并非阿尔都塞判断的马克思只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真正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所有观念，更非如他所说，马克思完全抛弃了人道主义① 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内部“认识论的断裂”。

一、人道主义总问题纠缠下的“哲学反叛”

利用“人”来解释历史和世界，甚至自然和人及它们之间的价值关系，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根本的逻辑话语，不过，这种逻辑话语的表达是在穿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外衣和黑格尔的精

* 本文系广州市“十一五”规划课题“人道主义的逻辑及其实践维度”（06-YZ10-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峰，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哲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053）；周霞，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博士生（广东 广州，510665）。

①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已经有过多次争论并基本形成一致意见：认为阿尔都塞的指认显然偏激甚至错误，并形成至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某些研究者的“阿尔都塞情结”。

神辩证法形式展开的。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只看到意识和精神方面的理性内部辩证法，掉入纯粹的形而上学；批判费尔巴哈只在乎人的抽象的本质和抽象的自然，使历史与人同时陷入先验而无内容的再次抽象。但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摆脱黑格尔理性人道主义的辩证法姿态，也没有去除费尔巴哈“自然主义”人道主义的外衣。相反，马克思还不得不利用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念，来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关系进行异化劳动的本质揭示，但这些，就已经充分表现出马克思自身所具有人道主义总问题特质的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说道：“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而“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3](P80)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是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阐述却正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观念——把自然的关系理解为类存在物的特征，这是一种抽象的以人的感性出发的历史观——人道主义的抽象历史观和世界观。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用“感性”的关系来确定并扩大到整个人类，从自然主义角度论述出他的“人”的观念。

在同一节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和私有制之间关系的论述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通过先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直接进入被旧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作事实的“私有制”出发，马克思经过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等的严格分析和论述，考察私有制的起源、异化劳动的产生，推导出是由于人的劳动产生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最终形成私有制，而私有制又产生着异化劳动。结果，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下，人的劳动就变成为他者的劳动，自己劳动的结果反过来成为支配自己的力量，这基本上是对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安置、对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挪用。于是，在论述“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就直接说道：“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P81) 在这一论述中，马克思把“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和“人性”、“人道主义”、“共产主义”、“自然主义”等等相提并论，认为它们之间的内在意义和关系是一致的。而且，正是人性向社会的复归，才真正是人的本质和人道主义观念的显现。并且，这些显现和实现，只能在私有财产被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在完成了意义上来加以等同，就表征出马克思深厚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在其哲学观念中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和表现。

因此，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充分地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支配下历史观和世界观与伦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对此，丹尼•戈德斯蒂克指出，“在1844年，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也把‘人性’当作伦理评价的最高标准”。[4](P204) 这是非常贴切的判断。日本学者今村仁司的指认则更为直接。他说，马克思“将作为类的人（人类、人性）放在根本乃至原理的位置，正因如此，仍停留在包含了黑格尔思辨的主体主义和费尔巴哈人类的主体主义的近代理论的人道主义的范围内”，所以，从理论本质上来说，早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样，还处在神学的唯物论境地。[5](P147)

马克思此时的“神学唯物论”的影子，并不阻碍其力图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概念与实践的突破。通过对人类劳动、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之间关系的分析之后，马克思就显示出他与黑格尔的理性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因素。因为，当马克思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

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3] (P88) 时，就不仅是从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方面来表达他的人道主义观念，还认为，异化是一种使人、人性丰富的力量，人性的丰富正是在这种异化的社会过程中被创造的同时，也在人的实践劳动中消灭着产生异化力量的本身。① 所以，马克思才说道：“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3] (P93)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却不代表人的历史的结束，因为，“人的社会的形式”不是以一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观念为表现形态的，而只能是人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劳动所结成的具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存在为其表现形式的，这种形式不是所谓“人道主义”的完成和实现，但却充满着深切的人道。这一点，叶林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人本学”和“人本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几个概念译名考释》中，已给出了揭示。他说：“马克思采纳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的精华，同时却已明显地掺进了若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从而使原来比较抽象的人本主义增添了现实的和科学的成分，确切地说，也就是减少了自然和唯心主义成分，而增多了唯物主义的社会意义”。[6] (P150)

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观念绝不是如国内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是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构建，同样也不能理解为一种新型的人学。② 正如科尔纽所说，《手稿》“对人的社会和历史的发展的论述还是从带有费尔巴哈色彩的人道主义观点出发的”，但是“不能容许把他当时的观点加以绝对化，并在此基础上虚构出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用来和‘晚期的’马克思相对立”，因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7] (P132-133)

二、人道主义的批判与承继

《手稿》写作结束后，马克思就和恩格斯一起合作写了《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了他们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开始用这些思想批判他们所面对的唯心主义对象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在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把他们的整个政治构想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

“现实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中的“理论的人道主义”思想而言的。当时施蒂纳等人主张“理论的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仅仅通过对自我意识的改变就能实现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变，实现人性和人的价值及尊严。其实，这种改变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改良政策。所以，虽然他们主张“人道主义”，但其实是典型的“理论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就极力反对这种抽象的、脱离社会历史背景的人道主义观念，直接提出自己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以与他们的主张相对。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以加工利用费尔巴哈在1843年《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为基础的。其中，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描述，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统一的观点，关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以自然为基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一切活动和状态的基础、是类本质并表现在人的类活动中的观点，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受，并加以自己的移植，从而建构出自己的政治理想。

---

①对于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第112页中，马克思论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的个性时，就说：“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个论述也回答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这一让人困惑的命题。因此，就可透视出，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观念一直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之中。

②如丛大川先生为代表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模式，这种解释模式主要依据的文本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就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市民社会是处于第一位的；其二，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市民社会；其三，开始研究三个基本阶级经济上的生存条件并由此得出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其四，把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德国哲学结合起来。通过把市民社会当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必然的、暂时的阶段来研究，并由此推论出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社会的产生。显然，这种"现实的人道主义"仍然有缺点，比如还不能历史地唯物地解释社会状态和社会发展间的本质联系，无法本质性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以及用经济关系来解释历史和人、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经过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巨大改造和继承，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从物质利益的刺激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第一性作用，物质经济生活的源始性功能被马克思基本地阐述了出来。

经过《神圣家族》的批判性工作和积累，马克思开始逐渐抛弃人道主义的抽象"人"、"理性"等先验范畴，并用实践、劳动和生产方式等更富有历史、现实与生活意味的概念来解释、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这充分表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

在《提纲》中的第一条，马克思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唯物主义的缺点，说它们没有把现实和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来看待，而且在第6—11条中相继提出他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纲领性意见。这些意见归结为一条：即是实践地改造社会生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充分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和当时德国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也论述了他们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容：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感性活动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最基本的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人们在不断地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所以，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唯物的共产主义者，绝不是以肯定现存的世界为满足，而是以不断变革现存的状况、消灭人的异化的现实、以实现人的个性、能力的充分发展为己任。也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类历史的解释原则被马克思勾勒出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之间的内在关系中来解释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世界。

所以，马克思批判那些以"人"为自己哲学整体出发点的主体哲学家们，"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个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8](P130) 人类历史在其本真意义上，就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历史，意识的历史只不过是在这种生产和交往中的反映史而已。

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建立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同体的设想后，就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指向充分表达出来。并在《资本论》中，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和内容做了更为"人道"的建构，把经由异化并扬弃异化的道路，走向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他们新哲学的整个目标和归宿。①

通过《神圣家族》到《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的论著，马克思逐渐地找到并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表述他的社会历史观和世界观，而不再用让人怀疑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概念来解释、评价世界历史和人类实

①这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曾论述过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里论述的就是把人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片面和畸形状态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自由、完整和全面的个人发展。显然，这里的人道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二者都在真正实现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的完整实现这一点上，目标一致。马克思所设想和期望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里彻底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完全实现。那时，人类的史前史才告结束，开始人类自己真正解放的历史。

践过程。因此，马克思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决裂”之后，他就“确立了一个新的总问题，一种系统地向世界提问的新方式，一些新原则和一个新方法”。[2](P198) 这是阿尔都塞正确的指认。

三、“人道”实现的历史建构

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人道主义”这一范畴的利用，也因此，就被阿尔都塞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存有“认识论的断裂”；而由于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和物质性的强调，又使得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人学的空场”。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问世，又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和东欧世界（直到今天）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的解读潮流。

事实是否如此呢？显然不是。我们通过上述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纠缠、批判和变革之路，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并非与人道主义的一切内容都发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断裂，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是“敌视人”的哲学，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最为关注人的生存与价值、尊严和自由，最为关注人性、人道的哲学。不过，与历史上所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家们只是在意识和精神领域的角度来抽象地谈论、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和人性不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必须要在现实的历史关系、实践关系、生活过程中来切实地实现人道主义主张的伦理、公正和自由。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不是神、人性主宰和复归的历史，而是现实的生产实践史和生活发展史，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相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着他们的生活，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P32) 人们一切的意识和观念无非是现实的人们生活过程的反映而已。所以，对于人道主义理论家们所主张的公正、平等、自由、人性等观念，必须在每一历史时代具体的人们的实践过程、生活过程和交往过程中来得到真正的实现。而对于现实的社会发展来说，由于人类历史至今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剥削世界的历史，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只能倒向抽象的精神辩证法革命，因此，现实的革命就仍然是实现现实的人道的最根本的途径。

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10](P593) 在唯物史观看来，人道主义者的正义、平等、公正和人道等原则和观念在道义上是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但是，如果人道主义者以为用这些观念就可以说明什么是人道的话，那还是太抽象了，因为，只靠一些道德说教和伦理规范来解释与说明历史、解决社会历史政治问题，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恩格斯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也说道：“正义”、“人道”等范畴和伦理规范这些字眼在历史实际中根本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不能证明和说明历史与政治问题。普遍性的正义、平等和自由等观念在道义和思想上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在具体的现实社会中，这种普遍性的正义等就会变成具体的正义观、平等观和自由观。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产生反映这个社会基础的观念的意识形式，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所造成的人的价值被异化的事实，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可以通过异化的扬弃与自我扬弃得以解决，但不是借助于观念的自省。

在唯物史观的批判下，先验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已经被改造为具体、现实、革命与富有实践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并与共产主义运动直接相联系。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11](P275) 共产主义只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P87) 来建立一个“有个性的个人”不断生成的新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294)

不仅如此，马克思希冀无产阶级来实现这种“人道”的观念和思想。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中受剥削、受压迫、被异化最为严重的一个阶级，它若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即“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8](P121)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他“不

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8](P15、16) 实现人的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充分发展，仅凭人道主义的爱和正义的说教是不可能实现人的完全回复的，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

但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被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以“上帝子民”和“末世论”的神学框图加以解释。他解读道：“无产阶级不是现存社会内部的一个阶级，而是在它之外的一个阶级，正因为此，它是一种绝对的、无阶级的社会的希望。由于它以最高的、人的方式表现和集中了所有社会领域的对抗，所以，无产阶级是解开整个人类社会问题的钥匙。不同时解放作为整体的社会，无产阶级就不能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12](P45) 洛维特以神学救赎论来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历史唯物主义归于弥赛亚主义和先知主义的引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神性人道主义的响应，却是对以实践为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非法勾连。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必须通过世俗生活中的无产者联合实现对社会生产力的共同占有，建立结束“人类史前史”的共产主义社会，只有那时“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13](P67) 这种“人道”的目标就是人人的自由和平等。此时，人们才能够“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14](P927) 安排自己的生活，真正的革命的现实的人道才能付诸于实际。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绝非是与人道主义的所有思想完全断裂，更非“人学的空场”。历史唯物主义吸收了人道主义思想中最为优秀的理论资源，将其革命性地付诸于现实的生活过程和实践，它是最富有“人道”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来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人道”观念的指引，在现实的实践中推进人道精神而非抽象的道德呼喊，同时批判西方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性，就是我们每一位社会主义实践者的最根本要求。

[参考文献]

[1] 阿尔都塞. 亚眠的答辩 [A] .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3-4) 合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 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 [美] 大卫•戈伊科奇等编. 人道主义问题 [M] .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5] [日] 今村仁司. 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 [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第 4 辑）[C]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7] [法] 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第 2 卷）[M] . 北京：三联书店，196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2] [德] 卡尔•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M] . 北京：三联书店，200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罗 苹

深入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

◎ 韩民青

[摘 要] 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关键在于拥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和人类观。自然的进化在本质上是物质形态的进化，人类的发展则是遵循着对自然物质层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认识与改造而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就是从自然生产向人类生产转变的历史，直到人类生产触及到自然的最深层秘密，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应对目前的工业资源危机，必须开拓和建立资源深层型的新工业化生产方式。

[关键词] 自然的进化 人类文明的发展机制 资源深层化与新工业化

〔中图分类号〕 K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31-05

如何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这依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的问题。我们必须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科学发展提供的新事实新材料，不断深化我们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当代人类发展的困境，才能更正确地把握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

一、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的统一性

把握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要害在于拥有什么样的人类观和人类发展观。在人类发展观上，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悠久的思想史上，占支配地位的一直是一种“孤立的人类发展观”。在这种人类发展观看来，人类虽是大自然的产物，但人类由于具备种种优越特性而远远高于自然界，人类的发展似乎只是人类自身的事情而不再与自然的发展相关联，自然界充其量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孤立的人类发展观”在 20 世纪下半叶由于生态问题的凸显而受到冲击，人们开始提出“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相协调”的生态伦理观点。但这种观点至今仍显得苍白无力，究其原因就在于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仍是只有外在关系的“两张皮”，远没有把二者内在地统一起来。所以，人们一方面拒斥“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则仍然只从人类自身的立场去评判自然价值及保护自然的必要性。现在看来，要想真正冲破“孤立的人类发展观”的藩篱，就必须在更广大更深远的背景下建立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发展观”。“大发展观”的根本特征是把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统一，但要真正做到统一，就不能再把人类与自然看成两个相互脱离的事物，必须形成把二者内在结合起来的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自然观”。在这个“大自然观”看来，原来所讲的自然属于“狭义自然”或“低级自然”，人类本质上仍是一种物质形态，只是处在更高层次上的“高级自然”。“狭义自然”或“低级自然”与人类或“高级自然”相结合便形成了统一的“大自然”，把“低级自然”与“高级自然”的发展统一起来就形成了“大自然发展观”或简称“大发展观”。

在“大发展观”看来，自然的进化在本质上是物质形态的进化。大自然的物质形态进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场与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2）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3）细胞、机体的生命物质；（4）人及其创造的文化。这是一个由小到大或由里到外的个体进化历程。各种物质形态还都有其相应的宏观群体形态，如宇宙弥漫物质（物理物质）、各类星体（化学物质）、生物群落或生物圈（生命物质）和社会（人的群体）。各种物质形态形成了大自然由低级到高级的物质层次和台阶（图 1）。

从物质形态进化的历程看，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及太阳系起初是作为一团物理物质和化学物质

作者简介 韩民青，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 济南，250002）。

群体存在，在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地球及太阳系，地球自身则又经历了若干演化而形成了它的宏观结构，从性质上又形成了生命物质和人类。从地球表层的宏观物质结构上看，它可区分为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人类及其智慧圈等六个圈层。这六个物质圈层中的前四个圈层，从物质性质上讲都属于物理和化学物质圈，在它们的基础上则又生成了生物圈，并进一步生成了人类及其智慧圈。低层次的物质圈是高层次的物质圈赖以生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实质上讲，大自然的演化就是物质形态和物质圈层的进化，即新的更高级的物质形态和物质圈层的生成。所以，大自然观和大发展观本质上就是物质形态和物质圈层的进化观。人类只是一种高级的物质形态和物质圈层，人类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遵照物质形态的进化规律而实现的。坚持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发展观”，就是坚持物质形态进化的发展观，这其中包含了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以及人类进化等若干具体环节。

把人类及其发展统一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大发展观，绝不是要抹杀人类的特殊性，只是要把人类的特殊性放在大自然的统一发展中去审视去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认识，才能真正揭示人类的特殊性。事实证明，以往的那种把人类与自然相割裂的“孤立的人类观”和“孤立的人类发展观”，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类的本质与特征，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的发展规律。从大发展观上看，人类属于大自然演化出的一种物质形态和物质圈层，但人类不是普通的物质圈层，人类与普通生物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创造出一个智慧圈或文化圈，它是比其他物质圈层都要高级的独特圈层。所以，人类在地球（甚至在宇宙中）的诞生，其实质就是生成了大自然的崭新物质圈层即智慧圈。进一步讲，人类在大自然演化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就是实现了自然的质的飞跃。人类的发展，从实质上讲也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圈的演化和发展。智慧圈是各种自然物质（生命物质、化学物理、物理物质）经由人的认识与实践改造而生成的，是自然物质的质的再生与升华。所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及智慧圈的存在与演化就是以大自然的其他物质层次为基础的。但是，不能否认人类所拥有的认识与实践能力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创新作用。由此可见，大自然观和大发展观并没有忽视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特殊性，而是更深刻地把握了这种特殊性。

总之，“大发展观”是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统一发展观，是大自然演化观，是物质形态和物质层次的进化观，是宇宙进化观。从大发展观看来，人类的发展是大自然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高级的环节和阶段，是大自然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段，人类的发展将为大自然的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将促使大自然实现更大的新飞跃。

二、人类发展的方向、特点和基本线索

从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自然观大发展观审视人类发展的机制，将获得许多新的认识，这包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特点及历史线索等方面的新认识。

首先，大发展观表明，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实质是：不断创造和开拓智慧圈。从人类自身讲，人类的发展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这种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发展机制，它促使人类不断地能动地为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努力地创造和开拓智慧圈。智慧圈是文化性事物系统，它是自然资源（物理、化学、生物资源）经由人类改造而形成的更高级的文化圈层。这是自然物质自身的进化所不能产生的事物。但从本质上讲，这仍是大自然普遍存在的生成论法则在发挥作用，只是增加了人的智慧创造的生成环节，这应被看成大自然生成法则本身所固有的一个机制。所以，人类的发展不论其具体目标、内容是怎样，归根到底总是在创造和开拓文化圈，总是在对自然物质进行认识和改造，否则文化圈不能拓展。人类发展的这个方向和实质，是人类发展机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决定其他环节的因素。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决定力量。生产力是什么？生产力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和开拓智慧圈即文化圈的力量。

其次，大发展观表明，人类发展或者说文化圈发展的特点是：循着对自然物质层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认识与改造而不断深化和拓展。自然科学的材料揭示了宇宙中自然物质的进化历程：元宇宙→场与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细胞、机体的生命物质→拥有智慧与文化的人类。人类直接

诞生在生物层面上，并直接依赖于生物圈而生存和发展。所以，对于人类而言，表层是生物层，依次向下深入是化学物质层和物理物质层。生命物质虽然是处在比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场与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更高层次上的物质形态，但对于人类的生存时空尺度来讲则是表层。对生物层的认识，主要是指对动植物的宏观活动及习性的认识，尤其是它们在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特性的认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首先就需要人自身对各种作为食物来源的生物环境有一个最初步的了解，这种认识甚至在人的本能层次上就开始了，后来形成了人类早期的经验性认识，只是在最后才形成了科学性认识。人类在对生物层次的认识与改造的同时，也对化学物质的宏观群体即通常的宏观物体进行认识和改造（如岩石、土壤、河流等）。但这属于从宏观尺度上对物质群体的认识与改造，并未涉及化学物质的质的规定性层次即个体层次（原子、分子层次）的认识与改造，对化学物质的真正认识与改造是在经历了对生物的表层认识与改造之后才开始的。所以，人类对自然物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与改造，表面上体现为空间尺度上的由大到小，但从本质上讲则是表现了由生物机体层面到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层面，再到场与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层面的不断深化。人类创造和开拓的文化圈层，也是伴随认识与实践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例如由生物文化层拓展到化学文化层，再拓展到物理文化层。文化圈层由浅入深即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表现为：认识的由浅入深，对物质认识的日益深化，知识日益丰富、深刻，从经验不断上升到理论；实践上的由浅入深，对自然物质改造的日益深化，各种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知识含量不断增大。由此可见，自然物质的进化是由小到大或由里到外生成的，而人类对自然物质的认识与改造则是由大到小即由浅入深进行的，文化圈层的拓展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的不断深化，是对自然物质层次的由浅入深的触及。

再次，大发展观还表明，人类对自然物质层次的由浅入深的认识与改造机制，可以成为重新审视和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历程的钥匙。按照由浅入深不断深化发展的机制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的全过程将经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这三个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的三个物质层次决定的并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对生命物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对化学物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对物理物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简称人类发展的生物文明时代、化学文明时代和物理文明时代。每个时代又可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小阶段：在初级阶段，人类活动主要是对天然存在的某类物质形态的采集和利用；而在高级阶段，人类则能够生产该类物质形态。这样一来，三个大时代共可分为六个小阶段或小时代，即：天然生物时代与人工生物时代——天然化学时代与人工化学时代——天然物理时代与人工物理时代。

当我们把这六个时代的文明演进线索与通常讲的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历史相对照时，就不难发现：采猎文明实际上就是天然生物时代（采集渔猎自然存在的动植物），农业文明实际上就是人工生物时代（人工生产动植物），工业文明实际上就是天然化学时代（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还将经历人工化学时代、天然物理时代、人工物理时代等三个文明形态（图 2）。待到人类文明进入人工物理时代，就能够创造各种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原则上讲也就是能人工创造质量与能量了，实际上这也就是能够再造宇宙了（现代宇宙学在理论上已允许再造宇宙），人类的使命到此为止了。



图 1 大自然物质形态的进化

a. 大自然物质形态的进化形成了由低到高的不同的层次

b. 物质形态越高级占有的时空就越小

c. 低级物质形态是高级物质形态存在的基础

d. 每种物质形态都有个体形式和群体形式

e. 物理物质的层级及其时空范围与宇宙等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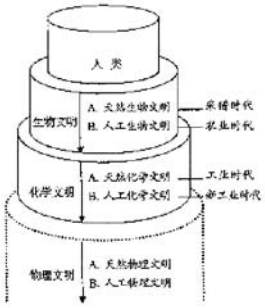


图 2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

a. 人类文明是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物质的结晶

b. 人类文明随着由浅入深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物质层次的深进

c. 认识与改造每个物质层次都是一个文明阶段

d. 每个文明阶段又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小阶段

e. 人类文明的历程分为三个大阶段六个小阶段

在这里，需要我们特别予以关注的是：工业文明的实质是“天然化学时代”，即“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时代”；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将进入一个“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时代”，由于它和工业文明都属于化学文明时代，与工业文明相对应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新工

业文明”或“新工业时代”。显然，获得这样一种关于工业文明和未来新文明走向的深刻解释，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和认识当代工业文明的困境与新文明革命的实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三、人类生产发展的本质：从自然生产到人类生产

人类物质生产的发展，本质上是从自然生产向人类生产的转变，是人类生产资源的逐步深层化。当代工业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开拓深层化的更高级生产方式——新工业化生产。

历史表明，不同人类文明时期的主导资源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它们是遵循自然物质形态的结构层次而分为不同层次的，人类生产即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由浅入深而不断推进的。简而言之就是：采猎时代——主导资源是天然生物，主导能源是人的体能；农业时代——主导资源是土地和草原，主导能源是薪柴和畜力等生物能源；工业时代——主导资源是天然化学物质即各种矿产，主导能源也是各种天然化学能源即矿物能源；显然，未来的人类新文明即新工业时代——主导资源应是元素物质，主导能源应是太阳能、核能等各种物理能源（见表 1）。

表 1　　生产方式及主导资源的演进

时代 / 内容	生物文明		化学文明	
	采猎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新工业时代
主要特点	采集果实、捕鱼、狩猎	种植庄稼、养殖牲畜	采掘矿藏、制造机械	微制造、循环生产、太空开发
生产方式	劳动对象：野生动植物 劳动方式：采集、渔猎 劳动产品：果实、猎物	劳动对象：土地、草原 劳动方式：种植、养殖、手工制作 劳动产品：粮食、牲畜、手工器具	劳动对象：自然矿藏 劳动方式：采掘、冶炼、制造 劳动产品：天然化学材料和能源及加工制造产品	劳动对象：循环利用的原子小分子材料 劳动方式：微制造、深层循环生产、航天 劳动产品：人工化学材料及加工制造产品、物理能源、太空基地
工具与能源	石器、骨器；人力	金属工具；薪柴、畜力	机械；矿物能源	智能化机械；物理能源

主导资源的深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属于自然生产的环节逐步转变为人类生产的环节。人类文明已经和正在发生下列四种生产方式的转变。

1. 生物文明的生产方式。

（1）采猎生产——采集渔猎天然动植物的生产：

土地、草原→自然繁殖→天然动植物→人工采集、渔猎→采猎物→废弃物

↓

扩大采集、渔猎→天然动植物匮乏

（2）农牧生产——种植养殖动植物的生产：

土地、草原→人工种植、养殖→人工生产的动植物→废弃物→循环利用

↓

扩大种植养殖→土地、草原丰富（相对原生态农牧业）

2. 化学文明的生产方式。

（3）工业化生产——采掘和利用天然矿物资源的生产：

元素物质→自然生成→矿藏→采掘和制造→工业制品→废弃物→环境污染

↓

扩大采掘制造→矿物资源匮乏

（4）新工业化生产——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生产：

元素物质→深层制造→人工材料及制品→废弃物→深层循环利用

↓

扩大深层制造→元素物质丰富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物质生产发展史就是从自然生产向人类生产转变的历史，直到人类生产触及到自然的最深层秘密，能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语)。

面对当前的资源危机，出路在哪里？资源演进的规律告诉我们，发生危机的资源只是特定形态的社会主导资源，而绝不是所有形态的资源，人类必须开发和利用更深层次的新资源并使之逐步转变为新的主导资源。在今天，人类则必须开拓出比天然矿物资源更深层次的新资源新能源，才能最终走出工业资源困境。

事实表明，深层开发新资源能彻底解决当前的资源危机。第一，资源深层化能彻底解决原材料短缺问题。我们看到，原材料之所以发生短缺，根本的原因在于采掘、冶炼、加工、制造的工业化生产只是把天然的矿物质作为原材料，经过生产和消费之后，矿物质被分解成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废弃物质，而大自然生产矿物质的速度远不能适应人类开发使用的速度，于是就发生矿物质原材料短缺。但是，从物质元素深层次看，被消耗的矿物质并没有减少而只是被分解，如能从元素层次进行人工生产利用，那么物质资源就不会出现短缺。物质资源深层化还会极大地拓宽原材料范围，把原本不属于原材料的物质纳入新的原材料范围，这更彻底地解决了资源短缺问题。第二，资源深层化能彻底解决污染问题。短缺的本质是有用的物质少了，污染的本质是没有用的物质多了并给环境造成了危害。但从物质深层看，这些多余的物质也可以纳入资源范围而投入再生产。循环利用和再资源化的本质就是从更深层次把废弃物质纳入物质再生产，所以，在资源深层化的生产中没有无用的物质，也就不会再有污染物质的存在。第三，资源深层化也彻底地解决了能源匮乏问题。目前，发生匮乏的是矿物能源。比矿物能源处于更深层次的是物理能源，水能、风能特别是太阳能、核能、太空能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也是干净无污染的。

当前，全球工业危机已经来临，新工业革命已经兴起，中国的现代化已经不能依赖建设发达的工业化来实现，必须积极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所以，建设资源深层型的新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工业化已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也就是我们深入认识人类文明演进机制的重要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罗 苹

•经济学　管理学•

中国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比较分析

◎ 史永隽

[摘　要] 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集群形成、产业类别、产业水平、中介机构、分工协作以及社会网络等方面对我国产业集群与意大利产业集群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我国产业集群尚处于相对较低发展层次的结论。借鉴意大利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增强我国集群竞争力，对于进一步培育发展我国集群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企业集群　意大利　差异　集群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36-06

一、引言

意大利是西方重要的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国家中一直居于第五位的位置。与其它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意大利的中小企业在其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该国 70%以上的就业岗位和 80%的国内生产总值。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强的原因主要是它们都处于集群的环境中，尤其是其在东北部地区，巴格那斯科将此地区称为 "第三意大利"（Bagnasco，1997），以区别人们所称发达的以大型企业为主的北部发达地区（第一意大利）和欠发达的南部地区（第二意大利）。在 "第三意大利"地区，企业集群集中程度很高，意大利 70%以上的制造业、30%以上的就业、40%以上的出口量都是在其专业化产业区域即集群内实现的，意大利每年出口 200 多亿美元主要也是由这些集群区域提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形成了一些集群产业区，这些由中小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集形成的企业群与 "第三意大利"有很多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处在同一集群的企业从事的行业相近或相关，企业数目众多，由几十家到上千家不等。第二，以个体、私营性质的中小企业为主，有的甚至是家庭作坊式的企业，许多企业的家人和亲戚就是企业的成员。在管理上，这些中小企业一方面具有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内在优势，它们对变化的市场行情和信息反映迅速；由于规模很小，管理层次很少，最高层管理者和底层的生产者直接接触，信息沟通直接且费用低。大多数企业所有者直接经营，即所有者和经营者基于一身，几乎没有詹森（Jensen,1976）所讲的交易成本，能迅速解决内、外部问题，有能力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迅速对企业进行重组或转产、转型。当然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也有不利的一面，也具有一些自身的缺陷，如在技术力量上，这些中小企业通常缺乏专业技术人员，不能支持正式的有一定规模的研发活动；在金融上，难以吸引外部大额资金，由于集群中的企业大多数从事传统产业，风险资金对它们并不青睐，因此在某些领域由于资金缺乏很难达到合理、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水平。第三，企业集群中除了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外，还包括其他的机构——提供各类服务的中介组织，如行业自律组织或行会等，它们与当地政府共同为聚集区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多种服务。第四，集群内存在由生产商、贸易商、供应商等不同性质经济体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形成的不同程度的联系和社会网络关系，联系的纽带也多种多样，可以是业务关系，也可能熟人、亲戚、同乡等社会关系。

虽然意大利的集群与我国的集群有以上共同点，但是意大利作为发达的工业国家，其产业集群形成的时间比较长，其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有很多特征与我国的产业集群是不同的。分析我国与意大利的产业

作者简介　史永隽，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管理学博士（广东　广州，510053）。

集群的差异，借鉴意大利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对于合理把握和正确培育我国正在发展和成长中的产业集群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虽然在很多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集群现象，但是以广东和浙江两省最典型，本文主要以这两个典型省份的产业集群与意大利的产业集群进行比较。

二、我国产业集群与意大利产业集群的差异分析

(一) 从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分析

中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对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产业集群，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产物。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72个集群专业镇中大约80%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什么生产基础的，是在当时城乡物资交换需要的基础上形成的专业市场转换而来，即在利润的引导下，专业商品市场上的经营者逐步演变为生产者。这个演变的背景就是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开始增加，他们进一步希望从拥挤的土地上转移出来发家致富；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对轻工业特别是民用工业的忽视使得生活用品在城市里很紧缺。于是给农民们从事这些生产技术不高的产品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王珺（2004）分析了这个过程：[1] 第一个阶段是专业化市场的形成阶段。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进入了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主的体制改革阶段，国有企业普遍地推行了承包制。只要完成规定的指标，经理与职工的收入都会有较快的增长。由于每个企业与上级部门进行对指标谈判中对企业的指标定得偏低，使企业在比较容易完成指标基础上，有更多的生产能力进行超额生产和获得额外收入。在城市周边地区，经过市场取向的农村体制改革，农民们开始根据市场来配置资源。在中国城市周边地区存在地少人多的条件下，有限的土地资源开始从低收益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较高收益的贸易和工业部门上来。当然，受到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限制，城市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并不能生产城市居民需要的技术较复杂、资金门槛要求较高的耐用消费品，诸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各种工业制品，而只能先进入那些资金规模门槛较低、技术比较简单的行业，诸如制鞋、服装、纺织等。然而与其他内地大城市周边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沿海开放地区的企业不仅可以率先获得境外的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源，也可以利用一些优惠政策和熟悉的市场渠道从境外组织一些国内大城市紧缺的日用工业产品和耐用消费品满足大城市的基本需求。于是形成了在城市或县城周边附近的专业市场，这些市场之所以定位于城市周边，也是成本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当时这些产品主要供应城市，离城市越近运输成本越低，交易机会越多；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区的地价较高，经营成本也较高，而这些市场上的期初经营者都是靠近城市的农民，靠近城市的他们的居住地附近成了最优选择；第二个阶段是依托专业市场的集群发育成长阶段。专业市场充分发育后，巨大的利润空间的发现使得专业市场上的经营者转向生产领域，当然在这个过程转型中有一个技术的学习过程，有的时候生产技术是偷来的。如“(浙江大唐袜业集群的创业者）没有技术，他们就到国营企业里去当学徒，偷学‘拳头’(技术)”。[2] 广东顺德乐从家具集群形成的初期也是在广州等地的国营企业中请来技术人员来指导，[1] 于是产生了大量的“周日工程师”，这些大城市国有企业里的技术骨干，在周末或休息日就跑到郊区的民营企业中作兼职技术指导。当某一产品生产成为普遍现象，集群内一些企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仅仅依赖的本地区域专业市场已经满足不了其生产能力的要求，开始建立自己的跨地区，甚至国际性的销售网络，他们对原来专业市场的依赖降低了，产业集群基本上形成了。

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形成的时间比我国要长得多。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集群形成只有十几年、20几年的时间，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如果说中国形成的大部分产业集群是当时体制转轨机会造成的，那么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则是更多地接受历史的传承，当然在接受历史传承的同时也存在偶然事件和政治的影响。在第三意大利地区历史上主要以农业为主，人口密度较大，很多农民只拥有少量的土地，除了耕作和畜牧以外还从事编制、纺织等，手工劳动形成了历史悠久的手工业传统，早在中世纪的时候，该地区就有陶瓷、衣帽等产品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例如萨斯索洛地区生产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该地区出产作为陶瓷主要原料的红黏土也是当地特有的资源，虽然逐渐被后来的来自英国的进口高品位的

白黏土替代，但是当时当地的特有红黏土资源对于陶瓷产业的起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初，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中上台的社会党在第三意大利地区推行社会主义生产合作，抑制了该地区资本的集中，阻碍了垄断企业的产生，反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运动中，从发达的国家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共产主义的思想加快了这些技术推广普及，该地区成立了许多专门技术学校，推广先进的技术，使整个地区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得以整体提升。二战后，该地区在左翼政党的领导下与热衷推行垄断大工业的中央政府对抗，制定了一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限制资本过渡集中，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得当地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欧洲传统产品的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我国和意大利集群企业形成的过程来看，意大利的产业集群形成的时间较长，集群的形成是与当地的特色资源或者优势传统技术相联系的，集群的特征深深地带有集群产地的特色，可以说这种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集群深深扎根在意大利的文化背景中，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和不易模仿性，形成了集群产业厚实的竞争实力。而我国的大部分集群是适应改革开放之初轻工业品普遍短缺的形势而产生的，原来没有生产基础，更谈不上和本地的优势资源和文化相联系，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相关产品短缺而产生的，这样集群的根基不稳定，形成不了独特的竞争力。

（二）从产业类别的构成分析

根据意大利统计局的评判标准，意大利专业集群地有199个，其中，纺织品集群地有69个、皮鞋和鞋27个、家具39个、机械32个、食品17个，还有金属制品集群地1个、化学制品集群地4个、造纸与印刷集群地6个、首饰集群地4个。在意大利现有199个产业区中，除了拉斯佩齐亚等少数几个产业区生产船舶和机电设备，其它产业区均以需求价格弹性低的传统消费品为主营专业产品，如服装、家具、皮革制品、家居用品、食品和饮料等。广东科技厅认定的72个产业集群中，属于纺织服装类的共有16个，食品类（含水果、蔬菜等）11个，家具5个，玩具3个，不锈钢和五金6个，陶瓷4个，其他如灯饰、铝材、珠宝、麦克风等共27个。浙江的集群产业主要也集中在服装、纺织、五金、家居小商品、低压电器等传统产业。

意大利的集群产业与我国（浙江、广东）集群产业类别

意大利的集群与产业	中国的集群与产业（以浙江和广东为例）	
	浙江	广东
比耶拉、普拉托：毛纺织	绍兴：轻纺、化纤	西樵：纺织；大朗：毛织；张槎：针织；盐步：内衣
萨思索罗：瓷砖	慈溪：鱼钩、长毛绒	枫溪、南庄、高陂：陶瓷
卡拉拉：石制品	永康：五金	云浮：石制品
卡尔皮：木工机械、针织品	温州市区：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义乌：小商品；海宁：皮革、服装；余姚：轻工模具	金沙：五金；司前：不锈钢；大鳌：集装箱；风翔：玩具；狮岭：皮革制品
阿雷佐、瓦伦扎;珠宝	奉化：服饰	可塘：珠宝首饰
博罗尼亚：包装机械	柳州：低压电器；永嘉：纽扣、泵阀；金乡：标牌、包装	锡场：食品机械；伦教：木工机械
都灵：自动化设备	台州：摩托车	南头：电器；皇岗：水族机电；汤坑：电声工业
蒙特别鲁那：滑雪靴	慈溪：长毛绒、鱼钩	上下川：旅游海洋渔业；恩城：麦克风；古镇：灯饰

从总体来看，意大利与我国产业集群的产业类别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因为进入这些传统产业的资本和技术门槛比较低，缺乏这些资源的农民生产者可以比较容易进入；不同之处是，意大利的产业集群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具有历史传统和手工业优势的产业上，具体地讲分布在纺织服装、家具、陶瓷等家居产品，珠宝首饰等个人用品，葡萄酒、橄榄油等食品饮料，这些产品意大利有较强的优势，包括技术、文化传统、消费者认同等。我国的集群产业相对比较分散，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原来过分注重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各种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远远不及人们对它的需求增长，所以集群的产品类别比较多，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国很多集群原本没有生产基础，广东的产业集群80%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生产基础，也就是没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当时在所生产的产品紧缺的情况下，产业

集群的产品尚有市场，当这些技术含量和加工工艺并不复杂的产品在别的地区也开始生产的时候，部分产业集群存在的优势将丧失，有的集群会走向衰落，目前这是我国很多产业集群面临的严峻问题，如何发展这些集群，获得新优势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从产业的发展形态分析

1. 产业水平。我国的产业集群虽然与意大利的企业集群一样，都是生产传统产品，但传统产品并不是低技术产品，同样需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我国的集群产品生产大部分以适用、简单技术的应用为主，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创新，生产技术上的模仿多于创新，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学习和模仿很快，但企业的独立发明创造能力不足，可以说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而“第三意大利”的企业集群，虽然也生产传统产品，但区域内企业的柔性专业化程度高。区域内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推广 CAD、CAM 等先进的设计与制造技术，设计和控制产品的款式和大小，从而及时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现在该地区的许多企业开始利用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进行柔性化的生产，这些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节省了时间，降低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增强了集群整体的竞争力。

2. 中介机构。在我国产业集群内，中介服务机构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虽然在某些集群内，中介机构对专业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的商会以及广东南海各镇成立的技术创新中心等，与国外企业集群中的中介机构比较起来，无论在运作机制以及服务功能上，它们都需要极大的完善。在意大利的企业集群中，有许多服务功能很强的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服务中心和行业协会。它们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促进了对区内中小企业资金、技术的供给、海外市场的开拓、研究与开发知识及信息的传播。具体表现如下：(1) 各种各样的雇主协会，他们各有其独特的活动范围和使命，并对自己服务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开放，自由出入，作为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它们不仅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也是联系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桥梁。(2) 地方银行以及其它地方性的信贷机构，它们在为区内大量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起着重要的作用。技术学校的存在对当地柔性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为中小企业提供真实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机构也广泛存在，例如位于莫德纳纺织业集群中的 CITER，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当地的企业收集、分析以及传递该行业的重要信息；比耶拉 (Biella) 镇中的 TECNOTEX，它为纺织业提供专业化的培训、技术开发和技术试验等服务。[3] 正是在这些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第三意大利”地区生产传统产品的企业集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3. 分工协作。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看，我国集群区域内的分工以横向一体化为主。企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分为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两种生产组织联系。所谓横向一体化，是指在一个企业集群中聚集了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之间不一定有产业分工联系，整个区域内都是生产或提供基本相同的产品或服务。在这种企业集群中，企业之间通过相互配套形成的产业链条关系是有限的。而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联系，是指在企业集群内形成了企业在上下游之间的基本链条关系，一个企业集群内虽然也是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每个企业只从事某一个产品的某个生产环节的活动，或者说，一种产品分别由不同的企业来完成，从获取原材料开始到产品加工组装、最终产品的分配和销售都是由不同的企业来完成的，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内部组织完成的。这种类型的生产组织联系在我国的企业集群中较少，除了广东东莞、江苏苏州的少数以外资引入型的生产计算机为主的企业集群实行了纵向一体化的分工联系以外，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集群都是以横向一体化分工联系为主。在意大利的企业集群中，纵向一体化的专业化分工则发展得比较成熟，例如在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的食品机械集群区域中，由于一些大公司的存在，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成为大企业的分包商，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上下游纵向分工关系，彼此紧密合作。在这种纵向合作关系中，大企业向中小供应商提供新点子、新信息，带动供应商自我创新，努力发展新技术，并培养新产品研发的环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区域内中小企业的进步。

（四）从产业的竞争力比较分析

1. 品牌的差异。在意大利其国内的贸易市场也很发达，意大利人是全球有名很会挑剔的有经验的消费者，有时候追求完美的高要求促使企业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他们对专业化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往往是专门考虑客商需求的。它们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高信息含量的差异化优质产品和由最新技术支持的高品位艺术设计，形成的专业、精细的产品自然就很难复制而别具一格，使得他们产品的质量在国际市场上都很有名，使意大利成为世界知名的品牌之都，拥有许多著名的品牌，如家具品牌 Cappelletti、意大利时装品牌 Versace（范思哲）、意大利鞋类品牌 Gucci（古驰）等享誉全球。

我国产业集群中新产品的技术开发能力较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意识。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企业对开发新产品投入不多，企业技术改造意识较为薄弱，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据 2002 年 1-7 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下工业监测网络的调查，浙江有 80.9%的工业单位没有进行新产品开发，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工业单位投入资金较少，在 10 万元以下的占 66.7%，在 30 万元以上的仅占 8.6%。[4] 我国企业多从事对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销售代理、包装加工或材料加工，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优势，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产品生产附加值也较低。如在浙江大唐袜业产业集群中，“大唐袜业仅用20 年时间就在技术装备上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几乎所有的高级袜子都能在这里织出”，但是 “现阶段大唐袜业的生产以‘贴牌’为主”，没有自己的知名品牌，也就是主要给人做嫁衣。虽然 “一些世界著名品牌服饰商慕名到大唐要求‘贴牌’加工，大唐生产的袜子开始进入欧美大商场”，[2] 但是离走上创出自己的品牌实现更多的附加值的自有品牌之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 创新程度的差异。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M .Porter, 2000）。意大利人是天生的冒险者，他们喜欢拥有自己的企业，或给熟悉的人打工，使企业不断繁衍，与同一产品相关的各种企业的发展很快，创新和知识扩散的速度非常惊人。本地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更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王缉慈，2001），意大利企业的创新有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三方面。在产品上，意大利对虽属同类的产品不断细化，追求特色、新意。在工艺上，电脑辅助生产、机器人的使用已成为新工艺潮流所趋。创新不仅反映在设计方面，更多的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开发各种先进的技术，用来制造那些传统地看来是低技术的产品。另外，意大利的集群中的企业还从特别的、艺术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先进的批量的式样设计、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高技术的控制过程、高质量的产品和低成本的投入，使得其产品不但生产成本低，而且能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以萨斯索罗的瓷砖企业集群为例，20 世纪 80 年代，集群内有 350 多家企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导致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而激烈的竞争又迫使这个产业进行创新。他们从烧制方法上进行创新，创造了一次烧制法；从产品设计上进行创新，请一流的设计师设计出各种场所需要的产品；从组织方式上创新，把流程进一步细分，使其更加专业化。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构想，以吸引挑剔的消费者。他们十分重视工艺流程与机械设备的改进，一项先进技术的应用，就意味着取得领先。“小就是美”在意大利广为流传，这也许会让人在不经意间领略到意大利人差异化竞争的优势。[5]

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中源于新技术、新产品的不多。如从 2000 年到 2004 年，浙江集群经济总产值增量约 9830 亿元，真正源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集群仅 29 个，总产值约 889 亿元，分别占新生区块的 12. 7%和 27. 9%。据抽样调查，浙江省 80%的民营企业没有新产品开发能力，57. 52%的企业没有投入科研经费，仅 18. 10%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6] 不得已大量浙江企业采取仿冒策略。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仿冒却成为民企发展最大的障碍，甚至是杀手。虽然经历了 20 余年的发展，我国的集群总体上看，产品低档次、低附加值的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处在模仿创新为主、价格竞争为主的阶段。产业集群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不快、开发新产品能力薄弱、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是我国集群经济在发展中存在的辣手问题。

3. 在人力资源上的差异。在企业经营中，管理人员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意大利中小企业的管理特点是有权威的、领导松散的、甚至混沌的组织。管理者通常具有抱负、有志气、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他们在经营目标上追求长期稳定的利益。此外，意大利人不喜欢背井离乡，而以在家乡生活和工作为乐趣。所以他们的经理人员流动性很小，大家都安心工作，努力经营自己或替别人经营企业。意大利地方政府认识到教育和培训是意大利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非常重视职业技术培训。意大利没有世界知名的大学，但是它的职业技术学校却很有名，源源不断地培养了集群发展需要的各种技术人才。如意大利威尼托地区布伦塔河岸的制鞋集群1923年建立的制鞋学校，就是一所职业学校，也是欧洲和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鞋技术学校。仅2003年，布伦塔河制鞋学校共开设了120个培训班，第一种形式是面向企业中的设计人员在职学习，一般学制三年；第二种形式是欧盟资助的专业化培训，获得资助的必须是有威尼托户口的人员，培训的内容主要是皮鞋的制作、经营、管理等；第三种是面向高中学生的，一般培训期限为5个月左右，毕业后从事皮鞋生产。由于皮鞋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学校的教育甚至还延伸到中小学，制鞋学校为附近学校开设皮鞋相关知识的课程，从小培养制鞋产业的接班人。目前，布伦塔河有80个皮鞋设计工作室，约有各类设计人员400余人，这是布伦塔制鞋业最重要的财富。高水平设计师、高超技艺的工人是布伦塔制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7]

我国集群中企业经营者与工人的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高水准的企业管理理念。由于我国集群经济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其“作坊式生产”的经营者虽然具有较强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创业意识，但本身素质不高。据2007年1-7月对浙江规模以下工业的调查显示，在423个小企业的业主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仅占1.7%，高中文化占28.4%，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5]在广东的西樵纺织产业集群的调查中，企业经营者大专以上的不到5%，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经营者视野不阔、难以把握未来市场变化和产业的动向。而且，中国农民历来“小富即安”的观念，也使得这些企业主缺乏继续开拓市场的抱负和能力，在经营目标上有些“急功近利”，注重追求短期效益。企业大多数工人文化素质较低，只是从事简单生产加工的劳动力，缺乏有技能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意大利企业集群中的制造业中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的比例为35：50：15，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为5：35：60，所以，我国企业集群中大多难以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我国的职业教育严重脱离市场，职业学校学生的录取排在普通高校之后，大多是被认为没有被所谓“正规”高校录取后的无奈选择，这样人才培养和技术培训与市场很不适应，满足不了企业对专业化人才的大量需求，企业集群发展缺乏足够的合格技能型人才。于是出现很多企业高薪求高级技工而不得的情况，由于技术工人的匮乏，我国的集群经济发展已严重受损，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鼓励人们学习技术，高级技术工人就业受优待的措施，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技工队伍缺乏的现状。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产业集群大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只有10-20余年的时间，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和发展时期，还很不成熟，与意大利相比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通过与历史相对悠久、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意大利产业集群的比较，找出差距，借鉴意大利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通过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合作创新和体制创新，积极推动我国的集群经济尽快由“创业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是我国加快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王珺. 衍生型集群：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产业集群生成机制研究 [J]. 管理世界，2005，(8).

[2] 王缉慈等.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姚海林. 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传统社会关系在集群企业合作形成中的功能及其演变 [D]. 博士论文，2005.

[4] 刘全国，刘鼎盛. 克隆还是借鉴——“第三意大利”带给浙江的启示 [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4，(3).

[5] 储小华. 意大利产业区经济对发展浙江产业集群的几点启示 [J]. 浙江统计，2004，(3).

[6] 傅白水，李晓兰. 浙江产业集群重演意大利式衰微？ [J]. 决策，2006，(7).

[7] 王鹏生. 企业集群与技能型人才培训 [J]. 现代企业教育，2006，(9).

责任编辑：黄振荣

集群企业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 以广东传统产业集群为例 *

◎ 岳芳敏

[摘 要] 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如何从模仿走向创新？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和现实观察，本文发现，由于存在内生性模仿机制，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能力较弱，集群企业模仿行为普遍存在；但随着集群内部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产生创新动力，在合作性创新机制下形成创新能力。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就能从模仿走向创新。总体上看，集群企业通过四种途径实现创新，即通过自身创新资源积累、依赖政府建立的创新平台、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与大企业合作、构建并加强集群外部联系，提升创新能力。结合实际，本文得出几点扶持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传统产业集群 创新机制 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2-07

一、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点的产业集群创新已成为相关文献的关注点，大量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区域创新体系、集群创新空间、集群创新网络和创新过程。这些文献多以产业集群为分析单位，考察知识外溢与信息共享及创新网络如何形成集群创新能力，而较少将分析单位聚焦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行为方面，这样可能模糊或泛化了集群企业的创新研究。观察广东各类产业集群会发现，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其创新动力和能力的来源是不同的。当前，广东的产业集群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目前年产值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集群有 148 个，年产值 10~ 50 亿的集群有 60 个，50 ~ 100 亿元的集群有 15 个，超百亿的集群有 10 个。其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 83%。① 但同时，这些集群普遍面临着各种发展约束，比如，模仿大量存在、创新能力较弱、要素价格上升、集群竞争优势不具备可持续性等问题。产业集群亟待创新升级，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制造”走向高端的“中国创造”。集群创新，企业是主体。那么，传统产业集群企业如何提高创新能力、从模仿走向创新？

对此，需要分析集群企业的创新机制和路径。本文以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集群中企业创新行为为研究视点，根据现有的调研资料和实地了解，考察并分析产业集群企业的创新机制和路径。

二、本文研究思路

产业集群 (clusters) 是指同一类产业内的企业在同一地区的聚集（Schmitz, 1995）。② [1] 而在以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为主的集群中，企业进入的技术与资金门槛都较低，但小批量、定制式生产和非标准化产品和工艺流程不适于大企业进入，从而为中小企业在这些产业中留下了生存空间（王珺，2004）。[2] (P4) 这些产业大多是一些传统型商品行业，如五金、纺织服装、皮具、鞋类、陶瓷、家具、音乐器材、五金、机械

*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中一个子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该课题立项号为：06JZD0031。

作者简介 岳芳敏，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 广州，510053）。

①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广东发展研究院丘海雄组织的调研资料。

②产业集群有多种称谓，从马歇尔的“产业区”到意大利学者们的“新产业区”，国内学者的“块状经济”、“专业镇”、“企业簇群”、“企业集群”等。

配件等，其产品具有时尚性、艺术性等特点。这些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创新行为是本文的分析对象。

关于创新。熊彼特（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给出的技术创新概念：创新是一种生产函数的新组合，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可将创新概括为以下五种类型：(1) 生产新的产品；(2) 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流程；(3) 开辟新的市场；(4) 开拓并利用新的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供给来源；(5) 采用新的组织方式。其后，创新研究者们将这五种形式的创新归并为两类，前四类称为技术创新，第五类称为组织创新。纳尔森（1992）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第一次引用，而且还包含技术扩散；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本质上取决于各种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的过程。[3] 大卫•艾杰顿① 认为创新就是新技术的出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经济发展史最有意义。通常当创新快速传播使用时，创新对生产力的成长影响最大。同时，创新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特点。实际在使用的技术（包括模仿使用），以及因使用而引起的特殊问题，强烈地影响创新，并会引发针对原技术或创新进一步做出改善，从而产生新的创新。本文分析的技术创新涵盖了新技术的产生、引用和扩散及其过程。

在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中，创新主体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P. N. Cooke，1993）。[4] (P543- 564) 但仅有集群中近距离信息知识（尤其是缄默知识）交流和信任机制构建的内部创新网络还不够，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外部异质性信息有利于企业创新和集群升级（Humphrey，Schmitz，2002；Pietrobelli，2004）。[5] [6]

基于上述观点和现实观察，本文关注传统产业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认为技术模仿是技术使用的一种方式，当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时，模仿是企业的低成本学习方式。当集群内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企业会产生强大的创新动力，随着集群内创新网络形成、企业不断积累创新资源、加强与外部联系，企业创新能力就会逐步形成并提高，企业呈现从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广东内生性传统产业集群在形成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实方市场”下，竞争不足，加上创新收益不确定性、技术成果外溢的影响，企业创新动力普遍不足。随着企业创新资源的积累、创新知识的不断吸收，企业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从而积极创新，以增强竞争力。

为考察上述路径的发展过程，分析集群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的形成机制和路径，本文提出下述理论假设：

1. 集群企业在竞争机制下产生创新动力，在合作性机制下形成创新能力。

当企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集群内外竞争变得异常激烈，为了生存，企业不得不追求创新，以寻求差异化发展之路。作为创新空间，产业集群有利于创新所需的缄默知识的转移，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包含政府、中介组织的创新网络的存在，有利于企业形成并提升创新能力。由此可以提出的另一假设是：

2. 集群企业通过构建和加强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获取创新能力。随着创新能力由低到高的发展，企业就可能实现自主创新。

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制度化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能够使企业形成创新能力。但同时，同质化信息、知识的交流，会形成产业集群的路径依赖和功能锁定，不利于创新。因此，企业在加强内部联系的同时，还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与外部联系，吸收有利于创新的异质知识，从而获得创新能力。当企业拥有创新能力时，就会从模仿到消化、吸收走向再创造的自主创新之路。

三、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创新机制

虽然集群企业中模仿行为内生性地普遍存在，但当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比如由“实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竞争加剧，市场需求变化不定，消费者偏好求新、求异、求变。仍然墨守成规、缺乏创新的企业大批死亡，集群出现衰落迹象。比如，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内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广东南海西樵纺织业在当时出现了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产量不断收缩、大量企业关闭或转产的现象。集群由 1994

①David Edgerton. 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 Oxford, 2007。

年以前国内外知名的“家纺名城”、“千家店、万台机、亿米布”衰落为300多家企业，产量比最兴旺的80年代后期减少了60%以上。可见，简单模仿缺乏持续竞争力（王珺，2004）。[2](P155-157)

那么，这些传统产业的企业如何形成创新动力？如何获取创新能力？大多数文献从知识外溢和协作创新角度对技术创新加以解释，与此不同，波特（1998）认为集群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还体现在内部竞争压力和同行间的持续比较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创新激励，并指出，正是合作和竞争两方面的因素使集群可以长期居于创新中心的位置。[7] 观察发现，在竞争压力和创新激励下，企业就产生出创新动力，但中小企业往往创新能力较低，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外力才能实现创新。因此，本文将集群中创新机制分为竞争性和合作性两种。在集群环境下，合作性机制产生集群创新能力。这个外力和合作性机制指的就是集群企业的内部联系及其与外部的联系。

（一）竞争性机制形成企业的创新动力

竞争性创新机制主要来自于集群内外的竞争压力。不创新，企业就无法生存。传统产业集群内部激烈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创新而不是压低工资的基础之上。例如，在广州皮具产业集群中，企业的更新速度很快，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以来，企业寿命最长的有一二十年，最短的为两年左右 。由于企业数目更新频繁，广州皮具商业协会也很难掌握确切的企业数目，截止2004年，只知道大约有3000多家。① 而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的企业由于竞争压力大，生存危机使得企业产生极强的创新动机。而且，传统产业集群产品的时尚性、差异性、个性化等特征，也迫使企业不断推陈出新。此外，集群内部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取得价格优势或市场份额优势，从而满足销售代理商和消费者求新求变的需求。在当前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企业不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只能靠创新去竞争；外部竞争压力来自于国内外的竞争。当前，企业都意识到简单模仿只会导致产品趋同、无个性化及竞价竞争，企业发展走向恶性循环、无序竞争，而只有创新、走差异化竞争道路，才可能获取竞争优势。因此，有能力的企业已经从最初的简单模仿，走向模仿中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产品设计风格、自有品牌，开始自主式产品创新，走差异化竞争之路。②

（二）合作性创新机制使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形成并不断提高

合作性创新机制来自于集群创新环境和协作创新。创新能力体现为企业创新资源（包括企业规模、资金、人力资源）的积累和信息交流水平（包括信息交流数量和质量，比如信息的同质、异质性）两个纬度。其具体表征可以是企业规模、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人力资源情况、专利申请数量、创新活动的结果等。王珺（2004）将集群内部产生的创新能力归类为内生型的，将由跨国公司等技术领先者转包与承包使集群产生的创新能力称为外生型的。[2] 本文认为创新能力这两种来源都可归为合作性创新机制。它包括：

1. 技术外溢、知识转移机制。集群环境有利于缄默知识和同质技术信息以及与集群外部联系获得的异质信息的流动，这些信息在企业家、技术和管理人员之间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意识，从而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企业聚集在一个临近的空间范围内，相互频繁互动使得获取创新所需的知识成为可能（Feldman,1994），[8] 所以集群环境因适宜于技术创新而被当作“创新空间”。③

2. 协作创新机制。它包括企业网络、大企业主导、政府建立的创新平台以及与国外客户的协作创新机制。如上所述，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不足、缺少技术研发人才，因此难以靠自身积累创新资源实现创新。但这些企业可以通过获取创新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尤其是近距离交流获取的缄默知识），依靠外力实现创新。

企业网络式协作创新机制是指集群企业之间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联系（比如分包协作、配套生

①2004年10月，广州皮具商会访谈信息。

②2006年8月，广州某皮具公司访谈信息。

③王缉慈教授在《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一书中，认为企业集群就是一种创新空间。

产、供应链及非正式的信息交流），通过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在拥有互补性能力的参与者之间的创造、结合、交换、转化、吸收和利用，使企业的参与者产生创新能力。集群中上、中、下游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制度化组织（如地方政府、中介组织、大学、科研机构与技术服务组织）之间，通过集体学习与合作，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形成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

大企业主导小企业的协作创新机制是指在轮轴式产业集群中，众多的中小企业作为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存在，大企业的创新主导着小企业的创新，小企业可能得到大企业的创新指导和支持。比如，广东汽车产业集群中的丰田集团与其配套企业之间的合作创新、江门摩托车产业集群中的大长江集团与其配套企业的协作创新等。

在中小企业集群中，中小企业则是在中介组织、地方政府建立的技术创新中心的帮助下进行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从广东中山大涌红木家具企业技术中心、南海金沙创新中心和西樵纺织业创新中心中都可观察到政府推动的创新平台形成的合作性创新机制。

而在创新动力和能力外生型的产业集群中，比如广东省东莞市、南海的鞋业集群、潮州的婚纱集群，企业主要由台湾转移进入，或由当地人建立，但其产品主要外销。为满足自己需求、确保所订购产品的质量，国外客户会主动协助这类产业集群中的生产企业进行创新。

当然，在上述产业集群中，还有一类企业在创业时就表现出很强的产品创新能力，企业拥有自己的设计人才，也有较充足的资金。这类企业多为从下游销售领域转入或从其他行业转入。因此，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资源。在广州皮具产业集群中就有一些从零售流通领域、服装业或其他行业进入的企业，他们要么有资金实力，要么有产品设计开发专长，能够进行自主创新。这些企业看起来不需要其他企业的协助就能自己进行创新。但实际上，在一进入生产加工领域时，他们也同样要从原有的供货商那里学习企业的运营方法，并在之后的生产过程中，需要与其关联企业及客户合作开发设计新的产品，或进行创新改进，协作创新机制仍然存在。[①] 同样的例子在西樵纺织业集群中也能看到。[②]

四、传统产业集群中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路径

作为创新主体，企业必须要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在当前的竞争压力下，企业不会缺乏创新动力。同时，创新作为国家、区域竞争优势的来源，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激励创新，这也促使企业创新动力增强。有了创新动力后，关键就看企业是否具备创新能力。集群企业获取创新能力，实现自主创新的路径主要有:

（一）企业通过自身创新资源的积累，拥有并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这类企业的成长路径大多通过技术模仿学习，逐步积累创新资源，才有能力实现自主创新。企业发展经历了创新动力和能力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比如，在广州的皮具业集群中，先动者（First- Mover）（最初的皮具生产经营者）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服装行业转入的，当时服装业竞争日趋激烈，而皮具私人企业在国内还是空白，而且皮具与服装业生产经营较相似。最初，面临环境、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先动者的经营模式是模仿服装业。而随后的进入者受先动者的成功效应指引进入，跟随者必然选择模仿先动者的组织模式、生产、经营模式。[③] 由于皮具业进入门槛低，只要有10万元左右的启动资金，有10来个工人一个皮具工厂就能开工了。在缺少资金、缺少设计开发人员的情况下，[④] 企业自然选择风险小、成本低、见效快的模仿。这些企业通过买板（到市场上购买皮具产品）模仿成功企业的皮具产品，做出样品后，接到客户订单，进行生产获利。这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卖方市场”环境下，甚至90年代初期，

①广州皮具产业集群2005年4月、2006年10月调研信息。

②在广东南海西樵纺织业产业集群企业调研信息，2006年12月。

③广州皮具商会访谈信息，2004年10月。

④比如广州皮具业的开发设计人才奇缺，2004年曾有企业开出50万元的年薪招聘人才都没能如愿。广州皮具企业访谈信息，2005年11月。

皮具市场竞争不太激烈的情况下，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很快获利，所以企业也没有创新动力。①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同一产业，集群规模不断扩大，集群内部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同时，国内的市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卖方市场”转变为90年代中期的“买方市场”，企业要想生存，在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就会选择模仿。竞争压力被认为是组织被迫模仿竞争对手的动因(周雪光，2003)。[9](P85-88) 像服装产品一样，由于行业进入门槛低，产品更新快，皮具产品也难以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这使得模仿行为普遍合法化地存在。因此，企业只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企业样品展室由开放到封闭（只有得到许可才可以进入），或新样品一般不先在本地市场销售。同时，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不断创新，引用新材料、新配件，设计开发出新款产品。能够这样不断进行产品创新的皮具企业就在大浪淘沙中成长起来。例如，广州某皮具企业，拥有两个公司和一家工厂，建有自己的厂房，员工人数200多人，产品设计开发人员加上板房师傅约6人，其中一名主设计师，拥有企业的股份。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和一批熟练技工，能够自我开发设计、进行产品创新，在生产中也会有一些外包业务。但该类企业在进行产品创新中，也要与其原料、配件供应商和下游零售商合作、交流信息，企业老板和研发人员要到国内外尤其是到国外市场搜寻异质性信息，捕捉灵感，不断学习，以提高企业的研发设计能力，从而不断地创新。调研发现，即使在集群中存在创新中心，比如西樵的南方技术中心，这类企业也主要是自己从事创新，与创新中心联系较少或基本没有联系。在汕头澄海的玩具、毛衫服装业集群中，也有同样的例子。②

（二）企业在技术创新平台推动下实现创新

传统产业集群中大多是缺乏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比如上文述及的广东南海西樵纺织业集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而出现了衰退。为扶持和激励企业创新，1997年，西樵镇政府出资建立了一家专门从事新产品开发的研究机构——制版公司，由政府贴息帮企业购置先进设备，改进质量、设计新品种。制版公司设计出的新版、新品种均以成本价出售给企业。镇政府还高薪聘请专家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创新带来的收益鼓舞了企业的研发热情，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设立研发部门研发新产品。1999年底，在省科技厅、市、镇政府的共同投入下，西樵建立了纺织产业“南方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中心设立了技术研发中心、产品检测和质量认证中心、企业信息化推广中心、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中心、培训交流中心、知识产权应用和保护中心。当前，市场化运作的技术创新中心提供的服务不仅涉及纺织产业的技术研发环节，而且涉及到纺织产业从技术、管理到市场的整个产业价值链。其技术研发机构主要是为本地的中小企业设计研发新产品，本地的大企业都可以自主研发新产品，但工艺创新主要通过引进国外（比如意大利）的成套设备实现，有些简单的工艺创新则与国内高校合作或独立完成。创新中心为大企业提供的是产品检测认证等创新服务。其结果，西樵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30%，新品种的单价提高了20%以上。西樵纺织业形成产业链完整、专业市场完善的产供销一条龙格局，成为国内继浙江绍兴之后第二大纺织面料生产和销售基地；西樵纺织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大量中小企业依赖技术创新平台主导下的创新网络实现创新，同时，创新网络也推动着集群中大企业的创新发展。

（三）在大企业主导下实现产品创新

这是指轮轴式产业集群形成了产业配套格局。配套企业围绕核心大企业的创新需求和导向，进行产品和工艺创新。目前，广东中山小榄镇锁具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就是主要依赖大企业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大企业或者在政府为主导的集群创新网络扶持下成长起来，或者在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被当地的集群优势以及招商政策吸引进入，而后就成为其配套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

到2004年，小榄镇锁具及五金产业年产值在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另外，全镇已评定30多家省级科技企业，组建了40多家省市级工程技术中心；2005年1至10月共申请专利

①广州皮具企业访谈信息，2005年11月。

②2006年8月，在汕头澄海调研信息。

755 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50.1%，呈逐年增加之势。2005 年，年产值上亿元企业达到 10 家。79%的主要锁具企业成为配套商。[10] 当前，几乎所有锁具产业的配件和加工服务在小榄都可以找到，小榄锁具产业已形成较完善的配套网络。在小榄生产力促进中心提供的共性技术服务逐渐不能适应中小企业个性化需求的时候，随着近几年锁具产业集群发展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大小企业分工关系的完善，大企业开始主导中小企业的创新。在 “大企业主导的创新机制” 下，中小企业实现创新的途径包括：一是核心大企业向中小配套企业直接提供技术指导。作为利益共同体，双方通过生产合同明确规定大企业帮扶配套企业创新，通过技术培训、及时解决技术难题，例如，与大企业约定，每两周由大企业派技术人员到配套企业中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双方建立每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技术交流回报的机制。即使无合约规定，大企业也会在配套企业遇到问题时及时提供技术援助。 二是通过大企业对供货商的质量筛选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创新。 大企业在配套生产合约中通过质量标准、技术约定促使中小企业进行创新。比如，有着 100 家左右配套企业的铁神制锁企业，技术质量标准是其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准，谁的配件供应质量好、信用好，它就稳定持续地跟它们合作。这种稳定的供应——采购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业务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进行持续的配件技术质量监督，有利于对配件企业进行技术辅导和帮助。三是通过核心大企业自身持续的技术创新，激励、鞭策配套企业不断创新。在这些机制作用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推动了产业集群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四）集群企业通过外部联系获取并提升创新能力

随着集群企业与外部国际市场联系的加强，企业也不断从这些外部联系中获取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得以提升。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集群内部创新网络的建立，还取决于这些网络的延伸和发展（Christian Lechner and Michael Dowling，2003）。[11](P1-26) 随着全球化发展对区域发展影响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集群的外部联系对集群竞争力的提高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集群中企业之间的互动学习多为同质信息知识的转移和传递，时间久了会产生技术锁定，从而失去竞争力。因此，集群企业就必须向外部知识源学习以获取 “创新环境” 的持续性。一些研究发现集群企业与外部的长距离联系能给企业带来丰富的新颖信息和创新机遇，对于企业获取异质竞争力是有利的；集群与跨国公司之间完全可以相互促进，实现互依式发展；集群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产业集群升级（C. Pietrobelli， R. Rabellotti ，2004）。[6]

集群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指的是集群中大多数企业与跨国公司、国际采购商有联系，或企业产品主要外销而直接与国际市场发生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跨国公司在集群中直接投资或者分包、国际采购商在集群中购买所需产品、集群中企业产品的外销过程中产生的。观察这类集群可以发现，企业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或仅存在纵向的供应链联系，但集群企业的创新激励和能力主要来自于外部。例如，广东省东莞市、南海里水的鞋业集群，以及潮汕地区产品主要以外销为主的陶瓷产业集群和婚纱业集群。鞋业集群主要是由台资、外资企业进入而生成的产业集群。而潮汕地区陶瓷、婚纱产业集群，虽然主要由本地私人企业自发生成，但企业产品主要销往国际市场。这些集群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主要来源于国外的母公司、国际分包商或国际采购商、国际市场。外来公司的投资会带动集群中其他企业的创新；国际市场中挑剔的顾客、国际采购商的产品质量标准、环保要求、对劳工保障的要求以及禁用童工等标准都促使集群企业不断创新。与国际客户、分包商等的合作，以及来自国际市场的新信息、异质知识都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由此，集群企业能够通过与外部的联系获取持续的创新动力和能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 合法的技术模仿是一种对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形式，是企业创新能力较弱时的投机行为。传统产业集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模仿、应用已有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应用中发现不足或因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产生新的创新。随着创新能力的提高，企业需要在模仿中创新，创新中模仿。当具备创新能力时，企业就从模仿走向自主创新。其间，为提高创新能力，企业需要不断加强与集群内部的企业和制度组

织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外部的联系，构建并发展自己的创新网络。

2. 集群企业创新仍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尤其是传统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这类集群面临的严重问题就是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管理水平不高以及人才缺乏这几个方面。因此，政府的扶持，不仅仅是建立技术创新中心这样的直接支持，还包括信贷政策、专业人才培训以及企业与集群内外的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帮助企业从模仿走向创新。

3. 各级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创新扶持政策应视产业特点而定。政府“抓大放小”扶持政策的制定，应根据产业集群的行业特点而定。对于产业链、工艺链能够拉长、能够标准化生产并能够带动大批配套企业的产业，政府可以重点扶持其核心大企业的创新。但对于产业链短、不适于标准化生产、突出个性化、时尚化的产业（比如皮具业、服装业）集群，政府的创新扶持就应偏重于提供创新所需的公共服务方面，比如技术人才培训、创新中心等。因为该类产业难以形成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配套合作创新机制。但人才培训和技能的提高，会促进集群企业整体的创新水平。

4. 地方政府在构建和延伸集群创新网络方面仍然可以大有作为。比如，激励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能动作用，帮助企业加强内部和外部的联系。设立创新扶持研发项目，将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项目与集群企业创新直接挂钩，鼓励科研的实效性，加强产学研的结合。因为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企业对一些与高校、研究机构的合作结果并不满意，认为效率低、收益低。政府应借鉴国外经验，利用和开发现有的资源扶持企业创新。同时,在引进外资时，应鼓励外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之间的配套合作联系，促使其形成本地的根植性；鼓励行业协会帮助本地企业加强集群外部联系，为集群企业的创新提供切实的支持和服务。①

[参考文献]

[1] Schmitz. Collective Efficiency: Growth Path for Small- Scale Industry [J] .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1. 1995, (4).

[2] 王珺主编. 集群成长与区域发展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 Nelson. R. R. 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 Cooke P, Morgan K,. The Network Paradigm: New Departure in Corporat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93, (11).

[5] Humphrey,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dustrial Clusters? [J] . Regional Studies, Vol.36, 2002, (9).

[6] Pietrobelli C., Rabellotti R,. Upgrading in Clusters and Value Chains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Policies [J]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partment Best Practices Series, 2004, MSM- 124.

[7] Porter,.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J]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11/12).

[8] Feldman M. P.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Economic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M] .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9] 周雪光. 组织行为学十讲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 王峥. 创新网络与集群技术创新 [D] .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6.

[11] Christian Lechner and Michael Dowling. Firm Networks: External Relationships as Sources for the Growth and Competitiveness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J] .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3, (15).

责任编辑：雨 田

①相关的集群升级政策扶持措施，参见岳芳敏 《政策的作用：国外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经验启示》，北京大学 2006 第五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2006 年。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

◎ 李渝萍 甘寿国

[摘 要]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相关研究理论很多，但是较杂乱。本文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系统地认识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关键词] 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 演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76.3；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 19 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P2-4) 中国学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性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P11) 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性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P281-282)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 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 Young, 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

*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产业集群生成中的关系资源研究”（资助号：06-YZ1-63）。

作者简介 李渝萍，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甘寿国，广东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521）。

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P527-542) 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 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性，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P66-226)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 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性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 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 E. 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

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性、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姜皓（2004）[9]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吴国林（2001）[12]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性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性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性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性，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外围，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

心卫星工厂型) 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性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 按照企业的性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性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性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性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 [15]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 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珺（2003、2005) [17][18] 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珺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性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认为基于准公共性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性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性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性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性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 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外围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性，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性”和“阶段性”，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性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 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性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 [22]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 [23]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性、追赶和拉拔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

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性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性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性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缉慈. 解读产业集群 [A] . 顾强主编. 中国产业集群第一辑 [M]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 [英]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中译本）[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3] [英]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中译本）[M] .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4] Allen A. 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J] . The Economic Journal 38，1928.

[5] 阿尔弗雷德•韦伯. 工业区位论（中译本）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M] . 华夏出版社，2002

[7] 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和贸易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 陈雪梅，赵珂. 中小企业群形成的方式分析 [J] .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2001.

[9] 姜皓. 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发展和衰退 [J] . 商业研究，2004，(10).

[10] 李永刚，祝青. 浙江小企业群落式发展初探 [J] . 财经论丛，2000，(9).

[11] 李新春. 专业镇与企业创新网络 [J] . 广东社会科学，2000，(6).

[12] 吴国林. 专业镇经济——一种新型乡镇经济发展模式 [J] . 科技日导报，2001，(5).

[13] 李新春. 企业家协调与企业集群 [A] . 企业家理论与企业成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C] . 2001.

[14] 仇保兴. 小企业集群研究 [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5] 陆立军，白小虎. 从“鸡毛换糖”到企业集群 [J] . 财贸经济，2000，(11).

[16] 朱康对. 经济转型期的产业群落演进——温州区域经济初探 [J] . 中国农村观察，1999，(3).

[17] 王珺. 企业簇群的创新过程研究 [J] . 管理世界，2002，(10).

[18] 王珺. 产业集群中的地方技术组织行为研究 [J] .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4).

[19] 刘友金. 中小企业集群创新 [M] .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0] 李渝萍. 基于生物群落视角的中小企业衍生发展分析 [J] .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2006，(2).

[21] 金祥荣.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 [J] . 经济研究，2002，(8).

[22] 魏守华，石碧华. 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J] . 中国工业经济，2002，(1).

[23] 赵中伟，邵来安.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形成机理与地方政府促进其发展的措施 [J] . 经济问题探索，2002，(10).

责任编辑：雨 田

入世以来我国学界对管理环境与管理转型问题的研究

◎ 郑英隆　杨向艳

[摘　要] 当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发展动力发生大的变化时，管理本身就需通过转型来完成它的质变。管理由一定所有权制度安排下管理者在既定边界范围内对管理对象实施计划、资源配置、组织、协调、激励等活动组成，其转型势必是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包含生产、流通、研发、分配、文化等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管理转型问题也成为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为进一步促进研究，本文就入世以来环境变迁与管理转型、管理转型的内容、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等问题的研讨作一简要的回顾与综述。

[关键词] 管理转型　管理环境　管理内容　转型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C9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54-05

角逐国家竞争力正成为全球化下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而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企业竞争力基础上。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需有行动，更需要思想和理论。从企业组织的生存环境出发，把握企业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思路是“环境—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范式。进入 21 世纪，中国企业的环境变化有三个要点：一是行为主体的自然与社会责任要求；二是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快速变化；三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制度变革。三者作为企业的外部条件对企业发展正产生重要影响，也向管理学界提出深入研究管理变革、创新与转型的新课题。为促进研究，下面对入世以来有关讨论作简要回顾与探讨。

一、环境变迁与管理转型

中国入世的制度变革效应是显然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中国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国外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本土化战略在使中国得到不同于以往开放的资源来源、资源开发、资源综合的新途径的同时，使国民得到了一个比以前更为直接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去。而不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使中国企业面临一个如何变革和管理转型、提升管理能力的问题。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经营同时带来了许多管理经验与管理方法，对促进国内企业管理变革与创新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外市场经济上站稳脚跟，取得管理效率与经营效益，就不能死抱原先国内经营的管理办法，而要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特点与消费习惯，从根本上进行管理变革、创新与管理转型。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管理转型。范保群、王毅认为，随着网络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发展，企业环境的动态不确定性特征日益增强。这种增强使以往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受到挑战，传统的主流竞争战略理论中强调内部资源特点与能力积累的思想及 SWOT 分析方式也因此而显现出发展的要求。为此他们通过对竞争环境和传统竞争战略分析框架的回顾，在已有商业生态系统竞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重点讨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维持、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四大问题。并建立起审视机制和重组与重构商业生态系统的应对策略。[1](P3-10) 陈宏志也指出企业外部环境的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特征。他认为，近 10 年来世界技术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加快，技术创新的学科交叉性加强、复杂度和成本增加；世界市场竞争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竞争焦点转移，由成本转向产品性能、质量乃至新产品开发速度上，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而包括狭义的客户和供

作者简介　郑英隆，广东商学院法治与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320）；杨向艳，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50）。

销商、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顾客需求变化则主要表现为：顾客从关心质量到关心性能价格比的不断改进，直至个性化需求。市场需求从产品基本功能向多样化、多种产品附加特征转变。需求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使企业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战略，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处在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中的企业发展，没有“最完美”的战略范式，只有“最适合”的战略范式，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范式。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变化越来越快，企业经营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经营管理重心、企业战略管理范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2] (P71-74)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与管理转型。从经济社会形态到管理形态的转变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路径。乌家培认为，社会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管理转型。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双重的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与双重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还经历着双重的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工农业经济向新兴的信息（知识）经济转型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还有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集约型转型。传统经济的管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流水线生产的大批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在工业时代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进效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工业社会的管理不同，信息社会的管理更注重信息和知识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管理基础的组织形式也不再是金字塔式等级分明的官僚型组织结构，而是富于柔性的扁平型网络型组织结构，甚至还具有虚拟组织形式。近 10 年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企业管理的巨大变化，正在引发管理转型。[3] (P5-7) 蔡茂生认为，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引导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势必是管理的转型。一是传统战略决策的基础和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传统的组织结构形态和管理机制不适应新的环境；三是实物资本与知识位置的转换，导致管理的重心转移；四是管理日益全球化；五是管理手段信息化。显然，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发展的要求；经济转型必然引起管理的转型，催生新的管理模式。[4] (P8-11)

二、管理转型的内容

宏观经济管理转型。朱建中指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经历过两个阶段和一次转型后，目前正进行第二次转型和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建国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建立和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在同一管理客体基础上进行管理的最长阶段。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现在，管理客体的变化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加入 WTO 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发生实质性变化，要求管理的第二次转型，进入第三个阶段。这包括两个层次和两种方式的转变。两个层次的转变，即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尊重经济全球化规则和利用经济全球化规则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一是通过以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保护弱小产业的发展；二是利用环境标准、技术标准、进口限制等，为国内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的产业赢得成长时间；三是利用反垄断法，防止在若干领域由于外商投资集中程度较高而居于支配地位，以保持市场的可竞争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四是对国内具体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扶持也可使用如发展军事科技，促进军用向民用转移，应用和开发研究走向市场化等间接手段。两种方式的转变，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决策和以较大的储备应对突发事件和反经济周期。WTO 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简单说来就是组织多边贸易、制定多边贸易规则、解决贸易争端，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规则的制定，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宏观经济管理须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为目标，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三次转型，最大限度地消除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适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5] (P54-57)

企业管理转型。对与管理信息化相联系的企业管理转型内容与特点，乌家培归纳为 12 个方面。(1) 在管理目标上，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在完成本身任务的同时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义务，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2) 在经营重点上，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

(3) 在生产方向上，企业从为增加供给而生产转向为满足需求而生产，更多地采用定单生产，加强定单管理。(4) 管理主体从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变为以企业家为主包括员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群体。(5) 管理对象中的劳动者，除“蓝领”外，“白领”的人数和比重大大提高，更需要根据其特点进行管理，以提高知识劳动的生产率。(6) 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为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和知识来进行管理。(7) 在组织结构上，垂直的层阶式组织趋向扁平化，管理决策下移，高层与基层可直接“对话”；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如矩阵型、网络型、虚拟化的组织形式大量涌现。(8) 管理中重视分工，但更强调集成和整合，跨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协调，职能调整和流程重组成为管理的重要内容。(9) 管理由内部向外部延伸，出现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新内容，在企业内部相对于战术管理、操作管理，战略管理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战略管理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掌握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从未来审视现在。(10) 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管理种类越来越多，出现了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以及项目管理、业务外包等管理形式。(11) 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的关系，竞争情报分析与管理、谈判和合约管理等变得流行。(12) 管理的范围突破了国界，扩展到全世界，企业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发展，使跨国管理成为可能。[3]

企业战略管理范式转型。陈宏志认为，企业战略管理范式是由多维战略要素构成的有机成长协调系统。要素的不同组合会造成不同的结构，引致不同的功能，为此，转变企业战略管理范式主要表现为战略要素的不同组合。企业战略管理范式转型的内容与途径是: (1) 挑战惯例, 形成新的适合于现在与未来的企业心智模型。管理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走势, 尤其是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更会加强惯例的稳定性。这与瞬息万变的环境对企业的要求是不相称的。(2) 建立学习型组织。新经济时代的战略管理, 要求通过采用正确的学习模式来提高学习效率, 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加速知识、技术、观念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学习型组织的一大特点是能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主动的适应性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由严格的垂直层级型向宽松的扁平网络型转变, 有利于内外部知识交流, 提高反应速度。(3) 重视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积累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无形资源是最有价值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资源, 也是企业战略范式转型的可行性基础。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出发，战略管理重点必须转移到培育异质性资源和核心竞争能力上来。异质性资源是一个组织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竞争能力是一个组织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并以配置资源的流程和人员为载体, 属于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4) 建立企业经营绩效的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寻求战略管理范式与它的关联机理。服务于企业战略管理，有利于核心竞争力形成的绩效评价体系，其包括财务评价与非财务评估两部分。非财务评估体系更加重视对员工积极性、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发展能力和知识资本等无形资产的评价, 而恰恰是这些能力与资产从导向性来说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管理, 改进经营理念, 更有利于战略管理和增强核心竞争力。[2]

管理文化的转型。企业管理文化是联系新老管理的纽带，它的继承和发扬促使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得到平稳化解，导致管理转型顺利完成。但管理观念、管理文化本身也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转型问题。乌家培认为，企业文化的精髓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它指引和激励着企业的组织行为，调整和提升着企业的管理方式。世界一些著名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创立于工业时代，但在它们的优秀企业文化影响下，与时俱进地调整了业务和管理，在业务上从制造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在管理上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及价值链管理等，从而使企业重振雄风。一些企业往往由于文化底蕴差，经不起时代变迁的冲击，未能解决好转型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以致缩短了企业寿命而使基业长青毁于一旦。[3] 陈宏志认为，战略范式转型有风险，需要精益求精和坚韧不拔，缺乏相应的企业文化支持是难以持续的。为此，实现战略管理范式转型需要培育一种乐于革新、允许尝试和失败的宽松的企业文化。富有文化内涵的企业也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学习模式有适应性学习模式、发展性学习模式、过渡性学习模式和创造性学习模式等多种, 而创造性学习则是组织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它以发明创造或采用新技术为突破点，进行积极的根本性的系统重构，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2]刘良认为，组织作为一个由人与目标耦合而成的共同体，要想健康发展就得不断变革、调整，变革、创新已不单单是组织与环境联动发展的需要，而且早已渗入组织内部，成为当代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组织面临的环境要求它迅速、经常地应对变化，变化可能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微调上，也可能是组织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心理契约的变化，组织成员也会重新考虑与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这些变化增加了组织违反心理契约的可能性，因而重塑或整合变动组织中的心理契约就显得十分重要。心理契约是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付出什么同时又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约定，约定的核心成分是雇佣双方内隐的不成文的相互责任。[6](P126-129)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多跨国公司进来，也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种进出之间，东西方管理理论与管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势在必然。管理学者们普遍认为：(1)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思潮开始影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永恒的主题和旋律，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 不同文化之间要互相补充，吸取各自管理文化的合理内核。西方管理学需要吸收东方人本管理思想，而东方管理学更应当学习西方管理理论，使东方管理学更加科学化、客观化。(3) 管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7](P39-45)

与企业管理转型紧密关联的公共管理转型。张丽曼在考察和审视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管理模式三次历史性转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内部分权式转型、职能转变式转型和行为规范式转型的特征、原因和经验，指出实现公共管理意识的根本转变，需要克服全能型政府的“政府万能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在由全能型政府向效能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新型治理模式。[8](P1-5)如何管理公共事业，提供公共事业产品与服务是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赵立波认为，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相适应，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两次大的转型：一是政治主导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二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社会转型导致的政府治理变革引发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转型。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事业向公共事业转变、国家包办向多元参与转变、“两公（公有制和公益性）模式”向分类发展转变、管办不分向管办分离转变、政事一体向政事分开转变、行政任用向契约聘用转变。[9](P72-76)吴云等研究了中国入世对公共管理范式的影响和WTO规则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的转变。(1) 理念的转变，包括知识从垄断到分散；能力从全能到有限；作用从控制到服务等。(2) 结构的转变。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到公共管理中去，如对公共物品质量和价格的听证会制度，向行政民主化跨出了一大步；公共部门将部分权力下放或授予某些社会组织 (如各种协会)，由其行使（或代理）公共部门的职能；一些非政府组织自主地承担起环保、社会、福利、人道救援、教育卫生的职责，分担政府的公共职责。整个社会公共管理呈现出公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多元模式。(3) 管理方法的转变：从规制到协调；从单向到互动；从官僚到顾客；从注重投入到关注产出。公民的广泛参与是中国入世以来整个社会的显著特点，它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公民参与水平的提高，民主化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从政治领域向公共管理的范围内渗透，公共管理范式也在渐进地进行转换。[10](P53-55)

三、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

转型管理的特征。企业管理转型具有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以物为本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从有形的“原子”管理转向无形的“比特”管理即虚拟管理或数字管理等性质。转型管理一般有两种混合模式，一种是板块式的机械性混合，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价格管理中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在并轨之前两种价格管理时有摩擦甚至冲突，另一种是渗透式的有机性混合，如我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中老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一下子就为新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而是在建立新体制的同时改造和提升老体制，使它们逐步接近而趋于一致，达到管理上新陈代谢的目的。转型管理表现为传统管理和现代管理或者说新、老管理同时并存的混合管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混合性。在混合的转型管理中，新、老管理的成分熟多熟少、熟强熟弱，在转型初期、中期、末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和相互

渗透、结合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新与老的对立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老的管理是由新的管理变过来的。传统管理（如工业时代的管理）曾经一度也是现代管理（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管理而言），不同时代的管理尽管有质的差别，但也还有共同点，有些管理因素会逐渐传承下去，比方说，管理是基于组织的，任何管理决不可能脱离组织而存在。这不会因时代变迁而使管理有所不同。[3]

蔡茂生通过总结中外管理转型的实践，归纳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一是创新性。支撑这一时期的管理理论主要不是对传统理论的修补，而是新的概念和术语。如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跨文化管理、顾客价值管理、绿色营销等。二是融合性。正如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依赖和相互更紧密联系一样，各种管理思想不是日渐疏远、背离、对立，而是多学派、多视角、多方法、多工具、多范式并存中的相互融合。相互融合使管理系统思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全球性融合中，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管理、硬的管理与软的管理的贯通是转型管理的主题。它们的相互融合，反映了管理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客观要求，同时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西方传统管理以追求科学和理性为主流，东方传统管理重视人文和伦理，追求人际的和谐。管理向人性化和软化转移，反映了东方管理思想更加适合新的环境。在转型的和未来的管理中，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依然重要，但将作为管理的方法手段纳入新型的管理体系中，人文价值将提升到新的高度。三是动态性。转型的管理面临的是快速变化的环境，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产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转型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与环境在动态中保持其适应性。[4]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同时是一个管理创新的过程。管理转型突出了管理范式的变化，但不断创新始终是新型管理思想的品格。创新表现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鲁兴启认为，在管理理念创新上，要建立知识资本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的基本理念，企业管理者应该十分关注无形资产的投入；在管理模式创新上，应该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传统的以交易过程、后勤统筹和工作流为关注核心的管理转到建设一个有能力支持沟通、建立人际网络、在工作中学习等内容的系统上来，以行动和知识的创新更快地反馈循环来对全新的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在管理组织创新上，要实现从金字塔型等级化的垂直管理向网络型扁平化的水平管理的转变；在管理方式的创新上，则应从消极地适应市场转向积极求变、创新，将企业管理从科学管理推进到科学加艺术的管理的新境界。[11]

[参考文献]

[1] 范保群，王毅. 战略管理新趋势：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 [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3).

[2]] 陈宏志. 论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型 [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3] 乌家培.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 [J]．学术研究，2006，(5).

[4] 蔡茂生. 管理转型及其思想特点 [J]．学术研究，2006，(5).

[5] 朱建中.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转型要求 [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

[6] 刘良. 变动组织中的心理契约重建 [J]．新华文摘，2006，(1).

[7] 苏东水. 论东西方管理的融合与创新 [J]．学术研究，2002，(5).

[8] 张丽曼. 论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 [J]．社会科学研究，2004，(6).

[9] 赵立波.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 [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6).

[10] 吴云等. 中国加入 WTO 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 [J]．学术探索，2002，(4).

[11] 鲁兴启. 互联网与企业管理创新 [J]．中国软科学，2002，(4).

责任编辑：雨 田

•社会学　公共管理•

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化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基于系统整合理论的改革新思维*

◎ 李习彬

[摘　要]　“1+1≠2”的系统整合原理揭示了自然界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基于系统整合原理，我们可以给出生产力的科学定义，并得出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形成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的结论。因此，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并列为“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等基本论述是不能成立的；改革开放中，将计划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解释为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是不能成立的。而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是“姓资姓社”争论存在的理论基础。由系统整合原理可以推断出“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这一基本命题，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人类认识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度；而在实践层面，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地位，从而揭示出，改革开放中的“姓资姓社”争论，在科学理性层面，是一个不需争论的伪命题。

[关键词] 系统整合原理　生产力　社会发展　不可预测性　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N94-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59-04

一、系统整合原理

1. 基本理论。

现代系统观认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及其构成的整体，都是以系统的形态存在着。所谓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整合原理揭示了系统整体功能和其部分功能之间的关系，人们常常简单地表述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并形象地表述为

$$1+1\neq 2$$

系统整合原理的较为严格而完整的表述是[1](P79)：一般情况下，系统整体功能不等于其所有部分功能的简单加和。具体说来，可能有下述三种情况。

① 当系统整体和其部分都具有某种功能时，整体功能可能大于、小于和特殊情况下等于其部分同类功能之和。

② 系统可能具有所有部分都不具有的新的功能。这一现象称为系统整体性态的涌现。

③ 系统作为整体亦可能不具有部分的某些功能。这一现象称为部分功能的隐没，或称非完全整合。

对于一个特定的系统，其整体功能与部分功能之间究竟取何种关系，依赖于部分之间的关联—整合（或称组织化）状态。在以自然系统和工程技术系统为背景的传统系统科学中，系统的整合状态通称为结构。在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参与的系统中，为了更精细和准确地反映系统整合的复杂性，系统的整合状态划分为结构与运行两个层次，[2](P16) 社会系统的组元、结构、运行和环境，共同决定了系统的功能——这一规律称为系统功能原理。[3](P36-45) 系统功能原理的内容不仅容括了反映部分与整体之间功能关系的系统整合原理，还扩展到了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各种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

2. 系统整合原理的科学基础地位。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70573028）

作者简介　李习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地球上的元素不过几十种，何以演化生成数以百万计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种类，最后还出现了人类及人类社会，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其根源在于，物质从原子到分子，从简单无机分子到复杂有机大分子，生命的出现和不断进化，乃至多个层次人类社会的出现，这其中每一层次的整合都有新的功能和属性涌现。这就是说，系统整合原理中的“1+1>2”，即由部分结合成整体而导致系统整体功能增强或新的功能涌现，是自然界进化规律的真谛。

近代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何以会奇迹般地快速增长？人们将之归功于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并称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两个车轮。科学技术是什么？其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基本手段不外乎两种：一是研制具有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二是设计制造具有新的功能属性的器具。前者本质上是创造物质的新结构，后者本质上是发明零部件的巧妙组合，两者都是新的“1+1>2”规律的发现、发明和利用，即经由整合的创造（技术创新）而大大提高物质的价值。科学管理是什么？是通过巧妙地安排组织成员之间的分工、协作、竞争、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等关系，以便做到成员之间知识和能力的互补与相互助长，使个人的长处充分发扬，弱点变得无关紧要，可能发生的错误受到抑制，从而完成人们单独行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大地提高工作的效果、效率和效益，亦即经由组织整合的创造而大大提高组织整体的功效。因此，系统整合原理中揭示的“1+1>2”，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

部分整合为整体（系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与演变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系统整合原理，不仅揭示了自然界进化规律的真谛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谛，它在许多学科中都具有基础地位。以系统整合原理为基础，一些社会领域可以构建出具有严密逻辑的准公理化的科学体系。下面关于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化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重大命题的推出，是系统整合原理在科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初步展示。

二、生产力概念的科学化

基于系统整合原理和系统功能原理，可以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给出新的科学定义和分析，并由此可以对诸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管理是生产力”、“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等一些论断给出科学解释和论证。

政治经济学将人们进行物质生产、亦即“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称为生产力，或称社会生产力。[4](P2086) 从系统视角看，上述定义的生产力即是社会经济系统在与自然界相互作用方面表现出来的功能。

运用系统功能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形成，亦即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实现，不仅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等要素（社会经济系统的组元）的存在，而且需要将这些要素进行整合——建立要素之间的关联，其中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而后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生产关系。[4](P2087) 但是，从系统学的视角看，很清楚，生产关系仅属于社会经济系统组织整合状态的一部分，是生产力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4](P2087) 这一表述也清晰地表明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有机构成部分。

上述分析表明，生产关系仅属于社会经济系统组织整合状态的一部分，是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之一，它不能独立于生产力之外，更不能超越于生产力之上。因此，经典政治经济学中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并列为“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视“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4](P2087) 以及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等这些基本论断，就混淆了系统整体功能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概念层次上的逻辑关系混乱，源于经典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概念的含混，内涵与外延均不够明确和严密。

系统功能原理为生产关系决定因素的分析提供了清晰思路。实际上，生产关系应该与生产力要素之中的组元要素种类、规模数量、复杂性相适应、应该与系统所处的现实环境及面对的基本任务相适应、而不是与整个生产力相适应。在以系统整合原理、系统功能原理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概念和理论基础上，可以重

建政治经济学和许多社会科学与管理类学科，大大提高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理论体系）的清晰度，增进这些领域学科的科学性。

比如，如果承认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系统组织整合状态的一部分，那么它就是一种人为设计，那种关于生产关系是“必然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4](P2087)就是错误的。实践中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将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公有制存在的诸多弊端，解释为它们（生产关系）超越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从科学的生产力定义视角看，这种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将旧体制（生产关系）先验地假定为符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未来，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是改革中“姓资姓社”争论存在的理论基础。

下面基于系统整合原理得出的“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则从根本上否定了对未来生产关系做出科学预测的可能，从而在科学理性层面否定了“姓资姓社”争论的合理性。

三、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

科学是探索未知的，但基于系统整合中的涌现和隐晦（非完全整合）的存在，在由现有某一层级系统的理性知识推测更高层级或更低层级系统的存在形态和运动规律时，就会遇到超越现有理论知识和一般科学思维能力的超常障碍。因此，我们说科学理论具有预测功能，但科学理论的预测能力非常有限，特别是远期的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上述这些可以概括为命题 1:

命题 1　科学的未来发展（会发现怎样的新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及运动规律）具有不可预测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新的科学发现，即科学已成为技术之母。由科学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可以进一步推出:

命题 2　技术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

技术长远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必然导致:

命题 3　未来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艺过程等生产力要素具有不可预测性。①

进而导致:

命题 4　未来微观生产关系（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整合形态）具有不可预测性。

未来生产力要素之中的组元要素种类及其复杂性不可预知，其中人员之间的关联——微观生产关系也不可预测，自然可以推出:

命题 5　未来微观经济活动及微观生产力均具有不可预测性。

作为社会基础的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可预测性，必然导致:

命题 6　社会宏观经济活动的长期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

同时有:

命题 7　未来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演化，各阶级和阶层的属性、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具有不可预测性。②

---

①工业革命之前，人们难以想象可以代替人力、畜力、风和水等自然力的动力机器出现。工业社会初期，蒸汽机出现后，人们预测到其将引起生产领域的革命，但不可能想象到后来电力、电子、化学工业、核能的出现，不可能想象到能够代替人脑记忆和思维的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难以想象宇宙中个体极其渺小、数量极其巨大的第三类生物，即微生物的存在，更想象不到生物中存在着遗传密码（基因）和基因工程的出现。今天我们从事生产所使用的工具、技术和工艺，绝大部分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所没有、也不可能想象到的。

②工业经济的发展以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为物质基础，以不可再生的能源为动力基础，这就注定了其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只能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作为工业化初中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也就注定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幕。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蓝领工人）不仅数量上越来越少，其社会作用也逐渐降低，而从事科学技术与管理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数量上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主体，而且由于他们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而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这样，最终导致：

命题 8　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①] 即未来的人类社会生活与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活动，包括政治与行政体制在内的社会治理的基本架构，也包括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均具有不可预测性。

四、改革新思维：重建社会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工业社会的初中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科学，主要在于它对当时社会存在形态及其内部运作机理的揭示。如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4](P1366) 由于其科学性和维护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鲜明立场（人民性），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为 20 世纪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实践，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所有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突出的表现为时代局限性——以当时社会现实来预测未来的社会制度，必然存在着偏差。这种偏差已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科学理论存在局限性，对未来预测存在偏差是难以避免的，问题是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偏差。“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这一命题，为这一难题的释解提供了思路。

“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人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限度——在一定具体化层面的规律是不可能掌握的，因而我们不能把先哲们基于当时社会现实对未来的一些设想和愿望当做规律来遵循，甚至象一些宗教的原宗旨主义那样进行教条主义的维护。在实践层面，“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这种论述只能做为一种大胆的设想，而不是必须遵循的真理。这样，实际上就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的“姓资姓社”争论，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不需争论、不必争论的问题：因为争论者用来评判“姓资姓社”的尺度，是一种不能用作标尺的先哲关于未来的设想。对于我们的改革方案，要争论的应该是它们是否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5](P372)

“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一切新的重大社会制度的建构，都不应该是遵循理论预先规定的结果，而应该是、最终也必然是没有预设的社会自我组织过程。而社会制度构建的社会自组织，应该是作为社会主人的公民的主权行为。也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改革方案，任何人都可以评判，但最终的取舍应该决定于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

在新时期，我们最需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根据我国实际，积极探索、推进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社会科学理论与意识形态的重建。

[参考文献]

[1] 李习彬，李亚. 政府管理创新与系统思维 [M]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李习彬. 管理科学化研究指南 [M]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

[3] 李习彬. 系统工程——理论、思想、程序与方法 [M]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4] 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M] .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柏　桐

①这里的人类社会“未来”与“长期发展”，均是一个模糊（模糊数学意义上的“模糊”，而非含混）概念。如何严格地定义未来（长期发展），或如何选择其尺度，应该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础的变量、即科学发现为基础。在人类农业社会初中期，未来（长期发展）应该以数千年为度，工业社会初中期应该以几百年为度。显然，随着科学的加速发展，这种尺度越来越短。

城市治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 袁 政

[摘 要] 城市治理近年来成为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在对城市治理的含义、城市治理的理论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治理与普通意义上治理的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并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作了探讨，分析了中国的城市治理在实践上的如下方面内容：治理的实施在发展时序和空间上有别于农村；城市治理的政治体制背景；城市治理的实际操作模式；最后，文章提出了今后中国城市治理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城市治理 社会分化 公共需求多样化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063-06

一、城市治理的概念

1. 治理。治理一词在政治与行政管理范畴由来已久，治理的概念在西方区域（包括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频繁使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有学者预言它将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一样产生深远影响。[1] 目前人们对“治理（governance）”一词有多种定义。1992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将治理定义为政府或公共行政管理的同义词，以“争取使用政治权威控制和经营社会及资源以争取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强调：（1）法制精神（2）公共机构公正地管理和使用开支（3）政府领导向人民负责（4）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政治与行政公开。[2](P33) 该委员会 1995 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 4 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P4-5) 美国学者罗森奥（J.N.Rosenau）等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一书特别强调：治理实施过程中需要公众参与。[4](P107) 治理理论的权威学者威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对目前流行的治理概念作了一番梳理后，提出了如下五个要点：[5] 其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惟一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共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其二，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它们正在承担着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责任和界限便日趋模糊。其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所谓权力依赖，是指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其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其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作者简介 袁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在我国，不同的学者群体对治理（governance）一词也有多种理解和译法。曾有人将 governance 译为“管治”，但另一些学者认为“管治”在字面上仍给人以“政府主体”的感觉，易使人对其本质涵义产生误解，因而将其译为“治理”更合适；有的学者根据其功能和特质将其译为“协治”。无论采用什么译法，予以什么名称，关键是我们要把握其本质的涵义。有学者提出：“治理”(governance)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出现了两种最典型的误读，一是将治理读解为是政府的一种管理方式，二是将治理读成了是对公众参与的强调。治理与这两方面都有关系，但却不是仅指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这两者的简单加和。治理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寻找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治理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治理从开头起便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6] 按照此观点，治理是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社会两个层面的契合。在行政管理学中，治理模式包含以下基本内容：(1) 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自组织等共同承担，重构政府与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关系。(2) 重新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与作用，重理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间的关系。(3) 从政府完全理性假设到政府有限理性假设，并用以解释政府改革必然性的行为主义依据。[7]

俞可平认为，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意味着涉及集体行为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8](P110-113) 笔者认为，治理与协调有联系又有区别。协调着眼于对涉及多方的矛盾冲突的解决，一旦冲突得以解决，协调行动就可划上句号。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多方协调，但这种协调过程通常是没有句号的；此外它还着眼于建立在协调之上的行政（公共）管理，甚至可以包括执法管理活动。在西方，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治理还通过建立常设的专门机构来统一行使职权，有时，它还可以根据特殊需要，向参与治理机构的各市地方议会提出创设新的地方法规的建议。

2. 城市治理。在明确了治理的概念后，我们就容易明白城市治理的涵义：是将治理运用于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当今城市及城市密集区域，政治民主化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城市社会群体分化、社会信息化与科技的迅速发展的基本选择；更多地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权力来调动各部门、各基层和微观单位的积极性与活力，成为城市控制与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现代城市中，对公共事务的最佳管理和控制已不再是集中的，而是多元、分散、网络型以及多样性的，这就涉及中央、地方、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多层次的权利和利益协调——这种由各级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个人管理城市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就是城市治理”。[9] 构建一个既公平、公开，又具竞争力的治理系统，对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城市治理注重的是过程，即地方当局协同私人的利益集团力求实现集体目标的过程，并由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体系去共同塑造。城市治理是政府与市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的互动过程。“地方政府是城市治理的主角之一，理解地方政府的组织能力是理解城市治理的关键。城市治理的内容不仅包括垂直调控的各权力部门的行政约束，也包括水平制衡的各相关部门、企业、组织、社团的建设性协作。它的内容本身就具有系统性和层次性”。[10]

在现有城市治理的诸多范式中：城市治理的主体包括城市的国家机构、城市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城市治理强调“过程”，强调决策建立在许多不同层面的复杂关系之上；城市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除了政府机关外，还需要公众社会的参与和各种利益集团及组织的介入，共同协商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互动。这样，在现代城市公共管理中，城市治理通常能获得公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实现政策的预定目标。

二、城市治理的理论背景

龙献忠概括了一般意义的治理理论的产生背景：[11] (1) 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需要全球治理。(2) 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出现，使得人们在解决社会各种问题时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或国家政府协调的失败”。[12] (3) 第三部门的兴起使管理主体多

元化，为“治理”提供了行动基础。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传统上的“市场——政府”二分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就迫切需要另外一种力量来参与管理，这就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各种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发展空间。这些第三部门力量壮大后，它们或是独自承担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一道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管理职能。因此，“由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3](P328)（4）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治理的推行。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背景外，城市治理的理论背景还具有其自身的要点。

1. 城市社会高度分化。一份分析当今社会发展变化趋势的综述报告指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社会分化也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社会利益关系不可谓不严峻。那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是否如某些西方工业化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一样具有一种社会修复机制，或是某些独特的协调机制在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这一问题成为2003年社会分层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城市社会中出现了类似‘后现代’的个体化、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使得社会意识形态‘碎片化’”，[13]这些概念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的分化是越来越细化了。有人将这种趋势称之为社会的碎片化。李强认为“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14]另有学者强调指出，现阶段我国城市的社会分化，“表面上看是分配制度问题，其背后却是不同群体为自己争得利益，即有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缺乏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机制，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被排斥于社会利益分配的权利表达制度之外。因此，建立一套公正、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当务之急。”[13]

可见，城市社会的碎片化，对现代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包括公共资源分配）从传统管理模式向城市治理模式转变提出了需求。

2. 城市多样性的不同群体对于许多公共性事务的态度和许多公共性需求各不相同。对此，尹继佐作了较好的概括：“不同集群的社会聚合体因其在城市分工中起的作用大小不同，因此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不同，对自己居住的城市也存在不同的期待。西方研究城市问题的专家们经过调查，就世界城市中不同利益群体对城市的期待进行了分梳。一般来说，社会的低收入群体比较关心城市是否存在着改善境遇的机会，城市的物价、子女受教育的机会等；城市中产阶级则比较关心城市的生活质量是否优越、税收是不是较低、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利因素是否充分；城市中的非永久居住者，包括因工作关系在城市中作长期或短期停留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则更关心城市是否是事业发展的场所、政治生活是否稳定、是否能化少量的钱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总之，不同的人，要求的（公共）事务很不一样。”[15](P27)（参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不同公共性需求的分析①

利益群体	与自己相关的城市功能	对城市的主要关注点
贫困阶层	尽管生活艰难，相比较而言城市仍比乡村要好；能够积累一些钱买土地；能够保证子女通过正规教育获得更好的未来	收入机会，能够承受的物价、教育机会、住房和交通
富裕与半富裕阶层	城市是理想的居住地，意味着更好的服务、容易建立同商界和政府的联系，是走向外部世界的大门	社会地位、收入、安全、廉价的劳动力，关注生活质量以及商品服务的质——价平衡
非公民的商人与专业人士	城市是短时期内获得最高利润的场所，是进入各种公司和机构总部的理想之地，是少花钱但能享受体面生活的地方	政治和社会稳定、安全、城市的服务、就学机会、住房、社交、劳务市场。关注服务的可得性与可靠性、产品质量，不太介意价格高低
访问者与旅游者	城市的气氛、轻松宜人的环境、良好的购物环境以及一切保证使假日和短期舒适愉快的因素	食宿、交通、安全、舒适、购物环境、观光资源、特色商品服务的可得性；关注服务——价格间的平衡

3. 城市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的特定联系。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结论为我们认识城市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本分析框架：（1）法国著名学者布罗代尔

①本表摘录于《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尹继佐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Fernand Braude) 认为："城市是发达的原因和起源"，归根结底在于商品和商人的特性，"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品孕育了自由和所有权观念。但在政治国家高度发达的领域，身份代替了平等，权力垄断一切，个人所有权是君主和政治权力的附庸，不存在独立的个人所有权。(2) 城市市场经济的充分、健康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在这个社会空间中人们不受专断权力的随意裁制，以（与政治国家）平等的身份和资格谋求着自己的私利，人们自主地管理着私人事务，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依附于政治权力。从实际进程看，市民社会真正以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姿态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然。反观之，"独立于政治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的建立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条件"。[16] (3) 对城市中的国家与社会同构状态的反思，这种状态造成整个经济生活的过度政治化特征。它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企业或个人都成为国家计划的执行者，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社会生活单一、缺乏活力，社会不能有效地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而市民社会理论揭示：国家强制性干预的无限扩大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枯竭，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义务最终会被剥夺殆尽。……这似乎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观点——当政治国家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17]

4. 国家主导下城市政治与公共管理多元化的倡导。市民社会的表述如同政治社会、经济社会一样，代表的是整体性社会中的一个功能领域，它强调社会的自组织性，提倡自由、平等、分权精神，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18] 这就要求多元、协调、互补、互动的城市公共管理体系的构建。市民社会理论揭示：现代市民社会的显著特征——"社会自主性"发展的直接结果,其重要表现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不再是社会惟一的支配力量，其部分权力分配给了相关的社会组织，从而形成了众多利益群体、社会组织与政府机关并存，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补的多元化社会控制的局面。

5. 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改革的新要求。政府职能的运行过程，是一个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过程，而公共政策具有明显的利益分配功能。陈庆云教授认为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第一，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利益分配……；第二是基于多种利益关系上的有选择的利益分配……；第三，是通过综合各种利益矛盾后的利益分配……；第四，是要在实践中得到兑现的分配……。"[19](P2-9) 在我国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背景下，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群体，对城市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偏好不尽相同；面临和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等等往往不尽相同。而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各种公共问题中时，为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决策目标，对许多错综复杂的、涉及到各种市民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问题，采用的主要决策与实施模式是"一刀切"的行政模式。这样，确实可以达到降低政府制定、实施政策的成本的目标，但这也往往会强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供给的非均衡特性和非公平特性。从均衡性角度看，政府不可能十分清楚社会群体甲、乙、丙面临何种具体困难，最需要得到什么公共服务供给、解决何种公共问题，而这些，只有甲、乙、丙自己才是最清楚的。类似这样的问题，城市治理是其解决的基本途径之一。

三、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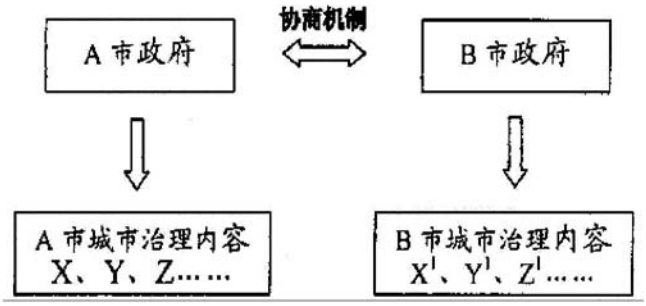
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三个独特的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5000 年的中国文化传统；长期而有力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9] 中国的城市治理在实践上具有以下特点：

1. 治理的实施在发展时序和空间上有别于农村。由于我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等原因，与西方市民社会的起源不同，中国的市民社会并非起源于城市。我国农村的治理伴随着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展已先于城市而行。此外，笔者认为，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的地理空间和行为空间均有不同：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活动的进行集中于一个高密度的（地理）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某些原本在农村中属于私人活动的范围（行为空间），变成了具有很强公共特性的活动，即农村的许多"私域"在城市变成了"公域"；而且，在城市，如果"公域"得不到加强，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将处于较大的混乱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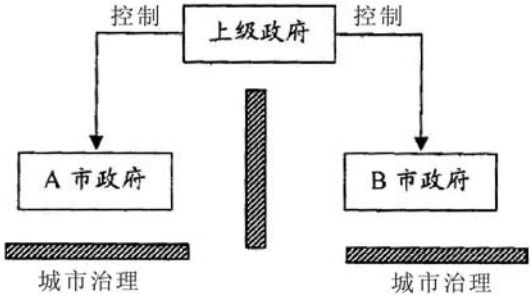
2. 城市治理的政治体制背景。西方国家的城市是自治单位或具有较大自治权力的地方实体（参见图

一)；中国的城市是纳入国家统一政治——行政体系之中的某一级政区，中国城市治理的体制背景可以描述为：(1) 中国的市民社会还处在刚刚发育阶段；(2) 整个国家的城市政权体系仍处于改革中；(3) 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仍在进行之中；(4) “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管理格局仍是基本行政框架；(5) 维护“私域”的法规仍处于完善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城市治理目前还只能处在试探性的“摸石头过河”阶段。黄光宇、张继刚指出我国城市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有：(1) 行政体系内事务分工、责权界限划分不清；(2) 行政体系在区域管理上缺乏对应机构和协调机制；(3) 行政体系的市场适应性与应变能力较差；(4) 水平层面的问题：缺乏公众参与机制，缺乏对行政的司法、社会的公开监督。[10]

3. 城市治理的实际操作模式。目前我国的城市治理中，不同城市之间在协调、对话方面存在着较大阻隔（参见图二）。在我国沿海地区，业已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城市治理，其表现形式主要与西方城市治理中的“支持增长模式”较接近。[20] 比如许多地（县）级政府对于基层地方的招商引资赋予充分的灵活权限，这些做法使一些地方的基层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由此而出现的遍地工业化现象，引出了新的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工业布局分散化；土地浪费；环境污染；集聚效益低；工业化对第三产业带动系数低；基础设施投入大，效能低；缺乏城市化所需的社会资本；基层政府管理混乱，规范性差等等）。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在实施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没有分清“公域”(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公共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公共财政管理等等）与“私域”(经济发展、集体权利等等）的界限。结果，使“公域”与“私域”混淆；“公域”向“私域”妥协；“私域”侵犯了某些“公域”。另一方面，政府对某些“私域”又没有充分放开，层层审批压抑了“私域”空间中的灵活、创新源泉。在广州市白云区，在过去的发展中，为了照顾各基层镇、村的利益，在全区建设了十二个工业开发区，结果各开发区规模小，行政管理和政策不到位，业务管理水平低，吸引外来资本的成绩很不理想，土地浪费严重。并且由于工业区小而分散化，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另外，2000 年 12 月制定的广州市总体规划，拟将广州市城市建成区控制在白云区华南大道以南，华南大道以北区域是广州市的生态控制区和生态保护区。但直到笔者调查的 2004 年 10 月，在华南大道以北区域大、小工程建设正在“遍地开花”，一些局部区域生态环境在加速恶化。这是广州的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公域）与个别机构利益（乡镇、村，私域）相混淆，私域侵犯了公域、公域中某些权力被弱化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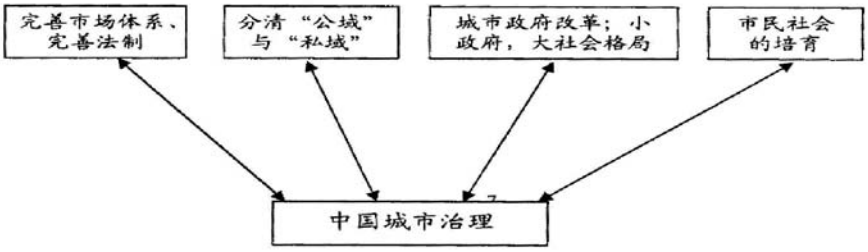


图一　西方国家的城市治理体制



图二　我国城市治理的体制约束，县级市尤其如此(阴影框表示体制障碍)

4. 今后中国城市治理的发展路径。笔者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广州市白云区的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州市白云区新的城市治理工作，首先要分清“公域”“私域”，并要加强“公域”的政府管理，做好在全区范围内的集中式开发区规划与建设，制定有关的环境保护规则，并由政府出面，协调好各镇、村的利益关系，建立起“一区集中开发，各镇村皆受益”的共同富裕机制。其次，在“私域”，则要注重放开搞活，充分激发各利益主体的创新和发展欲望。由此，笔者进一步总结概括，现阶段中国城市治理的主要路径是：强化“公域”、还权“私域”、激励创新（参见图三）。



图三　中国城市治理的构建路径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其新意之处在于“扩大”和“有序”二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主张“公域”与“私域”的合理划分，对“私域”的深度、广度和效率给予了新的和高度的重视。这为我国城市治理的顺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 城市与区域治理及其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 [J]. 城市问题，2000，(6).

[2] 全球治理委员会.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M].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3] 俞可平主编.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 [美] 詹姆斯•N•罗森奥著. 张胜军和刘小林等译. 没有政府的治理 [M].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5] [英] 威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 [J]. 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6] 孙施文. 关于治理的解读 [J]. 国外城市规划，2002，(1).

[7] 孙柏英. 当代政府治理变革中的制度设计与选择 [J]. 中国行政管理，2002，(2).

[8] 俞可平.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 顾朝林.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发 [J]. 城市规划，2001，(9).

[10] 黄光宇，张继刚. 我国城市治理研究与思考 [J]. 城市规划，2000，(9).

[11] 龙献忠. 论高等教育治理视野下的政府角色转变 [J]. 民办教育研究，2004，(1).

[12] [英] 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 [J]. 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2).

[13]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 中国社会学学术前沿报告 [J]. 社会学研究，2004，(4).

[14] 李强. New Trends in 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oday's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5，(4).

[15] 尹继佐主编. 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6] 田忠. 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市民社会 [J]. 理论与改革，2001，(2).

[17] 张昕. 宪政主义与创新政府 [J]. 中国行政管理，2002，(3).

[18] 韩克庆. 市民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再检视 [J]. 天津社会科学，2002，(3).

[19] 陈庆云. 公共政策分析 [M].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20] 罗震东，张京祥，罗小龙. 试论城市管治的模式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J]. 人文地理，2002，(3).

责任编辑：柏　桐

提升城市功能与合理发展人口初探
——以深圳为例

◎ 王世巍

[摘　要] 本文以深圳为例，对城市功能和城市人口问题作了相应研究。深圳城市发展和人口发展现象表明，城市功能和城市人口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方面，城市功能的形成、发展，对人口形成吸引、聚集、分配、培养等规定性要求；而人口有效聚集和配置，也对城市功能的建立和实现具有促进和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功能不尽合理和不尽完善之处也给人口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本文从增强城市承载功能、经济功能和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等方面提出对策与建议，对实现深圳城市功能和人口发展相匹配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城市功能　城市人口　深圳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69-05

城市功能和城市人口相互作用、共同发展。一方面，城市功能的形成、发展，对人口形成吸引、聚集、分配、培养等规定性要求；而人口有效聚集和配置，也对城市功能的建立和实现，具有促进和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功能不尽合理和不尽完善之处，也给人口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经过 25 年的发展建设，深圳已经成为经济功能极强、人口规模超大的城市。作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人口，在对深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城市功能完善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同时，也对资源、环境、城市管理和城市功能提升造成严重压力。提升城市功能、合理发展人口，涉及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是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不可回避的问题。将城市功能和人口问题作对应研究，对实现城市功能和人口发展相匹配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以深圳为例，就此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城市功能和城市性质

城市是城市客观条件和地理分工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城市功能类型多种多样。

（一）城市功能分类

英国学者奥隆索（M.Auronsseau）根据对城市形象的定性描述，将城市功能分成行政、防务、文化、生产、交通和娱乐六大类。[1](P190-191) 美国学者哈里斯（C.D.Harris）根据主导行业职工比重应达到的最低临界值和主导行业的比较优势两部分指标，将美国城市功能划分为制造类、交通运输类、零售商业类、批发商业类、娱乐休息类和政治中心等十大类。[1](P192) 我国是根据从业人员比重、主导行业产值、特殊地理区位或城市历史传统、特殊职能和现代产业特征来划分城市功能的。

（二）城市基本功能

1. 载体功能。

载体功能是指城市自然环境、资源和基础设施、生产生活设施有机结合，构成城市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

2. 经济功能。

经济功能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运输等功能。在现代社会，城市经济功能主要发挥经济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工业

作者简介　王世巍，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广东　深圳，518031）。

区、开发区、生活区、交通站场的形成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展过程。

3. 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是指城市为人类各类社会活动提供集中场所的功能。政府、团体、企业、各种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实体都设在城市、并活动在城市，它们以城市为依托，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增强城市自身辐射力和吸引力。

4. 中介和传输功能。

中介、传输功能是指城市内部之间或对外部的传输、物流、人流、信息、资金与技术等辐射功能。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城市中介和传输功能越来越突出。

(三) 城市功能发展

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导致城市功能不断发展。从城市产生到现在，城市功能经历了简单功能到复杂功能、单一功能到多种功能、低功能到高功能的发展变化。

(四) 城市性质界定

城市性质与城市功能有关联，又有不同。城市性质是指一个城市在国家和地区承担的主要职能和发挥的主要作用。城市都是多功能的，其中主要功能是确定城市性质的依据。城市性质有共性与个性之分。共性是一切城市都具有的性质，是区分城市与非城市的标志。个性是指某个城市或某类城市所特有的性质，是区分此城市与彼城市，此类城市与彼类城市的标志。城市性质决定人口、基础设施、资源等要素的配置。确定城市性质的方法有定性分析法、定量分析法、区域比较法和综合分析法，通常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

二、深圳的城市功能和城市性质

特区建立以来，深圳的城市功能不断发展变化，人口、产业、资源、基础设施、区域布局等城市要素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

(一) 深圳的城市功能

深圳除具备城市的一般基本功能外，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功能。

1. 金融中心。

深圳是全国第二大资本运营中心，拥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设有企业上市的主板市场和中小企业板市场。深圳又是全国的银行中心，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在深圳都设有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和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2. 物流中心。

深圳是全国的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拥有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集装箱吞吐量位列世界第四、国内第二。深圳机场航空客、货运量在全国均名列前矛。深圳又是全国最大的外贸城市，已连续 14 年进出口总额名列全国大城市第一名。

3. 科技产业中心。

深圳是全国科技产业、先进产业中心城市，2005 年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 4885.26 亿元，在全国大城市中位居前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产值 2824.17 亿元。深圳的企业科技开发机构 300 多家，是全国企业科技研发机构最多的城市。深圳是全国科技产品出口能力强市，多种电子信息、通讯产品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的份额。深圳还拥有一大批开拓市场能力很强的国际型科技企业。

4. 文化产业中心。

深圳将努力把文化产业发展为第四大支柱产业。近年来，深圳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作为全国较早的动画加工制作基地之一，深圳动漫游戏产业已形成一定规模。深圳创意设计已在全国乃至亚洲显示出领先优势。“文博会”已成为全国文化产业产品展示、信息交流与资金交易平台。

(二) 深圳的城市性质

深圳是经济功能主导的大城市，在主要经济领域、主导产业和企业产品等方面的辐射力，已远及全国和国际市场。深圳不仅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全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三）深圳城市功能的区域布局

深圳城市功能布局，大致与其行政区划相对应。罗湖区以商业、金融为主，福田区以行政、商务为主，南山区以旅游、科技产业和高等教育为主，盐田区以港口物流和旅游为主，宝安区以先进工业和加工业为主，龙岗区以大企业、大工业和物流业为主。

（四）深圳城市功能和城市性质的发展升级

随着产业、人口、资本、技术等诸多生产要素的聚集，深圳的城市功能不断发展和升级。同时，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又提高了对人才、资本、技术、产业等生产要素的吸引、集聚和配置能力，进而促进了深圳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伴随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完善，深圳城市性质也在不断升级，大致经历如下：外向型出口加工区——综合性经济特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全国经济中心城市。深圳不同时期的城市功能和城市性质，对人口、设施、市场、区域布局等城市要素产生不同的要求和影响。未来，深圳城市功能将进一步提升，将发展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人口、设施、资本、市场等城市要素的需求量更大、质量要求更高。深圳发展建设的经验证明：城市功能与城市要素必须协调、对应发展，良性互动，否则将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和竞争力。

三、深圳城市功能对人口发展的要求

城市功能对一个城市的人口发展状况和人口管理工作，具有规定性的要求。

（一）深圳城市功能对人口规模的要求

作为迅速崛起的经济中心城市，对人口必然有一个规模化的要求，深圳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和人才聚集地。一方面，深圳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比较富裕，对国内外人员有巨大的吸引力，容易形成人口和人才聚集效应。另一方面，深圳作为经济中心城市，要保证城市经济功能得以很好地发挥，也需要有庞大的人口和人才规模作支撑。从中国人口实际情况看，深圳人口聚集能力在1500万人左右，从深圳自身发展状况看，理想的人口规模是1000万人。

（二）深圳城市功能对人口结构的要求

城市功能对人口结构的要求，关系到城市的生命力和发展后劲。作为经济中心城市，深圳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高，普遍具有良好的道德和知识素养。二是人力资源与主要产业匹配，深圳需聚集相当规模的金融、商贸、科技和文化产业人才，成为专业人才、精英人才聚集地。三是服务性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大，以保证深圳对区域和全国强大的服务和辐射能力。四是要聚集大量高端人才。一个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必须要在各个行业具有带头人和专家。而深圳目前的人口结构与其城市功能的要求差距还比较大，主要表现在：人口总体素质不高，来自农村的人口占主要比重，专业人才聚集量较小，服务业人口比重偏低，尖子人才少等。

（三）深圳城市功能对人口分布的要求

城市功能对人口分布的要求，是指人口分布要与城市主导产业发展和布局相适应。就深圳而言，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个区，应该形成深圳人口的主聚集区域，应以服务业人口为主，以专业和高端人才为主，以配合金融、商业、物流、文化等主要产业的聚集和发展。龙岗和宝安两个区域则应当形成深圳人口的次聚集区域，应以制造业人口为主，以产业工人、科技和企业管理人员等为主，以配合制造业的发展。总而言之，按照深圳城市功能的要求，深圳人口合理分布状况应该是，核心地区人口密度高，次核心地区人口均匀分布；人口和主导产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四）深圳城市功能对人口增长速度的要求

深圳高承载、高辐射城市功能的形成，产生了对人口快速聚集的需求，出现了25年间人口由30万增长到827万的情况。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深圳还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口聚

集来支撑。但这种人口增长须加以调节，以保证有效人口增长和新增人口质量。

（五）深圳城市功能对常住人口比例的要求

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中心城市，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比例过大，不利于城市功能的巩固和扩展。深圳要大幅度提高常住人口比例，增强人口对产业的吸引和稳定作用。

四、深圳人口发展状况与城市功能的对应分析

（一）人口总量与城市功能

按常住一年口径统计，目前深圳人口827万，加上流动人口，深圳实际管理的人口超过1000万。国际上特大城市和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一般是在1000万—1500万左右。可以说，深圳已经达到了大型、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所需要的人口规模，深圳人口总量和城市功能基本是对应的。从城市发展历程看，深圳经历了经济和城市的高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高位整固期；从人口发展历程看，随着国内其他大型城市吸引力的增强，深圳人口增长已经度过相对高峰期，进入调整和稳定增长阶段。

（二）人口行业分布与城市功能

城市主要产业、行业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功能的影响力，也决定城市人口发展水平。目前深圳人口发展与行业发展水平基本对应，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0%，制造业人口比重也占人口总量2/3左右，金融、商业、物流等服务业人口只占总人口1/3左右。纽约、香港等世界经济中心城市服务业人口占85%以上。深圳要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其主要服务业要达到国际化水平、占GDP比重要大幅提升，高素质、专业化服务业人口要占主要比重。按这一目标，深圳人口与行业对应严重不和谐，必须加以改善，不然将长远影响深圳提升城市功能。

（三）人口区域分布与城市功能

目前，深圳人口区域分布情况是核心区域人口少，一般区域人口多。宝安、龙岗工业制造区域人口是特区内四个商务核心区域人口的2-3倍。这种人口区域分布状况与深圳城市功能目标水平极不相称。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分布应该是核心商务区域高度集中，次中心区域依次均匀分布。深圳人口区域分布现状，说明深圳城市化水平总体不高，后农村化痕迹较重，产业发展还未达到经济中心城市要求。

（四）人口增长速度与城市功能

25年来，深圳人口高速增长，基本适应深圳城市化和城市功能提升的需求。但人口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负面问题：低素质、低学历、从事简单加工类人口增长过快、总量过大，高素质、专业人才增长慢、总量少；流动性人口增长过快，常住人口增长慢，特别是户籍人口增长过慢。今后深圳应增加高素质、专业性、服务业人口，减少一般性人口；增加户籍、常住人口，减少流动、不稳定人口。

（五）新增人口来源与城市功能

新增人口来源决定人口质量。过去深圳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从区域看，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才，还有海外留学人员；从教育水平看，有大批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业人才；从年龄结构看，以青年为主。这种优质人口供应源，提升了城市活力、创造力和城市功能。新形势下，深圳人口供应源面临巨大挑战和竞争，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生已不把深圳作为首选地区，北京、上海、天津等优秀人才密集地区的人才已很难流动出来，海外人才选择职业地区出现多元化，这些情况都极大影响深圳人口供应源的优化。

五、深圳城市功能提升与城市人口发展的对策建议

深圳人口问题已成为城市功能完善和提升的制约因素。实现深圳城市功能与城市人口相匹配，两者就要良性互动。一方面要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包括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增强城市经济社会功能，从而促进城市人口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要提高人口发展水平，包括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合理配置人口资源和加强人口管理，从而提升城市功能。

（一）增强城市承载功能

坚持现代化、国际化标准，以增强城市功能和辐射力为目标，通过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增

强城市承载功能，打造功能完备、环境优美、适宜人居的国际大都市。

（二）增强城市经济功能

优化产业结构是深圳增强经济功能、合理发展人口的根本措施。深圳产业结构应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为主。首先，要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控制人口规模。深圳“二产”中，高新技术产业人均产值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既能增强城市经济功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又能控制人口增幅。要加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力度，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要用先进技术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形成产业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其次，要通过发展高端服务业来控制人口规模。深圳“三产”中，批零贸易、餐饮和社会服务行业人均增加值最低，仅2.51万元，但从业人员最多。相反，金融、交通信息行业人均创造值分别为58.92万元和18.77万元。显而易见，发展高端服务业能直接控制人口总量。要鼓励发展金融、物流、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同时限制特区内劳动密集型行业，从环保、消防和卫生防疫等方面，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再次，要通过发展总部经济来控制人口规模。大力引进大公司总部，利用总部经济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合理分工产业链和价值链，把产业链条的生产加工基地安排到深圳周边地区，使大量生产加工人员分流出深圳。发展总部经济既能提升城市功能、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减少人口。

（三）提高人口素质

深圳高素质人口数量少、比重低，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差距很大，与北京、上海等城市也有显著差距。深圳今后要引进和培养并重，大力引进高校毕业生、海外留学生和全国优秀人才。同时，加大继续教育力度，特别要提高广大外来劳务工的思想和文化素养，进而提高深圳人口整体素质。

（四）提高户籍人口比例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对城市功能、主导产业具有稳定和增强作用，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增加户籍人口问题。2000年以来，深圳户籍人口年均增长在10万人左右。而同期北京、上海虽户籍人口基数大，年均增长仍在15万左右。深圳户籍人口基数小，增长空间大，应大规模将常住人口转为户籍人口。要以产业、环境和政策吸引人。在深圳工作一定年限、具有中专学历和技能、职业稳定的常住人口，应分期、分批转为户籍人口。非政府公有机构新近聘用人才，一律直接入户，同时要实施投资入户政策。

（五）优化人口产业分布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

优化人口产业分布结构。人才引进、培养和鉴定必须与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结合。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重点发展但基础薄弱的行业用人，应放宽入户条件；政府限制的产业，应提高入户标准。要按照深圳服务业大发展需要和国际大都市标准，提高服务业人口比重，促进城市功能大飞跃。

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结构。深圳人口空间分布状况是，人口总量特区外多于特区内，人口密度特区内大于特区外。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来优化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特区内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主要聚集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人口；特区外主要发展制造业，主要聚集加工制造业人口。

（六）提高人口管理水平

管理滞后会产生放大效应，使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的表象更为突出。深圳人口管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特区内外人口管理水平差距大，宝安、龙岗城市化后，仍有明显的农村管理方式；二是普遍是以“物业管理”代替“社区管理”。提高深圳城市人口管理水平，一要加强社区建设，以居民生活为中心，建立文化、卫生、教育、娱乐服务等设施，满足居民需求；二要注重商业服务与公益服务相结合，物业管理是商业服务，公益服务则需政府提供，不能以物业管理代替社会服务；三要彻底改变原有农村管理方式，以社区管理机构和模式，替代农村股份合作公司管理“城中村”，把外来人口纳入社区管理范围。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主编. 中外城市知识词典 [M] .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柏 桐

都市圈化中的“三农”难题及其破解

◎ 刘范一

[摘　要] 城市化是一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和必然趋势。城市化的基本模式是都市圈化。在都市圈化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是非农化，包括：农地的非农化，即大量的农业用地将转化为非农用地；农民的非农化，即大量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产业部门；农村产业非农化，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由此产生都市圈化过程中的“三农”难题：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护、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

[关键词] 都市圈化　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农民就业转移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 F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74-05

城市化是一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经途径和必然趋势。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重点是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这是理论界“都市圈化”主张的政策化。事实上，我国正在形成三大最主要的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和京津唐都市圈。与大城市相比，都市圈是一个以大城市为核心、大中城市有机结合、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的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模式，它有助于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维持人口—经济—生态三者之间的平衡，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都市圈化的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是非农化，包括：（1）农地的非农化，即大量的农业用地将转化为非农用地；（2）农民的非农化，即大量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业产业部门；（3）农村产业非农化，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由此产生都市圈化过程中的“三农”难题：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保护；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本文将对这三个难题进行初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

一、都市圈化中农民的土地权益保护

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具有三项基本的社会功能：就业、经济来源和社会保障。都市圈化的首要条件是用地，农地非农化的主要途径是征地，而在此过程中，农民应有的土地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分析其原因，根源是在土地产权主体模糊的情况下，市场化流转机制发育不足。

（一）问题成因

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包括国有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 43 条规定，除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批准可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需要的大量的建设用地主要通过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来提供，这是我国都市圈化过程中大量征地、农民权益被严重侵犯的根本成因。就我国集体土地制度而言，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 74 条和《土地管理法》第 10 条的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农民集体，而农民集体有乡（镇）、村和村内（村小组）三种情形，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村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

作者简介　刘范一，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405）。

村民小组经营管理。这在实践中导致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权旁落到村民委员会，甚至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成为了集体土地的所有者，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在征地程序上，农民无论是作为使用者还是作为所有者，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从征地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征用协商谈判中来。[1]

就土地管理者而言，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既是国土资源（包括集体土地）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具有所有者和管理者双重职能，政府作为“经济人”，其行为具有政治利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往往把经营城市等同于出让土地，借“公共利益”之名，对城市郊区土地大肆征用，但又缺乏合理补偿和劳动力转移措施，农民权益受到严重侵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的顺利进行。

就土地征用补偿而言，目前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测算办法不够科学合理。依据《土地管理法》，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费计算方式为“产值倍数法”，这种测算办法对农民缺乏说服力。第一，以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尽合理。现在的城郊农村，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产出价值已完全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以传统农业产值为依据的土地征用价格必然是偏低的。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其用途的改变通常会导致地价的飙升。但是，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却没有考虑增值因素。按照马克思的地租分配理论，级差地租增值部分应当由土地所有者和征地者共同所有。第三，在地区地价差异上欠考虑。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从根本上讲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而耕地的产值与区域经济条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无法反映地区的地价差异。[2]

（二）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措施

要推动都市圈化和谐、稳健地进行，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土地利益势在必行。针对目前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改革现有的土地利用制度。

改变建设用地均需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的土地利用制度，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出调整，缩小政府征地范围，减少被征地农民数量，是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各种复杂矛盾的治本之道。凡涉及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用地，采用政府征地形式供地，其余经营性建设用地可采用集体土地流转的形式供地，由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使用土地的公司、企业、房地产经营者直接交易。在这方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推广。2005 年颁布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兴办各类工商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资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等，均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从而突破了若需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必经征用和“国有化”的限制，缩小了政府征地的范围，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2. 解决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的途径——以村民委员会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代表，建立和完善农民集体组织。

这是增强农民土地权益自我保护能量的有效途径。对此，我们应对农民集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农民共同共有的所有权，“农民集体”是一种能按章程或规则行使权利的组织形式。在“农民集体”中每个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全体成员大会是农民集体的最高权利机关。因此，可以将农民集体视做一个股份制企业，在农民集体中设立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赋予农民集体法人资格。[3] 目前，农民集体未真正建立，如果建立起农民集体组织，农民集体与现有的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协调？笔者认为正确的解决思路是：建立农民大会组织，将村民委员会界定为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代表，使村民委员会肩负双重职责——既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在此基础上按农民集体的要求完善现有的村民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以此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的问题。

3. 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

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关键是，有效约束政府行为，寻找政府、征用地主体、失地农民间最佳的利益联结，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应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将现行补偿标准提高。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对纯公益性项目用地、准公益性项目用地以及开发性项目用地，采取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切实保障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的权益。从制度上，最根本的就是要确保农民利益有充分的表达渠道和法律救济途径，如对农民征地进行听证，农民参与谈判，对政府有关征用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并能有效执行。

二、都市圈化中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在都市圈化的过程中，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地农民脱离土地之后没有工作岗位，这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方面是农民通过房屋出租而获得不菲的收入，但却精神空虚；另一方面，有些农民却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生活困难，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农民生存和农村稳定，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问题成因

就宏观经济层面而言，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的局面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在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上，实行了严格的城乡隔绝制度，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使农村劳动力长期处于潜在的剩余状态。随着都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使这一问题由隐蔽转向明朗，并日趋尖锐。

就农民本身而言，农民长期以来所从事的是小农经济状态下的简单劳动，而都市化过程中，乡镇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增反降，对劳动者文化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从实际情况看，目前，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依然偏低，随着城市第二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并重发展的态势，就业岗位也由传统的第二产业为主，转向效率更高的金融、保险、电信交通、信息、法律、公证、咨询等全新层次的第三产业，这对就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比传统的第一、二产业更高，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这一要求。此外，除了文化素质外，有许多农民自由散漫，难以适应严格的工厂纪律约束。因而，农村劳动力作为一个自发群体，在寻找生存、劳作的机会和新的社会位置上困难重重，很难顺利向城市转移。

就收入较高的农民而言，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近郊基础设施与生活配套措施大大改善，有些农民不再依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获得收入，他们将自己原有的房屋、店面整改后出租，收取一笔可观的租金，再加上土地征用后政府拨给的土地征用款，这部分农民普遍对工作失去兴趣，精神空虚，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土地征用过程而言，对于被征地农民，政府不仅仅要保障其生存权，更要保障其发展权，充分重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实践中，政府往往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给农民进行一些经济补偿，但却没有考虑如何培训农民，安排农民就业，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促进失地农民的就业转移的建议

1. 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培训，转变农民的就业观念，培养农民适应现代工业发展的技能。具体而言，对学龄人口的教育，应该在全面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逐渐推广职高教育和高中教育，提高其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为适应城市化的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对青壮年劳动人口的教育，主要从基础教育和就业培训两方面入手，重点针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大部分人缺乏一技之长的状况，通过街道、成人教育中心、技工学校等机构，开设培训班，对青壮年劳力提供基础技术训练，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化带来的就业挑战。就经费而言，主要采取有偿与无偿相结合的方式，无偿部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

土地征用时的安置费提留、村集体收入和政府财政拨款。

2. 大力鼓励村民集体创业。要重视组织和指导农民将农村土地被征用后的土地款、水利设施补偿费、安置费和青苗补偿费等闲散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允许和鼓励农民以资本、技术、土地使用权等参股投资。具体而言，可由政府或街道、村委会牵头，筹集资金，将农民手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活动。例如，配合居民生活小区的建设，配套建设农贸市场；配合莲前大道拓宽改造工程，做好沿街店面的建设和商业网点建设；充分利用国际会展中心和环岛路全线开通的有利时机，发展同旅游相配套的第三产业。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农民增加就业岗位，同时又能有较固定的经济来源，为推动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变创造条件。

3. 积极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农民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载体，但目前乡镇企业在吸纳农民就业方面的能力有所下降，应该引起重视。政府要为乡镇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企业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目标，发展经济。具体而言，首先，要从宏观上从用地、产业选择等方面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行规划，在乡镇企业的项目选择上，注意同政府的总体产业规划和布局相配套，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现有的乡镇企业，鼓励其增资扩产，技术改造，提高竞争力。第二，以农村城市化进程为契机，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大力发展商贸、建安、运输、旧城改造、旅游等产业，并使之成为乡企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吸纳更多的失地农民就业；第三，可利用现有的街、村二级工业小区，进行招商引资，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大、无污染的工业项目，并配合农民的培训，与这些企业签订用工协议，以此增加农民就业。

三、都市圈化中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都市圈化过程中，农村产业调整的关键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要以城市为中心，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市场化的“规模经济”转变，积极发展都市农业。

(一) 都市农业的发展方向

随着城市发展的都市圈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被打破，城乡间和产业间的融合，使城乡结合部的农业出现了新的变化，都市农业应运而生。都市农业在城郊型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又超越城郊型农业；主动适应城市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生产形式与结构，服务并依托于城市，实现了城乡互动，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4] 都市农业是都市圈化过程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要面向市场、以城市需求为中心，依靠科技，发挥优势，优化品种和品质，积极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计划农业向市场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构筑起具有城市特色和较强综合竞争优势的新型农业。具体而言，都市化农业的发展方向有五个。(1) 高科技农业。都市农业是高科技农业，这是它与传统农业的区别之一。要充分发挥高科技的优势，尽量与相关农业科研单位合作，引进和开发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无土栽培、节水灌溉、品种改良、配方施肥、间作套种、设施农业、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等方面有所突破。通过引进企业投资和科研院、所新技术，建立高科技农业示范区，为发展现代化农业提供技术支撑。(2) 生态农业。要利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原理，发展有机农业，形成农业生态链，以降低农业成本，减轻环境污染，节省农业资源。作为城市近郊区，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如林果、苗圃、草坪业，控制和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保护农田环境，保持城市生态平衡，绿化城市环境，这是都市农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优势。(3) 观光休闲农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假日休闲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发展观光休闲旅游农业大有可为。包括以观光农业景观为主的观光型农业，如观光农园、农业公园；以参与农业活动为主的体验农业，如市民农园、采摘园、教育农场；以休闲娱乐为主的休闲型农业，如休闲农舍、农家乐、度假村；以民族文化为主的农业活动节，如采摘节、桃花节、樱桃节。通过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实现农业和旅游业、生产与消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合，将自然农业区变为观光旅游区，让城市居民观赏田园风光，享受乡村情趣，体验大自然的美感；(4) 园艺农业。园艺农业是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现代农业，它具有食用、观光、美化环

境的特殊功能，如苗木园、花卉园、中草药园、蔬菜园、瓜果园等。园艺农业具有首都“门面”的功能，可以建成首都的“后花园”。(5) 农产品加工业。以城市需求为中心，大力发展包括蔬菜、果品、畜禽、蛋奶等加工业，这既是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持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二) 推进都市农业发展的措施

大力推进都市农业的发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都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都市农业，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建立和完善一套适合都市农业发展的政策体制，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第一，从政策层面看，积极鼓励支持都市农业的发展，制定和落实各种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类资本进入都市农业的生产经营。加大金融对都市农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和担保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力使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落实农业支持补贴制度；鼓励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企业进行合作，努力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第二，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大力宣传和认真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向实体性专业合作社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村社会化服务质量，提升产业化经营层次。

第三，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研成果的应用，增强农业发展科技支撑。加大农业科研经费投入，进一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走产学研联合的路子，促进龙头企业、推广服务单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与科研院所、高中等院校等进行研发合作，加快推进农业科技的集成创新，提高全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力度，加快推广应用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等；加强对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第四，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农业信息网，加快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农村综合市场、村收购网点建设，完善以城区批发市场为中心，以集贸市场、零售经营店和超市为基础的农产品市场网络。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健全完善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努力构建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村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 潘光辉.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合理利益保护问题 [J] . 南方农村，2006，(4).

[2] 谢韶光，吴青霞. 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 [J] . 零陵学院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5).

[3] 李平龙. 论我国集体土地流转法律制度之建构 [J]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4).

[4] 马俊哲. 都市农业与京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J] . 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1).

责任编辑：柏 桐

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

◎ 朱国城

[摘　要]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农民主体力量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分析了树立农民主体意识观，包括科学地认识农民的主体性，辩证地把握农民的主体性，历史地看待农民的主体性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若干对策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农民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D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79-04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至关重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1] 我们认为，党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仅要在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规划和指导等方面加大力度，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要注重把加强农村党的建设和切实保障、强化农民的主体性紧密联系起来，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向纵深发展。

一、农民主体力量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

培育农民主体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战略意义。如果不着力于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激发蕴藏在亿万农民中的巨大潜能和无限创造力，再好的优惠政策，再多的人财物力支持，也只能起到暂时的"输血"功能。而只有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力军作用，才能变"输血"为"造血"，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快速、健康发展。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农村是很落后的，农民生活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当时我们在农村实行了脱离客观经济现实，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同样还是那些地，同样还是那些农民，但我们用了不到 5 年时间就解决了建国 30 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是邓小平说的"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2](P177) 邓小平认为，我国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2](P78) 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2](P65) 邓小平从调动农民积极性层面上来总结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方法论的战略意义。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首要出发点。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农村改革为什么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呢？在邓小平看来，一是给农民自主权，二是给基层自主权，从而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今天，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培育农民主体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新农村要把农民作为主体力量，这是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建设新农村中就是要以农民为本，其最基本的内

作者简介　朱国城，广东省梅州市电视大学校长（广东　梅州，514021）。

涵就是要以农民为主体，即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基本依靠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农民为主体，这也是由我们建设新农村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所决定的。由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处在艰难的发展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建设新农村任重道远。我们只有使亿万农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才能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指出“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1]的原因所在。

二、农民主体力量的主体意识观

要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首先要树立全面的完整的农民主体意识观。切实保障和强化农民的主体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和理解农民的主体性。然而，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对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认识还不到位、还不深刻，直接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如有的对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清，不尊重、不注意发挥农民的主体精神，习惯于代替农民包办一切；有的在发展中重物轻人，更多的是注重物的投入，而轻视对人的投入；有的工作方法简单，不注重教育、引导，政策脱离实际。因而，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起农民主体意识观。

第一，科学认识农民的主体性。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一是利益主体。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政策、各项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在是否能够体现和保障农民的利益上来。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会以自己的利益来评判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从而决定是否支持和拥护它们，也就进一步决定了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效。二是价值主体。农民的利益主体地位决定了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主体地位。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3](P243)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尊重农民，依靠农民，相信农民，时刻关注农民的利益和愿望，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最终受益者。三是行为主体。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最直接、最广泛、最可靠的力量基础，因此，要坚持用党的新农村建设政策统一广大农民的思想，把中央的正确决策变为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把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变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四是创造主体。广大农民群众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创建了小城镇，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创新精神。因而，建设新农村，要充分相信农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发挥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

第二，辩证把握农民的主体性。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好农民主体和政府主导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强调农民的主体作用而使政府缺位，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使农民缺席。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农民主体和政府主导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不断进行调整。例如，20 世纪 70 年代的韩国开展“新村运动”，在开始阶段着力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基本项目选择、到各种款项的使用，都由中央政府计划好，并派出大批官员下乡指导，从而使新村运动顺利开展起来，农民群众也被充分动员起来。可见，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在开始阶段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但是，政府的强力主导作用也会带来明显的消极因素。例如，虽然韩国政府号召农民发扬“勤勉、自助、合作”精神，但由于朴正熙政权的专制威权特点，官员们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常对下边采取武断命令的方式，结果遵循农民自愿很快就变成了行政强迫，农民参加工程项目的自愿性、积极性越来越小。到了 80 年代，这种“政府主导”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于是由“政府主导型”逐步过渡到“民间主导型”。目前，我国的新农村

建设还处在初始阶段，必须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强化政府主导，以农民主体规范、落实政府主导，以政府主导调动和强化农民主体。

第三，历史看待农民的主体性。从现实来看，我国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还面临着不少历史局限性。一是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我国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自身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化素质方面，我国农民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技术水平不高，视野较窄，容易形成对人和物的依赖。在思想观念上，由于长期受封建制度思想的束缚，个人没有独立的权利，农民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淡薄，保守守旧思想、迷信愚昧思想、“等、靠、要”思想浓厚。二是传统地位的局限性。我国历史长期处于专制体制下，农民在事实上往往处于被统治、被管理、被驱使的地位，在社会事务中扮演被动角色，缺乏发言权、自主权、参与权，结果农民权无责重，政府则权重责轻。三是现实制度的局限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各种制度性的壁垒，使农民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如土地使用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等，都影响到了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

三、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若干政策建议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农民为本，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好农民的主体作用，我们认为必须把握好以下几方面主要内容:

首先，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我们无疑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逐步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但是，我们决不能仅仅把农民看作是城市帮扶的对象，是工业反哺的客体，应当认识到农民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也就是说，建设新农村从始至终都要注意防止可能出现的“见物不见人”的倾向。一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新农村建设首要的任务是培育农民，使之成为有文化、有技术、会开发、懂经营的新型农民。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应由政府、学校、民间共同参与，应有计划、多层次地开展，逐步实现农业教育系统化和规范化。二要倡导和培育农民组织。农民组织是科学技术和工业进农业、进农村，农民掌握、利用先进农业知识的载体，也是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党支部、村委会是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的形成，各种专业性农村协会组织随之建立，政府要推动这些农协组织的发展，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购买、信贷、技术经营指导、市场信息等服务。三要大力发展电子农务。农业信息化建设在农村社会经济建设中地位十分重要，而电子农务日益成为向农民提供专业、准确、及时的农业科技信息的平台和载体，是农民立足市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四要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基金”筹措机制。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落实惠农政策，提供基本建设资金外，大量的农村开发项目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投入的主体是农民，要培育农民的主体意识和“自立、自助、勤勉、协力”的思想观念，建立起长效筹资机制。

其次，要千方百计，切切实实地提高广大农民的自身素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亿万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四] 我们说广大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基本依靠力量，决不意味着农民就不必提高自身的素质了。恰恰相反，建设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迫切要求必须把提高亿万农民的自身素质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一是从中央提出的建设新农村20字的总体要求来看，它要求从根本上转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价值观念，引导农民通过投身建设新农村的实践，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文化水平，陶冶精神情操等，在走向富裕、迈向文明和建设新农村过程中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价值主体和创造主体。这无疑对农民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二是从现实状况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文化水平低，缺乏职业技能。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92%的文盲、半文盲在农村。目前，在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0.6%，高中及以上的占1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

7.5%。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不足5%；受过技能培训的仅为1%。因此在我国农村相当多的地区实际上形成了这么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致使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反过来制约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目前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3年。[4](P380) 我国农村从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占0.14%；据统计，2003年592个重点县的剩余劳动力中，有2/3以上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因文化程度、身体和年龄方面的限制达不到城镇企业所要求的就业条件。此外，在公共资源分配上存在的不平衡也是制约农民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我国农村中学生占城市的四倍，而国家所拨出的教育经费中用于农村中学教育的只占城市的38%；2004年我国农村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26.5%，低于城市文化事业费47个百分点。在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多是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农村还有上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是这些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如果为数众多的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能得到提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变人口压力为劳动力资源优势。因此，我们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有意识地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适应建设新农村的要求，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

最后，要使广大基层干部成为培育农民主体力量的领路人。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目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政方针十分明确。建设新农村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取决于农村基层干部对上述方针政策措施的贯彻和落实程度，尤其取决于他们培育农民主体力量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要求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能够成为培育农民主体力量的领路人。广大基层干部要以目前正在开展的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为契机，把建设和谐文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与培养越来越多的农村主体力量结合起来，与帮助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进而使他们增收致富结合起来。通过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扶持、对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重视以及广大农民自身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新型农民的主体力量一定会不断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必将出现一个崭新的面貌。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Z]．2006年2月14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 农业部课题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若干问题研究 [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柏 桐

•历史学•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 孔祥吉

[摘　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 36 函 109 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083-12

信札，又称函札、书札，古称书牍，是治史不可或缺的资料。道咸之前，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即是依靠信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笔者曾阅读过较多信札，一般说来官愈大，其所藏的信札愈有价值，盖因其地位重要。但又不尽然。有些没有官职的幕僚，其信札亦不可忽视，赵凤昌可谓最典型之代表。其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共藏《赵凤昌藏札》原稿 36 函 109 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将此珍贵藏书影印出版之际，遵戴逸师之命，笔者有机会将该稿本，翻阅一过，深感受益匪浅，谨略述其梗概，以期唤起同仁们之兴趣。

一、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

赵凤昌，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 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他于上海南阳路建造邸宅一座，命名“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且写有《惜阴堂笔记》传世。

赵凤昌的一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也没有担任过高官，然而，其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不同凡响。赵氏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也非一般封疆大吏可比。

关于赵凤昌的早年身世，坊间流行资料甚少，刘厚生所著《张謇传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 他幼年失学，在某钱庄做学徒，常常到一个姓朱的家里送银钱。那时他年纪不到二十，人极机警。因为家贫之故，私自挪用了钱庄之款，被经理停职。他就向那姓朱的诉苦。姓朱的很有钱，就向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你最好还是读书，可望上进。”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你荐一件事情吧！你家店铺很多，我只想荐我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姓朱的不由分说，替他捐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混了几年，后来张之洞做两广总督，就很赏识他，让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之洞到湖广总督任内，格外亲信。[1](P93)

刘厚生所述内容，可能来自赵凤昌的密友张謇。但是，并不十分准确。据赵尊岳所记，其父到粤后，“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2](P246) 所述与刘说稍异。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赵凤昌遂有机缘与张之洞相识。张之洞出身翰林，爱才若渴，对于幕府中的赵凤昌格外垂青。结交张之洞可谓是赵凤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又据清档记载，赵氏在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身份，尚不是像刘厚生所称“文案，参与一切机密”，而是

作者简介　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教授（美国）。

“巡捕”。[3] 所谓巡捕，是指清代总督、巡抚等地方长官的随从官吏。当然，作为随从官员，也亲疏有别，分工不同。总之，赵凤昌很可能是处理张之洞文案事宜，但又不限于此，他甚至还替张之洞管理一些重要的家政。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信任赵凤昌，主要是因为赵氏精明过人，办事干练，而且记忆力极佳。张之洞本人起居无节，“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1](P93)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往湖广总督任后，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往，仍然处理文书机要。但是，好景不长，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受翰林院周锡恩之托，[4](P63) 上书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且牵连赵凤昌。其中有关揭参赵凤昌的文字略谓：

> 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陷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5](P6)

由于徐致祥参折的内容，涉及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及湖广总督两地情事，因此，书上之后，即奉旨著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照原参各节确切查明。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上谕称：

>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至钜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甚钜。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该督俱加信任等语，著李瀚章按照原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P19)

而军机处寄致两江总督之上谕则称：

>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钜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借电竿毁通桥，几酿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语，著刘坤一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著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6](P19)

以上两道谕旨，侧重面各有不同。光绪皇帝要李瀚章查处的是，张之洞在广州时的“起居无节”等官场作风；而要刘坤一查处的，则是在湖北“浪掷正供”，勒捐搜索，但是两处都涉及到赵凤昌。大约两个月之后，李瀚章的查复折率先递呈清廷。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补遗档》中找到李氏原折，与坊间流传的稍有差异。该原折谓：

> 头品顶戴两广总督臣李瀚章跪奏：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
>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臣谨阅原奏所参，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各节。臣昔未至粤，亦有所闻，迨到任后，随事考证，始知非实。大抵不得志于其时，又未深悉其事者，为此过甚之辞，传播远近也。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
> 司道皆钦简大员，与督抚切近共事，若不随时接见，理固不可，势亦不行。闻张之洞偶遇手治簿书时，属员进谒，不无稍等，未尝候至终日，尚不得见。旧时司道等官，亦无言及此者。
>
> 至于候补之员，人数太多，有事则常见，无事则稀见，此各省所同，不独张之洞为然也。人之才具，长短各殊，或兼数事而有余，或任一事而不足。张之洞任内，间有一人，兼充数项差使者，

皆系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专尚浮夸，阿其所好，诸务何由而理。

又闻张之洞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外任时判牍亦然。及其至粤，正当多事之秋，并力支持，日不暇给；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劬劳罔懈；毁之则曰，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惟既未误公，此属小节，无足深论。

罚缴之银，不下七八十万，已超报未造报者，皆有册案可凭。取之于关盭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董，而非抑勒乎富家，用之以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消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复为苛，且皆独独施行，属员无从迎合。

王之春以江苏候补道，奉旨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该员两次署理藩司，照章综理，并未创立名目，多增进项，谓为掊克聚敛，未免无因。

赵凤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实，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凤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蒙蔽。

张之洞到两广总督任时，海防戒严，边事孔棘，黎匪、客匪、土匪，乘机思逞，虽有彭玉麟力疾坐镇，而征发兵饷，整顿地方，剪除伏莽，维持洋务，期弭后患，则张之洞经画为多，用项虽多，委非浪费。军务甫松，即遣撤添调添募之兵，以期撙节。黄江税厂，潮桥盐务，皆扫除更张，拔其病本，取中饱糜费之款，而归之公，出入之际，筹划若此，岂有恣意挥霍，虚耗帑金。

该前督臣任内，用款业已分案造报，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所建书院、书局，或自捐资，或用罚款，为数不少，并未动用正项，人所共知。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钦奉上谕，饬臣确查，断不敢稍存瞻徇，代为粉饰。谨据实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3]

李瀚章此折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至朝廷。由其内容分析，李瀚章实际上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他谁也不想得罪。因此，该折对张之洞多有袒护，称赵凤昌非但无干预公事，反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时人称，李瀚章居官圆滑，“性柔和，临事慎密”，“任封疆三十年，初未劾一贪酷吏。时谓之官界佛子云。”[7](P36-37) 可见，李瀚章在官场不愿意得罪人，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该折递上后，奉硃批：“另有旨。钦此。”[3] 直到四月十六日，光绪帝方颁谕称：

前据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当谕令刘坤一、李瀚章确查具奏。兹据该督等先后查明覆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无掊克聚敛实据。张之洞、王之春，均著毋容置议。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著即革职，勒令回籍，以肃官方。张之洞向来办事尚属认真，嗣后于应办事宜，务当督率属员，力求撙节，妥为经理，用副委任。钦此。[6](P61)

这道谕旨，对赵凤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其仕途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光绪皇帝在谕旨中，并未详细指明赵凤昌究竟有何劣迹，只是说他“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仅凭此八个字，即对赵氏进行严惩，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赵凤昌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

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对此事记载颇为可疑，他罗列了光绪皇帝的上谕、徐致祥之参折与李瀚章的议复折，却未指明赵凤昌有何“劣迹”。而坊间许多论著都受胡钧所编年谱之影响。

即如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对此案之处理经过，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但是，大体沿袭胡钧之说法。其文曰：

徐致祥奏参张之洞。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少往还，独与徐致祥过从甚密，于是有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封事。折中最严重之点，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

令不时”；又如“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折文甚美，奏入，廷旨交李瀚章查明奏复。闻李瀚章奏呈大意，谓张之洞夙夜在公，不遑启处，在张之洞勇于任事，致使泄沓不图振作之属吏，故造流言。至若赵凤昌，小有才能，不无在外招权之事。赵凤昌应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云云。折中立言，对之洞甚得体，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4](P64)

刘禺生所记含混不清，大多是沿袭《张文襄公年谱》所记，亦未说清赵凤昌被革职的真正原因。而且，刘文居然未提及刘坤一查复之事。解放后，赵尊岳写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一文，亦记其父被罢官一事，文字甚为简略。略谓：“张之洞督粤调鄂，均留任，后被谗去官。”[2](P247)盖谓其父受人诬陷而丢官。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民国人物传》中的赵凤昌传，依然受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影响，称：“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8](P117)

至于坊间有关赵凤昌之传略及论著，大多沿袭“替罪羊”说。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有一个很大缺陷：他在记述大理寺卿徐致祥参案时，只注意到了李瀚章的《勘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而忽略了刘坤一对此案所做的调查。笔者怀疑许同莘、胡钧等编年谱时，不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可能。因为在清末民初，大凡编辑张之洞之文集，或者编纂年谱，没有不同赵凤昌联系，向赵凤昌求教的。

其实，刘坤一之《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对于搞清楚赵凤昌被革职原因，至关重要。刘氏称：

> 臣复查原奏所参各节，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粗知崖略。……
>
> 原奏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各节，查王之春由广东臬司，升任湖北藩司，用人行政，均系禀承督抚臣办理，实无掊克聚敛情事，如何报复恩仇，亦查无其人。臣前次承乏两江，王之春时以道员需次江苏，当差勤奋，于时事尚属留心，现任湖北藩司颇乏规益，而承流宣化，按部就班，亦未见有贪缘要结之弊。
>
> 赵凤昌籍隶江苏，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此访查王之春、赵凤昌之梗概也。
>
> 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兼圻重寄。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炼钢开生财之源，保自有之利，造端闳远，用款诚不免稍多，然揆其本心，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能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该督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倚畀之重，下念同朝责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终始其事。相应请旨饬下张之洞，督率承办各员，共体时艰，力求撙节，妥为经理，以竟全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器局深稳，职守颇能认真，既经查无掊克等项情事，应请毋庸置议。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所有遵旨确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9](P6-9)

刘坤一说：“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可见，刘氏对调查此案，态度颇为认真。其奏折所称赵凤昌“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与刘厚生《张謇传记》所述亦有不同。而对赵凤昌的调查结果，与李瀚章的奏章则完全相反。刘坤一说赵凤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这些评语是很严厉的。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氏的调查结果及惩处意见，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

二、赵凤昌与张之洞关系及罢官原因考察

据上所述，赵凤昌的罢官，完全是由于刘坤一对他的查处丝毫不留情面而造成的。刘坤一，字岘庄，

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军。早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功勋，成为湘军重要领袖之一。据《清史稿》记载，刘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10] 由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官场情形了若指掌。他在《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中对王之春网开一面，偏偏对赵凤昌毫不留情。

那么，刘坤一对赵凤昌的查复，究竟是有真凭实据，还是凭空捏造？

刘坤一在奏折中称，赵凤昌籍隶江苏，"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揆之《赵凤昌藏札》，刘坤一的调查，并非空穴来风。《赵凤昌藏札》搜集了张之洞在两广、湖广总督衙门致赵凤昌的短信、电报甚多。现摘引数则如下："今日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乍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必进署，俟稍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以慰默念可也。壶。"[11](第 92 册)"闻昨夜小有不适，此时已愈否？如能来署，望即进署一行，有要事面说，夜间再回可也。壶。四月二十一日。酉发。"[11](第 92 册)"电悉，尊寓又有烦心事，深为系念，已安置妥帖否？明日能进署一行否？即复。壶。"[11](第 92 册)

壶公者，张之洞之自谓也。通过张氏之短信，可知他与赵凤昌之间关系亲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之洞的儿子赴京师赶考，赵凤昌以觐见事而与之同行，旅途多方照料。抵达京师后，赵氏电禀张之洞。张氏回电称：

两书、叠电均悉。已抵长安为慰。儿子同行，诸荷关照，感谢。仆以秋闱，益加见迫，一切见闻，望详晰函知，交去人带回，愈详愈佳。阁下事毕，可从容料理南还，如欲回常州省亲，无妨。不必勉强赶回，切嘱。此间公事固繁，足下到江南亦不易，无不相谅也。尊寓屡遣人候问平安。勿念。即颂觐喜。

竹君明府。洞再拜。

再，小儿场毕后，足下可与之相约，同往什刹海一览，新为先哲祠买作祠产之庆和堂冰楼，回粤时为仆说之。

牛翁再拜。[11](第 92 册)

牛翁者，亦张之洞之自称也。可见张之洞对赵氏之关照周到，真可谓无微不至。

后来有一次，赵凤昌在乡身体不适，张之洞又急忙发电慰问。电文称：

致赵竹君

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悉念至甚。

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为妥；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若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壶。正月十二日戌发。[11](第 92 册)

致赵竹君

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元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

如虑桂元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洪大使复。壶。

又电曰：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食何药？情形若何？望即复电。洪大使即复。壶。正月十四日戌发。[11](第 92 册)

上文中的洪大使，似乎应指洪钧。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与赵凤昌为同乡。同治七年状元，"授职修撰，视学湖北、江西，典试陕西、山东，叠司文柄，由侍讲累涉华资，洊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五月，充出使俄国、德国、奥国、和国大臣，十六年闰二月，补兵部左侍郎，十七年十一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2] 系张之洞在翰林院之好友。这些未刊电文，反映了张、赵二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一般幕主与幕僚的关系。在清季，大凡有所作为的总督巡抚身后，都有一些

非常能干的幕僚在协助他们。此类幕僚，有的负责出谋献计，有的策划征收钱粮，还有的分管刑名词讼。曾国藩如此，李鸿章如此，左宗棠同样如此。但是，很少有像张之洞对赵凤昌这样关心的。刘坤一的查复折称“张之洞颇信用之”，可谓言之不虚。

至于刘坤一说赵凤昌“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在《赵凤昌藏札》中亦可找到凿凿实据。如杨锐即屡次函托赵凤昌为其弟“营谋差缺”：

节府聚居，深叨尘教，隆情厚贶，感切五中。敬维竹君仁兄先生大人，懋绩日新，兴居多福为颂。弟礼闱报罢，中夏出都，航海泝江，以七月望后旋里。家居碌碌，贱况如恒，跧伏穷山，闻见日局。本拟明春南来，适因舍弟悦以前随滇军微劳，得蒙帅恩保以巡检，留广补用，自应令其先行赴粤，藉效涓埃。舍弟学识粗疏，深虞不称，前此已叨大庇，得进寸阶。尚祈始终玉成，推情教诲，则感激者岂惟身受而已。区区琐渎，鉴原是幸。署中诸同人见时务乞代达鄙忱，是所切祷。附上川省近刻二种，统希莞纳。专肃布达。敬请大安。诸惟朗照不宣。

愚弟杨锐顿首。[11](第 46 册)

竹君先生大人执事：

日前厚扰，谢谢。承允为舍弟悦代捐一节，不胜感祷。兹查舍弟于去岁蒙保留广巡检，部改以巡检前先选用，于腊月十九奉旨：依议。今拟指分广东，并加本班尽先花样，敬恳执事赐信到京，托人代办。需费若干，统祈示下，或交尊处，或票庄汇寄，均即遵办。其行知及离营文书，日后乞费心，代为招呼一切。感甚，感甚。

明知忙冗，鄙事琐渎，万分不情，伏望鉴恕。手此，布恳。敬请早安，诸希亮鉴。

小弟锐顿首。初六日辰刻。[11](第 46 册)

这两通函札均出自杨锐之手笔。杨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年少俊慧”，为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提拔之士，颇为张之洞赏识与信赖，后“入佐幕僚”，“由粤而鄂”，与赵凤昌堪称同事，且关系融洽，故屡托赵为其弟代办捐事。除此以外，杨锐还另有请托：

连日不晤，尊恙想更轻减矣。念念。襄恕捐事闻可代托电局在扬州办，感佩不尽。并求电查，由到省试用道，捐足遇缺即补花样，共须实银若干？分晰见示，以便电汇措办。琐渎惭悚之至。手肃，叩上竹君先生。敬请愈安。

小弟制锐顿首[11](第 46 册)

再欧阳平斋衡向当淮盐沙市分局差，今夏因位置别人始行交卸。渠与杨彦珪有旧，允为别筹善地。惟日久未得消息，窘况不支。锐昨托敬山恳求瞿观察为之一言，必可复旧，不知敬山已道及否？尊处如与瞿公有信，希赐提及，则吹嘘生自易为力矣。可否？均祈酌夺。琐渎愧悚，再请亮鉴。锐又启。

再平斋系候选同知，四川华阳人，并奉闻以便赐信也。[11](第 46 册)

上文中瞿观察、瞿公，均指瞿廷韶，字赓甫，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今北京市）籍。同治九年（1870 年）举人，后官至湖北布政使。长期跟随张之洞的亲信人物。杨锐致赵凤昌之函札甚夥，此处仅从中摘述其中与请托有关系者，可见，刘坤一称赵氏“门庭若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并非毫无根据。

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坤一奏折所述内容，决定将赵凤昌“著即革职，勒令回籍”。清廷的这一决定，断绝了赵凤昌升官之路，也改变了他对清廷之态度，及其后半生的发展道路。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赵凤昌

赵凤昌被革职后，严格说并未按上谕所要求的“勒令回籍”，而是被张之洞派往上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1](P94) 赵氏则利用他在湖广总督衙门所积累的财富，在沪成家立业。而且，他还把原来在广州、武汉两地经手处理的重要函札、电稿，一并携到上海。此时的赵凤昌，已经是无官一身轻。对清廷之态度，

与以前也已大不相同。他可以接触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朝廷通缉的“要犯”维新派人士及革命党人。他还与沪上绅商及外国领事广泛结交，把所得消息及时传递给远在武昌的张之洞，依然是张氏的重要帮手。

翻阅《赵凤昌藏札》，可以发现有不少函札记述了赵凤昌在离开张之洞幕府之后，所从事的重要活动及其思想变化。这些函札反映了一个封建衙门的官吏，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讲求时务，追求进步，由一个同情维新立宪人士，逐步转变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的追随者。赵凤昌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反对列强干涉，尤其是日俄两国的干涉，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已经成了他后来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赵凤昌所作的大事甚多，其中有几件大事，颇值得一提。

首先，赵凤昌在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积极策划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京师形成高潮期间，赵凤昌与盛宣怀积极策划推行东南互保，并试图与张謇一起将慈禧与光绪从北方迎至南京或汉口，然后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8](P119)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件《时事新报》辛亥五月初九日第二张第二版的剪报，该报以《赵凤昌开复原官》为题刊载了赵尔巽之奏片。其文曰：

> 东督赵制军，日前附片奏请开复革牧赵凤昌原官，略谓：已革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前随升任湖广督臣张之洞襄办要政，精细干练，颇著能声，卒以任怨太多，遭时疑忌，经前浙江学政徐致祥奏参革职，士论惜之。
>
> 该员罢职后，即回江苏，回籍闭门读书，不求闻达而关心君国，讲求时务数十年如一日。庚子之变，长江上下，各国交涉，危机一发。刘坤一、张之洞创议保全东南大局，悉赖该员赞助之力。开濬黄埔，载在和约，嗣幸收回自办，稍换利权，亦出自该员擘画。臣前在奉天筹办善后，上年边藏交涉，均经派员密询办法，该员所陈之策，和平正大，切中事情，赖之而成功，不居翛然物外，实当今奇杰之士。东事孔亟，待商之政甚多，合仰恳天恩，准将已革湖北候补道直隶州知州（府）赵凤昌，开复原官，由臣礼聘到东，备谘要政。奉旨：著照所请，吏部知道。[11](第 32 册)

赵尔巽此片，充分肯定了赵凤昌在东南互保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开濬黄埔，收回自办，稍挽利权的重要贡献。赵尔巽之请求，虽获清廷允诺，但赵凤昌却并未赴任。他致电赵尔巽称：

“凤昌本无学识，加以二十年病体，近益衰慵，每值寒暑，怯不出门，更何能远涉府庭，辱承下问。”[11](第 32 册)

说明赵氏此时，已经厌倦官场，不愿意再走从前的老路了。

其次，赵凤昌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时，即积极鼓吹更张政体，实行立宪。

在《赵凤昌藏札》中，收录有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一起草拟的《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极力要求实行政体改革。其文谓：“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今环球之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该折最后要求：

> 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臣等悬揣实行之期，已须数年以后。为目前救急计，但求速宣明谕，则政体先立。[11](第 33 册)

这份奏章明确指出，倘若不改革政体，中国别无出路。正因为赵凤昌的这种远见卓识，所以清廷派出的考察宪政大臣之一端方，非常欣赏赵凤昌的才干。端方出国前在沪与赵氏相见，赵氏则告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归后果得之。”[13]

端方到欧洲考察之际，行色匆匆，政务繁多，却依然同赵凤昌联系不断。端方曾致函赵氏谓：

> 竹君我兄尊右：
>
> 前奉邮片，想已收到。到欧后排日于政界，尽心甄考，时期匆迫，译述艰难，于精微奥妙处，

苦不能一一窥见，然览观所到，阅历所经，此行亦良不负负也。

小儿在美留学三年，近日拟便携之游欧，前藉便船先令回华。忆其出洋已（以）来，即承遇事关爱，随时照料。此番道经沪渎，特饬敬诣台端，藉申谢悃。尚望长者有以教之。相见不远，统俟晤谈。敬请台安。

弟端方。四月廿五日[11](第 99 册)

端方归国之后，被清廷派往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到任伊始，他又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大人左右：

相违三月，渴慕为苦，官制事虽经议有草本，发表尚复无期，阻障太多，同情太少，无如何也。

弟南来值此交涉繁难，饥馑洊臻之际，无人相助，无牧可筹，势将坐困，惟我兄体时局之艰，念交谊之重，出局助我。相知有素，谅无屏弃之情，特属式如陈辞，尚乞鉴允。余俟台从至宁，面谈一切，肃请道安。

弟端方顿首　九月廿四日[11](第 99 册)

清廷任命其为两江总督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事，则此函当写于是年九月廿四日。下车伊始，端方就想到了赵凤昌，可见他对赵凤昌才干之仰慕。但是，赵凤昌依然未出山，因为他确实看不到清廷有实行立宪政体的诚意。宣统元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会，为立宪政体之确立继续努力。直到宣统三年，监国摄政王载沣非但没有在立宪上有所前进，反而倒行逆施，“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① 于是，赵凤昌与张謇等十人通过“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②

赵凤昌是在对清廷大失所望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合的思想基础。

再次，赵凤昌在辛亥革命风暴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为革命党人出谋划策。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之史料。上个世纪 80 年代《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曾刊登了部分内容。近期章开沅教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料新编》亦收录了部分辛亥信函。辛亥革命爆发伊始，赵凤昌很快在上海邀集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到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盖因“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2](P248) 赵凤昌积极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往更加频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上海光复之后，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辛亥九月二十一日，赵凤昌收到熊希龄来函，略谓：

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倘旧政府已倾，而新政府未立，其间迟至一月，必生外交上之危险。弟昨到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革军稍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11](第 107 册)

得此信后，赵凤昌担心外国列强出面干涉，连续发出电报，首先是阻止唐绍仪担任清廷所授予的邮传大臣，该电略谓：“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初六午发)”另电致梁敦彦，劝其“为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而后，又再致电梁氏，劝其阻止列强在财政方面支持清廷，其电文称：“闻（监国）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为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昌。（初十午发)”[11](第 107 册)

这些电文显示了赵凤昌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及对革命大业之关切。为促使清廷尽快交出政权，赵凤

①②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 102 期，第 247 页。又见陈时伟：《赵凤昌传》，《民国人物传》第 7 卷，第 120 页。

昌甚至通过其在赵秉钧手下做事的亲戚洪述祖，代拟清帝退位诏书。而上海南阳路上的惜阴堂，已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接洽密谈的中心。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清帝逊位后之安排，新政府的组建等都是在赵氏的惜阴堂谈妥后，才进行谈判的。

辛亥十一月初七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之次日，即来到惜阴堂，向赵凤昌询求方略，赵氏则“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并介绍熊希龄入局。[2](P250)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十分赞赏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远见卓识，及其为推翻清廷、肇建民国所作出的努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即致函赵凤昌请其出山，加入到民国政府中来。孙中山函曰：

竹君先生执事：民国初基，余羶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然有硕彦相为扶持，思负国人推选之意。素审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拟藉高远之识，以为切磋之质，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口佇眙，即颂兴居，惟希炤詧。

孙文谨肃。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九日。[11](第 32 册)

该信系用“总统府用笺”所写。这通来自民国元勋的信函，确实使赵凤昌无比兴奋，深受鼓舞。他在复函中称：

昨奉手书，迴环庄诵，具仰虚怀若谷，不弃刍荛，〇等原本荒落，识短才庸，谬承奖饰，益用汗颜。

窃维我公数十年困苦艰难，为四万万同胞力图乐利，〇等亦国民之一分子，即无责任，犹当殚竭智虑，以赞高深。

惟是枢密为最高机关，必须学识宏通，德望优裕，方足以副谘询，〇等何人，敢膺斯选。矧昌体弱多病，久在洞鉴之中，顾问一席，万不敢当。但此后遇有重大事件，苟有所知，无不据实直陈，以为泰山土壤之助，区区之愚，想荷原鉴，专此肃复，敬叩台安。

〇〇〇 〇〇〇谨启。[11](第 32 册)

赵凤昌虽未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枢密顾问”之邀请，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任命赵凤昌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董。1912 年 3 月，他又与张謇、章炳麟等组织统一党。在临时政府北迁后，赵凤昌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尤其是在反对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1](第 40 册)

《赵凤昌藏札》保存了一组电稿，记述了在反对张勋复辟时，段祺瑞之幕僚熊希龄将北方反复辟进展及时通知赵凤昌，而赵凤昌则想方设法配合反复辟斗争。其中赵氏致电冯国璋之电文称：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去夏通问，一年刚届，大局复扰，且生奇变。幸仗威信声讨，指顾奠定，无任祷企矣。昨接秉三天津来电云，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请将此电转达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谨即转陈。赵凤昌，叩雨。[11](第 40 册)

两日后，熊氏又来电云：

昨飞行队炸弹投入皇宫，炸伤数人，宣统惊病，现三路司令兵围北京，逆军释械投降，薙发裁遣。张勋逃入英使馆，清室通电表明被胁情形，段合肥日内入京，冯麟阁今日已在京奉车上拿获。特闻。希龄叩，青。

获得喜讯之后，赵凤昌即刻致电要求北方执政者“一复国会，一遵约法，一修宪法”，力图“有功于民国”。[11](第 40 册)

这些电报所揭示的细节，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之史料，也记载了赵氏本人为近代社会变革所做的积极贡献。难怪黄炎培先生称：“四十年来，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14]

可见，赵凤昌的后半生，实与中国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

四、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赵凤昌藏札》保存完好，均系原件装裱，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原件面貌。这些函札，是从光绪十年张之洞到广东履任开始，直到赵尊岳生前所保留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大约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张之洞本人在两广总督、两湖总督任内的函电底稿及其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友朋的往来书札；其二是赵凤昌与张謇、杨锐、熊希龄等同事文人之间的往来函电；最后是赵尊岳生前所保存的友朋之间诗词唱和及往来信函。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许多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活动的原始信札。这些珍贵文献，集中反映了清流派人物的思想状况。譬如，清流派中的骨干人物宝廷，号竹坡，出身宗室，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与张之洞关系至为密切。宝廷襟怀坦白，敢作敢当，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没有皇族习气，遇事议论风发，不避权贵。当年与张之洞同在翰林院时，彼此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宝廷不时有来信，其中一函曰：

> 春间曾寄一槭，当早登记室。疾病缠绵，兼为二儿娶妇，伽事纷纭，闲身不容小息，直至端阳后病始渐减，事亦渐定，得不死，无可消磨，仍钻故纸。……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非谓其传教也，其教涉陋，不足一辟。而其讲天学者，逞其私智，肆为臆说，以器为道，以数为理，自命为学究天人，欲将中华古圣人阴阳动静之训，扫而空之。华人喜新好奇，多为所惑。群以西人为大智，足以知天。此时虽怵于清议，尚不敢直谓圣人不知天，数十年后，恐无天者。皆奉歌白尼奈端为圣人，而不屑谈大易矣。
>
> 自愧手难缚鸡，不克披坚执锐，从事于海上，及此以血未干，聊借毛口子作文战利器。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著一语者。盖西人思深算巧，虽不明阴阳正理，而推测细密，假象数以穿凿附会，其无理之理，以实有足以惑人者，故谈天者多信之也。不敢自是，寄呈哂正。此乃初稿，容杂不成文章，祈略词取意，如所驳尚是，再修饰另抄。有不妥，祈批出。此外，尚多可驳。前承厚赐，谢谢。草渤，顺请壶公老夫子大人台安。
>
> 侍宝廷顿首。儿辈随叩。中元夜半。[11](第71册)

由宝廷该函可以看出，由于国势陵夷，强邻环伺，使这位已经挂冠还乡的昔日清流干将，满腔热血，愤愤不平。他有报国之心，虽然未能“披坚执锐”，却想从思想方面对洋人中“讲天学者”进行反驳。但是，他所用的是传统的封建理论，所批评的则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实在是把劲用错了地方。该信正反映了像宝廷这样的清流派人物，罢官之后，经济上一贫如洗，长期徘徊于京师西山，吟啸于花前月下，脱离实际，自我封闭，因此，其思想停滞不前，未能与时俱进，还是用传统的旧观念看新事物。

《赵凤昌藏札》还辑有许多庆宽函札。庆宽，字小山，据清档记载，庆宽本人系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延英管领下贡生，早年曾供醇亲王奕譞驱使，为时甚久。后来又到内务府当差。醇亲王奕譞于甲申易枢后，大权独揽，隐操政柄。庆宽便因醇王府势力，得到掌管内务府银库之美差，大肆贪污，胡作非为。戊戌政变后，庆宽长期在上海游荡，后又曾自告奋勇前往日本捕杀康梁。[15](P131) 他与赵凤昌相识大约是在这一时期。《赵凤昌藏札》所保存的庆宽函札系庚子事件开始后的，数量甚多，往来十分密切。以前，从事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很少知道，庆宽还是晚清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而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则不知庆宽在晚清政坛上，还是劣迹斑斑的政治小丑，曾在捕杀革命党人沈荩一案中立有头功，被慈禧拔擢为江西盐法道员。[16](P54)《赵凤昌藏札》中有一通书札，颇值得一读。其函曰：

> 竹君道兄大人台鉴：
>
> 前复芜函，谅邀荃察。顷于阴历十月十二日奉到瑶章，敬悉接见凤卿，其言及弟病，需桂佳者

罕有等语，乃蒙格外关怀，特将素承刘永福所赠上等之桂，珍藏四十余年，今乃分施于弟，已交邮寄矣，足征痛痒相关，视同手足，真令弟刻铭心版，永矢弗忘也。至当年刘渊亭同方照轩提督来京时，弟正在西城广济寺绘画战图，刘、方二公均寄寓该寺。醇邸闻知，甚是垂青二公，遂派在寺(招) 照拂。弟又带领二公谒见王爷，故此相交甚厚。刘公托购老山人参，四处搜寻，刘公皆言不好，且价极昂贵，事处无法，因思弟有盟兄容俊峰前在宁古塔副都统任时，自采老参二株，重约四两，寄京待重价而沽，不幸病故。弟由盟嫂处将参求到，用数百金购妥，送于刘公，喜出望外，言此参诚难得之物也。渠回送肉桂二块，彼时弟不知为宝，便送多友将此宝桂湮没不彰。据云，此二件价值二、三千金，殊为可惜。今弟所用之桂，系由凤卿处讨来，服之不见有效。兹蒙宠赐，则桂到病除，在指顾间耳。先为肃函鸣谢，俟由邮寄到时仅将收据呈上，不再为渎陈，尚此渎陈。叔雍贤侄等均吉。

愚弟赵庆宽病笔

阴十月十六日[11](第 44 册)

上函中刘渊亭，是指刘永福 (1837- 1917 年)，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原为广西天地会领袖，后率黑旗军驻越南 20 余年，中法战争时，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国侵略军，战绩卓著。方照轩，则是指方耀，时任广东提督。二人均为当时名扬全国的武将。而位于北京西城的广济寺，则是一所名刹，香火颇盛，至今尚保存完好。在清末，广济寺还有旅舍之功能，故庆宽能在其中作画，并照拂刘永福、方耀二人。

又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创人物孟森，曾为张謇之幕友，与赵凤昌系武进同乡，彼此关系非同寻常，往来函札甚夥，在 《赵凤昌藏札》中设有专册保存，其中不乏非常重要者。今略举一二:

其一函曰:

惜阴主人，奉示敬承一一，南通屡烦通问，具征关爱。……知起居增胜，茹素后神采益佳，甚慰，甚佩。如公卫生得力，最为妙谛。近聆东西洋佛学大长，颇得梵夹真相，释迦教义，不及诸祖之精深；天竺慧光，又逊吾华之阐发，摄养为当前受用，公独得之。若益源辈，则不免太泥矣。又见朱少屏来谈，乃与江亢虎正相反。似乎俄之潮流已落，吾华正在上潮时。无聊之政客，幼稚之学生，迎合鼓荡，方兴未艾。赖所本之俄风，已成过去之试验。弟之所急欲亲往一观，未能急就，而少屏已有所诏我，其言当不无可信之处也。

国之人职业太少，败象难堪，然此运已开，果有世界知识之一端，无论何途径终难淘汰，以此启政局稍定，真象可推而知之。从前望有大人物救国，今知此见解之陋，仍是三千年余习。其实将来不过以职业救国，政府亦全国职业之纲领；有职业者，有时而助提纲领。提纲领者，随时而退为职业，则持久之道存焉。若以行政营业为两途，即是过渡未成之现象。他日吾国之归宿，因不免取法他邦，然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盖各国虽趋向如弟所云，而未能尽践。吾国乃以种种酝酿，不如是不得到题，凡百君子扰之营营，皆造成黄金世界之大功人也。

公明烛几先，常超同辈之上，以弟言为何如？啬倘有函，当希见示，柏樵归沪后见否？南北局势皆急，国手高坐而观之，最后妙着恐不能不如弟说。侧身人海，日手一编，亦日在被骂之列，不能不辗然自笑，缕上即颂道安。

弟森谨言　四月十六日菊儿随叩[11](第 31 册)

该信中所提及的朱少屏，名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05 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受孙中山的邀请任总统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朱少屏又回到上海，宣传民主政治。江亢虎，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国外，同社会民主党人有过接触。1911 年 7 月，在上海发起组织 “社会主义研究会”，武昌起义成功后，他把研究会改为中国社会党。1924 年，江亢虎再度组建社会党，成为当时有名的政客。啬，系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黄伯樵，江苏太仓人，留学柏林

工科大学，精通德文。以上诸人均为惜阴堂之常客。

其二函曰：

惜阴主人，转瞬阴历又改岁矣，久未修候为歉。此间事，南方视之亦殊未得真相。如前日之通电反对选总统者，以为电内有名者，即其人，亦殊不然；一面得钱，一面争附名于此电者，正不一人，而其不与此电者，亦未必人人得钱，要以得钱为极多之数而已。

其实，曹之梦想，弟以为终必无成，各方未能赞同，岂得由彼一厢情愿，此不成问题也。但宪法亦必无成，以省宪为大梗，其中利害关系各有不同，有公有私，但私多而公少耳。惟有此复杂，乃为制宪，若如沪上数人议定之宪，正于事实无效也。近有人发起纠合议员团，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

弟森手上。新正初五日。[11](第 31 册)

上文中“曹之梦想”，当指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权位，以及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的活动。1923 年 10 月 5 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故该函应写于 1924 年的“新正初五日”。

以往的有关孟森传记，大多认为“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1914 年，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著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云云。[17](P656) 但这两通函札似乎表明，孟森直到 1924 年，其主要精力还在从事“政治活动”，远远没有“脱离”。他虽然在进行明清史研究，但更多的是注意国内政局之发展，对中国之未来表现出极度的关心。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虽一无所知，却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可见，只有在阅读《赵凤昌藏札》之后，才会对孟森先生之生平活动及其思想之发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最后，还应该指出，在《赵凤昌藏札》中，有相当部分函札是写给叔雍的。赵尊岳（1895-1965 年），字叔雍，凤昌之子。在赵凤昌影响下，他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词学，曾致力于明词的搜集与研究，有《明词汇刊》存世。他还喜好京剧，与当时京沪梨园之著名角色，多有信函往还。因此，如果要研究民国时期的京剧历史，尤其是有关京沪的文化史，一定会在《赵凤昌藏札》中发现十分重要的史料。

[参考文献]

[1] 刘厚生. 张謇传记 [M]. 上海：上海书店，1985.

[2] 赵尊岳. 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A]. 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 近代史资料（总第 102 期）[Z].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广总督李瀚章. 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 [Z]. 光绪十九年，内政类.

[4] 刘禺生. 世载堂杂忆 [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 胡钧撰. 张文襄（之洞）公年谱（卷 3）[Z].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大版）[Z]. 光绪十九年.

[7] 沃丘仲子. 近代名人小传 [M].

[8] 陈时伟. 赵凤昌传 [M]. 民国人物传（第 7 卷）[M].

[9] 欧阳辅之编. 刘忠诚公遗集 [C]. 奏疏，卷 21.

[10] 清史稿. 刘坤一传 [M].

[11] 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 赵凤昌藏札（稿本）[Z].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洪钧遗折（光绪朝录副奏档）[Z]. 光绪十九年，内政职官类.

[13] 赵凤昌. 惜阴堂笔记 [J]. 人文月刊，第 2 卷第 8 期.

[14] 黄炎培. 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 [A].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 1 册）[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15]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 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 [M]. 成都：巴蜀书社，2004.

[16] 孔祥吉. 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 [M]. 成都：巴蜀书社，1998.

[17] 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 [Z].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郭秀文

省河之南的鏖战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二*

◎ 郑永华

[摘 要] 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的有关中文传统舆图，是清军在镇压广东洪兵起事过程中形成的实录档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其逐一进行考释，将为我们提供更为详细、更为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以进一步深化对咸丰年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等重大地方史事的研究。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参以文献记载，对编号为 F.O.931/1911 与 F.O.931/1954 的两幅舆图及相关史事，做了较为具体的考释。

[关键词] 传统舆图 考释 广东洪兵 省河之南

〔中图分类号〕 K2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95-08

广东省城珠江隔河以南地区，河洲密布，水路纷歧，过去广义上统称“河南”，为广州城南著名水乡。自东汉时期议郎杨孚植松定居之始，这里便逐渐知名于远近，延至晚清时期，“富者多居之，人烟稠密，栉比相错。”[1](卷 6,P905) 咸丰四年到咸丰五年之间，广东洪兵大举起事，并围攻省城长达半年之久，这片向为广州人躲灾避难的首选之地，也成为清军与洪兵争斗的战场。时人张维屏有《河南诗》记云：“羊城对岸河南地，是我童时所钓游。杨子宅边闻劫掠，梵王宫里见戈矛。千家密密排珠海，一水盈盈护广州。二百年来称乐土，却因离乱话从头。”并自注云：“耆老言河南未经兵革，国初人尝避乱于此。”[1](卷 6,P907) 这是广州洪兵起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前人对此虽有所涉及，但均非常简略，甚或避而不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现有文献史料的有关记载不很充分。① 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U.K.）中，庋藏有较大数量关于两广洪兵起事的传统舆图，其中多幅即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如 F.O.931/1886、F.O.931/1897、F.O.931/1903、F.O.931/1905、F.O.931/1911、F.O.931/1917、F.O.931/1936、F.O.931/1954 等，都与广州河南地区相关，大约即形成于这一时期。这些传统舆图，多是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便于指挥，充分了解战况，而令下属绘制进呈的。如在清军反攻河南之前，“该道沈棣辉督办日久，往来其间，熟悉情形，因绘图贴说禀商。”[2] 这是清军镇压广东洪兵起事的实录档案，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充分利用这些舆图，参以其他文献，或可以使我们对该历史事件有更详细的了解。本文仅对 F.O.931/1911 与 F.O.931/1954 两幅舆图略加考释，以便于研究者的解读与利用。

一

F.O.931/1911 为英国国家档案馆现在的编号，此前曾编号 F.O.682/289/2 (21)，在线目录注为：1850s, Military map of Honam (Ho-nan) and environs。原图手绘，尺寸为 33 ×51 厘米。图上标有方位标识，下北上南，左东右西，其中上方因边角磨损，所注“南”字已不见。舆图并无严格比例，仅为方位示意图。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传统中文舆图专题研究”（项目编号：04BZS021）的成果之一。有关舆图由项目负责人华林甫教授提供，并取得英国国家档案馆授权使用。初稿完成后承孙冬虎研究员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郑永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① 相关研究主要参见简又文、陆宝千、黄宇和、骆宝善、胡珠生、秦宝琦、周育民与邵雍、欧阳恩良与潮龙起以及朱俊强、雷冬文、林志杰等人的著述与论文。辑录资料，主要有 [日] 佐佐木正哉所编《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篇》，及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骆宝善先生等）合编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两书。

所绘范围，北起广州省河南岸，形象注有“省城”、“白云山”图示，南至大石、圆冈、南亭、新篮一线(新篮，即今新造)；东自狮子洋，西到石壁、三山滘等地。图上沙洲多处注“田”字，并注有白鹅海、省河、狮子洋、黄圃、新篮海口、官山门、沥滘乡、百步田、三山海、三山滘、大王滘口等地名数十处，北边白鹅海注“宜往石门金山等处”，西边三山海注“此处通佛山等处”，更西标注“顺德陈村等地”字样。但图中大石和大山两处地名，标注与实际方位相反。

图中核心内容，是关于广州省河之南“河南堡州（洲?）六乡”附近水域及清军攻剿新造“贼匪”的军事部署形势图示。图上详细标注了省城南面各炮台的位置。其中省城西南白鹅海附近有西固炮台、西安炮台；正南河面有海珠炮台，其东另有一炮台，模糊不清，据其他舆图，应为中流砥柱炮台。再往东，猎德炮台与对岸东固炮台、东靖炮台遥相呼应，共同扼守省城东南河面。河南堡之南有崙头炮台，西边有南台炮台、大王滘炮台。此外还注有破箕村汛、石壁汛两处军事驻地。

图的上方粘贴红纸三张，反映了两军当时的军事态势。其中圆冈、大石下方的红纸所标文字为：“红单船由此进剿。”新篮、官山门附近红纸标注：“现贼船在此湾泊，拖船二只，西瓜遍船一只，渡船二只，草遍约七八只。”另一张在图的左上方狮子洋之东，面积较大，其文字为：“今天由省拨红单船四只、拨巡船三四只前往此处堵剿。”(见附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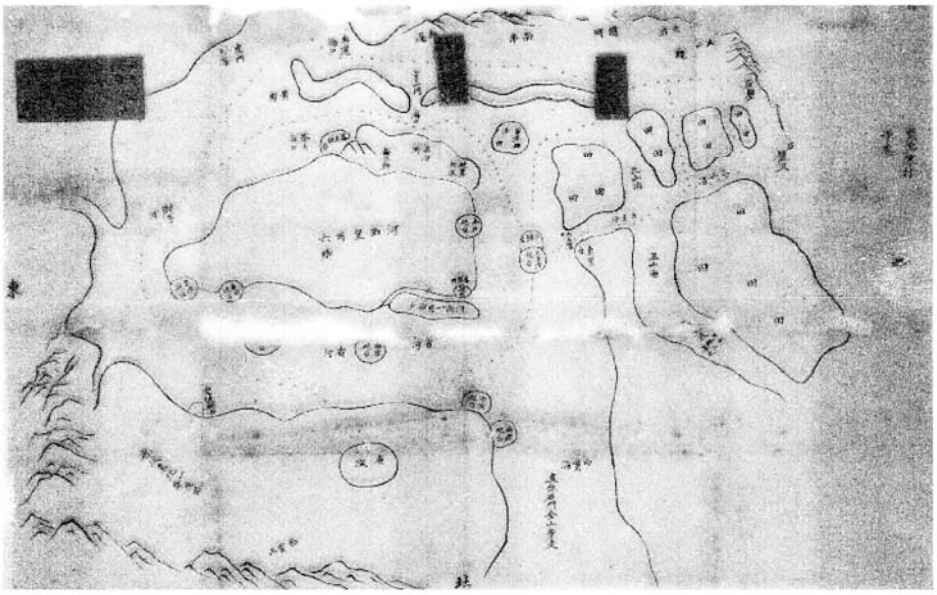


图 一

该图绘制年代，英国国家档案馆定为“1850s”，即19世纪50年代。其间相距10年之长，过于宽泛，实际上等于未加考证。华林甫教授根据有关史料，初步考证出该图当绘于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至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1855年1月20日至3月8日）之间，反映的是大石失败之后、新造被占之前清军策划攻打新造洪兵的情况。[3] 这一结果，相对于英国国家档案馆所标年代，已经大为精确，但其上下限之间，仍有一个多月的间隔，多少影响到舆图的史料价值与充分利用。在此先介绍与之有一定关系的舆图F.O.931/1954，然后一并做更为详细的考证。

F.O.931/1954此前曾编号F.O. 682/371/2，亦为手绘，尺寸60.5 ×52厘米。原图也有方位标识，初标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后经圈涂，改标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且其字形与原图不一致。对照附近地形，可知初标方位是正确的，改标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则恰与实际相反。图上所绘范围，北起盐埔、石潭口、贝底水、大黄滘炮台一线，南至石洲、橹尾滘、围涌口一带，东自陈头、中环、三山滘口，西到石龙、五斗口、五丫口等地，更西标注澜石、石湾及“此河通佛山”等字样。图中大约以二尾口、福寿园为中心，绘有附近沙洲及河道等详细地名。

该图核心内容，应是关于攻剿陈头“贼船”、“贼巢”的军事示意图。图中橹尾滘北画有拖船6只，旁红纸标注“此处日前贼船在此湾泊”。平洲村之东水面画战船5只，其中拖船3只、快船2只，旁贴红纸，标注“潘参将船见在此湾泊”。福寿园东南水面画有船4只，旁标有“梁参将船在此守口，拖船三只、快船一只”。三山滘口标船6只，包括拖船3只、快船3只，东标“此路通大尾大石元冈等处”，其南用红纸标“三山口”，再南又有红纸1张，注有“此滘东北风，我兵进剿系在上风”字样。中环、陈头之东水道，标有船6只，其中拖船2只居中间，快船4只分布南北，东边水道标“此小河通大石、新造”，陈头东南河岸有炮台1座，注明“贼炮台”，此为“贼军”势力所在，旁边红纸注明：“贼船现在此湾泊，自石壁至中环，其势欲起锚大冲出口”。再往南为围涌口，其下标注“探确前日贼船并未入此涌，系入石壁至三山滘”，旁以红纸标“此涌东北风，我兵进剿系在下风”。东北角为大黄滘炮台、凤凰台，水面有船4只，标明红单船1只，贡吉船2只。(见附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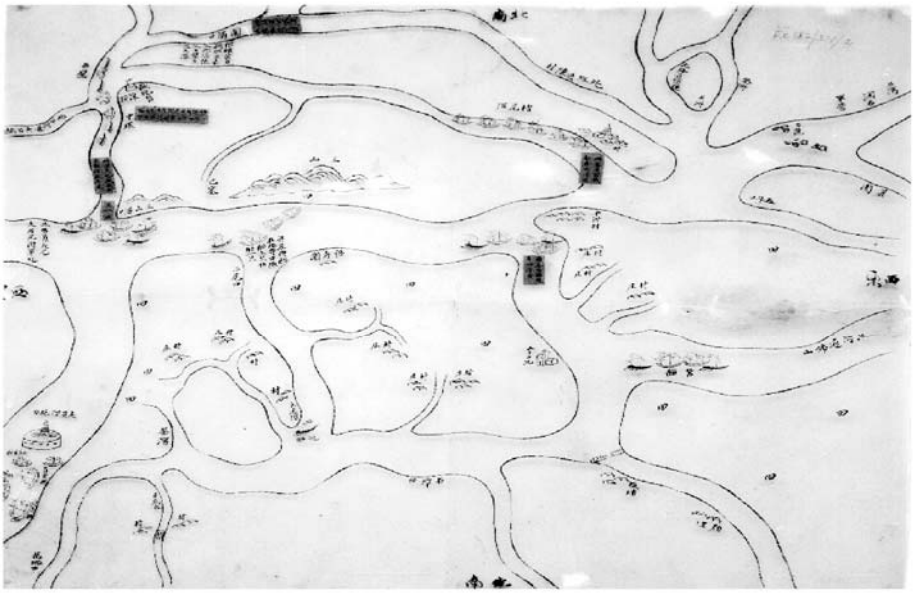


图 二

图二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注为：c. 1852/1853, Map of the Pearl River below Canton showing position of government and rebel forces，仅指出该图为广东省河南面官军与造反者对阵形势图，形成于1852-1853年间，具体时间及其详细内容均未加注明。

二

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这批中文传统舆图，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从所攻陷的两广总督衙门和广东巡抚衙门中掳走的。综合英国国家档案馆在线目录所标以及图上所示内容，可初步判断上述两图是清军为进攻河南的新造、陈头附近“贼船”、“贼营”而绘制的军事舆图，形成于广东洪兵围攻广州期间，对研究这一重大地方史事具有重要价值，很有详细考释的必要。[4] 由于原图均未标注作者和绘制时间，严重影响到两图的使用。而欲考证它们形成的准确时间，则需要从双方在广州河南的新造、陈头附近所进行的战事情况来细加分析。

按广东洪兵屯聚广州省河之南，从咸丰四年六月围攻广州之初即已开始。据记载，广州附近洪兵自何禄首发于东莞石龙墟、陈开继起事于佛山镇之后，省城北部有李文茂、甘先、陈显良等亦聚数万人响应，并进军环逼广州，“二十六日，匪分三路径扑省城。东路以燕塘为穴，北路以江村为巢，迤西由石井直接佛山，为诸路各匪总汇之所。南河沙茭所属，港汊纷歧，东通狮子洋，西连佛山镇，水则扼堵，陆则进攻。省垣戒严，四境蹂躏。”[5](卷 1,P310) 文中所言“南河沙茭所属”，即广州河南的沙湾、茭塘两司管辖区域，“所属一百二十一乡，统名为大箍围，四面环水，土沃民稠”。[2] 而河面“袤长一百余里，内外水口不下数

十余处，港汊纷歧。西连佛山镇，东连狮子洋”，[6] 为省城之南的战守要地。其中东自石岸、新造，西至大石、陈头，是河南洪兵聚集的重点地段。在此活动的洪兵，早在咸丰四年六月中旬前后即已起事，史料载“（咸丰四年六月）十四日辛巳，番禺之大石乡会匪作乱，调卫佐邦等讨平之”，[7](P952) 其实并未平息，反而越来越活跃。主要包括两支，一为以大石为根据地的林陈洸濬（或称林洸濬、陈洸濬）为首，一为以新造为大营的陈显良（又称陈豆皮大）为首。[8] 他们与珠江河面的关巨、何博奋等“水贼”互为声援，曾给广州守城清军以很大威胁。据地方志记载，“逆首林洸濬屯大石，豆皮大屯新造，水贼关巨、何博奋等海艘数千，阻河绝外援”。[9](卷 32, 列传一, P1332) 尤其是在洪兵围攻广州之役的中后期，河南洪兵活动更是发展迅速。“（咸丰四年）八月，逆首陈显（良）自三宝圩败回新造，与南安炮台贼合，势愈炽”。[9](卷 16, 建置三, P1326) 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向朝廷奏称：“自上年（指咸丰四年）秋间逆首陈洸濬等聚众数万之众，先阻陈头、大石各水口，复分党啸聚新造，直踞南安、南固等台。十月后纠集外海外河匪船，络绎而来，大肆猖獗。”并称“该墟（指新造）向为各匪水陆总汇大营半年有余，其先拜会竖旗，纠合夥党，皆屯聚于此”。尤其是咸丰四年十一月间佛山为清军克复后，省北、佛山溃散洪兵多有转趋河南者，一时之间，“附省地方，惟此股贼匪奔突无定，出没自由，旁亘横行，大为水路之害”。[2] 广东当局于是派遣大军，对新造、大石洪兵进行围剿。

从 F.O.931/1911、F.O.931/1954 所绘双方形势来看，显然应是清军进攻河南洪兵过程中所形成的军事舆图。就 F.O.931/1911 而言，其时大石水面已停泊官方的红单船，新造东边水路出口则游弋着从省城派来的官军红单船和巡船。这表明大石附近水面，已基本为清军水师控制，并显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新造“贼船”则东西通道俱被堵截，困于一隅，岌岌可危。而在 F.O.931/1954 图中，“贼巢”陈头之北水路三山滘口已为清军水师严密封锁，平洲等处河面，也为“梁参将”、“潘参将”的巡船所控制，图上文字亦标明清军欲从两路进攻的意图，而洪兵船只则力图冲出水口突破重围。故两图应当形成于洪兵退守、清军大举进攻新造与陈头之时。按清军倾力进攻河南洪兵，不是自咸丰四年夏秋之间洪兵占据新造、大石之始即行展开，而是一直拖到此役的晚期方才开始。盖因广东洪兵大起并围困广州之后，当局起初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危急的北门外各路，而无暇顾及河南。故双方早期战事，主要集中于广州北门附近，河南洪兵仅遥为犄角与牵制之偏师，以至于陈显良曾留屈金、陈四等守新造，自率大军北上三宝墟、燕塘助阵。后来陈显良败退新造。咸丰四年九、十月间，清军集中主力，陆续肃清广州北门外东、北、西各路洪兵。咸丰四年十一月间，叶名琛又倾全力剿除“匪巢”佛山。此后河南方成为广东近省洪兵的惟一要点。清军于是调集主力南向与洪兵鏖战，该地遂成为两军相争的最后主战场。对此叶名琛曾说，虽然此前大石、新造等处洪兵横行一时，“维时因省北一带水陆戒严，兼之佛山匪巢未破，战守均关紧要，兵勇船炮无可多分，惟于各要隘严加堵剿，曾在大尾口等处叠获胜仗。十二月间该匪驾船登岸窜踞附省河南，经委奏补雷琼遗缺道沈棣辉会督文武剿除殆尽，首逆陈洸濬当经炮毙。各匪又分股欲闯驶省河攻扑东路炮台，均经叠获大胜。”[2] 可见先期清军对于河南聚集的洪兵，主要是采取防守姿态，虽然间有交锋，但多属应付骚扰、牵制的防守之战。图 F.O.931/1911、F.O.931/1954 反映的是新造与陈头两处洪兵退守、清军进攻河南时的情况，故不可能形成于先期，而必在双方攻守逆转之后。

细考史料，可知广州河南洪兵与清军战守变化的关键，在于咸丰四年十二月。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叶名琛令沈棣辉督率水陆各军，猛攻洪兵重镇佛山，经 20 多日激战，一举克复。这是广州附近洪兵的一次重大失败。十二月初，新造、陈头等处河南洪兵联合北进，希望从南威胁广州城，以打击清军，挽回局势。“十二月初三日，新造贼纠合猛涌、钟村、陈头各贼由陆路犯河南（按指广州城对岸的河南堡六乡，即狭义上的河南）”。但此役开展并不顺利。先是林洸濬在小港桥突遇官兵，惨遭杀害，赶来增援的陈显良部亦被击败。而广州城内清兵又陆续渡河增援，洪兵更难支撑，至十四日，“贼大溃，陈显良等遁回新造，河南肃清。”[9](卷 22, 前事三, P1331) 更有史料说，“（十二月）十四，仍进剿，贼已远遁。”[10](卷 26, 杂录下, P1310) 所述虽不无夸张，但此时河南洪兵连遭失败，不得不退守陈头、大石、新造等处，双方攻守之势开始逆转，则

属事实。此即为 F.O.931/1911、F.O.931/1954 两图绘制之上限，华林甫教授已在文中指出，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但两图的绘制，还应在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因为河南洪兵虽经此一败，但进攻能力并未立即完全丧失。"(十二月) 二十日，……陈头贼船犯大王滘口炮台，守台兵走，都司黄彬率巡船力战却之。自此每日一至，皆为我兵击退"。[11](卷 82, 前事略八, P1271) 可见直到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后，陈头等处的洪兵船只，尚在积极组织进攻，两军交战地点，一直在离广州颇近的大王滘口炮台附近展开，则陈头、大石等处河面显然还不会为清军的水师所封锁。所以直到十二月下旬，叶名琛在向咸丰皇帝报告的奏报中，虽称省河以南"本月内均亦次第得手，计日当可剿平"，也仍不得不实称"水陆各匪尚多"。[12] 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清军大举进攻河南的行动，并未能在十二月中下旬随即展开，而是直到次年正月方择期进军。"迨甘先屡败，北门解严，佛山贼亦焚巢溃散，十二月初十日，林逆授首河南，陈逆败回新造，① 官军遂得专意南讨。乙卯正月十八日，绅士黄知裁、孔传心等遂以募勇协同官勇由陈头、大石进剿而下。十九日，由市头进剿南安。新造贼溃，陈显（良）逸。是夜，林党之在钟村、市桥扎者，亦焚巢遁。二十日，官军大破何六贼船于四沙。"[9](卷 16, 建置略三, P1326) 佛山陈开败走后，"于是贼攒聚神头，舟师日至。使参将黄彬与战，又连败之。棣辉知贼无能，始议进兵沙、茭。正月十八日，我军舟师齐进，连破员冈、蓼水之贼。十九日，即登陆，营于沙、茭，贼皆散走。二十日，贼复集船四百余号，由狮子洋而上，督巡船拖船往战于波罗庙。贼败，弃船走，直至沙湾之南。排头尚有贼船四五百号拒敌，又大破之。"[11](卷 180, 宦绩五, P1279) 当时香港出版的报纸也曾报道其经过，略云："省中大员侦知虚实，遂大整军旅，由黄埔水陆并进。……于（五年）正月十七日出师。……正月十七夜，沈道台（棣辉）引军出城，十八日，攻打贼党。……官军大胜，……十八夜，官军暗伏其台左右。于黎明时，贼见官军登墙来攻，弃炮而走。所以官军不须发炮而夺其炮台。"[13](P851) 另据外人记载云："西历三月十六日（即五年正月十八），② 广州城内出兵一万五千人，进攻黄埔，叛党因无接济，缺粮食，大败，死者二万五千人。其首领逃往香山。"[14](P851) 可见，清军进攻河南洪兵的时间，是在咸丰五年正月中旬，上距先年十二月初三，已有 40 多天。图 F.O.931/1911 与 F.O.931/1954 只能成于大举进攻之后，而不会在此之前。

但上引史料所言官兵出兵时间，并不完全相同。或言十七日夜，或言十八日。《清实录》则载："正月十七、八、九、二十等日，水陆进攻大石口，毙贼三千余名，毁夺贼船军械无算，河面及沿岸贼巢，悉就荡平。乘胜进攻新造地方，毙贼三千余名，将贼老巢焚毁，所有省河南安、南固炮台，亦即时夺回，毙贼二千余名。其余匪船逃驶外洋，纠合大帮救援，我兵追至柏塘洋面，大加剿洗，复毙贼一万二千余名，其溺死及各乡擒斩无数。现在省河东南水路通行。"[15](卷 167, 咸丰五年五月壬戌, P837) 此处径言"正月十七、八、九、二十等日，水陆进攻大石口"，未言为十七日夜。孰是孰非，难以确定。

至于官军"围剿"河南洪兵、尤其是进攻新造与陈头的具体作战进程，更是言之甚为简略，甚或各相抵牾。如有史料记云："五年正月十八日，候补道沈棣辉率舟师并沙、茭绅勇，先攻陈头、猛涌贼巢，焚之。遣把总苏海入贼水寨，毙贼万余。"[16](P335) 表明清军十八日先攻陈头、猛涌。但据另一史料："乙卯正月十八日，绅士黄知裁、孔传心等遂以募勇协同官勇，由陈头、大石进剿而下"，[9](卷 16, 建置略三, P1326) 则十八日先攻陈头、大石。史料又称："当剿佛山时，水贼鲤鱼仔集水寇黄幅、何博奋等艘尚数十，环泊陈头、猛涌、

① 所言"林逆"即林洸灉河南"授首"的时间，不在十二月初十，而在该月初三；"陈逆"即陈显良败退回新造的时间，亦不在初十，而在十四日。参见同书卷 22，又见《林敬联供词》，载《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下册第 1331 页、上册第 100 页。

②所言中历正月十八是对的，但西历应为三月六日，而不是十六日。又该段文字，在《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中译作："(经过这次骇人的暴行之后，叛军们由于感到他们缺乏战利品和给养来把他们的徒众纠集在一起，因而不能抵抗多久，于是越来越做垂死的挣扎)。终于在三月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在市内作准备，三月六日偷袭黄埔下游的一个（清军）炮台。当时攻守双方都决死一战，在战役结束之前，已有二万五千人战死或溺毙。叛军首领向香山（Hiang- shan）方面逃走。"似有出入。见该书下册第 1842 页。

新造。棣辉于是率舟师并合沙、茭绅勇力攻大石，遣把总苏海扬帆入贼水寨，兵船继之，毙贼万余。绅勇由市头登岸，新造之贼，闻风先遁。棣辉乃分兵而东，贼由狮子洋尽走潭洲。”[9](卷 32,列传一,P1333)则先攻者仅为大石，未及陈头。又有史料称：“正月十八日，贼用船六百只，把守新造水陆地方。官绅指授方略，著夷人火船三只，先埋伏在黄浦（埔），官船大队由乌涌进。剿（破句，应为 进剿’。）官船前后夹攻，贼腹背受敌，杀毙二千余人，生擒千有余人，溺死者不计其数，抢夺贼船百余只。追至沙头、陈村、新造等处，贼势大窘。”[17](P1017) 则十八日攻打之地为新造。被俘洪兵供称：“十一月初二日放火烧佛山店房，何亚六带三四千人马，小的亦带三十旗人马，到陈头会同陈洸濬、何得乾等扎营。十二月连次攻打河南，陈洸濬在锁龙桥被官兵打死后，又打仗败了，散回新造。过年至本年正月十八日，又被官兵打得大败，小的逃回甘竹，后逃到新安黄松岗。”[18] 又有供词称：“本年正月十八、十九、二十，会同……在新造与官兵打仗三次。二十日，被官兵打败逃避”，“本月十八日，有官兵至大石剿捕。”[19](P100) 可见十八日大石、新造均已发生战斗。而时人欧阳溟所做纪事诗，表明清军攻占新造，时在十九日，而不是十八日。[20](P1798)同时有的又记作：“二十日，兵勇焚新造贼巢，陈显良闻风先遁。”[11](卷 82,前事略八,P1271) 则至二十日清军方攻占新造。

三

以上文献所记，颇多歧义，令人莫衷一是。而这次战役的具体进程，正是考证两图绘制时间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寻找更为权威的第一手资料，详加考察，才能甄别相关记载的正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我们查到了叶名琛当时所上奏折，其中对清军此次行动叙述甚详。① 据叶名琛所奏，清军曾策划进攻河南洪兵的线路：“如由东路而进，应先攻石岸口以至新造；如由西路而进，应先攻陈头而至大石。惟两路抄击，兵分则单，恐无把握”，前线指挥官沈棣辉因此“绘图帖说禀商”。叶名琛等认为，“与其并举难齐，不如并力一处，经由大石攻入，中腰击断，使该匪首尾不能相顾”，遂以此决策。清军即派参将潘庆等堵截东路二沙尾，派守备黄彬等堵截西路之陈头，而沈棣辉“会督文武，调齐各战船兵勇”，于正月十七日夜在大尾口扎驻水营。探听洪兵布置后，于十八日寅刻派候补把总苏海等“分头、二、三队，由大尾口驶出”，进攻大石，“复派勇目梁得显、绅士冯燕宗等带浅水船杉板船由小港抄袭后路。”两军相遇，清军水陆并进，“正在酣战间，陈头匪船飞棹前来救援，经黄彬督率头艋船开放三、四千斤大炮，击沉贼船十只，毙匪三百余名，旋即窜回。”大石洪兵大败，“所有大石河面匪船船（后一 船’为衍字），岸上贼巢，悉已荡平”。是夜沈棣辉令各船停泊大石口，“仍留黄彬头艋等船堵截陈头贼匪来路”，并派署黄鼎司巡检朱用孚领人钉塞石硝、银河两处水口，令署广州知府郭超凡督率壮勇在平洲一带堵守，“以防内窜”。十九日黎明，沈棣辉“督饬水陆各船进攻新造”，先在相距十余里的白泥涌打败洪兵，“仍即迅奋前行，不过数里，又由新造驶出贼船一百余号”，向前相拒。两军船只把住阵脚，互相对射，相持一段时间后，洪兵不支，纷纷溃逃。清军“遂令陆路兵勇由市头登岸，先攻曾边”，击破洪兵，毁其炮台。复将陆路兵勇分为七队，攻击新造各水，水师则于沿河轰击接应。洪兵惊溃，“陆路兵勇俱破入新造墟”，“遂将所有贼营房屋纵火焚烧，俱成灰烬”。时已薄暮，清军遂收军，当夜于新造河面扎设水营停泊。二十日寅刻，清军继续东进，挥师进攻南安、南固炮台。洪兵大败，清军水师追至狮子洋波罗庙前湾泊。午刻洪兵又集结船只 300 余只，经四沙口蜂拥杀向清军，复遭大败，为清军追至柏塘口，损失惨重。至于陈头水陆洪兵，听到新造大营被攻破的消息，自忖难以孤守，“业于十九日宵遁。黄彬在大石口闻信，开船追赶，贼已无踪。当将所剩空船十余只、篷厂五座焚烧，炮台贼垒捣毁。”至此，清军于三日内六战皆捷，歼灭洪兵二万多名，河南水面全部肃清。[2]

从叶名琛向朝廷的奏报可以看出，清军进攻河南的顺序，为十七日夜自省城出兵，进驻大尾口。十八日凌晨攻打大石，并击退陈头援敌，占领大石。十八日夜清军船只泊于大石口，留黄彬等继续阻击陈头洪

①这些档案，为研究广东洪兵起事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但由于种种原因，收集甚广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并未收入。笔者在档案查阅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邹爱莲馆长以及胡忠良、刘若芳、苏文英、郭慧、李静等多人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兵，而大队人马则于次日早晨东进，围攻新造，占领新造墟。十九日夜清军于新造河面扎设水营，二十日晨继续往东攻取南安、南固两炮台，并追击洪兵至狮子洋面，得胜而回。至于西路陈头洪兵，由于出口为清军封堵，而西部要路平洲等处水道也为清军遣人钉塞，于是在十九日夜四散奔溃，清军遂不战而掩有陈头。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史料的佐证。战后为清军参战人员请功的档案中说到，香山协右营千总苏海，在该役中表现神勇，“大石、新造、四沙，三战三捷，剿除大股匪船，东南水路通行。此一役也，该弁奋不顾身，沉毅安详，实为武弁中不可多得之员。”其顺序为“大石、新造、四沙，三战三捷”。署前山营都司奏升阳江营都司黄彬，“嗣进剿大石，该员督率舟师堵截陈头，攻破贼营，洵属尤为出力。”同知衔林福盛，“管带林勇由大石登岸，分路进攻土炮台及焚毁贼营。复带勇进剿新造、市头，当先冲杀，所向披靡，夺回南固炮台。于陈头贼匪由陆路扑我船营，经该员挥旗先登，奋勇向前击退。”[21] 均表明清军先攻大石，复进剿新造、市头等处，而陈头则仅为堵截击退，当时并未遣军攻占。

这就是咸丰五年正月间清军围剿河南洪兵的大略经过，据此可以纠正现存地方志等史料相关记载中的不实之处，并考证出前述两图的绘制时间和相关内容。先看 F.O.931/1911。图上大石已停泊官方红单船，说明必在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清军进攻大石、并进而控制大石河面之后，而在十九日晨清军开始进攻新造之前。至于 F.O.931/1954，由于河面遍布清军水师，陈头已为封锁，表明其时陈头援助大石之洪兵已被击退，则应在十八日晨清军对大石发起攻击之后。而十九日夜，陈头洪兵业已溃散，舆图必成于此前。据此，可知两图应形成于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晨到十九日夜的时间段内。揆之双方军事进展，两图成于十八日晚上的可能性最大。因其时大石战事已基本完毕，下步行动尚未展开。清军有关人员于是绘制军事舆图，目的估计是为了向驻于广州城内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汇报清军占领大石之后的行动计划。至于绘制者，或者即为当时在前线的总指挥官沈棣辉，当然也可能出自沈棣辉随军的幕僚之手。

又舆图 F.O.931/1954 中所言“梁参将”，可能为广东水师参将梁显扬。他参与了清军镇压洪兵之役，并因战功而得到清廷嘉奖，《清实录》有载：“以剿办广东东莞等处匪徒出力，赏参将梁显扬、都司尹达章、黄彬、守备陈贞标等花翎，千总冯瑞林等蓝翎，余升擢有差。”[22]（卷 195，咸丰六年四月庚子，P118）但他在该次战役中的具体行动尚不明朗，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所言“潘参将”，则是广东水师提标参将潘庆。两广总督叶名琛向朝廷奏报战事时，曾明确提到“当饬令水师提标中军参将潘庆等督带师拖各船，堵截东路之二沙尾”。[2] 地方志则有更详细的记载：“（咸丰）四年十一月，总督叶名琛檄从按察使沈棣辉① 剿佛山。议者请尽塞佛山诸河，专攻石壁。（潘）庆以石壁、围涌贼垒几遍，攻以舟，水道浅窄，贼援一集，不能退。群贼惟佛山陈开最强悍，方烧民居，两昼夜火未熄，必内变，宜乘机攻之，破开则群贼溃矣。沈从之，攻临海庙、高桥头诸垒，皆克。适曾琪车卑河之军陷，檄庆防东。贼五路昼夜攻省城，庆三胜之。贼收合赤冈山梁贼数万再逼河南，乡勇败，庆与陆兵夹击之，贼溃。”[23]（卷 15，列传，P1404）可知潘庆全程参与了后期平定广州河南洪兵一役，且颇有建树。这与图上所注内容，也是相符的。

总之，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 F.O.931/1911 与 F.O.931/1954 两幅舆图，与现存档案及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应形成于咸丰五年正月十八日到十九日间（即 1855 年 3 月 6 日-7 日），反映的是广东洪兵围攻广州之役后期清军与洪兵在河南殊死鏖战的情况。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关于广东地区的传统舆图，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对其逐一进行考释，将为我们提供更为详细、更为准确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咸丰年间广东洪兵围攻广州等重大地方史事的研究。

---

①志中所言“按察使沈棣辉”，有误。据叶名琛等奏折，沈棣辉时为“署盐运使奏补雷琼遗缺道”，而非“按察使”。简又文言为“肇罗道沈棣辉”（见《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 859 页），茅海建先生注意到沈棣辉于 1855 年 6 月方迁按察使，仍沿用“肇罗道”（见《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载《历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亦不尽准确。按沈棣辉于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命补肇罗道，不久“奏补雷琼遗缺道”，随后又署理广东盐运使。咸丰五年五月初七日命升广东按察使，同年六月二十日到任视事。

[参考文献]

[1] (清) 黄佛颐. 广州城坊志 [M] . 中国风土志丛刊 (55) [Z]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3.

[2] (清) 两广总督叶名琛, 广东巡抚柏贵. 沙湾等处剿贼大胜省河通行出力请保折 [A] . 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 [Z] . 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录副奏折" 档 (全宗号: 3, 案卷号: 9046, 件号: 27), 咸丰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奏, 五月初一日奉朱批.。

[3] 华林甫.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近代中国舆图 [J] . 地图, 2005, (1).

[4] 华林甫. 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 [J] . 历史研究, 2003, (2). 关于相关舆图对于咸丰年间广东洪兵起事研究的史料价值, 参见郑永华. 广东洪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初考——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两广洪兵起事舆图考释之一 [J] . 清史研究, 2006, (1).

[5] (清) 陈坤. 粤东剿匪纪略 [M] . 四库未收书辑刊 (3 辑第 13 册) [Z]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6] (清) 两广总督叶名琛, 广东巡抚柏贵. 沙湾等处匪船叠剿获胜折 [A] . 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 [Z] . 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录副奏折" 档 (全宗号: 3, 案卷号: 9046, 件号: 25), 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奏, 五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

[7] (清) 谭祖恩. 新会靖变识略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8] 沙茭二司有名逆首 [A] . 陈豆皮大, 系新造首匪, 年方六十余岁, 茭塘司石子头村人。伦敦: 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 [Z] . 档号: F.O.931/1089。

[9] (清) 李福泰, 史澄. (同治) 番禺县志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0] (清) 郑梦玉, 梁绍献. (同治) 南海县志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1] (清) 戴肇辰, 史澄. 广州府志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2] (清) 两广总督叶名琛, 广东巡抚柏贵. 省城西北大获胜仗贼巢廓清等由折 [A] . 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 [Z] . 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录副奏折" 档 (全宗号: 3, 案卷号: 9044, 件号: 30),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奏,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

[13] 遐迩贯珍 [A] . 简又文. 太平天国全史 [M] .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62.

[14] [美] 卫三畏. 中国总论 [A] . 简又文. 太平天国全史 [M] . 香港: 简氏猛进书屋, 1962.

[15] 清文宗实录 (三) [A] . 清实录 (第 42 册) [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 采访册 [A] . (清) 朱庆澜等. 广东通志稿 (前事略) [M] . 北京: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1.

[17] (清) 麦秉钧. 鹤山麦氏族谱及舆图记事论略 [A] . 鹤山麦氏族谱 (抄本)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8] 叶祖扶供词 [A] . 伦敦: 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 [Z] . 档号: F.O.931/1558.

[19] 林敬联供词 [A]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0] (清) 欧阳溟. 正月十九日官军平新造斩获数万 [A] . 海鹤巢诗草 [M] . 诗中云: "号令寂如水, 马行肃中衢。潜师抵虎穴, 仰见山月孤", 可见出兵乃在夜间。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1] 剿匪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员弁拟请奖励清折 [A] . 伦敦: 英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 [Z] . 档号: F.O.931/1549.

[22] 清文宗实录 (四) [A] . 清实录 (第 43 册) [Z]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23] (清) 田明耀, 陈澧. 香山县志 [M] . 广东洪兵起义史料 [Z]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郭秀文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

——“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 李 强

[摘 要] 公元 1044 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关键词] 进奏院狱 政治博弈 文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03-07

公元 1044 年秋冬之际，北宋著名诗人苏舜钦与其馆阁同僚们，利用祠神的机会，在进奏院用“鬻故纸公钱”召妓饮酒，结果受到严厉查处，《宋史》卷 422 载“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北宋一般职务犯罪案件，成为当时朝野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虽然根据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这样一个牵连甚广的案件背后也有专制社会难免的朝堂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使我们忽视进奏院狱对北宋文人心态发展的影响，这也恰恰是“进奏院狱”在中国文人心态史研究中失语的原因。“进奏院狱”这个看似普通的经济案子，给宋代文人留下难以抹平的记忆，使他们每每回忆起，总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这起案件有着不同的解读，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中国文人心态的理想视角。但是笔者更倾向于对事件本身的追问，它为什么会在 1044 年这样一个与北宋庆历革新几乎同步的时刻发生？为什么会遭到最高统治者如此严厉的打击？中国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如一条涓涓细流，蜿蜒前行，自唐而宋，文人作为一个逐渐成长并壮大的阶层，已渐渐融入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主流，他们的心态发生什么变化呢？而 1044 年一群文人的酣畅一醉，为一些专制秩序守护者所不容，又给此后的文人心态造成何种影响？下文试析之。

一、进奏院狱的文化冲击

进奏院狱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政府官员犯罪案件，考察这一时期的法律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进奏院狱的要点在于“探文”，而并不在于突破“法之常科”。此案不仅在当时成为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也对后世文人精神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宋人笔记和《宋史》也多次谈到“邸狱”。那么一个以所谓“监守自盗”区区“四五十索”的小经济案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案件发生的地点，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东京汴梁。开封号称七朝古都，战国时期的魏和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以此为都。而使开封真正繁荣兴旺的时期是北宋，彼时汴梁城的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其繁荣盛况在时人特别是南宋文人的著作中得到详

作者简介 李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细的描述。如王安石就曾写到，当时从事“占卜”行当的人，“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①] 京城里以算命为业的人就有上万，汴梁城市生活之浮华可见一斑。正因为当时汴梁是北宋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中心，京城里的新动向，能够很快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四方。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云，“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破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有书君谟诗在壁上。”[1](卷 2) 石介的《庆历圣德颂》，“士有自京师来者”，把这篇作品传到偏远的蜀地“乡校”，引起时为“总角”学童苏轼对诗中歌颂者的向往与钦佩。[2](卷 24) 由上面两例，即可知汴梁政治文化事件对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影响。至于传播手段，除了上述的“密市以还”、书于驿馆之壁、士人传播等私人途径之外，还有不少公共传播途径。如本文讨论的进奏院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换中心，其编行的“邸报”虽然还不具有新闻纸的特性，但毕竟也是一个较为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各地方政府在汴梁驻有办事机构，往往也承担了信息传播的功能。因此，随着官僚政府的健全、中央集权的加强，首都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具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而当时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造纸业和印刷技术在宋代的发展，使开封政治文化事件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都大大提高，这些因素也为进奏院事件影响的有效传播提供了条件。

进奏院狱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决定了此案的文化冲击力远大于其法律上的震慑与警示。史载：“监进奏院刘巽、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江休复监蔡州税，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为秘书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署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3](卷 153) 根据这份文件，共有 12 个人涉案。又据《东轩笔录》，诗人梅尧臣也参与其中，并受到了处罚。另外还有陆经似并未在当时受到严惩，“进奏院狱”不久后监察御史刘元瑜因他事弹劾陆经，诏王翼往按其罪，这才把“进奏院狱”的账也算进去，“并以经前与进奏院祠神会坐之”，责授袁州别驾。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确切材料而言，进奏院狱涉案士人有姓名可考的达 14 人之多。[②] 这份名单大部分都是当时的“文化名人”，苏舜钦成名较早，刁约、王洙、江休复、章岷、吕溱、宋敏求、梅尧臣等也都是一代名士，虽然除王洙在当年四月，因参与监修《国朝会要》得兼直龙图阁、赐三品服外，其他各人官阶并不高，但其所居的位置和已有的声誉，决定了他们是新型文化力量的代表，属于这个城市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虽然还没有站到政治舞台中心，但朝野已经对他们的政治前途习惯性地寄予厚望。而奏邸狱兴，时人有“同时俊彦，为之一空”、[4](卷 4)“一时英俊，斥逐殆尽”、[5](卷 5)“台馆为之一空”[6](卷下) 之叹。而馆阁之臣对北宋政治的重要性，学者已多有论及，此不赘述。[③]

此外，进奏院狱产生巨大冲击波的原因还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庆历四年秋冬之际，正是范仲淹等人的革新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虽然笔者认为，北宋庆历年间的所谓朋党之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后人以朋党二元思维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确实存在种种党议的迹象，而君子小人之争确实在庆历年间得以发展。这样的一场党议与其说是产生于对政治的不同理解，毋宁说是士人个体性格差异所致。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倾向于把进奏院狱和朝廷正邪势力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这也使“进奏院狱”越来越向政治文化靠拢，而它本身作为一个经济案件，却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需要强调的是，“进奏院狱”虽然与党议背景结合，甚至决定了它在后来岁月里被诠释的主流走向，但是这个案件具有极强的自述性，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解读，并不能改变它自身的文本意义。本文所关注的就是其超越文人集团内部纠纷的思想史意义，而这部分意义往往在朋党政治解读下失语。

二、政治生态与文人政治博弈

---

① 《卜说》，《王安石集》卷 70。按，此文中之“卞”和“卜”因版本不同而互换。笔者认为，按照古人一般命题习惯，题目当为《卜说》为宜，因少见专文辨正，故此及之。

②如果再详于钩索，这个数据还可能增加。笔者近日发现有专文论及，如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 年第 5 期，可资参考。

③可参见陈元锋博士新著《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在了解进奏院狱得以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和政治文化原因后，我们有理由进一步追问，进奏院狱为什么会发生？这件案子固然与仁宗朝惩治经济腐败没有多大关系，但也并不完全如当事者和后人所言，是出于台谏之争或借机打击当时的宰相杜衍，甚至把它看作是保守势力对改革派一次别有用心的攻击。要了解进奏院狱的发生，还需要从中国政治思想和文人心态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讨论，这就涉及到皇权与士权在北宋历史语境下构成的政治生态。

治思想史的学者习惯上把皇权士权之争看作“势”与“道”的冲突。二者之间确实有着紧密联系，笔者所谓的“士权”实际上是士人对皇权专制的一种制衡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以“道”的名义，但有时也可能突破这层界限。就前者而言，我们可以在仁宗朝找到很多具体的事例，如仁宗亲政之初，因琐事欲废掉郭皇后，引起了诸多朝臣的反抗，甚至激起并非“太平美事”的“伏阁”事件，以孔道辅、范仲淹等人为首的“伏阁”群臣就是在维护“道”的名义下，向皇帝专制提出挑战的。但这毕竟是直接涉及人事政治的激烈事件，引起了仁宗极大的不满，伏阁诸贤的迅速被贬，足以说明仁宗当时的心情。刘太后作为北宋第一个主政的女政治家，对北宋“祖宗家法”体系的形成确实功莫大焉，她对士大夫的宽容影响了整个仁宗朝的政风。宋仁宗亲政后，这种涵养于太后主政期间的直谏之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范仲淹就是当时士风的标帜。但是士权的迅速扩张，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朋党隐患，还是引起了仁宗的高度警惕。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后，朝廷的“禁越职言事令”就发布了。若不是因为宝元元年（1038 年）正月一声不合时节的雷声，士大夫的话语权还会继续被剥夺。相对而言，仁宗更在乎对天道的尊崇，无论是出于表演还是发自内心的信仰，其产生的政治效果都是一样的。大臣按传统习惯把自然灾异与朝廷时政联系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政见，而这样的表达方式总是能得到皇帝的尊重，这实际上也成为士人向皇帝决策质疑最惯用和最正当的手法。范仲淹的最后一次起复，就与苏舜钦、叶清臣等人论灾异的奏疏有很大关系，虽然仁宗出于政治考虑专门下令禁止百官翻范仲淹的旧案，但范仲淹复出的呼声已不可阻挡了。范仲淹的起复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范仲淹所倡导的笃于自信、不避权势的士风获得最高当局的默认；二是士权在与皇权的对话中，借助天道的力量取得了暂时的上风。士人将朝廷人事安排附着于天道，意见有时候听起来虽十分刺耳，但并不总是引起专制君主的反感，大多数情况下会起到很好的说服效果，即使皇帝无法遵照执行，最多是“疏入不报”，并不能对士人本身利益产生较大影响。这样，皇权与士权在北宋逐渐成熟的文人社会中，构成了独特的文人政治生态景观，双方互相补充，共同维系着专制政权的运作与发展。而如果士人们的参政自觉到了不假借“天人合一”的思路作为政治批判手段，而是以圣人的传道者自居，公然干扰皇帝的决策，甚至完全逼其收回成命，情形就有所不同。文人的这种政治博弈行为，可能给业已逐步稳定的文人政治生态带来了考验。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仅涉及经济层面，还只是维护皇家眼前的既得利益，由此产生的争执往往是技术性的，实际上与帝王权威的损益无关紧要；如果仅以“君子小人”之论，来直接干涉皇帝的人事任命，就很容易动摇皇权的根本。而在一个文人逐渐受尊崇的年代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总是难免的，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7](卷上) 一方面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士权在皇权专制下的必然悲剧命运。

谏诤是古代有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从政道德，纳谏是有着足够智慧和“角色意识”帝王的南面之术，二者之间构成的政治生态并不稳定，存在一个博弈过程。发生于 11 世纪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的政治博弈现象，与纳什上个世纪提出的静态博弈有深刻的不同，但它们都能解决一个问题，在经济学称之为利益均衡，而在古代政治学领域，笔者称之为“专制时代文人政治的和谐”。因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一问题，此不赘述。要言之，在一个逐渐成熟的官僚体制中，这特殊的矛盾双方，在找到共同最优战略后达到利益均衡，最优战略的形成就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在专制制度下，这样的博弈并非多多益善。南宋太学生陈东多次“出位议政”、最终导致被高宗赵构杀害，更是说明了皇权本身并没有多少耐心、士权得以生存的土壤并不总是温情脉脉。仁宗亲政以来，采取了积极纳谏的姿态，这使士人们的政治兴趣高涨，个性也得到张

扬。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对皇帝权威的削弱，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理性的。可是历史并不总是按既有的逻辑理性发展，在皇权与士权组成的政治生态中，皇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符号，而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个人品性都有很大变数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凌驾于制度之上，是专制社会政治生态系统中最脆弱的一环，除非现存制度是保证自己可触摸和智力可预见的切身利益，他才会积极主动地去遵守，否则他会使再完美精致的制度流于形式，这也是中国专制时代制度并不能真正保证社会发展的根源所在。相对于君主阶层，士人阶层就其整体素质而言是个比较固定的群体，个体的差异性和某一时段的趣尚，并不能改变这一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相对稳固性和发展趋势。但是这个群体在皇权与士权组成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属于一个他变量，具有较大的支应能力，这也是中国专制政治能绵延2000年才被最终消灭的原因。随着思想和人性的进步，他们会要求和期待更多的公平与公正，这种公平与公正往往不仅仅是有权利借助天道灾异来实现，而应该具有更多的政治表现形式。

仁宗是个有着较强“角色意识”的皇帝，为了加强对政府决策是否合理的监督，他特地恢复或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北宋的台谏制度正是在仁宗时期得到完善，其相对宰执群体的独立性得到保证。在这种独立性没有被滥用之前，北宋的文人政治体现出专制社会少有的民主萌芽。仁宗不仅在制度上重视言职，在具体的事件中也对台谏之臣抱有极大的宽容和好感，虽然后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但仁宗还是以虚心纳谏的形象为后世所接受。御史虽然主要职责是监察百僚，并不直接质疑皇帝，但仁宗朝的御史们也很快突破了这一职能界限，取得与谏官相似或等同的职责和权利。就在苏舜钦祠神会的当月，殿中侍御史赵祐言“台谏之官，俱职言事，台官则具奏候旨，谏官则直牒阁门，事体有殊，欲望许依谏官例，直牒阁门。”朝廷答应了赵祐的请求，而正是这个赵祐在进奏院狱中坚持要求严办与会诸人。[①]士权的逐渐扩大，势必要影响到皇权的稳定，尤其是这样的权力落到了所谓“轻薄”士人手中，他们作为士人中最具活力与政治变数的群体，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改变政治，但却有着极强的舆论影响力量，而这是仁宗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所不能忍受的。

皇权与士权之间又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持久的平衡，它们之间的短暂共处取决于皇帝和士人的博弈结果，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阶层政治素质的不确定性，使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政治博弈是一种存在很大不可预见性的动态博弈，每一次博弈都会带来新的均衡。是谁来最终打破这个均衡呢？对这个问题做出更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学界尚需更多的研究成果。目前宋学研究尚未真正触及这一内核问题，对北宋文人政治的认识，也有不少地方还停留在北宋士大夫的认识水平，缺乏对古代文人政治的省察。士人群体自身也具有极强的破坏因素，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尤其是其文人性格的一面得到凸显时。这也会使士权的一部分，朝着为皇权和传统政治伦理所不能容忍的方向发展。文人之性不离浪漫，文人之病源于轻薄，而在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中，二者又经常纠缠不清，特别是文人担任起士大夫的角色，浪漫无节，则几乎等同于政治上的轻薄。文人的自由议政，实际上是假定皇权的容忍与不作为，高涨的士风，使文人以不严肃的方式讨论朝廷大事所隐含的伦理危险，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不可置信威胁，从而过低地估计了皇权的反应。而仁宗对进奏院涉案士人的严厉处理，从士大夫心态发展史上来看，实际上也是对士人发布一种新信息或是对被忽略信息的重新打造，使处于政治漩涡中心及其边缘的文人，重新设计自己的行动策略。进奏院狱

①赵祐在进奏院狱里所扮演的角色值得研究。据晁补之撰写的《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他与苏舜钦关系十分融洽，“武功苏子美以诗豪，少所许可，与唱和盈笥”，但据苏舜钦自己对“进奏院狱”的叙述，则赵祐在此案中攻击甚力。而在其后的史料笔记中，这个名字在“进奏院狱”事件中却消失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政治文化现象。笔者将在《“进奏院狱”考论》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进奏院狱”发生时，按苏舜钦的说法是御史台“诸台益忿，列章墙进”、“全台墙进，取必于君”，见于苏舜钦《与欧阳公书》、《上集贤文相书》。据笔者粗略考证，是时正在台臣职位上的有王拱辰、赵祐、包拯、李京、梅挚、李京、鱼周询、刘元瑜、赵及、刘湜、王平等人，把他们都当作范仲淹新政的反对派似不妥。就在当年三月，台臣王拱辰、梅挚、刘湜还参与支持范仲淹推行的教育改革，并且苏舜钦的入选馆臣，亦有王拱辰的推荐之力。鱼周询亦有官声，多次得到范仲淹的举荐。至于包拯、李京，其凛凛风节，更不待言。关于这一问题，尚有研究的空间，限于篇幅，此处未能尽述。

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找不到文人们意气风发的议政身影，足以说明不可置信威胁变得可置信后，文人是怎样重新规范自己的行为。

三、北宋文人角色定位

作为皇权辅助者的士阶层，其自身的政治角色随着历史推演，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变化的轨迹是：作为政权配角的士人们，在行使皇权和道义赋予自己的使命时，要么是固守本职，做一名循规蹈矩的良吏，或者是以天下为怀，做一名“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的皇权最有效率的合作者。

如果只是作为帝国的政治工具，文人的各安其职、不出位论政未尝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实际上这样的想法也存在于北宋的许多士大夫心中。但是事情往往是，在还没有取得足够的地位时，他们会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取得声誉或者获得最高统治层的重视，而一旦执掌了政权，成了士人层批判的对象时，他们更习惯于采取因循持重的政治策略，对权力中心之外的“出位”苗头，表示坚决反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实用主义心理，是构成这一特殊政治景观的根源，纵观整个古代文人政治发展史，极少有超越此窠臼者。仁宗时期的侍御史知杂事郭申锡奏劾张贵妃追册，还弹劾过张尧佐、陈执中、余靖、高若讷等大臣，宋仁宗就曾对他说：“近世士大夫，方未达时，好指陈时事，及被进用则不然。是资言以进耳。卿勿为也。”（《宋史》卷 330）由此可见，仁宗还是具有相当的政治智慧的。在整个仁宗朝，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宰执之臣能不能在府邸会见宾客，这个看似很简单的事却引起了士人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我们显然不可能以党派政见的不同来划分，因为争论的双方有时恰恰是我们习惯上认同为所谓的“改革派”。这样一个关于制度的争论，实际上试图解决士人如何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以及表达又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即使是最激进的改革派，其灵魂深处也有最保守的一面，不愿意看到一股不受自己权力所把握的批判力量的存在，特别是他们怀疑这样的力量可能被滥用，以至于破坏自己的既得利益时。仁宗虽然以纳谏知名，但也经常处于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他要尽力示人以明主形象，不得不用传统帝王道德来规范、设计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这种士人“出位”议政的力量，汇聚成不可控制的洪流。这两种思想构成的张力，不断地考验着仁宗的政治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出位”对获得更高的声誉和地位往往是有效的，韩琦、蔡襄的迅速进入权力中心，与其出位言事有很大的关系。《习学记言》里的这段议论颇值得注意：“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势始轻矣。虽贤否邪正不同，要为以下攻上为名节地可也，而未知为国家计也。然范、韩既以此取胜，及其自得用，台谏侍从方袭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则是非锋起，哗然不安。”[8](卷 47) 王夫之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样的看法为我们解读北宋文人心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进奏院狱中涉案人员被严厉打击，与当局对士人“出位”行为的厌恶有关，不仅仅是因为饮酒轻薄。虽然饮酒轻薄的行为也为保守的高级官员所反感，但毕竟还能够被容忍，如名臣郑戬等人通宵畅饮曾引起仁宗的不满，进奏院狱涉案士人中的刁约就以嗜酒而为仁宗所厌，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贬斥。仁宗对文人“出位议政”行为的不满由来已久，进奏院狱只是一个集中爆发。此案发生时具有超派别性，一定程度上出于士人阶层内部对传统政治伦理的一种坚守思潮。案件在发生的当时并没有引发巨大的争议，其反对力量的声音是那样弱小，如果不与后来的朋党之争联系起来，这个案件会很快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庆历三年、四年是仁宗朝政治的一个关键点，那么在这之前，仁宗对文人和以文人为主要社会力量形成的士风有什么看法呢？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进奏院狱会有很大的帮助。天圣九年（1031 年）十月，应当时的侍御史知杂事刘随请求，下诏申儆庶官。其略曰：

> 比者搢绅之间，名节罔励，矜劳者掠美以近名，希进者行险以徼宠，分屏翰者或奏请之靡厌，任案察者或宽纵之为得；贪而无耻，故务营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用稽彝训，申儆群伦，苟少冒于官箴，将自投于公宪。[3](卷 110)

这是仁宗朝较早的以朝廷诏书的形式发布整饬士风的文件。笔者在进行“进奏院狱”研究时，发现不少材料谈到仁宗的“大怒”。纵观仁宗 42 年的皇帝生涯，他很少在朝臣面前表现出大怒的记录，即使王拱辰抓

扯他的龙袍、余靖喷他一脸唾沫，他也最多在后宫发发牢骚而已。因此，至少在这一事件中，仁宗是矛盾的主导力量似无疑义。明道二年（1033 年）十月，仁宗对辅臣说：“近岁进士所试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可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取之。”[3](卷 112) 虽然看起来讨论的是诗赋问题，但实际上古人常常将文品和人品联系到一起来看，因此仁宗在此也有对文人浮华之风的不满。这些材料说明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对文人“放肆狂率，实为害教”轻薄之风的调整与警告，而其核心则是对文人以不合法的手段“出位议政”之风的坚决抑止。进奏院狱结案后不久，朝廷诏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朋党者和“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的“属文之人”，很清楚地表现了仁宗规范文人行为的目的。所谓“讪上”，即是对朝政的非正当渠道批评，所谓“行怪”，大抵是文人狂放浪漫之举，这里面当然包括饮酒狂歌之事。而所谓“属文之人”，又特指那些以文名显，而又暂时没有处在权力中心的文人。把这份诏书和奏邸事件放在同一个研究平台上，则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四、基于进奏院狱的北宋文人心态描述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进奏院狱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犯罪案件，这已成学界共识；但是它也不仅仅是对文人“越礼”行为的打击与调整，把它当作文人不同政治集团间的政治倾轧也与史实不符。“进奏院狱”与仁宗朝的政治背景和文人心态发展有很大关联，它不仅仅是给十几个文人带来了命运的波澜，而是影响了当时整个文人阶层的心态。北宋的文人心态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话题。宋太祖以武立国，深知武将擅权之弊，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虽然他从内心深处看不起文人，但还是懂得文人对巩固专制政权的重要性。人们习惯上把宋代重视文教、扩大科举考试规模，当作宋代右文的表现，但右文政策和相关社会风气的养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关于宋初朝廷尊崇文人的文字记载不少，大多材料记载都说明这种风气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似乎一个天才的统治者是这一风气形成的源头。如果我们换一个研究思路，多观察一些北宋前期普通文人心理，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文人的自觉追求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相辅相成。

为什么这样一个过程发生在宋初，而不是更早的唐代或者宋以后的朝代？对一个几成文史界公论的问题进行从发生学上的探讨，有利于我们触摸事物的本质，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其历史走向。葛兆光先生在谈到宋初重建国家秩序时认为：“尽管平定天下的武功已经在疆域上支持了王朝存在的现实，‘杯酒释兵权’的谋略已经在制度上相当有效地解除了来自内部的威胁，可是，在权力总是需要证明自身‘奉天承运’的古代中国，也许还需要一系列的文化策略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仿佛就像古人所说：‘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天下’。”[9](P261) 这实际上也是换代之常态，是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治逐渐走向官僚政治之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大变动后的稳定，加速了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人官僚政治一旦形成，会产生巨大的惰性。文人人格的自由发展遭遇专制政权的暴力调整，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异化。这就是庆历四年进奏院狱发生的思想史背景。宋代文人自由之风气在仁宗朝获得较充分的展现，但是其涵养却自宋初即已开始。如果探究其精神源头，则可上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

文人阶层的真正形成和官僚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宋代的文人有了不同于前代的特点，科举制的完善与开放后，取士不问乡贯门第，大量贫寒之士有机会通过入仕实现抱负，命运和自己的努力紧密相关成为一种可把握的实在，门第在政治舞台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淡化。即使没有通过科举加入到政权队伍，文人们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讨论朝政得失。这样的政治风气逐渐强化，在仁宗朝达到极致，并且知识分子表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这样的松散士大夫组织，最直接的纽带就是文学。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全社会对文人的尊崇，使北宋文人有资格和条件过上诗酒风流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同时也是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宋代文人浪漫的性格得到极大的张扬，然而这种浪漫如果与政治结缘，往往会产生灾难。

在仁宗早期，文人之间的群体活动比较活跃，但是这样的活动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背景，“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10]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阶层本身的政治素质并不高，文学能力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对美好生活的梦想与追求，而并不是真正作为

道的本原或其传播工具。另一方面，这样的文人集会带有浓厚的传统贵族阶层雅集遗风，是对现实生活的享受。但是随着文人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亦有所变化。天圣年间欧阳修在钱惟演幕中时，其诗酒生活受到长官的支持与放纵，并以“洛中七友”、“八老”这样的名头自诩或互相品评，在这样的活动中，文学是形式同时也是内容。但是，庆历年间的欧阳修竟在宰执大臣的诗酒集会上以文学作批判手段，以此来显示对时政的关心。[①] 造成这种现象不能仅仅理解成政治军事形势的压迫，这也与仁宗朝政治边缘文人积极向政治渗透有关，这样的渗透反映了文人心态的变化，它们的关怀渐渐突破自己的现实生活，而更关注起国家的命运。文人对政治的关怀并不总是理性的，或者说更多的是出于个体理性而非集体理性。由此带来的另一个政治现象是所谓的“谤政”。如果这样的行为远离权力中心，还不会引起统治者的更多关注，如“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②] 仁宗朝更有所谓的“东州逸党”，虽然更倾向于个体行为而非政治介入，但因“谤政”之俗和稷下学风的悠久传统，亦不可能完全游离于政治之上。他们与政治精英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生活在都城的外围地区，但他们从个体行为和社会舆论两个方面瓦解着儒家固有的政治伦理。他们并没有受到统治者的打击，反对的力量恰恰是来自士人内部。进奏院祠神会上，我们能看到京东士人的影子。在进奏院狱祠神会之前几日，据苏舜钦自己在书信中记载，他与几位青年新进就有过在酒席上激烈讨论朝政的事情，而且他自己也承认是以不严肃的“戏谑”态度。当时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台臣的注意。当同样的事情以更大的规模发生在祠神会上时，激烈的矫正行为爆发了。

专制政权中传统政治伦理的守望者对文人独立人格发展的暴力矫正，虽然不可能使中国文人的淑世情怀释然冰解，但确实对权力中心之外文人的政治热情泼了一头冷水。“宜回天地入悲吟”是这样文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进奏院狱主角苏舜钦的“悲吟”，并不是中国传统行吟精神的回归，而是开放后的封闭，奔涌后的壅塞，舒展后的束缚。这样的“悲吟”倾注了更多的精神内涵，体现出不同于前代文人的理性与忧郁。我们不能说进奏院狱完全改变了文人心态和宋代文学走向，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略它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不能被当事者倾向性言说所误导，更不能站在北宋“君子之党”的立场上改判“进奏院狱”的结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介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放眼整个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历程，至少我们可以由“进奏院狱”为视角，描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宋代文人心路历程的痕迹。这样的痕迹有可能正是被我们所经常忽略的，而恰恰对历史的解读与反思有着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宋] 王闢之. 渑水燕谈录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范文正公文集序 [A] . 东坡集 [C] .

[3] [宋]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Z] . 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宋] 魏泰. 东轩笔录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耆旧续闻 [M] .

[6] [宋] 文莹. 湘山野录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宋] 叶梦得. 避暑录话 [M] . 四库全书本.

[8] [宋] 叶适. 习学记言 [M] . 北京：中华书局，1977.

[9]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 2 卷）[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0] [宋] 欧阳修. 西湖念语 [A] . 欧阳修全集 [C] . 北京：中华书局，2001.

责任编辑：杨向艳

① 《东轩笔录》卷 11：“永叔赋 《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生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② 《宋史》卷 343 《许将传》，原文是褒扬许将的政绩，并不认同所谓“郓俗”，许将善治的结果是“将虽弗制，其俗自息”。

论晚唐宵禁制度的松弛及其文化影响

◎ 曹胜高

[摘 要] 唐宋之际宵禁制度一度被废弛，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直接原因是元宵灯节开禁所鼓舞的下层民众的娱乐需求，促使民间娱乐业初步繁荣。在此背景下，文化娱乐逐渐向着市民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也导致了文学情趣的变化，成为宋元文学风尚转变的先导。

[关键词] 晚唐 宵禁制度 废弛 市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10-06

晚唐五代时期，一直严格执行的宵禁制度逐渐松懈，秦汉以来长期固定的以封闭分隔为特征的里坊布局，开始向市坊布局转变。宵禁的解除，夜市的繁荣，不仅是城市功能的调整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更标志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起。那些原先只在特定区域服务于上层官僚、士人的娱乐活动，开始向普通民众下行，以适应娱乐消遣的需要。宵禁制度的解除所促成的市民娱乐需求，是唐宋之际文化转变的深刻背景，特别是其中说话、俗讲、曲子词以及早期戏曲等到有娱乐性质的文学形态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的变更。这一制度的变迁是揭示唐宋市民文化形成的关键，但历来学术界注意不够，仅有少数在风俗史、经济史和文学史研究中作为背景材料简单提及，并没有从制度层面加以系统探讨。[①] 本文试分析之。

一、唐宋之际宵禁制度的变革

宵禁制度，起源甚早。《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汉代亦行宵禁，由执金吾负责，《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索隐引《汉旧仪》：“宿卫郎官分五夜诣呵，呵夜行者诣也。”《史记》卷 109《李将军列传》载李广夜饮而归，至霸陵亭，霸陵尉醉，便呵斥李广。李广虽自报家门，霸陵尉仍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李广只好宿于亭下。《三国志·魏书》卷 1《武帝纪》引《曹瞒传》：“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操能以违反宵禁棒杀皇帝宠臣，足见两汉时宵禁之严。《三国志·魏书》卷 26《田豫传》辞官表中说：“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夜行来喻罪责，可知汉魏律令于夜禁之重视。《南齐书》卷 22《豫章文献王传》载萧嶷与齐武帝“同辇夜归，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嶷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身为皇帝的萧赜仍担心夜行遭到官员的呵斥，说明在南朝宵禁并无松弛。《北齐书》卷 16《段荣传附子孝言传》言段孝言“曾夜行，过其宾客宋孝王家宿，唤坊民防援，不时应赴，遂拷杀之。”骄奢放逸的段孝言召唤坊民增援，将不能按时抵达者拷打而死，既可说明段氏的凶残，也可看到当时聚坊民以备盗的组织模式以及宵禁的严厉。

依《唐律》，唐时夜禁甚严。《唐书·百官志》载：“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鼚

作者简介 曹胜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亚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吉林 长春，130024）。

①如葛兆光：《严昏晓之节——古代中国关于白天与夜晚观念的思想史分析》中讨论古代时间观念时提及，《台大历史学报》第 32 期，2003 年 12 月。金素贞、罗猛：《中西文明变迁的制度经济学诠释浅析》中讨论城市经济时提及，参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

譟，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由专人负责宵禁。《唐律疏议》卷 26《杂律》“越州镇戍城垣”条注疏引《监门式》：“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若公使赍文牒者，听。其有婚嫁，亦听。”对于宫殿、城垣、武库等，夜禁尤严。《唐律》“夜禁宫殿出入”条：“夜禁宫殿出入诸于宫殿门虽有籍，皆不得夜出入。若夜入者，以阑入论；无籍入者，加二等；即持仗入殿门者，绞。夜出者，杖八十。”若夜行者不能被发觉，值夜者要受处分：“诸宫内外行夜，若有犯法，行夜主司不觉，减守卫者罪二等。”故立制严格，以禁夜行，仅奉敕方可开门，且验符严格。疏议又引《监门式》：“受敕人具录须开之门，并入出人帐，宣敕送中书，中书宣送门下。其宫内诸门，城门郎与见直诸卫及监门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折冲、果毅内各一人，俱诣合覆奏。御注听，即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违者处以严刑，“诸奉敕以合符夜开宫殿门，符虽合，不勘而开者，徒三年；若勘符不合而为开者，流二千里；其不承敕而擅开闭者，绞。”

唐长安、洛阳以里坊布局，每坊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坊角设置候铺。夜晚关闭坊门，严禁出入，且各宫城门、皇城门、坊里门、外郭门，夜间层层设卡，禁绝行人。《监门式》云：“驾在大内，宫城门及皇城门钥匙，每去夜八刻出闭门，二更二点进入。京城门钥，每去夜十三刻出闭门，二更二点进入。”若帝王不在皇宫，则“宫城门及皇城门，四更二点出钥开门。京城门，四更一点出钥开门。”其余州县，亦夜下管钥，禁止出入。

刘肃撰《大唐新语》卷 10《厘革》言：“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告今注》所载大致类同，言“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夜以鼓声警戒。韦述《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旧唐书》卷 71《杨贵妃传》载杨贵妃因与唐玄宗有小隙，被遣归杨宅，玄宗烦乱，高力士夜间迎归，因正行宵禁，便只好夜间打开禁闭之坊门回宫：“是夜，开安兴里门入内，妃伏地谢罪，上欢然慰抚。”《新唐书》卷 76《杨贵妃传》也载“是夕，请召妃还，下钥安兴坊门驰入第”。坊里布局是唐朝以前都城布局的基本结构，待至夜暮，商铺停业，坊门紧闭，百姓居于里间，全城禁行，禁军巡行以备非常。此一制度于中唐时依然严循。《新唐书》卷 207《刘贞亮传》载其治理京都时，“郭旻醉触夜禁”，便“杖杀之”。中唐元结《欸乃曲五首》之一写：“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即使城外夜行，也要被执行宵禁的守吏严加盘问。《太平广记》卷 254《嘲诮》载刘行敏为长安令时，有崔生酒后犯夜禁，被缚至五更，刘行敏上朝遇到时，才令解缚，并作《嘲崔生》：“崔生犯夜行，武候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言其犯夜遭处置之狼狈。

然至僖宗以后，宵禁逐渐松弛。虽无直接的诏告，却能从载述中明其踪迹。《唐语林》卷 2 载武宗时，王式初为京兆尹，“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式过之驻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献于马前，……式取而饮之。”夜晚当街聚众铺设祠乐，王式身为京兆尹视而不见。《新唐书》卷 187《王重荣传》载：

> 重荣以父任为列校，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主何察。时两军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还，诉于中尉杨玄寔，玄寔怒，执重荣让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执者奸盗，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状。玄寔叹曰：“非尔明辨，孰由知之？”更诿于府，擢右署。重荣多权诡，众所严惮，虽主帅莫不下之。稍迁行军司马。

此事发生于僖宗年间，尽管王重荣与杨玄寔的见解不同，但他们对犯禁军士的处理，相对于中唐时期的“杖杀”等处罚，则宽容得多。而且犯禁士兵还能向上级告状，可知此时的宵禁并未严格执行。同时期任谏议大夫知制诰的萧廪，“请厉止夜行以备贼谍”。[1]（卷 101，萧廪传）若京城宵禁严格如初盛唐，萧廪不比专门上奏以求强化，且若仍未律令，只需重申而已。这说明熹宗时期京城已不禁夜行，故萧廪认为需加强以备

盗。刘瑑传载其为河南尹、宣武军节度使时，“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内以安。”[1](卷 182，《刘瑑传》)由此可见，在僖宗时期，宵禁无论在京城、地方，已经不再成为严格执行的禁令，而由各地官吏自行处置。天复三年（903 年），皇城使奏请严肃夜禁：“伏以皇城之内，咫尺禁闱，晨夜巡警，固须清肃。伏乞准敕条，漏鼓声绝后，禁断人行。今据军人百姓，更点动后，尚恣夜行。特乞圣慈再下六军止绝。”京城宵禁也松弛已久。由于长期宵禁松弛，朱泚在长安时因与作战需要“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反倒使百姓不习惯，以致“士下惴恐”。[1](卷 225，《朱泚传》)可以认为，开宵禁是晚唐时期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变革，而这正是推动市民文化得以勃兴的一个契机。

五代时期，宵禁制度再无恢复。《旧五代史·唐书》卷 32《庄宗纪》载后唐同光二年（924 年），唐庄宗根据有司的建议，因“荧惑犯星二度，星周分也，请依法禳之。于京城四门悬东流水一罂，兼令都市严备盗火，止绝夜行”。此事在秋天，需要另外提出画区域宵禁，说明后唐都城并无严格执行宵禁制度。《新五代史》卷 65《南汉世家·刘隐世家附龚子玢世家》言刘龚尚在殡中，刘玢就“衣墨缞与倡女夜行，出入民家”。后汉也并无严格宵禁，娼女、民家与官宦之间来往自由。①

至北宋，经过改建的汴京打破了传统的坊市布局，允许市民在沿街开店设铺，尽管至道元年（995 年）和咸平中（998-1003 年）虽曾试图恢复坊市，却未能成功。仁宗时期，便推倒坊墙与市墙，实现坊市合一。由于临街摆摊，坊中开铺，易于打破交易时间，形成夜市。北宋前期，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 3 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此前都市严格的“宵禁”制度，在北宋初期一度被取消。《宋史》卷 292《张观传》记载张观知开封府时，有人告发他人“犯夜禁”，张观反问道：“有人见否？”民众传为笑谈。这说明在北宋初年，虽然城门夜禁仍维持，但城内已不再靠宵禁维护治安了。

宵禁制度在晚唐五代的松弛、在北宋的废弛，是中国城防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商业形态，促成了夜市的发展，使商品贸易的时间延长，刺激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而且也标志着市民娱乐愿望得到重视，随着市民阶层繁荣起来的民间娱乐业得以长足发展，以满足普通市民娱乐的文艺形式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契机。这一时期迅速生成并繁荣的市民文化，成为唐宋时期文学演进的驱动力。

二、宵禁制度废弛的社会及历史背景

晚唐五代宵禁制度的废弛，导源于上元灯节之刺激，促成于经济环境之变革。

隋唐时期，解除宵禁之举多在上元灯节。上元解除宵禁，自隋已始。《隋书》卷 62《柳彧传》载柳彧见“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便上书请求禁绝。说明隋朝正月十五开宵禁已成定制，初唐循其例。武后时期苏味道作《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使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言上元开禁以供吏民游赏。中宗、睿宗时，上元夜热闹非凡。中宗于景龙四年（710 年）上元夜，“与皇后微行观灯，因幸中书令萧至忠之第。是夜，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丁卯夜，又微行看灯。”[2](卷 7，《中宗纪》)睿宗于先天二年（713 年），“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2](卷 7，《睿宗纪》)《册府元龟》卷 205 引《朝野佥载》载睿宗游赏事，可见当时上自天子，下自庶民，皆在是夜燃灯以作娱游，载歌载舞，喧闹三日。玄宗时期，“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例程。”[2](卷 9，《玄宗本纪》)敦煌遗书有元和年间郑馀庆奉敕撰作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S.6537V14 号）

①后梁或有宵禁，《旧五代史·梁书》卷 7《太祖纪》载开平三年，朱温下诏：“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创开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盖唐末混战，上元节庆废弛，朱温新定洛阳，极力营造繁荣景象。然似乎民间凋敝，再无盛唐景象。其于乾化二年（912 年）正月，又下令：“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金吾不用禁夜。”并说“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后梁似仍存宵禁制度。

录唐令之规定："三元日：正月十五日上元，七月十五日中元，十月十五日下元。右件上元准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并宫观行道，设斋投金龙。"三元节休假，君臣吏民同欢。后成定例。韦述《两京新记》："正月十五日夜，敕禁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3]

上元灯节暂时解除宵禁，对皇室乃至上层官吏来说，意味着他们夜间走出禁宫深宅，开始与民众同欢。而对于长期处于宵禁之下的官吏百姓来说，则是极大的民俗解放，使他们能够在繁华的城市欣赏夜月，参与万民同欢的喧嚣。佚名的《正月十五夜》诗序说："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弛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人皆赋诗以纪其事。"以解禁宵夜为一时盛况。唐人写上元佳节的诗作不胜枚举，都洋溢着新奇的感受。如杨炯《奉和上元酺宴应诏》描绘道："瑶台凉景荐，银阙秋阴遍。百戏骋鱼龙，千门壮宫殿。"郭利贞《上元》也说："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惟愁晓，周游不问家。"崔液《上元夜六首》之一："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直言上元开宵禁对百姓的吸引。上元月夜，皇室贵胄、达官显要、贩夫走卒全都出动，不分贵贱，无论贫富，共赏花灯，同享喧闹。

上元节的夜市和娱乐，使唐人意识到夜生活的多彩多姿。特别是居住在里坊间的下层民众，只有在夜间才能有时间放下手中的工作，得到片刻的休憩。在上元灯节中，下层民众才能欣赏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良辰美景。因此，上元节开宵禁的重要价值，不在于随时可以歌舞娱乐的帝王、达官显贵们的出游，而是下层民众获得了夜间出游聚会的权利。上元节开禁尽管有宗教的背景，但毕竟标志着统治者对下层民众娱乐渴求的认同。这在庶族阶层陆续壮大且不断提出政治与文化要求的唐朝，确实带有某些打破禁制的深层意味。因而当唐人在上月灯节品味到宵禁解除以后的快乐和新奇时，他们对于彻底解除宵禁的呼声便会越来越高。

与之关系密切的是，中唐前后，随着均田制破坏，土地兼并现象的日益严重，部分农民开始脱离农业生产，而两税法则又鼓励了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城市人口的增加，开始冲击严格的里坊管理模式，促成了夜市的繁荣。[4]《唐律疏议》卷 26《杂律》规定"闭门鼓后、开门鼓前禁行，明禁出坊外者"。但"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这说明唐宵禁主要在于约束坊市之间，城中街道的行走，而对于坊内行走并无严格规定。这里所谓的"坊市"，"谓京城及诸州、县等坊市"。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里坊间夜晚落锁，由于坊市间多居住为手工业者，各里坊间又禁绝，虽允许居民夜间行走和聚会，但不是出于商业需要。

虽然在律令上仍实行宵禁，但各里坊内部的夜间娱乐、消费需求在不断增加，这种量的积累逐渐推动了宵禁制度的松弛。首先是长安城人口的增多和官员居住的分散，为了保证官员能按时赶到朝廷议事，开始允许官员可免除夜行之责，[①] 夜禁已经开始松动。其次是城市从业人口的增加，推动了里坊布局的变化，特别是部分里坊沿街开店，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唐会要》卷 86《街巷》载大历、贞元、太和、大中年间诏令奏议，以禁绝"侵街造房"之风，并言"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既可以看出中晚唐市民沿街造店风气的普及，又能看出宵禁制度的松懈。沿街造店是为了商业活动的便利，而坊门不再严格开闭制度，除了商业利益诉求之外，还有满足居民夜间聚会娱乐的需要。

中唐以后，大量进入城市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缺乏必要的居住设施，不得不聚居在本用来生产和买卖的坊市中，这便利了夜间生产。同样由于里坊居民增多，也促成了夜间消费的繁荣。《太平广记》卷 452《任氏》云："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

① [宋] 窦仪《宋刑统》卷 26："唐至德二载正月十二日敕，自今后，犯夜人其有品命者，奏听进止，自余一切，準式科决。"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18-419 页。

候鼓。”作者沈既济为德宗时期人，虽写天宝年间故事，然已可见唐时里中已有商业设施，而可见里坊间仍以宵禁管理，但坊间的商业活动已经开始形成。天宝年间，部分坊间夜市已非常兴盛，卢照邻《长安古意》言：“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节红尘暗天起。”崇仁坊也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6] 热闹非凡。而夜市的形成，则是晚唐五代市民文化形成的主要动力。

三、娱乐市民化倾向的形成

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娱乐生活，特别是夜间宴娱，多在皇室宗族和达官显贵的府邸举行。李世民《三层阁上置音声》：“绮筵移暮景，紫阁引宵烟。隔栋歌尘合，分阶舞影连。声流三处管，响乱一重弦。不似秦楼上，吹箫空学仙。”写皇宫夜宴的情形。祖咏《宴吴王宅》写吴王李恪召集文人雅士观舞：“吴王承国宠，列第禁城东。连夜征词客，当春试舞童。”李白《寄王汉阳》状在贵族宴饮中的见闻：“南湖秋月白，王宰夜相邀。锦帐郎官醉，罗衣舞女娇。笛声喧沔鄂，歌曲上云霄。”李唐宗室与贵族的府中夜宴，为一时风气，李适之喜宴宾客，“饮酒至斗余不乱。夜宴娱，昼决事，案无留辞。”以为美谈。豪宅聚会，或彻夜歌舞，岑羲《夜宴安乐公主新宅》云：“金榜重楼开夜扉，琼筵爱客未言归。衔欢不觉银河曙，尽醉那知玉漏稀。”储光羲《留别安庆李太守》云：“明牧念行子，又言悲解携。初筵方落日，醉止到鸣鸡。”或留客住宿，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云：“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清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便是写驸马郑昌裔宴后留客休憩。

而民间主要集中在固定的里坊，如平康里之三曲和可以留宿的酒楼。施肩吾《金吾词》云：“行拥朱轮锦幨儿，望仙门外叱金羁。染须偷嫩无人觉，唯有平康小妇知。”李廓《长安少年行》云：“晓日寻花去，春风带酒归。青楼无昼夜，歌舞歇时稀”，郑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云：“春来无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裴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云：“银缸斜背解鸣琏，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染桂枝香。”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更是描绘少年时“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的过程，铺陈了两人歌舞、欢宴、留宿、辞别的过程。除了平康里，酒楼也是夜间饮酒作乐的去处，此类酒楼常以胡姬侍寝，贺朝《赠酒店胡姬》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一到夜晚，酒肆歌舞悠扬；施肩吾《戏郑申府》云：“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成为少年们寻欢作乐的地方。李白《前有一尊酒行》云：“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中唐以前诗人所写夜间生活，大致不出豪宅、平康坊及酒楼等固定场所。集中在官邸和固定里坊的娱乐，虽然部分诗人可以参与，但其服务对象主要针对上层官僚和士人。下层市民是很少有机会来参与到夜间娱乐活动中的。

而随着宵禁的松弛，市民文化得以迅速繁荣。首先，虽然早期也存在一些民间文艺形式如说话、变文、戏曲以及曲子词等，尽管这些艺术形态也在民间流传，但其演出对象主要为贵族，我们从有限的记载来看，倡优、歌伎以及著名艺人常常集中在皇宫和官府；但在晚唐五代，随着宵禁制度的解除，城市中开始出现面向下层民众演出的歌舞、说唱和戏曲。其次，由于城市实行严格的宵禁制度，市民白天集中在作坊和商铺中进行生产，并没有大量的时间和场合去欣赏演出，只有在佛教节日，才有可能到寺庙里去听演说。当以上元夜解禁为突破口，直接服务于下层市民娱乐需要的产业如表演、歌舞、说话等开始面向下层市民，并将演出场地向市民开放。这极大地促成了艺术形态向世俗化、市民化转移，使服务于下层民众娱乐口味的俗文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第三，与市民娱乐需求一起形成的商业文化，支持并鼓励了晚唐五代市民文学的俗化，使说话、曲子词、变文成为新的文学形式，为宋词、话本和杂戏的形成作了必要的铺垫。

夜市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市民的娱乐需求得以承认，也成为市民文化迅速形成的原动力。宵禁废弛以后，各地夜游之风立即兴起，普通百姓可随意聚会。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说：“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潮台。”写广州夜市的喧杂。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也说：“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写行程

中所见夜市连绵。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夜看扬州市》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可见市民可以欢宵达旦地娱乐。黄滔《江州夜宴献陈员外》便是写民间乡绅"浔阳江上夜开筵"的情形，白居易《妪小侄龟儿咏灯诗并腊娘制衣，因寄行简》也是写江南夜间"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的娱乐情形。杜荀鹤《送人游吴》说："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韦庄的《过扬州》便感慨晚唐时期，"当年人未识兵戈，处处青楼夜夜歌。花发洞中春日永，月明衣上好风多。"可见，晚唐宵禁开放后所形成的夜市，极大刺激了民间娱乐业的发展，歌舞、曲艺等艺术形式，在丰富百姓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在迅速得到创新和发展。

随着市民娱乐的兴起，贵族的夜间娱乐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向市民化、俗化的方向发展。《旧唐书》卷16载：

> 穆宗长庆元年二月，丙子，上观杂伎乐于麟德殿，欢甚，顾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为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对曰："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不至于乱。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

穆宗时期，贵族娱乐已不再保持前期的文雅状态，而是向喧闹吵杂发展，与民间娱乐形态大体类似。在这种逐渐俗化的文化形态中，说话、俗讲等逐渐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并逐渐发展起来，为宋代文学的俗化作了必要的铺垫。

曲子词的繁荣最能说明问题。中唐以后，由于教坊制度的变革，掌握了大量教坊曲目的歌伎陆续流散到民间，这些原先仅在皇室和上层贵族中流传的歌唱和演出形态，立刻成为许多酒肆妓院彻夜演奏的曲目。温庭筠《弹筝人》言："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将新曲教宁王。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世人称之为新声，以表达他们对这种曲目的喜爱。孟郊《晚雪吟》云："古耳有未通，新词有潜韶。"张祜《观杨瑗柘枝》云："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之一云："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这些下行的教坊曲目，以其细腻、新奇的旋律和参差错落的节奏吸引了下层百姓的喜欢，成为夜间娱乐的重要内容。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听众的需要，许多词人、艺人纷纷加入到曲子的创作中，吴融《李周弹筝歌》言："年将六十艺转精，自写梨园新曲声。"极大刺激了晚唐文人创作欲望。传统的教坊曲目多由专业乐工创制，而流散在民间的歌伎很难有才情去创作新声，只能依托那些稍通音律的文人来依曲填词，以"新词"招徕顾客。李益、温庭筠正是这种背景下为妓女填词，温庭筠还成为了第一个大量填词的文人。可以说，曲子词的繁荣，宵禁制度的松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动因。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李昉，李穆，徐铉. 太平御览·卷30引 [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4] 翁俊雄. 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 [J]. 历史研究，1994，(3).

[5] 宋敏求. 长安志·卷8 [M]. 《丛书集成初编》本.

责任编辑：杨向艳

·文 学 语言学·

20 世纪西方文论嬗变趋向探微

◎ 黄克剑

[摘 要] 本文试图从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嬗变中找出某种内在节律以纵观其总体趋向。其运思线索是在 "唯美"与 "形式"、"形式"与 "语言"、"语言"与 "历史"等相承却又错落的关系中展开的；而所谓 "美"的再度自觉、 "语言学转向"、 "历史转向"等当代文论的几个枢纽性话题，则被系于这一线索作了别具意趣的考辨。

[关键词] 形式 语言 历史 语言学转向 历史转向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16-11

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的欧美，演进中的西方文艺理论在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逻辑主脉；到了 20 世纪，时潮中起引领作用的主导趋向似乎骤然隐去了。蜂拥而至的诸多流派留给人们更深的印象是各有千秋而多元竞进。在学者们或者出于审慎对诸文论家、批评家以国别为线索作了悉心考述（如郭宏安等所撰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或者借着艾布拉姆斯的文艺批评 "四要素"说把各个流派归类于 "作者系统"、 "作品系统"、 "读者系统"、 "社会文化系统"（如胡经之等所撰 《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后，这里愿作另一种尝试：从 20 世纪西方文论的嬗变中找出某种内在节律以纵观其总体趋向。

新的运思线索是在 "唯美"与 "形式"、"形式"与 "语言"、"语言"与 "历史"关系的错落中延伸的，它牵连着这样几个枢纽性话题：审美自觉与审美形式、 "语言学转向"、 "历史（文化）转向"。

一、 "唯美"与 "形式"：审美的再度自觉

20 世纪的西方文论肇始于 "形式主义"文论家——俄国形式主义者、英国艺术史家克莱夫·贝尔等——对 "形式"的推重，这推重 "形式"的 "形式主义"文论是 19 世纪唯美主义思潮在新的世纪合乎逻辑的演变。

唯美主义思潮的发生，意味着西方文化危机背景下新一轮的审美自觉。如果说 "美"在古希腊的初次自觉的主题词在于由 "什么是美"的发问引出的 "美本身"的概念，[①] "美"在西方的第二次自觉以德国人鲍姆嘉通提出 "美学"（Ästhetik）范畴而宣告了一门畛域确然的学科的诞生为标志，那么， "美"在西方第三次自觉的最富影响力的口号便是所谓 "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②] 与古希腊人的审美自觉相应的是艺术从先前所依附的实用技艺中的分化，尽管这分化同时即意味着对人的生命元始浑整状态的打破；近代西方的审美自觉是对发生在 "轴心时代"——雅斯贝斯称古希腊出现苏格拉底的那个时代为西方的 "轴心时代"——的审美自觉的一次不无历史感的回味，它是相对于把 "美"臣仆化了的他律的神学的，却也不得不对文艺复兴以来骤然膨胀的感性欲望在冲决神学控摄的同时也亵渎了 "美"的那道世俗背景作一种批判式的处置；以 "唯美主义"思潮——从法国的戈蒂耶到英国的佩特、王尔德——为代表的第

作者简介 黄克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① "什么是美"或 "美是什么"的问题及 "美本身"的概念的提出，见于柏拉图的对话体文字 《大希庇阿斯》。 "美本身"的概念也出现于柏拉图的对话体文字 《斐多》。

② "为艺术而艺术"一语可能最早出于法国学者库辛（Victor Corsin）——一位康德美学的热心阐释者——之口，这个口号后来被归之于法国诗人、批评家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是因为他在其著述 《阿贝杜斯〉序言》和 《莫班小姐〉序言》中对美和艺术提出的见解有着典型的 "唯美"意趣。

三次审美自觉，之所以执著于审美自律、艺术至上，乃是要在利欲的算计无处不在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风下为艺术和审美守住一份贞洁，为本然意趣上的人生留住一份虚灵的诗意。[①] 20世纪的“形式主义”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笼罩于“唯美主义”的，而“唯美主义”所昭示的第三次审美自觉，正可以看作是对“轴心时代”的审美自觉的再一次回味——富于现代文化危机意识的回味。

每一次审美自觉都伴随着对审美形式的强调，这含有审美意趣的形式使人的审美活动同所有功利的或伦理的活动区别开来。当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的口叩问“什么是美”或“美是什么”时，他也借着苏格拉底的口说：“真正的快感来自所谓美的颜色，美的形式，它们之中很有一大部分来自气味和声音，总之，它们来自这样一类事物：在缺乏这类事物时我们并不感觉到缺乏，也不感到什么痛苦，但它们的出现却使感官感到满足，引起快感，并不和痛感夹杂在一起。”[1](P298) 在第二次审美自觉中，“美学”的真正奠基者康德甚至断言“美本来只涉及形式”。[2](P68) 康德比柏拉图更讲求“形式”的纯粹性；他所谓“形式”，排除了气味，乃至也排除了颜色。在他看来，“在绘画，雕刻艺术，在它们作为美术这范围内，素描是十分重要的，在素描里，对于鉴赏重要的不是感觉的快感，而是单纯经由它的形式给人的愉快。渲染着轮廓的色彩是属于刺激的；它们固然能使对象本身给感觉以活泼印象，却不能使它值得观照和美。它们往往受美的形式的要求所限制，就是在刺激被容纳的地方，也仅是由于形式而提高着它的品格。”[2](P63) 第三次审美自觉同样倚重于“形式”，20世纪初叶的“形式主义”思潮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形式”被一再申说。与康德的“合目的性的形式”略相当，贝尔把蕴含审美价值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他说：

> 按照某种不为人知的神秘规律排列和组合的形式，会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感动我们……我称这些动人的组合、排列为“有意味的形式”。[3](P6)
>
> 我的“有意味的形式”既包括了线条的组合，也包括了色彩的组合。[3](P7)

如同贝尔把所有视觉艺术品的共通而独有的特性或艺术品的艺术性归结为“有意味的形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在把文学看作一种语言艺术时，也以“言语-结构”或言语“形式”为文学成其为文学的“文学性”之根据所在。什克洛夫斯基所谓文学是“作为程序的艺术”，乃是说文学是作为有着审美意趣的言语形式的艺术，而当日尔蒙斯基说“诗的材料不是形象，也不是激情，而是词”[4](P217) 时，他则指出：

> 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那么，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事实也都成为形式的现象。[4](P212)
>
> 形式和内容的这一传统划分，使艺术中有了审美成分和非审美成分的区别。与此相对立的是另一种划分，它将艺术作品视为审美对象，并以其本质特征为基础，划出材料与程序的对立。这一对立指明了对诗歌“形式”因素进行理论研究和系统描述的途径。[4](P213)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以“形式”(程序) 与“材料”的关系分析取代了传统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析，这使“形式”获得了主动得多的生机。艾亨鲍姆在其名作《论悲剧与悲剧性》中甚至这样说：

> “艺术的成功”永远是一场骗局：观众要求的好像是怜悯，可实际上，艺术家引导他达到的却是享受；观众被请来接受“内容”，而事实上，内容却被形式“消灭了”。(正是消灭了，而不是像教科书喜欢说的那样达到“和谐”!) ……对于观众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悲剧善于唤起怜悯感，在这一形式中，怜悯感对他便成为一种新的、与真实情感不相似的情感。因此，他期待于艺术家的并不是这一情感本身，而是用以唤起这些情感的一些特殊程序。[5](P35-36)

“内容”被形式“消灭”，意味着被纳入审美“形式”或审美“程序”的“内容”已不再是先前的内容。进到一定文学形式的愤怒、悲哀、热恋、冷遇、得意、失落，固然作为审美对象而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愤怒、悲哀、热恋、冷遇、得意、失落，那由悲剧这一文学形式所唤起的被亚里士多德称作“怜悯”和“恐惧”的情愫，也决不就是日常处境中发生的种种怜悯和恐惧。因此，悲剧中悲剧人物的毁灭所引发的

---

①关于西方的三次审美自觉，可参看拙著《审美自觉与审美形式》，《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另见《美：眺望虚灵之真际》，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导论”。

“怜悯”和“恐惧”对于观众说来反倒是一种享受——一种独特的审美享受。纯粹的怜悯和恐惧不属于悲剧，不属于文学，文学带给人的“怜悯”、“恐惧”及其他感人的情愫是经由文学的审美“形式”升华或处置过的。正是在这一意趣上，立足于审美的形式主义者才不厌其详而一次又一次地标举“形式”。

比俄国形式主义略早，表现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了“形式”的“唯美”特征或“唯美”的“形式”趣向了。他在断言“艺术即直觉”[6](P211)而“直觉是表现，而且只是表现”[6](P18)时曾指出：

> 诗人或画家缺乏了形式，就缺少了一切，因为他缺乏他自己。诗的素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只有表现，这就是说，只有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在把内容看成等于概念时，艺术不但不在内容，而且根本没有内容。[6](P33)

对审美“形式”的看重与克罗齐由“为艺术而艺术”而理解“艺术独立”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他说：“内容选择是不可能的，这就完成了艺术独立的原理，也是‘为艺术而艺术’一语的正确意义。”[6](P62)

依克罗齐的看法，“直觉或表象，就其为形式而言，有别于心理的素材；这个形式，这个掌握，就是表现。”[6](P1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这种所谓“表现主义”也正是另一种姿态的“形式主义”，而20世纪初叶的“形式主义”思潮自始就连着以“为艺术而艺术”为口号的唯美主义的根荄。事实上，这种“形式”而“唯美”或“唯美”而“形式”的艺术见地并没有在后起的文艺理论思潮中全然隐没，它一直影响着往后的诸多文论家，只是这影响或在于肯定性的启迪，或在于对抗性的刺激。荷兰文论史家佛克马、易布思在其所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得到启示，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是唯一正确的看法。”[7](P13-14)他们主要是在评说俄国形式主义，但真正说来，对20世纪30年代之后欧美诸多文论流派起了某种直接或间接催生作用的“形式主义”，除了俄国形式主义之外，至少尚有克莱夫·贝尔那样的形式主义和把“直觉”、“表现”作一体论说的克罗齐美学。文艺符号学的创始者卡西尔是从艺术品的“直观的结构”推导出他所谓的“形式的理性”[8](P213)的。他的学生苏珊·朗格则明确宣称“我们这里所说的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或“表现性的形式”。[9](P24)显然，“直观的结构”、“形式的理性”等概念的提出是多少受了克罗齐“直觉—表现—形式”说的启示的，而“表现性的形式”和“有意味的形式”的术语亦当分别属于克罗齐和克莱夫·贝尔。有趣的是，正像克罗齐在把艺术“形式”看作“艺术独立”的最后依据时曾再次回味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一语，卡西尔在以“形式的理性”诠释艺术品“直观的结构”时也毫不含糊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申辩。他说：

> 在这里，被看成是艺术品的必要条件和最独特特征之一的这种“移开一段距离”(这“移开一段距离”的使命是由“形式的理性”承担的——引者注)，一直被证明是美学理论的一大障碍。因为假若真是这样的话，它就会遭到这种指责：艺术已不再是某种真正人类的东西了，因为它已经丧失了同人类生活的一切联系。然而，为艺术而艺术原则的捍卫者们并不害怕这种指责，相反，他们公然蔑视这种指责。他们认为，艺术的最大功绩和特权就在于它烧毁了与平庸的实在相连的所有桥梁。艺术必须始终是凡夫俗子望而生畏的一种神秘。[8](P211-212)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仍把审美形式视为文学艺术的命脉所在。他认为，“一出剧，一部小说，只有借助能‘熔合’和升华‘素材’的形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10](P235)当他强调“艺术自律”并把由这种自律所肯定的艺术的独立价值归结于审美形式时，他说：“同给定现实对峙的审美形式，同时是一种通过调合的宣泄达到的肯定的形式，这种宣泄与其说是心理事件，毋宁说是本体的事件。”[10](P247)并且，他也就此指出：

> 艺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因为艺术的审美形式揭示出现实中受到禁锢和压抑的维度：即解放的层面。[10](P200)

二、“形式”与“语言”：语言学转向

“唯美”的秘密在于“艺术自律”或审美自觉，由“艺术自律”或审美自觉所引生的对“形式”的倚重在文学——所谓语言艺术——上则表现为对“语言”的经心。“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11](P169) 索绪尔以这一论断无意间预告了20世纪文论由“唯美”(“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最终引致所谓“语言学转向”的契机。克罗齐美学对“表现性的形式”的看重和对“语言”的看重是密不可分的，这至少可以从他把他所理解的美学称为“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这一点上窥见真谛。而因着钟情于“形式”被冠以“形式主义”之名的俄国形式主义思潮，甚至从一开始就同某种浓厚的“语言”兴趣关联着——其最初的两个学术团体是：“莫斯科语言小组”和“圣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从俄国形式主义走向英美的“新批评”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是顺理成章的，但真正的“语言学转向”则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后结构主义”脱胎于“结构主义”时。

“新批评”派的后期代表人物韦勒克曾这样说起俄国形式主义：“……特别精彩的还有俄国形式主义者及捷克和波兰的追随者们倡导的形式主义研究法。这些方法给文学作品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对此我们仅仅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分析。”[12](P146) 对某一对象的肯定性评价往往渗透着评价者的自况，从韦勒克对俄国形式主义的评说可以想见“新批评”同俄国形式主义间的非同寻常的学缘。在被称为“新批评之父”的兰塞姆看来，把诗歌与非文学性散文区别开来的不在于“伦理道德”，也不在于“多情、敏感”或“感情发泄”。他认为，“要说差异，诗歌的结构倒是很有希望算作一种”，[13](P73) 因为诗歌——最能体现文学性的文学作品——的“双重结构”(语义结构与语音结构)，“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它是要把比较繁杂的世界及较为出人意外的世界带入人们的经验，从更多方面来进行论述”。[13](P78) 对于兰塞姆而言，他所谓“本体论角度”涉及两方面：一是与科学所称述的那种抽象世界相对的具体世界，亦即“比较繁杂的世界”或“复杂难制的世界”；一是“诗歌的结构”，因为唯有“诗歌的结构”所造成的“意象”才能“重新组成感觉世界”。[13](P61) 显然，前一方面是后一方面的依据，但作为文学批评家，兰塞姆所倡导的“本体论批评”主要还是落在“诗歌的结构”的讨论上。后来的“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不再刻意使用“本体论批评”一类话语，但“本体论批评”的意旨被沿承下来了；兰塞姆在讨论“诗歌的结构”时所提出的“构架—肌质”说被更大程度地修正和改变了，但由关注“诗歌的结构”而引出的“文本中心”的观念毕竟成了留给后来的“新批评”倾向中人们的一份遗产。毋庸讳言，“文本中心”的观念在“新批评”派的韦姆萨特、比尔兹利那里被极端化了，他们断言文学作品本身是一种“自足的存在”。由此，他们在文学批评中排除了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感受的研究，而分别称这二者为“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相形之下，《文学理论》一书的作者韦勒克和奥斯丁·沃伦已不再那么偏激，他们强调“文学的内部研究”，亦即对文学作品这一语言符号结构的研究，但终究还是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的背景、文学的环境、文学的外因”的研究——留出了相应的空间。不过，“新批评”说到底仍属于形式主义的批评，只是属于这种批评倾向的人大多不愿接受“形式主义”的称谓。比起其他批评家来，布鲁克斯显得要率直得多，他在《形式主义批评家》一文中明确以“形式主义批评家”自居。其实，当兰塞姆把诗歌与非文学性散文的差异归结于“诗歌的结构”时，他所说的“结构”主要即是一种“形式”；当韦勒克和沃伦以“材料”称文学作品中“一切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以“结构”称其中的“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12](P147) 时，他们所说的“结构”正与“形式”相通。韦勒克、沃伦指出，对于文学作品说来，其意义或“审美目的”、“艺术效果”是与它的符号结构或独特的语言结构一体的。这用布鲁克斯的话说，即所谓：

> 形式就是意义。[14](P487)

这是说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文学作品的“形式”，对于文学作品的“意义”的探求或领略终究只在于对其“符号结构”或语言“形式”的分析。对于“新批评”派的人们说来，“朦胧”(燕卜荪)、“张力”(塔特)、“悖论”、“反讽”(布鲁克斯)或“隐喻”、“象征”(韦勒克、沃伦)等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所谓文学技巧，就它们是对文学的“意义”的指示而言，探讨它们即是探讨文学的“本体”。

如果说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主要是指造型艺术中线条或色彩的“动人的组合、排列”，那么，

“新批评”派的人们所说的“朦胧”、“张力”、“悖论”、“反讽”或“隐喻”、“象征”等，作为语词或话语的“动人的组合、排列”看，未尝不可以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正像造型艺术的线条、色彩的“动人的组合、排列”有无限多种可能，文学中赋有审美意趣的语词或话语的组合、排列同样不可作有限的规定。然而，语词的排列、组合毕竟有其最一般的规则可寻，对这种由博返约的语言规则的探求势必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而对这种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一旦作一种普泛的引申，又必然导致一度风靡于诸多文化领域研究的所谓“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生。文论线索上的“新批评”与“结构主义”都是从作为“形式”的语言那里获得凭藉的，二者的异致只在于：前者是面对由词语的排列、组合所造成的审美形式的无穷可能，后者则把纷繁、生动的言说化约为简要而易于把握的规则或程式。表面上看，“新批评”更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微观赏析，“结构主义”更注重对文学作品的宏观勾勒；“新批评”更倾心亦更见长于对诗的韵致的探求，“结构主义”更热衷亦更适宜于对叙事作品的结构的概括。而究其根本，或可以这样对二者的分野一言以蔽之：“新批评”的取向是审美的，“结构主义”的取向是认知的。

诚如索绪尔自己所说，他的语言学是一种“语言科学”。科学的方法在于抽象，而抽象——把某种被认为“共相”的东西抽取出来以获得程式化的确定性——总是以取舍明确的选择为前提的。索绪尔从人的“言语活动”这一“混杂总体”中舍弃了生动、丰富而带有偶然性的“言语”，选择了可在“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上加以确定的“语言”，因此他称自己的语言学为“语言的语言学”而非“言语的语言学”。与此相应，他又从共时态语言和历时态语言中选择了共时态语言，于是，他又称自己的语言学为“共时语言学”。[11](P36-42、142-143) 某一词语的价值不在于这词语的历史演化，而在于它在文句中与其他词语所构成的关系。索绪尔说：

> 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11](P170)

这关系当然首先在于一个词或一个语言单位中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与作为“所指”的“概念”的对立和结合，而重要的，也还在于集能指与所指或音响形象与概念于一身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包括两种，一是联词成句时所构成的那种毗连关系或句段关系，一是一个词同与它含义相似或相近的一些词所构成的那种相似性关系或联想关系；此两重关系构成一个以句段关系为横轴、以联想关系为纵轴的坐标，而出现在语言状态中的某个词的意义或价值则取决于它在这坐标中的位置——犹如一枚棋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棋盘中所处的相对于其他棋子的位置。就是说，一个词的意义或价值既取决于它在句段中同它前后的词的关联，也取决于它同可联想到的一切与它同义或近义的词的差异。离开棋盘的棋子没有弈局上的价值，离开同其他词的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的词语同样无从确定它在语言上的意义。关系乃是一种“形式”或一种“结构”，正是由于这一点，索绪尔要强调指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倘把这论断作另一种方式的表达，亦未始不可谓：语言是结构而不是实体。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把索绪尔分析语言的方法推演为一种有着普遍效用的结构主义方法，将其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他的一个执著的信念是：“语言”作为人的典型特征，它必定“同时构成文化现象（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原型，以及全部社会形式借以确立和固定的现象的原型。”[15](P25) 由列维-斯特劳斯开其端，法国遂成为“结构主义”思潮——其巅峰时期为60年代——的故乡；这思潮见之于文学批评，则是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勃瑞蒙等对所谓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倡导。罗兰·巴特曾这样宣说他主张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旨趣：

> 最理智的办法是假设在句子与话语之间有同源关系，只要同一个形式结构似乎支配了所有的符号学体系，不论其内容如何之多、规模如何之大。话语可能是个大的“句子”（其组成单位不一定非是句子不可），如同句子就某些特征来说是个小的“话语”一样。这一假设同目前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引者注）的某些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这里建议的同源性，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也意味着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16](P476-477)

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其他代表人物那里，例如，托多洛夫就说过：

不仅一切语言，而且一切指示系统（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指示系统——引者注）都具有同一种语法。这语法之所以带有普遍性，不仅因为它决定着世上一切语言，而且因为它和世界本身的结构是相同的。[17](P97)

对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来说，任何叙事作品都不过是某种形式化或模式化的抽象结构的体现，因此，文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描述或赏析具体作品，而在于发现若干具体作品所共有的那种抽象的结构。从19世纪的“唯美主义”到20世纪初叶的“形式主义”以至于盛行于40、50年代的“新批评”，西方文论的主流是以对“纯诗”、“文学性”、审美自律的属意而与被逞欲操作的科技理性相抗衡的，结构主义却以其“要成为人，就必须成为结构主义者”[18](P6)的霸气把人们再次带进了“科学”的罗网。这是文学批评以至整个人文意识变迁的一次迂回，当它终于达到某种临界状态时，处在这迂回中的人们将会重新作出抉择。结构主义批评家们所做的是“关于科学性的一个令人陶醉的梦”（罗兰•巴特），当梦醒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从“结构”走向“解构”。1970年，罗兰•巴特出版了《S/Z》一书，书的开篇写着如下的话：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这是桩苦差事，竭精殚思（“满腔耐心的科学呵，实实在在的苦刑”），终竟生了疲厌，因为文（texte）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内部的差异（différence）。[19](P55)

这段话意味着一种告别，一种同先前的寻找叙事作品“单一的结构”模式的结构主义取向的告别。罗兰•巴特从对“结构”的执守转向“解构”，这正应了那句著名的禅语——“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过，“解构”思维的原创性并不属于他。他承认，他从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或所谓后结构主义是受了德里达的影响和启迪。1966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结构主义学术研讨会上，德里达作了题为《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结构”概念必然导致预设一定意义上的“中心”，而预设“中心”一直是西方人的思维定势。诸如“存在”、“本质”、“真理”、“上帝”、“自我”、“目的”、“意图”等术语，无一不意味着西方人对确立一个“中心”的执著。他把这确立“中心”的取向称之为“逻各斯中心正义”（logocentrism）。他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乃是要否定“意义”的绝对的或客观的特征。对于他说来，从来就没有绝对存在的意义，而只有瞬间生成的意义。德里达强调：

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20](P18)

他解释“解构”这一术语说：

我用这个词的时候，结构主义正处在统治地位：解构在当时被认为同时具有结构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是这样的。解构不是简单地对体系论的结构的分解；它也是一个关于根基的问题、关于根基与构成根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它也是关于结构关闭的问题，关于整个哲学结构的问题。……解构首先与系统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系统，而是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凝聚起来的可能性，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这儿用的是从哲学角度赋予这个词的严格意义）。[20](P19)

就解构论者从一开始就否弃所谓绝对存在的意义而论，“解构”可说是“反结构主义”的；就其认可和关注瞬间生成的意义而论，“解构”又可说是尚留有一定的“结构主义”姿态的。“解构”所以“同时具有结构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姿态”，乃是基于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学的这样一种看法：一方面，他认为“索绪尔在继续使用符号概念时，他依然不可避免地证实了形而上学传统”；[20](P69)一方面，他又认为，正是索绪尔的语言学，其本身就隐含了对传统形而上学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解构”的性状。他指出：

（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种绝对的、决定性的批判作用就是：（1）它指出所指和能指是不可分割

的，所指和能指是一个和同个产物的两个方面，这是反传统的。…… (2) 索绪尔强调符号作用的“差异的”和“形式的”特性，……他极力用他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来的符号概念来反对形而上学传统。[20] (P68-69)

所指和能指的“不可分割”，意味着对传统形而上学认可的那种“先验所指”或脱开能指而独立存在的某种“客观真理”的否定，而“强调符号作用的‘差异的’和‘形式的’特性”，则意味着由符号作用而产生的“意义”的相对性和非实质性——这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所执著的那种真理的实质性和绝对性的否定。德里达是立足于索绪尔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和差异主题”的，他由“能指”与“所指”的同一的相对性推出的是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的相对性。既然因“差异”而瞬间生成而又因“差异”即刻自消形迹的“意义”没有其存在的某种“绝对性”或“客观性”可言，“逻各斯”所意指的那种“聚集”或“集中”[①]——即“逻各斯中心论”——也便由此而消解。

德里达把索绪尔语言学赋予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的那份灵气，聚合成“延异”(différance) 这一诡诞的词语，让“所指”的意义在一再的重新诠释中散落于一个无尽的“能指”的序列。与此相随，从“结构”到“解构”，语言被推定为人生无从脱其羁束的天罗地网；于是，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一切文化、学术由此被带进“语言的囚笼”。这在20世纪60年代被强化了的意识的发生，被人们称之为“语言学转向”或“语言学革命”。

三、“语言”与“历史”：历史或文化转向

无论德里达怎样抱怨人们对他的误解——以为他的著述所一再讲述的不外是对“语言之外再无其他”这一观念的强调，而事实上，人们从嬗变于“结构”论的“解构”那里所获得的“文外无物”的印象并非毫无根据。英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曾以同情理解的口吻谈起“语言学革命”，他说：

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直到当代文学理论，20世纪的“语言学革命”的特征即在于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以容纳经验。[21] (P68)

伊格尔顿是把“语言学革命”上溯到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的，但真正说来，使这“语言学革命”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是60年代后期出现的德里达的解构论。“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是立足于“文本”讨论所谓“意义”的，所不同的只在于“结构主义”更多地是由文本的确定性把握意义的确定性，“解构主义”则以开放了的文本把意义视为瞬间生成又随即消解因而无限“延异”的过程。然而，当“解构主义”扬弃——包容而又超越——“结构主义”时，另一种并不局守于“语言”的语言观念早就酝酿成熟，这即是俄国人巴赫金的以“对话性”为其内在契机的话语理论。“言语的对话意向，当然是任何言语所无不具有的现象”，[22] (P58) 巴赫金由此指出：

词生活在自身之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实指向中。……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研究心理感受却离开这感受所指的现实，离开决定了这一感受的现实。[22] (P73)

申明“词生活在自身之外”，肯定“语言”的“身外的指向”，这是对文本的荡开，对“语言的囚笼”的冲决。1973年，巴赫金为他撰于1937-1938年间的《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一文补述“结束语”时写道：

尽管从事描绘的世界和被描绘出的世界是多么不可融合，尽管它们两者之间的原则界限不可取消，两者还是不可分地相互联系着，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中；它们之间进行着不停的交流，犹如

①海德格尔：“逻各斯，就是经常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就是集中”。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0页。

活生生的肌体在不停地同它周围的环境进行新陈代谢一样：只要肌体活着，它就不同这个环境溶为一体；但如果使它脱离了环境，它就会死亡。作品及其中描绘出来的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中并丰富这个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也（通过读者、听众——引者注）进入作品及其描绘出的世界。[22](P455-456)

巴赫金以“从事描绘的世界”、“周围的环境”、“现实世界”，呼唤着被索绪尔“共时语言学”发其端的“语言学转向”所摈斥的“历史”，但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终于把“历史转向”或“文化转向”隐约作为一种人文使命提出来的诸学术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则要推崭露头角于80年代初的所谓“新历史主义”。这个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的解构历史学、巴赫金的历史诗学、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伽达默尔及哈贝马斯的解释学以至接受美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学缘关系的文论流派，并未简单地背弃“语言学转向”，它所做的只是把“语言学转向”导向历史因而或隐或显地诉诸一种以历史转向扬弃语言学转向的努力，这正像“语言学转向”范畴内的解构主义并不是简单地背弃结构主义而只是扬弃结构主义那样。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所说的，“新历史主义的‘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一直同结构主义批评——尤其是解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方法保持着暧昧不明的关系。”[23](P54) 不过，所谓“暧昧不明”未尝不可以同情地理解为一种探路者的审慎。另一位美国学者林特利查在论及新历史主义时，说它是“一个最终为福柯式的声调所支配的各种声音的混合”——对于这“各种声音”，他提到了格尔兹的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中的编年派，但他强调指出：“新历史主义奇怪的理论本体是由其导演在马克思和福柯之间并以福柯为支配一方的不大适合的结合所构成的。”[24](P149)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初衷，还是这一思潮的最堪注意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表达得更确切些，他说：

……要避开稳定的艺术摹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和话语间不稳定的阐释范式，而这种交流，我已经论证，正是现代审美实践的核心。为了对这种实践作出回答，当代理论必须重新选位：不是在阐释之外，而是在谈判和交易的隐密处。[25](P15)

“谈判”（negotiation）和“交易”（exchange）是格林布拉特借自经济学的范畴，它们被用于喻说“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交流”。“谈判”涉及双方，一方是依照一定创作规范从事创作的文学艺术家，一方是见于生活实践的社会机制，其结果是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互利而有意义的“交易”中的“通货”而出现。“谈判”与“交易”的可能在于“社会能量”的流通，而“社会能量”无非是动态的社会结构中与不同利益、兴趣、冲动牵连着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力量显现于人的身心塑造的那种动势。“社会能量”的流通把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的诸多领域关联在一起，并在关联中相互保持着动态的界限。因此，在格林布拉特看来，对文学艺术的阐释，也就是对文学艺术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功能的阐释。他认为：“文学以三种相互锁联的方式在此文化系统中发挥自己的功能：其一是作为特定作者的具体行为的体现，其二是作为文学自身对于构成行为规范的密码〔codes〕的表现，其三是作为对这些密码的反省观照。”[26](P78) 如果对文学的阐释只限于作者的行为，那就有可能使这种阐释变为一种关于作者的传记的撰述；如果单纯地把文学看作社会规范或指令的反映，那就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最终沦为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如果仅仅把文学视为一种对于流行的行为密码的反省，那就又可能使我们返回到旧有的文学艺术观念——要么以文学艺术为某种普遍而抽象的人类本质的展现，要么以文学艺术为自我关注、独立自治的封闭系统。格林布拉特所肯定或赞赏的是上述三种文学阐释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于是他把自己的文学艺术研究也称作一种“文化诗学”。他指出，这种“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阻止自己永久地封闭话语之间的来往，或者是防止自己断然隔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26](P80)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森把认可一个独立的文学艺术领域视为资本主义的欺骗性、虚伪性不同，也与后结构主义者利奥塔以所谓独白话语的一统性为资本主义的欺骗性、虚伪性特征相异，格林布拉特借助二者的对立所启示的那种张力，改变了对问题的提法。他说：“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中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同时注意到詹姆森所谈论的功能性区别的构成和利欧塔所谈论的一统化的冲动。就其自身特点而言，资本主义既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能共处其中、也不会产生那种一切话语都截然孤立或断断续续的政治制度，而只会产生一些趋于

区分的冲动与趋于独白话语组织的冲动在其中同时发生作用，或至少是急速振摆，使人以为在同时作用的政治制度。”[25](P7) 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推扩至更早时期的社会文化，基于文学艺术既相对独立又与其他领域在“交流”中寻找“通货”的信念，格林布拉特提出这样的主张：

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26](P80)

这里说的“社会存在”不是所谓“事物本身”，不是某种超出阐释的东西。格林布拉特承认，他在自己所做的“双向调查”中不可能遗忘他的现实处境，因此其全部工作都会由于现实处境中的他的提问方式的缘故而显得混杂不纯。不过，他认为这是新的研究方法不能不付出的代价，并且，他甚至也把它看作是某种优点。也许是出于在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结构中对自身的“个性筑造”或“自我造型”的关切，而这“个性筑造”或“自我造型”有可能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那里得到更多的启示，格林布拉特等新历史主义者所作的文学阐释大都集中于英国的16世纪。他们相信，那时作家们写下的词句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团体、生活环境和权力结构的，他们虽然不可能找到进入莫尔、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廷德尔、魏阿特等所曾分享的文化的直接途径，却可以凭藉自己在当下现实中的经验以间接的方式理解那些作为阐释对象的故人。他们往往着眼于史料记载中的一些零散插曲、轶闻轶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不足道甚至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情形，把它们当作16世纪文化力量交汇线索的透视点，以之“阐释它们之间象征结构的交互作用（interplay），并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自我造型过程”。[26](P81) 这种被称作“逸闻主义”的研究显然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手法——以对微观事件的描述透视其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这期间，由“自我造型”的那个“我”引出的是作为文本的最重要的语境的“权力关系”，格林布拉特说：

我们是能够获得有关人类表达结果的具体理解的。因为对于某个特定的“我”来说——这个“我”是种特殊权力（power）形式，这种权力既集中在某些专门机构之中——例如法庭、教会、殖民当局与宗法家庭——同时也分散于意义的意识形态结构、特有表达方式与反复循环的叙事模式中间。[26](P81)

“权力”范畴是缘自福柯的，不过福柯借着“权力的眼睛”书写历史是为了消解历史，而新历史主义者由“权力”把“自我造型”阐释为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过程”则毕竟保留了对历史性的依恋。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文论流派所主张的是“文化诗学”或“历史诗学”，与这一称谓相应，为他们的“诗学”所接受的“文化”或“历史”，也正可以说是“诗学文化”或“诗学历史”。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他们谈到的“社会存在”不是所谓“事物本身”，同样，他们所说的“文化”或“历史”仅只是阐释中的“文化”或“历史”。所以，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蒙特洛斯也把这一流派的旨趣或取向表述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依照他的解释，所谓“文本的历史性”乃在于强调所有书写文本和阅读形式的历史具体性和社会物质性，在于强调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历史的参与性；所谓“历史的文本性”则在于指出唯有以文本为媒介我们才可能抵近历史，而文本的产生乃是文本书写者有选择地保留和删削的过程，并且，在无尽的阐释活动中，当文本转化为文献档案而被当作新一轮历史书写者的凭藉时，任何先前的文本都仍会是后人的阐释媒介。[27](P140) 新历史主义者对“文本性”的认可使他们的文论打上了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的烙印，而他们对“历史性”的着意又表明了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种种历史主义的滋养的汲取，但正因为这样，他们也以“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把自己分别同福柯式的后结构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种种历史主义区别开来。诚然，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有待证明自己的内在潜力的文论流派，它似乎不愿舍弃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任何一项重要遗产，但承受这些遗产以见之于创造，却也使它显得力不从心。然而，这个从其执著的姿态看得出几分含蓄的自信的流派还是值得期许的，因为至少它也在做着一种并非盲目的自我督责——一如它的一位信奉者所说：“我们只能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保持一种介于文本分析与历史维度之间的创造性张力。”[28](P172)

四、结语：几点启示

借着对所谓“美”的再度自觉、“语言学转向”和“历史（文化）转向”在“唯美”与“形式”、“形

式”与“语言”、“语言”与“历史”等相承而又错落的关系中的分辨，我们或可从20世纪文论的有节奏可寻的嬗变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 与“美”的自觉相应，对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的发现和确认在西方人那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20世纪文论发端于带着“唯美”取向的“形式主义”，这表征着文学艺术以审美“形式”为凭藉对世界性的文化危机——其症候在于恶性膨胀的功利逐求对科技理性的滥用——的一种反抗性回应。“形式主义”连着19世纪的唯美主义的根蔓，但“为艺术而艺术”被克罗齐、卡西尔、马尔库塞等一再提起，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守望者对社会现实的鄙弃。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对“形式就是意义”(布鲁克斯)、“形式消灭内容”(艾亨鲍姆)的强调，所祈求的是文学艺术在“本体的格”(兰塞姆)的意义上的自立，不过，自立并不就是画地为牢或自拘自闭。抗争本身也是参与，艺术即使所取的是一种抗衡一切的姿态，它也仍可以从它与之对抗的文化格局那里获得相当的理解。事实上，20世纪文论的“形式主义”底色所催生的是文学艺术的批判性状，这性状述说着某种独特的时代关切。

2. “语言是形式”(索绪尔)。作为“形式”的“语言”既与被人们视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相通，也与抽象的可程式化的逻辑思维相通。同属于广义上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对体现诗性或文学性的“朦胧”、“张力”、“悖论”、“反讽”、“隐喻”、“象征”等话语形式的措意，产生了英美的“新批评”；相信“句子与话语同源”而对叙事作品的程式作富有语法分析特征的归类，产生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新批评”所诱导的是由语词排列组合的陌生化而引发的审美形式的创新不已，结构主义所致力的则在于从未可计量的叙事性作品中找出某种简易的规则或程式以求结构的可通约性。由词句组成的话语是遵循一定的“语法”的，而使词在话语中尽可能大地保持其“外延”义(词典所标示的原始义)与“内涵”义(在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中随机获得的喻示义)的张力，则又会使话语赋有“诗性”；“新批评”看重的是文学话语中的“诗性”，结构主义所留心的是文学话语中的“语法”。然而，文学中的遣词缀文固然不能有背于“语法”，却也必得造就足够的“诗性”。当结构主义把“新批评”挤到后台而风靡于文论领域时，实际上整个文学批评正失之于以“语法”分析替代“诗性”寻觅的偏颇。

3. “结构”与“解构”原是出自同一语言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母体的孪生兄弟；“解构主义”比“结构主义”理论晚出，只是因为在“结构”骤然吸引了人们时“解构”还不曾被更多的人理会。“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这“关系”体现“差别”——“差别”关系构成语言符号的意义或价值。“差别”关系是共时态的语言结构中任何一个词语的意义得以确定的契机，“差别”也使词语在其所处的一个共时态语言结构向另一个共时态语言结构过渡时意义发生变异。任何语义的生成都缘于它同无穷多的其他语义的差别，当德里达由此提出语词在语言结构中永远只有瞬间生成的意义时，扬弃“结构”于自身的“解构”论出现了。但不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是以“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这一判断为前提的，因此，所谓“语言学转向”说到底乃是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诸学术领域的“形式”化转向。这转向在文本的限度内是圆融自如的，然而人生践履毕竟未可一味视之为某种文本，而关联着人的生命践履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实践也终究难以仅仅被归结于“形式”。

4. “历史”话题的重新提出是在文艺理论及其他学术领域过重地累于“语言”(索绪尔语言学意味上的“语言”)话题之后，但正像“结构”与“解构”在“语言”话题内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语言”和“历史”在一个更高的话题——比如，姑且称其为“人生”话题——内也相互有赖于对方，“历史”总是一刻也离不开语言符号的人创造的，并且它也只有在人以其言说所作的阐释中才被赋予意义而被人所理解；“语言”也总是历史地活着的人的语言，它寓于人的言说或对话而不在这不尽的言说或杂语对话之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语言与“它身外的指向”的关系的强调把“语言”引向“历史”，福柯为消解历史而书写“历史”则把“历史”纳入“解构”着的“语言”；“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最后20年出场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个在所谓“历史(文化)转向”上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对巴赫金、福柯以至于文化人类学、哲学解释学理论的汲取，甚至也带着终于不能轻弃“历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在对文艺复兴

时期诸多作家的“自我造型”的研究中，新历史主义者保持着“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张力，而且，对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期作家们的“自我造型”的关注，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典型的美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焦虑”（林特利查）的一种历史投射。但就文学批评而论，新历史主义在文学作品的“特性”或“文学性”的检讨上却显露出令人惊讶的不足——如果借用“新批评”的眼光看，它所做的更多地还只是“文学的外部研究”。其实，新历史主义者并非对此毫无觉察，而这显然已构成“历史（文化）转向”后的文学批评的又一个有待探向纵深的话题了。

[参考文献]

[1] 柏拉图. 斐利布斯 [M] . 朱光潜译.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 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 宗白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 贝尔.艺术 [M] . 周金怀，马钟元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 日尔蒙斯基. 诗学的任务 [M] . 方珊等译.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M] . 北京：三联书店，1989.

[5] 艾亨鲍姆. 论悲剧与悲剧性 [M] .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M] . 北京：三联书店，1989.

[6] 克罗齐.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 [M] . 朱光潜译.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7] 佛克马，易布思.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 [M] . 林书武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8.

[8] 卡西尔. 人论 [M] .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9] 苏珊•朗格. 艺术问题 [M] . 滕守尧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 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 [M] . 李小兵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2] 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 [M] . 刘象愚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

[13] 兰塞姆. 新批评（结语）[A] . 张廷琛译. 赵毅衡编选. “新批评”文集 [C]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4] 布鲁克斯. 形式主义批评家 [A] . 龚文庠译. 赵毅衡编选. “新批评”文集 [C]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5] 列维- 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 [M] . 引自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 瞿铁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6] 罗兰•巴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M] . 伍蠡甫，胡经之主编. 西文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7] 托多洛夫. 《什日谈》的语法 [M] . 引自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

[18] 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 [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9] 罗兰•巴特. S/Z [M] .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 [M] . 何佩群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1]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 . 伍晓明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2] 巴赫金. 小说理论 [M] .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3] 杰诺韦塞. 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 [A] . 孔书玉译. 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4] 林特利查. 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 [A] . 肖明翰译.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5] 格林布拉特.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A] . 盛宁译.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格林布拉特. 《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 [A] . 赵一凡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 [C]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7] 参看 Stephen Greenblatt & Giles Gunn ed.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M] . New York，1992.

[28] 伽勒尔. 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 [A] . 赵一凡译. 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 [C]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罗 苹

中国当代群众写作的文学大众化想象

◎ 王本朝

[摘　要] 按社会主义文学的梦想，社会主义文学不但被要求创造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形象，人民的需要也被作为作家写作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提出让人民群众从文学的阅读和欣赏走向文学的创作，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策略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这种群众写作解放了文学生产力，也消解了作家身份及其文学的创作特性，它使文化精英的作家及其创造性劳动被社会大众的模仿和游戏活动所代替，实现了文学的民间化、政治化和游戏化，也对社会主义文学质量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 群众写作　当代文学　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27-05

文学大众化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追求目标，它经历了从大众化的理论倡导到为大众写作，直至让大众自己写作的历史过程。群众写作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梦想，社会主义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什么叫社会主义文化呢？就是全民的文化，劳动人民的文化”。[1](P98) 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就是要把文化还给人民大众，要“使文化真正成为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化”，让“文化、技术成为群众的，掌握到群众手里”，[2](P33) 要让劳动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就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革命，以使人民群众从文化的接受者变成为创造者，对文学而言，就是要从文学的阅读和欣赏走向文学的创作，让群众真正拥有使用文学的权利和机会。

这首先就需要完成文化的普及任务，使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走向结合，实现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大众的知识化，缩小社会的文化差距，追求思想文化的平均化。最终目的是“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最后到达共产主义。工人农民一方面作八小时工作，一方面受业余文化教育，根据他们爱好，又是科学家、文学家，又是管理干部。他们的业余活动，一是搞科学技术创造，一是搞文艺。而专业作家呢，也要参加体力劳动，那时实际上已不存在专业作家了，只有这样，才谈得上共产主义文化。”[3](P26) 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实现途径一是思想改造，二是劳动改造；工农大众的知识化就是要让工农大众接受文化教育，最后实现让他们开口说话，“能读能写”，[1](P96) 能自己拿起笔来写作和表达。这就出现了群众写作。

群众写作或者说是工农作家的大量涌现，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显示了人民的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似乎标志着文学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让人民大众开口说话和表达，这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有关。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文化为了什么，即文化的政治目的性问题；二是依靠谁来办文化，就是要在文化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的问题。[2](P34) 前者说的是文化的目的，后者说的是文化的主体。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要让人民成为文化的主体，必须自己要拥有文化，要让文化回到人民手中，文艺也是一样。过去剥削阶级垄断了文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翻了身，“文艺也回到了老家”。[4](P184) 从这个角度讲，群众写作的意义主要还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它体现了“群众自己掌握文化的一个革命。”[5](P85)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为工农兵写作，建立了人民本位的大众美学。文艺服务于工农兵，人民生活成为文艺的源泉，革命文艺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歌颂劳动人民，教育人民，革

作者简介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重庆　北碚，400715）。

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情感上与他们打成一片。毛泽东从阶级角度把读者分成两个读者群，工农兵读者群和少数人的读者群。他主要强调的是为工农兵写作，而不是让工农兵写作。让工农兵写作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文学被定位在人民的文学和群众的文学，它要让文学成为人民的、工农兵的文学，除了继承延安时期的为工农兵写作以外，还需要能让工农兵写作，需要倡导广泛的群众文学运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如果不是到人民中去发展，那是不可想象的。”[5](P82) 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而是集体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需要“吸引群众写东西”，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三个方面——受教育、欣赏和创作的需要。[5](P83) 所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方面积极鼓励专业作家深入生活，与群众结合，“作家和群众在一起，乃是基础和土壤，党的政策是阳光”；[5](P86) 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群众的业余写作。“正确地帮助和指导工农群众的创作，发现和培养工农作家、艺术家，是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6](P259) 还规定“辅导群众的业余艺术活动，是省、市文联的另一个主要的任务。这种辅导应当侧重于供应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材料和指导群众的创作这两方面，以便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工作互相配合而不互相重复。”[6](P262) 有了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引导和国家出版机构的帮助，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再次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写作现象。

1956年，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的蓬勃展开，文学艺术的“群众化”是真正民主化的过程，也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现象。[7](P472) 1958年，出现了“新民歌运动”。“自从大跃进以来，群众创作空前繁荣，我们的文艺已经不只‘百花齐放’，而是‘万花齐放’了。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全国文艺大竞赛的图景。”[2](P41) 1959年，邵荃麟在总结解放后十年来的文学成就时，认为劳动群众的业余创作在十年文学发展中“应该占一个重要位置”，“文学的普及工作和群众创作运动的高涨为整个文学艺术的提高奠定了广阔的基础。它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8](P371) 文学事业与劳动群众的广泛联系，作家与劳动人民的密切结合，被看作是当代文学事业上的根本变化和基本成绩。它具体表现为以“艺术的真实的形象去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他们的理想与愿望，从而提高他们的觉悟；我们的文学把劳动者放在最突出的主人公的地位，所以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成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劳动群众不但接受了文学，并且直接参加了文学创造的事业。我们除了专业作家的创作活动以外，还有广泛的群众业余创作活动，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下，展开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高潮。”[8](P363)

在作家的专业写作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工农兵作者，“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是继续不断地出现了新的工农的写作者，大家知道的高玉宝就是其中一个”。[6](P273) 不仅仅是一个高玉宝，在50-70年代，文学界十分重视在工人、农民中培养作家，出现了工农兵作家群，如胡万春、李学鳌、韩忆萍、福庚、温承训、郑成义、黄声孝、孙友田、刘镇、戚继广、李根宝、仇学宝、刘章、殷光兰、王老九等。《人民文学》等刊物还专门开辟“新人新作”专栏发表工农作者的作品，《文艺报》也组织力量研究新人创作，茅盾和侯金镜等批评家也为这些工农作者写作评论。侯金镜评价工人作者韩统良的小说《妮套》立意新，“善于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身上敏锐发现容易被别人一眼掠过的优秀品质”，“他的短篇剪裁能力强，处理素材又力求简练含蓄，并且是用人物来体现作者对生活的看法，不是用事件去直接印证某一种观念和政策”。[9](P76) 工人家庭妇女作者陈桂珍的小说《钟声》也是语言流畅、朴实无华，感情毫无夸饰，表达十分亲切。茅盾还多次给工人作者胡万春写信，鼓励和指导他的小说写作，在其中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茅盾称赞胡万春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今天的年青一代的作家比我（或者同我同辈的作家们）年青时代要强得多；我在您那样年龄的时候，写不出您写的那些作品”，原因是“时代不同”，“凡事都有党在指示，党分析一切并将结论教导你们”。这是胡万春们的有利的地方，也是他们的不利的地方。茅盾不忘告诫到：“因为不是自己碰了钉子而得的结论，所见有时就不深，所知有时就不透，此在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10] 应该说，茅盾是非常真诚的，也是非常清醒的。他说他自己年青的时候不能写出胡万春似的作品，这在当时肯定是一句表扬的话，但在今天却让人读到了其中的幽默。他鼓励胡万春珍惜时代的赐予，同时

也提醒他，时代既是一种恩赐，也是一种遮蔽，它容易导致作者没有丰富的思想和复杂的体验，而出现“不深”、“不透”和“概念化”倾向。

茅盾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工农作者或者说是群众写作的弊端。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史上的群众写作现象？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工农群众在艺术上也如在战斗和生产的活动上一样表现了他们丰富的创造力。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应当积极地帮助和指导群众进行创作。轻视工农群众创作的贵族式的态度是需要继续加以克服和反对的。我们必须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将专业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优秀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充分地重视他们的理解力和欣赏力，他们的爱好和趣味，并认真地倾听他们对作品的批评和意见；另一方面，必须帮助他们通过业余活动方式进行自己的创作和表演，从这些活动中发现和培养劳动人民中的艺术天才。”[6](P259) 然而，艺术天才不是想培养就能培养的，既然能称之为天才，也就超越了社会普通的平庸的培养者，你也就无法培养它了，但也必须承认群众写作的局限。茅盾指出：“也许在今天还不过是业余的写作者，而明天决心以写作为职业的未来的作家们，这后者的一群将来自工厂，来自农村，来自部队”，“在文坛的接力赛跑中，我们跑第一轮的，一定要努力加油；您不见养精蓄锐，跑第二轮的，已然在那里跃跃欲试么？”[11](P35) 茅盾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文学写作的业余与专业都是相对的，他借群众的业余写作鼓励专业写作不断进步。关于如何对待写作的业余与专业的关系，周扬有这样的主张，“业余艺术活动的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而不是使业余艺术活动分子脱离他们基本的生产的活动”，“将业余的写作者、表演者或歌唱者任意地、不适当地从生产中抽离出来使之专业化，是不妥的”。[6](P259) 这说明，工农群众的业余写作主要还是被定位在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而不是为了让他们完全进入文学的殿堂。群众写作要达到知识分子的专业写作水平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把群众写作的意义和作用估计得过高，就会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的水平，在拉平文学质量的过程中，会制约或影响到知识分子专业写作水平的发挥，带来文学的整体滑坡和倒退。在当代文学史上，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从倡导文学的大众化走到大众写作的过程，就隐含着一个文学价值的悖论问题。

大众写作曾是乡村的文学动力，也是文学的民间生存方式。民间文学都是普通大众艺术的结晶。胡适说过：“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12](P35) 事实上，自《诗经》以来，一直有“劳者歌其事”的文学传统，无论是唐代的竹枝词还是宋代话本小说，都有老百姓参与其中的创作。民间传统也一直是中国文学的资源。到了现代，白话文成为文学表达的基本形式，同时也生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与白话文相关的民众、大众作为被压迫阶级也从边缘走向了历史的中心，特别是在现代革命以谋取现代社会制度的民主化、人民主权原则和现代性平等观念为目标，文学大众化拥有了更大的社会合法性，日益成为文学的主流，也不断引发对作家和作品价值的质疑和拷问。当然，这里的大众主要是阶级和政治意义上的大众，而不是市场经济、现代都市、大众传媒、机械复制意义上的大众。他们区别于现代工业背景下大众化写作的地方，一是没有现代技术革命的支撑，以及由此带来的写作与生产的机械性和复制性特征；二是没有完全彰显写作者的个人性和主体性；三是写作方法的单一和模式化，缺乏多样性和创造性。大众化也曾是中国左翼文学提出的文学口号，拥有鲜明的政治意味和革命色彩，它涵盖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大众文艺，二是如何实现文学的大众化。由此引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问题。大众化在1949年以后就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的概念，越来越远离文学自身的审美意义，而走向文学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大众化也不再提了，而是转向提倡文学的群众化。“群众”比“大众”在字面上虽是一字之差，却更带有政治意味。这里的“群众”与“人民”有意义的相似性，大众则偏重大多数的含义。文学的群众化既以人民群众作为接受对象，又以它作为创作主体。

作为文学接受者的人民群众对文学有着多样化的要求，一般人们所说的通俗、生动、真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应该有其他的文学标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都肯定有不同读者喜爱，只是，我们把读者的审美需求简单化了，虚拟化了，把政治需要想象成普通文学读者的需要，忽略了文学读者感受的多样性。

作为创作者的人民群众，他们积极参与到文学事业中来，丰富和补充专业作家的文学写作，对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而言有值得庆幸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历史教训。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获得了崇高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也应该给予它相应的历史地位，除了要求文学创造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形象，把人民的需要作为文学写作的使命之外，还提出让人民群众写作的要求带有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它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策略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但却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作家身份及其文学的创作特性，让具有文化精英特性的作家及其创造性劳动被社会大众的模仿和游戏活动所消解了，对它的鼓励和赞许所带来的是对专业作家创作的否定和贬抑。它虽然带来了人民群众文学生产力的革命与解放，但却让文学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得不爬行在生活的表层与火热的激情之中，沉湎于文字的口语、谚语和民间形式的喧嚣。它虽有材料的鲜活，有形式的简洁，有语言的通俗，但却缺少审美的精致与深厚，缺少思想的力度和语言的繁复。它实现了文学的民间化、政治化和游戏化。特别是它对文学近乎游戏的态度和简单、随意的写作方式，还带有一定的后现代色彩。但它又有严格的题材和主题规定，带着面具去跳舞，如果说它是后现代，也是中国的后现代，是在特定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嬉戏。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场表演得十分庄严的喜剧。

总的说来，它对社会主义的文学水平和质量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它所生产的文学作品，主要还是一堆文学材料，有文学的历史价值，却没有审美的经典意义。它所培养的作家，都没有走到自己的未来，他们是生活的感受者和摹写者，也是文学的爱好者，但还不是有个性的作家。在这群作家里面，成就最高的是浩然。他从 1957 年就开始创作《艳阳天》，由于他出身农村，有感于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阶级斗争，就采用“文艺形式”把“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跟大家一块儿经常温习温习它”，在写作中“一边捉摸，一边学习，一边练笔，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在写作中，还不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最后花了六、七年时间写出了这部轰动一时的小说。[13] 相对于《山乡巨变》、《创业史》和《三里湾》而言，《艳阳天》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带头人’”的“优秀的文学作品”。[14] 小说有语言的鲜活与生动，有生活的真切与质朴，但有着明显的叙述模式化。就文体而言，群众写作涉猎了新诗、短篇小说、剧本、曲艺等多种形式，成就最高还是新民歌创作，它在容纳国家政治、政策的基础上，充分地表达了群众集体的感受和想象，在艺术上，则有“形象的鲜明，音节的整齐、响亮，色彩的明朗，语言的精炼生动”等特点。[8] (P372) 相对于新诗表达的个人化经验和艺术技巧，新民歌以调动公众积极参与的方式激活了普通大众的写作欲望，将传统诗歌的吟诵和现代诗歌的阅读转变为直接写作，阅读诗歌的人还没有写诗的人多，既改变了诗歌的写作方式，也改变了诗歌的接受方式。由于它隐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识，还诱使知识分子诗人参与写作，制造了以供模仿的诗歌范式。在一个强大的话语阵势面前，知识分子也难以保持自己的思想立场和话语方式。中央和地方，包括机关、学校、军队和农村还出版了大量的新民歌集，1959 年，由郭沫若、周扬署名编写了《红旗歌谣》，精选了 300 多首新民歌，并按照“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和“保卫祖国之歌”四大类来编排。它被称为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诗三百”。[15] (P136) 它们恰恰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类别，不同类别拥有不同的现实力量。

作为一项伟大的文化过程，当代的群众写作呈现出相当大的规模和数量。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诗歌的声音，贡献了许多有名或无名的诗人，创造了诗的狂欢节。1958 年“新民歌运动”之后，群众写作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时尚，1972 年以后出版了大量的工农兵诗集，每年就多达 100 多部，印数也增加到数以万计，甚至几十万册。一张白纸的确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群众诗歌降低了文学写作的难度，在没有任何文学历史和个人经验的前提下，写作就变得非常自由和大胆。一旦每个人都可以写诗和写小说了，把诗歌和小说写作等同于吃喝拉撒一样简单，那么，诗歌和小说也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没有了美与不美的差异。即使传达了时代和现实经验，但如果没有个人体验的基础，“时代”就成了空洞的字眼，“现实”也不过是虚构的本质。卢纳察尔斯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到了能够亲自建造自

己宏伟的殿堂和整座的城市，能够在无数墙壁上画上自己的壁画，使市内的雕塑随处可见，使这些殿堂里传出新的音乐，在市内广场上举行观众和演员同台欢庆节日的大规模演出时，所有这些独有的特点才能够表现出来。届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地狱炼就的集体创作特点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艺术的一切基本特点——对科技的热爱，对未来的广阔视野，战斗热情，无情的真实——表现在对世界和群体创作的集体主义领悟的主线上，将获得前所未闻的规模和隐约能够感到的深度。”[16] (P209-210) 中国的群众写作也有数量众多的规模，有生活的热情和未来的理想，但却没有科技的想象，总体上也缺乏应有的艺术深度。

[参考文献]

[1] 周扬. 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 [C] . 周扬文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 周扬. 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C] . 周扬文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3] 周扬. 和工人业余作者的谈话 [C] . 周扬文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 茅盾. 文艺和劳动相结合 [C] . 茅盾评论文集（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 周扬. 对文艺工作的希望和对作家的要求 [C] . 周扬文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6] 周扬. 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C] . 周扬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 周扬. 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C] . 周扬文集（第 2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 邵荃麟. 文学十年历程 [C] . 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侯金镜. 侯金镜文艺评论选集 [C]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0] 茅盾. 致葫万春 [N] . 文艺报，1962-05-20.

[11] 茅盾. 文艺创作问题 [C] . 茅盾文艺评论集（上）.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12] 胡适. 白话文学史 [N] . 胡适文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3] 浩然. 寄农村读者 [N] . 光明日报，1965-10-23.

[14] 杨澜. 在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评长篇小说 《艳阳天》[N] . 人民日报，1974-05-05.

[15] 袁水拍. 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诗歌 [C] . 文学十年. 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16] 卢那察尔斯基. 无产阶级美学原则 [C] . 艺术及其最新形式.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陶原珂

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

◎ 纪德君

[摘 要] 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是通过民间说书等艺术形式扩大其在民间的广泛影响的。民间艺人不仅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而且对之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加工，这才使通俗小说更加通俗易懂，更为民众所喜闻乐道。

[关键词] 民间说书 通俗小说 评话 传播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7-0132-05

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影响民间说书。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到了清初，《水浒》、《三国》、《说岳》、《西游记》等渊源于说话的长篇小说，《三言》等渊源于说话的短篇小说，早已广泛流传；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出版后，《红楼梦》也接着问世。这些，都为说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P614) 既然民间说书多以古代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与推广，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古代通俗小说的普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传播

清末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2](P267) 此言甚是。潘建国在《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曾指出，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3] 可现有文献资料却显示，明代的"愚夫愚妇"对通俗小说竟然耳熟能详。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4](P883) 清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也说："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这些"村哥里妇"、"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为何竟能熟知"小说演义"呢？其实，主要就是靠民间说书和戏剧的传播与推广。解弢在《瓯庵漫笔》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也指出："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分别为：2005037171、03SJA75000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广东 广州，510006)。

么大的势力。”[5](P10-11) 《三国演义》如此，其他小说在民间的传播也不例外，下面以评话（评书）为例，来探讨民间说书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

二、民间说书对古代通俗小说名著的宣传与推广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明中叶问世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因而很快便成为民间艺人争相演说的对象。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诗序》即说：“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钱希言《戏瑕》卷一《水浒传》说：“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袁宏道游无锡时，听朱叟说《水浒》，认为其所说“与俗说绝异，听之令人脾健”，并赋诗赞曰：“一语快西风，听君酣舌战。”[6](P353) 李延昱《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寄托部•莫后光”条云：“莫后光三伏时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可见，艺人演说的《三国》、《西游》、《水浒》等，颇有艺术感染力。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还举例说：“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其实，不光“里中儿”如此，甚至就连明末一些义军首领居然也会被说书艺人宣扬的忠义思想所感化。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说：“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7](P616-617) 有些义军首领还曾从艺人演说的《三国》中汲取了丰富的军事智慧。刘銮《五石瓠》卷五说：“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7](P563) 明末清初著名说书大家柳敬亭，则以擅长说《水浒》、《隋唐》、《三国》等而名噪一时，张岱、钱谦益、吴伟业、冒襄、黄宗羲等即对其精湛的说书艺术倍加称赞。

清代民间说书更为盛行，尤其是扬州、苏州一带，民间说书可谓盛况空前。康熙时费轩《扬州梦香词》即说：“扬州好，评话晚开场，略说从前增感慨，未知去后费思量，野史记兴亡。”并具体记述：“评话每于午后登场，设高座，列茶具，先打引子，说杂家小说一段，开场者为之敛钱。然后敷说如《列国志》、《封神榜》、《东西汉》、《南北宋》、《五代》、《说唐》、《西游记》、《金瓶梅》种种，各有专家，名曰正书。煞尾每云：朱知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8](P81) 可见，当时扬州评话多以小说作为敷衍对象。乾隆初，董伟业《扬州竹枝词》说扬州地区是：“书词到处说《隋唐》，好汉英雄各一方。”[9](P188) 诸明斋《生涯百咏》卷三《说书》也说：“一声尺木乍登场，滚滚滔滔话短长。前史居然都记着，刚完《三国》又《隋唐》。”[9](P193)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则更具体地记载了乾隆时扬州的说书情形：

>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云玉《清风闸》、房山年《压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精难故事》、邹必显《飞蛇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

在这些著名的说书艺人中，吴天绪演说的《三国》独占鳌头。李斗还举例说：“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惟张口努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这种以形传神的表演技法，真让人匪夷所思。

与李斗大约同时的清凉道人，在《听雨轩笔记》卷三《余纪•评话》中，也对浙江杭州地区流行的评话有所评介：

> 小说所以敷衍正史，而评话又以敷衍小说。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如《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之类是已。

据此可知，评话《列国》、《东西汉》、《三国》、《隋唐》、《残唐》、《飞龙》、《金枪》、《精忠》、《英烈传》等，皆由“敷衍小说”而来。评话与小说之不同在于，“小说间或有与正史相同，而评话则皆海市蜃楼，凭空架造”。

乾隆以后，演说小说名著的评话艺人，更是名家辈出。如生于乾隆后期的邓光斗，即以“跳打水浒”闻名，而宋承章演说《水浒》则以口锋泼辣见长。后来，王少堂继承邓、宋两门书艺，兼取各家之长，致力刻画历史人物，描绘三教九流，借助丰富的生活积累来塑造形象，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变革、发展，形

成说表细腻、神采夺人的艺术风格，成为扬州评话界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咸丰、同治年间，李国辉则以擅长演说《三国》而享誉书坛。时人桃潭旧主《扬州竹枝词初稿》赞之曰："粲花妙舌吐珠玑，《三国》评词李国辉。"① 著名的"康派《三国》"创始人康国华即是其高足。康国华擅说以诸葛亮为中心的"三把火"，即《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他以其精湛的艺术功力说活了孔明，形成了独特的"康派《三国》"艺术，他本人也被誉为"活孔明"。其传人有康又华、康重华等。与李国辉同时的说书艺人任德成，谙熟《三国演义》，博览汉魏诗文，并在说表艺术上有所独创，成为"任门《三国》"创始人。蓝玉春则是"任门《三国》"最有成就的传人。他于《后三国》中增加了不少"刀马书"，如《葭萌关》、《定军山》、《汉中大战》、《独挡斜谷》等，着力渲染和烘托打斗的精彩场面，因此自成一家，人称"蓝派"。清末至民初，在扬州常有数十人同期演说《三国》。与扬州评话《三国》相映生辉的是苏州评话《三国》。同治、光绪年间评话艺人许文安，演说张飞，神态活现，有"活张飞"之称。其徒黄兆麟则有"活关公"、"活赵云"之誉。黄兆麟之徒张玉书，以评说为主，重说表，擅组织关子，描述人物形象细致，注意人、情、理的结合，因此成为苏州评话说《三国》的杰出代表。

与南方评话艺人遥相呼应，北方的评书艺人也爱说《三国》、《水浒》等小说名著。清代北京说《三国》的艺人，已知最早者当推康熙、雍正年间的王鸿兴。清末张岚溪，曾专在皇宫内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三国》，在评书界甚有影响。后来，吴阔瀛在鼓楼市场说《三国》，长于变口，如摹拟关羽时用山西口音，摹拟司马懿说话时用河南口音等，皆饶有情趣。[10](P92) 说《水浒》的著名艺人，则有双厚坪、高胜泉、徐坪玉、蒋坪芳等。双厚坪长于说"武（松）十回"，能够巧妙地传达人物神韵，对原著情节多有丰富、发展。其说书沉稳细腻，一段"挑帘裁衣"，即可说上半个月，仅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的所谓"十分光"就能说两天。[10](P673) 安太和为评书界说《西游记》的掌门，因学孙猴儿惟妙惟肖，故有"猴儿安"之称。其弟子恒永通，"每演《西游》，不论大小场口，坐客满堂，真有追着听的座儿"，[11](P155) 其演说猪八戒最佳，当时观众有"见者如观真猪八戒"的评价。

由此可见，正是借助于民间说书的传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名著才得以家喻户晓，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曾说："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裳'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12](P7) 其实，如果了解《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下等社会的传播途经，那么就不难明白"小说"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实际上是与民间说书的大力推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的。

三、民间说书对古代通俗小说名著的充实与加工

说书艺人在演说古代小说名著时一般都不会照本宣科。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就说："他们说的书和本儿上要是一样，听书的主儿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书馆去听，花几角钱在书局里买一本书，几天能够看完，又解气又不用着急，谁还去天天听书，听两个月呀？"[13](P267) 因而，有经验的说书艺人往往都会结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理解，在演说的书目中融入丰富的生活细节、风俗民情和民众的爱憎情感，从而使其所讲的人物故事活灵活现。大致说来，他们对古代小说名著的充实加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小说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书目的故事性、传奇性和连贯性。我们看扬州评话《三国》，就会发现艺人们只以曹、刘、孙三方面的龙争虎斗为主要线索安排回目，敷衍故事，刻画人物，故而其情节冲突就更紧张激烈，结构也更为紧凑连贯。如《前三国》只从关羽《止山约三事》讲起，小说中官渡之战前面的内容就舍弃了，而接下来的关目如《身在曹营》、《斩颜良》、《诛文丑》、《挂印辞曹》、《五关斩六将》等，又都紧紧围绕关羽展开，与关羽无直接关系的情节也都被摒弃或简化了。《中三国》只围绕《火烧博望

①参见《中国曲艺志·传记》（江苏卷），中国 ISBN 中心 1996 年版。本文中涉及的其他演说《三国》的扬州评话艺人，如康国华、任德成、蓝玉春等，以及演说《三国》的苏州评话艺人许文安、黄兆麟、张玉书等，其相关材料也从《中国曲艺志·传记》（江苏卷）中择取，不再一一注明。

坡》、《火烧新野》、《火烧赤壁》做文章，以曹操、周瑜等为陪衬，重点突出诸葛亮的过人才智。苏州评话还围绕赤壁之战，改编出“东吴十条计”：周瑜叫鲁肃送“安营图”给孔明修改，欲借孔明改图犯法杀之，为“诱人犯法计”；周瑜令孔明至铁聚山劫曹军军粮，欲借曹军之刀杀孔明，为“借刀杀人计”；周瑜于三江口设宴请刘备，欲杀掉刘备倒掉孔明依靠的大树，挖掉孔明生存之根，为“倒树寻根计”；蒋干盗书为“反间计”；周瑜欲借造箭未完成任务为由杀害孔明，为“挖坑逮虎计”；周瑜打黄盖为“苦肉计”；庞统献连环计为“连环计”；周瑜派兵封锁孔明南屏山借风返回之路，待东风一起即杀孔明，为“瓮中捉鳖计”；孔明在南屏山以周瑜之弟周济为替身，自己乘赵云早就准备之船逃之夭夭，为“金蝉脱壳计”；刘备招亲为“美人计”。这十计中原作只有五条，另五计为艺人增添。十计环环相扣，关子特别抓人，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开打交战丰富多样，故有“大书之王”之称。由此可见，艺人在改编小说时，总要煞费苦心地围绕主要人物与主要矛盾来设计关目，经营和组织扣子，以便使故事情节既惊险又曲折，一环扣一环，使听众欲罢不能。

其二，对小说原著既有继承又有丰富和发展。继承，主要是从原著那里获取“书梁子”(主要人物故事和情节框架)，以便根据原著提供的故事情节和叙事脉络来加以演说；丰富则主要是在原著情节叙述的空白处或粗疏处增添了大量的生活化细节，使情节血肉丰满；发展是指根据原著提供的情节逻辑，进行合理的虚构和拓展，增加原著所没有的故事情节，或对原著的某些故事情节予以改动、矫正，使其更符合生活情理。其中，细节描绘的丰富细腻，可以是民间说书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前文曾提及北京评书名家双厚坪说潘金莲“挑帘裁衣”，能说半个多月，仅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的所谓“十分光”就能说两天。当然，这与他们喜欢节外生枝有关，但说表之细腻，无疑是极重要的因素。老舍曾说，评书艺人善于“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毫不苟，丝丝入扣”，他能“把书中每一细节都描绘得细腻生动”。[14] (P418) 比如，“说武松喝酒，便把怎么喝，怎么猜拳，怎么说醉话，怎么东摇西摆的走路，都说得淋漓尽致。他要说武松怎么拿虱子，你便立刻觉得脊背上发痒”。[5] (P44-45) (老舍：《大众文艺怎样写》) 那么，艺人们为什么要在原著的基础上大量增加细节呢？这显然与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不无关系。说书是诉诸听觉的艺术，它对听众意识的刺激是短暂的，必须立即奏效。因此，只要是应该交代的事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一一交代，不能遗漏，而且它还必须通过细致入微的描绘，造成形象、可感的画面，才能使听众“听得到”，“看得见”，心里头明白，所以它不仅要叙述人物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还要不断地说明人物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至于人物的善恶、美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也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来不得半点马虎。艺人行话即云：“交待不清，如钝刀杀人。”“表书不清，听客不明；衬托不到，听客直跳。”[8] (P639) 这样一来，其细节描绘必然会大幅度地增加，在文字上自然要比小说显得“噜苏”一些。说书艺人往往还会矫正小说原著中的思想局限。例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能借东风，是因为他“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能呼风唤雨”，这就把诸葛神化了。而扬州评话《火烧赤壁》则把诸葛借风，归因于他熟习荆襄一带冬天的气象规律，说他借风是蒙人的，是为了分散周瑜的注意，趁机溜走。这就比原著合理多了。

其三，说书艺人还喜欢在演说小说名著时加入当地的风俗民情。如扬州评话《水浒》演说的武松、宋江等人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北方，但是艺人却有意以扬州的市井小民为对象，描绘和塑造书中当时当地的各色小人物，诸如衙役、书吏、丫环、使女、贩夫、走卒、堂倌、屠夫等等，无不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另外，它在描绘书中环境时，也大量地插入当时扬州的建筑设施、民风习俗，赋予书目内容以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苏州评话艺人说《水浒》，也在有关回目中敷衍了江南的人物风情，《武十回》中王婆、乔郓哥、何九等，均被描绘成苏州式的市井小人物；《宋十回•初会牡丹亭》中对琵琶亭、浔阳江的描写都体现了江南园林建筑的景色。这样做，显然容易让当地听众倍感熟悉亲切，恍若身临其境；同时，也可以赋予书目以生活实感和时代意义，使书目常说常新。

其四，说书艺人在演说小说原著时一般都要千方百计地强化或增加人物、故事的趣味性，以便调剂书情，活跃氛围，迎合听众的审美口味。各地行艺口诀中都有“无噱不成书”的说法。研究扬州评话的著名

专家陈午楼甚至说：“趣味性是扬州评话的命脉，幽默感是扬州评话的个性”，“要求处处有科趣，时时见幽默，且用精湛的扬州方言表现出来，这是扬州评话最显著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15] 不过，说是“地方特色”，不够确当，因为对趣味性、幽默感的强调和追求，是许多说唱文学共有的特点。所以，老舍说：“提到趣味，通俗文艺或者比任何种文艺都更聪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晓得‘沉闷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一句话。”[5](P20)（老舍：《通俗文艺的技巧》）那么，说唱艺人是怎样来制造趣味的呢？一是利用人物言行与情节冲突来生发趣味，艺人谓之“肉里噱”，如张飞、李逵、程咬金、猪八戒等，就是说书艺人用来生发趣味的喜剧性人物；二是艺人穿插在书中的趣闻、笑话和科诨等，艺人谓之“外插花”。评书大王双厚坪即精于此道，他“当场能抓现哏，诙谐百出，真有‘翻堂的包袱’。什么叫翻堂的包袱哪？江湖艺人，不论是哪行，在台上把人逗笑了，调侃叫‘抖包袱’。多好的书料也不如好包袱有价值。……若能把全场的书座全都逗笑了，那调侃叫‘翻堂的包袱’。”[13](P266) 可见，趣味性是直接关系到书目能否叫座的重要法宝之一，故艺人才会常说：“噱乃书中宝。”

其五，说书艺人在演说小说原著时，还存在一个如何将小说原著的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话语的问题。因为故事主要是讲给复杂而众多的听众听的，书面语尤其像《三国演义》那样“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听起来不容易接受，所以说书艺人就不能不把书面语转换成听众所熟悉、了解、欢迎的口语甚至是方言俚语来讲，这样才能保证不识字的文盲也能听得懂。如此一来，改编本的口语化色彩就要比原著浓厚得多。例如，扬州评话《三国》就是以口语方言讲述的，甚至还经常活用当地流行的俗话、歇后语，频繁地使用语气词、象声词（常见的就有：啊、噢、嗯、哎、呔、嚯、唵、喳、嘘、啊哟、嘿嘿、嗨嗨、嗯咳、呜呜、哦哦、咦喂、噗咚、咕噜噜、哗啦啦、嚓嚓嚓、咚咚咚咚、哈哈哈哈等），故而当地群众听来就亲切易懂。这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区别于原著的一个重要特色。

总而言之，民间说书对古代通俗小说名著不仅起到了宣传和推广作用，同时还对它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加工，正因如此，它们才能变得更加通俗易懂，为民众喜闻乐道。侯宝林等所著的《曲艺概论》说：“实际上，刘备、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显然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劳动人民还不掌握文化的旧时代，是曲艺和戏曲艺人使这些英雄形象变成群众的亲密朋友。”[16](P116) 因此，当我们谈到明清小说名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不能忽视民间说书对于小说名著的宣传推广、充实加工等所起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胡士莹. 话本小说概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黄霖、韩同文选注.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3] 潘建国. 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 [J]. 复旦学报，2001，(1).

[4] 丁锡根编著.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 老舍. 老舍曲艺文选 [M]. 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

[6] 袁宏道. 听朱生说《水浒传》[A]. 马蹄疾. 水浒资料汇编 [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朱一玄、刘毓忱编. 三国演义资料汇编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8] 中国曲艺志（江苏卷）[Z].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6.

[9] 周良编著. 苏州评弹旧闻钞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0] 中国曲艺志（北京卷）[Z]. 北京：中国 ISBN 中心，1999.

[11] 张次溪. 天桥丛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夏晓虹编. 梁启超文选（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3] 连阔如. 江湖丛谈 [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14] 老舍. 谈《武松》[A]. 王派《水浒》评论集 [C]. 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90.

[15] 陈午楼. 从长篇小说发展到长篇评话 [J]. 扬州师院学报，1985，(1).

[16] 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 曲艺概论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王法敏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 左鹏军

[摘 要] 吴梅弟子是晚清民国戏曲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传奇杂剧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堪称传奇杂剧终结时期的突出成就和重要标志。吴梅弟子以传统的戏曲形式表现对时代的、民族的思考及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在戏曲体制上，吴梅弟子既坚持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又能进行适度的调整与改变，尤其重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统一，及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协调。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关键词] 吴梅弟子 传奇杂剧 思想艺术 戏曲体制 戏曲史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37-06

吴梅是中国近代戏曲史和戏曲研究史上的一座标志性的高峰；他的弟子们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戏曲创作和研究群体。作为学者型戏曲家，吴梅与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产生过深远影响，形成了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戏曲史、文化史现象。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创作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其展现出的独特的思想倾向、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在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一、一个独特的戏曲群体

吴梅（1884-1939）的戏曲创作集中于中年以前。早年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响，所作戏曲致力于反清革命的思想宣传、民族气节的张扬鼓吹，或取材于当时现实，或取材于历史故事，均贯穿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精神。歌颂戊戌六君子的处女作《血花飞传奇》，长歌当哭以悼秋瑾的《轩亭秋杂剧》，以明末瞿式耜抗清殉国事迹歌颂反清志士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风洞山传奇》，以宋末谢翱登严子陵钓台西台痛哭文天祥史事抒发强烈爱国激情和民族情感的《义士记传奇》等，均为典范。辛亥革命后，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和自身境况的变化，吴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所作戏曲或表现自由害人，或表彰义夫节妇，表达对当时世风日下的不满，也透露出保守的文化观念，取材于现实的《落茵记》和《泪碑》即为代表。这种政治文化观念一直延续到其晚年。20 世纪 20 年代后，吴梅以词曲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主，绝少再进行戏曲创作。吴梅的剧作，音律功夫极深，文词刻意求工，十分注意戏曲的舞台特点。这在传统戏曲走向式微，许多传奇杂剧作家重案头而轻场上，娴文学而疏曲律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其戏曲观念和创作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1917 年后，吴梅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古乐词曲。吴梅对弟子的要求也是戏曲创作和学术研究并重，成才颇众，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戏曲学、词学的创作和教学研究人才，卢前、蔡莹、任中敏、钱南扬、王玉章、孙为霆、唐圭璋、王季思、万云俊、常任侠、汪经昌等皆为其中之优异者。在吴梅的众多弟子中，有多人从事戏曲创作，有的长于杂剧，有的长于传奇，也有的二者兼擅，形成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戏曲创作群体。其中，卢前（1905-1951）作有杂剧五种，即《琵琶赚》、《荼荚会》、《饥为州》、《仇宛娘》、《燕子僧》，总署《饮虹五种曲》、《饮虹五种》或《卢冀野丙寅所为五种曲》，另有《楚凤烈传奇》、杂剧《女惆怅爨》（包括《巾帼帘》、《课孙》，后者未见）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调查与史实研究”（项目编号：04BZW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510006）。

蔡莹（1895-1952）作有杂剧《连理枝》一种，另有话剧《当票》一种，此两种尝刊为《南桥二种》；孙为霆（1900-1966）作有《太平鑿三杂剧》（即《断指生》、《兰陵女》和《天国恨》）；王玉章（1895-1969）作有《压抱肚杂剧》、《奸倭杂剧》（后者未见）；常任侠（1904-1996）作有杂剧《祝梁怨》、《田横岛》、《鼓盆歌》、《劫馀灰》（后二种未见）。据载，1949年后常任侠还尝作《妈列带子访太阳》（又名《妈勒传》）一剧，未知存否。

吴梅弟子娴于传统文学创作，但并不排斥新文学，如蔡莹、王季思等就曾创作过话剧剧本，卢前尝写过小说与新诗，常任侠也有新诗创作，还写过歌剧、诗剧、音乐剧和电影脚本等，表明吴梅弟子创作领域之广阔，也反映了新旧文学过渡转换时期的重要创作特征。

吴梅有意引领弟子们进行戏曲创作，创作活动与学术研究并重，是他一贯坚持的教学理念。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多经吴梅指点，或为润饰，或为点校，或作序跋，或作评点。吴梅对弟子们的学术研究也经常采取同样的方式支持鼓励，这些弟子早年戏曲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重，后来均侧重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吴梅与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与学术活动是传统戏曲研究、创作和教育走向现代之际的重要事件，在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和戏曲研究史上具有昭示传统戏曲及其创作最后命运的意义，也具有彰显传统戏曲创作和研究现代转换的历史价值。

二、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虽创作于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之下，但仍表现出某些共同特征或相近趋向，展示了作为一个戏曲群体的创作观念和价值追求，其核心是在新旧文化冲突嬗变、传统文化日趋式微背景下，对传统道德理想、文化观念和精神价值的留恋与坚守，对渐成往日风华的传统文化之现代价值的认定。

首先，借历史故事寄寓现实感慨，鼓吹弘扬民族气节，表现对国家政治局势、民族危机的强烈关注，贯穿着鲜明的时代精神。这一点，与吴梅早年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响，创作《血花飞传奇》、《轩亭秋杂剧》、《风洞山传奇》、《义士记传奇》等作品的情况极为相似，亦与郑振铎所说近代戏剧"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剧曲之丰碑"，"大有助于民族精神之发扬"[1](P1005)的精神相合。

卢前所作历史悲剧《楚凤烈传奇》堪称代表。作者尝云："《楚凤烈》旨在发扬忠烈"，"《楚凤烈》本事根据王国梓自述之《一梦缘》，与孔尚任《桃花扇》、董榕《芝龛记》、蒋士铨《冬青树》、黄燮清《帝女花》同为历史悲剧，无一事无来历，差堪自信者。"[2](卷首,例言)戏曲史上的历史剧绝少单纯地记述历史故事，大都有着或隐或显的现实机缘，讽刺时事与现状，寄予深刻的当下感慨。《楚凤烈传奇》完成于1938年，正值日军大举侵华并迅速南下之际，并非泛泛的追怀历史之作，有借古代故事寓伤时忧国情怀之深意。这在全剧最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丑）说来我小时光听阿爷说明朝亡时，多少做官的人卷了金银财宝，带了娇妻美妾，一逃了事，没有几个肯死的。后来被清兵杀掉了了事。（付）本来国破家亡，要么拼个你死我活，替国家出一分力，替百姓保一分廉耻，真个事不可为，痛痛快快的寻个死也好。老脸皮厚苟延性命，还算是一条好汉？"[2]在民族危机日甚之际对"忠烈"、"廉耻"的表彰，对"国破家亡"之际敢于拼死拼活、替国家出力的赞誉，对苟延性命、偷安求荣的讽刺，用意甚明，作者的民族情感也依稀可见。全剧结诗再次表明主旨："风云儿女多奇气，慷慨悲歌仔细看。一曲乍传楚凤烈，老夫落笔泪汍澜。"[2]此剧的广告也说："近代传奇作者如丁传靖、梁启超辈多不知律。此作发扬民族之精神，又系当家之作品。治文学者，案上不可无此书也。"[3]

常任侠《田横岛杂剧》发表于1930年1月，是一部具有浓重抒情色彩的单折杂剧。旨在借田横故事激发民族精神，鼓励民众同仇敌忾，反对日寇侵略，寻求世界大同。剧中本贯安徽颍上、读书江南的张霁青，显然就是常任侠本人（按：张常音近，常任侠原字季青）。作者本人登场抒情议论，慷慨悲歌，其伤时忧国、壮怀激烈之情喷薄而出。作者以这样的笔触抒情言志："（生）呀！这正是昔年田横之徒五百人自杀的去处！四面环海，孤屿凌波，英风萧飒，侠气纵横；虽在千百载下，犹令人激昂慷慨，不能自已！贤弟，我与你生当国难，忍辱苟活，有愧先烈也！……（生）贤弟，那五三烈士之血未干，历城仍为倭奴盘

据，正是危急存亡之秋，蒙垢负辱之际，你我作此勾当，真正无聊啊！”剧末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小桃红】恨虾族真狂妄，随落日将倾丧！问何时才免去侵凌象？何时才改尽凶残状？何时才现出清平样，解兵戈共乐无疆？”此剧虽作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但作者对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担忧、对民族危机的清醒认识可见可感。

孙为霆《太平爨三杂剧》完成于1943年，时作者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这是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卢前《太平爨序》云：“此剧之成，乃在拔木破山，倒江翻海，血战玄黄，风雨如晦，二十年后如今日者，旨意之深，气势之隆，又非集之之徒所得而比肩者已。”[4]正是当时历史环境和作品旨趣的揭示。作者自序云：“近作杂剧三种，……取材则本《秋蟪吟馆诗》与忠王供词，而旨在褒正砭邪，廉顽立懦，不作寻常风月语也。”[4]朱宝昌《题雨廷八兄壶春乐府》咏《太平爨》云：“太平英迹渺难求，留待词人著意搜。洗尽岛夷污秽语，未妨爨弄有阳秋。”霍松林《读雨廷师壶春乐府》云：“太平三爨翻新调，谁识词翁托意深。写就英雄流血史，红旗一夜遍江浔。”[4]可见，《太平爨三杂剧》虽未直接表现当时日军野蛮侵华、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现实，但通过对战争局势的关注、对英雄的礼赞和对太平的向往，确实寄予了作者“褒正砭邪，廉顽立懦”的深远寄托和热切期待。

其次，取材于历史故事，反映当下世态炎凉、人心变迁，表达对某些传统道德观念之现代意义的探寻与思考，对某些传统价值日渐失落的警戒和担忧，表现出浓重的眷恋往昔、坚守传统的怀旧情怀。吴梅弟子这种思想倾向和创作心态，与吴梅辛亥革命后的思想状况和创作转变有相似之处。吴梅作于民国初年的《落茵记》、《双泪碑》、《绿窗怨记》、《东海记》等传奇中对传统爱情婚姻观念的认同，对节妇烈女的褒扬，和对新式爱情、自由婚姻的讽刺就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和心态。

常任侠《祝梁怨杂剧》完成于1933年12月，情节虽无创新之处，但通过一曲哀婉缠绵、感天动地的爱情悲歌，表达了作者对这种蔑视生死、超越时空的爱情的由衷赞美，正如题目正名所标识的：“同池三年管鲍交，痴情千古祝梁怨。”[5]从作者对这一家喻户晓的动人故事的重新表现和解读中，可以看到对传统爱情观念之现代意义的探寻与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及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将这一故事写得如此凄婉动人，寄予了作者深切的价值认同。在这一爱情故事背后，蕴含着更加深广的关于传统和现代、继承和超越等道德伦理问题的追问。

蔡莹《连理枝杂剧》通过孙三娘与赵二官的爱情悲剧尤其是孙三娘可怜可悲的命运，反映了传统道德观念、家庭秩序、父母之命对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束缚和破坏，特别是婆婆对媳妇命运的独断控制和无情宰割，寄予了对孙三娘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实际上提出了妇女社会地位和妇女婚姻自主的问题。孙三娘即将自尽时的感慨哭泣就是女性孤独无助的控诉：“（三娘泣云）可怜俺一生孤苦零丁，虽嫁着个同心夫婿，却不曾有过一天舒服日子。但愿生生世世，永不再做女子身了。……【一煞】没来由再思量，今后呵待怎生。从来最是人心硬，掂斤播两分恩怨，数黑论黄较浊清。言难罄，看遍了昏颠世事，冷暖人情。”[6]作者的创作主旨、风格特点也得到集中体现。

卢前杂剧《奴惆怅爨》之《窥帘》表现相国郑畋之女小娘与钱塘秀才罗隐的命运以及二人关系的几番变化，篇幅短小，人物不多，故事简单，但内涵丰富，所反映的人心变化、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深入真切，意味深长，作者对仁义忠信、质朴率真、重义轻利、一诺千金等传统道德品格的认同与期待亦寄寓其中。在对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之徒的讥讽中，也蕴含着世事难料、命运难测的思考与追问。

王玉章《压抱肚杂剧》通过两村村民为争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遗失的一条价值十万贯的玉带而相互争斗、不择手段的故事，表达对天下太平的向往。结束曲【南中吕千秋岁】云：“金缕讴，整顿得江山秀，是天下乐升平时候。破了江南，真个是破了江南，把一个太平朝消归乌有。曾和左，如山斗，彭和李，俱不朽，天地同长久。向觚棱北望，共庆千秋。”[7]通过对太平军的讽刺，对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和李鸿章等人的赞誉，表现了正统观念；通过对村民见利忘义、你争我夺的描写，讽刺了人性的弱点。与此同时，也寄予了作者对近现代世道变迁之际忠奸善恶、情理义利、人心向背、世情民风等转换变迁的思索。

三、戏曲体制趣味的通变

从艺术趣味和戏曲体制的角度来看，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也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这主要表现为认同并守护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在此基础上亦能较为自觉地对戏曲传统进行适度的调整和改变，在通与变之间选取了温和兼顾、兼收并蓄的创作策略。

第一，戏曲修养较为全面，娴于传奇，更重视杂剧，杂剧创作成就明显高于传奇创作。

吴梅弟子创作的杂剧数量明显多于传奇。吴梅弟子所作戏曲，蔡莹一种，孙为霆三种，王玉章二种，常任侠四种，均为杂剧。卢前所作戏曲八种，其中七种为杂剧，传奇仅《楚凤烈》一种，这也是目前笔者所见知的吴梅弟子创作的唯一一种传奇。这与吴梅本人传奇创作多于杂剧创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种情形当与吴梅对学生的教育与要求有关，在教学中将杂剧置于传奇之先，以杂剧为戏曲研究与创作取径入手之始；也与杂剧的体制特点和格调趣味有关，杂剧较之传奇，格律较为严密，曲式与文辞更加讲究，篇幅也较为短小，而杂剧的格调也更加高古渊雅，趣味更加自然晓畅。在传奇与杂剧之间，吴梅更重视杂剧，将此作为弟子们研究和创作戏曲的起点，确有穷本溯源、取法乎上之深意存焉。

第二，护卫并坚守杂剧与传奇的原有体制规范，也不一概排斥变革传统戏曲的旧有习惯，有意识地对传奇杂剧的体制规范进行适度的调整与创新。

从戏曲史的意义上说，传奇杂剧体制规范逐渐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它不断创新、走向消解的过程。这种通与变、立与破、扬与弃的复杂关联，构成了变动不居、丰富多彩的戏曲史面貌。至明代，元杂剧演唱北曲、一人主唱、四折一楔子的习惯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文人传奇在体制充分严密化、规范化的同时，也发生了南北合套、篇幅缩短等显著变化。传奇杂剧体制的传承与变化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至乾隆末年以降，二者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出现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一方面表现出对传统戏曲体制的熟悉与喜爱、继承和守护；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戏曲体制有所变革，有时甚至进行自觉而明显的改造和创新，反映了吴梅弟子在新的戏曲环境、文化背景下关注并拯救戏曲传统的不懈努力。

这首先表现在作品的折数（出数）方面。吴梅弟子所作杂剧中，仅有蔡莹《连理枝》和常任侠《祝梁怨》两种各为四折，严守元杂剧的体制规范，曲词与说白均自然率真，朴质无华，以情动人，颇有本色派戏曲的特点。王玉章《压抱肚》为二折，其他八种均为单折短剧，表现出以突破元杂剧体制规范、变革戏曲传统为主导的创作倾向。卢前《窥帘》虽为杂剧，同样不分折，且有三人放唱，显系元杂剧体制之变。

其次表现在套数选择、角色安排、关目设置等方面。孙为霆《太平爨三杂剧》自序云："所以为三折者，期于一夕演完。当此旧乐衰沉之际，为便于搬演，情节安排、排场布置与脚色分配，无一不取苟简，识者自能谅之。"[4]将既要尽力护持和坚守杂剧传统，又不能不对原有体制进行若干变通改造的情形表达得相当充分。这种创作心态和艺术处理方式在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中颇有代表性，也反映了清乾隆末年以降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传奇杂剧的处境和际遇。

卢前《楚凤烈传奇》凡十六出，篇幅较短，已与典型的明代文人传奇体制相异；与同时期传奇相较，属最为常见的中等长度的作品，与当时传奇创作的总体倾向相同。与此同时，作品也表现出执著护卫传奇原有体制规范的倾向。卢前尝说："《楚凤烈》全部用南曲。"[2](卷首,例言)又说："作者自信颇守曲律，不似近贤，墨脱陈式，不问腔格者。惟第六出记献忠、自成之叛，在【雁过沙】后用【江头金桂调】加快板唱，似有未安，然于剧情尚无不合，故仍之。"[2](卷首,例言)此语中有两点尤可注意：一，全部用南曲并尽可能谨守曲律，偶有未合，亦是内容所需，表明作者对曲律极为熟稔与重视；二，当时创作传奇杂剧不守曲律、不遵曲谱者大有人在，此剧之作有昭示正轨、不同流俗之意。此剧为夙好北词之卢前作南曲传奇的尝试，这种努力是富于戏曲史意味的，既表明严守旧制、延续传统的强烈愿望，又反映了不能不寻求创新、变革传统的历史必然。

第三，既重视戏曲的音乐性和舞台性，又强调其可读性和文学性，力求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的融合，

为传奇杂剧寻求尽可能广阔的生存空间，最大限度地延续传统戏曲的生命力。

如何处理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的关系以及二者的长短利弊、优劣高下，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长期存在而且影响深远的问题。清乾隆末年以后，特别是吴梅和他的弟子们从事戏曲创作和研究的20世纪前期，这一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对传奇杂剧的当下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影响至为重大。在案头之曲日渐发达、场上之曲渐趋萧索的环境下，吴梅和他的弟子们实际上在进行着守护戏曲传统、坚持舞台性和音乐性、振兴场上之曲的努力。

卢前尝自述云："我的《饮虹五种》——《琵琶赚》，谱蒋檀青事。《仇宛娘》，谱仇宛玉事。《饿为州》，谱蒋师辙事。《荣黄会》，实际上谱我的家事。《燕子僧》，谱苏玄瑛事。以上皆北曲。"[8](P210) 吴梅评《饮虹五种》说："置诸案头，奏诸场上，交称快焉。余按诸折中，《琵琶赚》感叹沧桑之际，《饿为州》记述循良之绩，于家国政俗，隐寓悲喟，已非率尔操觚之作，若宛玉一剧，尤足为末流针砭，盖礼教废而人伦绝，夫妇之离合，不独可觇世风之变，而人情之淳浇，即国家兴亡所系焉。曲虽小艺，实陈国风，而可忽视之乎？近世工词者，或不工曲，至北词则绝响久矣。君五种皆俊语，不拾南人余唾，高者几与元贤抗行，即论文章，亦足寿世矣。"[9] 吴梅的评价实际上具有戏曲创作的指导性意义，表明吴梅及其弟子们积极提倡并努力实践的词曲并工、比肩先贤、合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二而为一的创作理想和艺术追求。

其他吴梅弟子的杂剧创作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蔡莹《连理枝杂剧》和常任侠《祝梁怨杂剧》对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体制的遵守，对北曲的坚持，王玉章《压抱肚杂剧》曲词宾白的本色自然、生动传神、韵味隽永，常任侠《田横岛杂剧》的悲愤慷慨、高亢激昂，都表现出融合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协调戏曲文学性与表演性的倾向。在传奇杂剧真正走向衰微的历史时刻，益发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四、戏曲史意义的彰显

杂剧和传奇经过元明两代的充分发展，已高度繁荣且影响深远，而清康熙年间"南洪北孔"则可作为传奇创作达到鼎盛的标志。乾隆末年是中国戏曲史一个至为关键的转捩点，由于花部戏曲的兴盛，传奇杂剧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冲击，此后，传奇杂剧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微直至消亡的不归路。20世纪最初20年间，由于"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传奇杂剧得到了一次兴盛发展的短暂机会，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戏曲家和戏曲作品。而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话剧的兴盛，对传奇杂剧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打击，以至于使其迅速失去了发表传播的机会。到20世纪40年代末，古老的传奇杂剧终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路程，永远消失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之中。

面对乾隆末年以降的戏曲状况，吴梅曾发出这样的感叹："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10](P185)① 又说："自逊清咸同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正始日远，牙旷难期。"[11](P259, 自叙) 他还说过："况光宣间，黄冈俗剧，正遍海内；内廷宴集，大率北鄙噍杀之声。词曲之道，几几亡失矣。夫词家正轨，亦有三长：文人作词，名工制谱，伶家度声。苟失其一，即难奏弄。自文人不善讴歌，而词之合律者渐少，俗工不谙谱法，而曲之见弃者逐多；重以胡索淫哇，充盈里耳；伶人习技，率趋时尚，而度曲之道尽废。"[11](P305)② 有感于此，从1917年起，吴梅首先在中国的大学课堂开设戏曲课程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弟子，力图以教育和学术护卫中国戏曲传统。这与王国维1913年撰成《宋元戏曲史》并将元杂剧誉为"一代之文学"异曲同工、精神相通。而吴梅弟子及其戏曲创作的出现，正是这种努力结出的丰硕果实。因此，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创作具有延续和振兴传统戏曲生命的意义。作为一个学有渊源、自成面目、颇有气象的传奇杂剧创作群体，在晚清民国戏曲史上，吴梅弟子可谓绝无仅有、独一无二。

从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的角度看，吴梅弟子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特别是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次呈现和重新解读所表达出的对当时重大社会矛盾尤其是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强烈忧患与关注，表现出来的强烈入世精神和忧患意识，均与近现代中国戏剧及其他文体一再表现的在新的世界格局中

①②笔者对原标点有所调整。

反思传统、重估自我、寻求出路的主体精神息息相关。他们表达的对传统爱情观念、婚姻习俗、世态人心与现代价值之间的矛盾，对忠与奸、善与恶、义与利、情与理的纠缠与冲突的思索，在某些传统价值面临崩解和新价值系统尚未建立之际的孤独无助和无所适从之感，都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中不断再现。吴梅弟子以传统戏曲的形式表现这种时代的、民族的思考与诉求，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在精神上获得新的生命，他们的这一独特贡献，非同时代的其他戏曲家所能比拟或替代。

吴梅弟子对传统戏曲体制与艺术趣味的护卫与坚守，既表明他们不肯退让、不合流俗的戏曲理念，对传统戏曲的一往情深，也表明传奇杂剧真正到了走向终结的最后时刻；吴梅弟子对典范的传奇杂剧体制的适当变革，不仅表明对其合理性的认同和弘扬，而且表明对戏曲变革的必然性和戏剧形态时代性的理论体认和艺术实践。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执著态度和眷恋心态，不只让人体会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也令人感受到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后，万劫不复地走向消亡或无疾而终的文化传统又何止一二而已！吴梅弟子这种既有意识地坚守传统又不得不适当变革传统的戏曲创作方式和文化态度，也是为走向式微终结的传奇杂剧寻找尽可能广阔而持久的生存空间，当然也透露出这最后一批传统戏曲家同时也是第一批现代戏曲研究者内心的深刻矛盾。由于娴于戏曲体制，深谙戏曲趣味，使得吴梅弟子能够本色当行地传承与变革传奇杂剧的形式和格调。在晚清民国戏曲史上，真正具备这种素质的戏曲家并不多见，当时大量出现的是以变革甚至消解传统戏曲形式，以诗词、文章、政论演说为戏曲的戏曲家，因此，吴梅弟子对传统戏曲形式采取的态度便显得弥足珍贵。

吴梅弟子对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并重，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相统一的追求，实际上具有清理总结这一中国戏曲史上长期存在且多有争论的重要问题的意味。吴梅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吴梅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经验，形成了在当时文化背景下颇为特殊、在戏曲修养方面非常全面的知识结构，具备了理论阐发与艺术实践兼擅、场上之曲与案头之曲并重、戏曲研究与戏曲创作双美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与素质，造就了吴梅弟子戏曲创作和戏曲研究的独特面貌，也使他们在传奇杂剧尚能生存延续的最后阶段，做出了扎实不懈的努力和无可替代的贡献。当时，也只有吴梅及其弟子们具备如此全面的素质和能力，包括梁启超、林纾、俞樾、高增、丁传靖等在内的许多戏曲家或不通音律，或不谙搬演，愈来愈明显地走向以诗为戏、以文为戏、以议论为戏、以学问为戏的道路，使戏曲远离了音乐和舞台，使传奇杂剧鲜活的艺术生命日渐丧失。在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戏曲状况和文化背景下，吴梅弟子这种看似不偏不倚、中正和合的理论主张和艺术实践，实际上蕴含着更关注和强调场上之曲的意味。这也是挽救传奇杂剧衰微命运的最后一次努力。

[参考文献]

[1] 郑振铎. 晚清戏曲录叙 [A] .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卢前. 楚凤烈传奇 [M] . 民国朴园巾箱本.

[3] 民族诗坛（第三辑），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 年 7 月.

[4] 卢前. 太平鑿三杂剧（卷首）[A] . 壶春乐府 [M]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1964 年 7 月铅印本.

[5] 常任侠. 祝梁怨杂剧 [M] . 南京：永祥印书馆，1935 年 10 月铅印本.

[6] 蔡莹. 连理枝杂剧 [M] . 民国年间铅印单行本（又 鹣桥二种》收录，民国年间铅印本）.

[7] 王玉章. 玉抱肚杂剧 [A] . 卢冀野. 木棉集（附录）[M] . 1928 年 7 月.

[8] 卢冀野. 中国戏剧概论 [M] . 上海：世界书局，1934.

[9] 吴梅. 序 [A] . 饮虹五种（卷首）[M] . 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本，1931.

[10] 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 [A] . 王卫民编. 吴梅戏曲论文集 [M]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11] 吴梅. 曲学通论 [A] . 王卫民编. 吴梅戏曲论文集 [M]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王法敏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 杜运通　杜兴梅

[摘　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我们社和太阳社看作同一个文学社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两个社团的人员组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当局查封时的情况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方面作了深入比较，并对其代表人物蒋光慈、洪灵菲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和风格不同的形成原因作了探析。

[关键词] 我们社　太阳社　人员组成　革命文学论争　小说创作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143-05

孟超在 1951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洪灵菲选集·序》里说："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国庠，组成了'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1980 年由吴泰昌记述的《阿英忆左联》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一辑，文中谈到左联七个常委的代表性时，阿英说："夏衍既可代表太阳社，又可代表创造社，冯乃超代表后期创造社，钱杏邨代表太阳社，鲁迅代表语丝社系统，田汉代表南国社，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元老，洪灵菲代表太阳社（特别是代表并入太阳社的我们社）。"后来易新鼎在《太阳社》一文中又说，太阳社、我们社"他们虽然独标一社团旗号，实际上是一个组织，除出月刊外。"[1](P486) 如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把我们社、太阳社看作"一个组织"。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我们社始终未曾并入太阳社

1927 年 6 月，蒋光慈、钱杏邨、冯乃超等人在武汉曾酝酿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之事。不久，"7·15"事件发生，他们不得不离开武汉逃亡上海，于 1928 年 1 月在上海组成了太阳社，同时创办《太阳月刊》，并筹资开设了春野书店（书店名取自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太阳月刊》由春野书店发行，每月 1 日出版。当出至第 7 期（1928 年 7 月 1 日出版）时被国民党查封，编辑部发表了《停刊宣言》。但发行《太阳月刊》的春野书店仍继续营业。在《太阳月刊》被查禁后 2 个月，春野书店因出售《世界周刊》遭当局查封。我们社则在 1928 年 5 月成立于上海。编辑出版《我们》月刊，1928 年 8 月 20 日出至第 3 期后停刊。我们社还创办有晓山书店，由该书店发行《我们》月刊，并出版《我们社丛书》。1929 年 2 月 19 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致函国民政府："查上海晓山书店发行之《我们》月刊第三号选载《献给既经死了的 SP》及《重来》新体诗两首，核其语气，完全共产口吻，其余文字均属以文字为面具实行宣传之作品。"转请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并令上海特别市政府及上海临时法院查封晓山书店。国民党政府次日（1929 年 2 月 20 日）即发出查禁查封令，立即查禁了《我们》月刊，并同时查封了晓山书店。所说的《献给既经死了的 SP》，是森堡（即任钧）悼念烈士的一首长诗；另一首《重来》，作者藏人在结尾深情呼唤：终有一天，我们的热血会将鹦鹉洲、黄鹤楼"染得通红、通红！"[2](P27-29)

从我们社、太阳社的成立，到不同时间、因不同缘由被国民党分别查封的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从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来看，我们社与太阳社也并非一个文学社团。在 1930 年 3 月 10 日出版的《拓荒者》第 1 卷第 3 期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报道。文章开头写道："自从

作者简介　杜运通，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杜兴梅，韩山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521041）。

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其实也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笔者注）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3月2日正式成立了。”文中我们社与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相提并论，看不到我们社隶属于太阳社的蛛丝马迹。左联成立后，太阳社成员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都加入了该组织，这是事实，但说我们社并入太阳社则于史无据。

二、我们社与太阳社人员组成不同

太阳社如同当时的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诸如太阳社的四位发起人：蒋光慈，安徽六安人；钱杏邨，安徽芜湖人；孟超，山东诸城人；杨邨人，广东潮安人。其他的主要成员：（刘）一梦，山东沂水人；（楼）建南，浙江余姚人；任钧，广东梅县人；殷夫，浙江象山人；如此等等。

我们社的人员组成则不是来自“五湖四海”，而是清一色的潮汕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广东辗转流亡抵沪的。我们社的中坚人物有三个：洪灵菲、林伯修和戴平万。洪灵菲（1902—1933），原名洪伦修，广东省潮安县江东乡红砂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新加坡、暹罗等地。归国后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运失败后赴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创办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当选为七个常务委员之一。1933年2月调往北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处工作，7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庠，广东澄海莲阳乡兰苑村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07年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研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归国，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北京大学执教；1925年后回家乡任金山中学校长等职。1928年1月辗转到上海，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宣传工作，30年代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广东省社联主席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戴平万（1903—1945），原名戴均，曾用名戴万叶等，广东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人。戴与洪灵菲是小学、中学、大学同级学友和挚友；1926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由国民党海外部派往暹罗陶公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洪灵菲一道颠沛流离至上海，携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上海“孤岛”时期一直留守“孤岛”坚持文艺斗争；1940年11月调往苏北根据地工作，曾任苏北区党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45年初夏溺死于兴化县。除上述3人参加过太阳社外，我们社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李春鍏（李一它）、李春秋（李伍）等，这些人均为潮汕地区的文学青年。我们社成员的这种区域特征，在现代有影响的社团流派中极为少见。

这里要提及的是，鲁迅先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涉笔“王独清领头的《我们》。”王独清是陕西西安人，他是创造社作家而非我们社成员。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祝词》一文，这是该刊首篇文章。他在《祝词》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其论调与当时的创造社其他同仁相互呼应。我们社虽然诞生于上海，但在潮汕地区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1935年，进步青年曾定石、曾广等人还在揭西县五经富圩内创办了“我们书室”，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1936年中共韩江工委成立后，就在“我们书室”建立了地下“抗日义勇军五经富支部”。1937年秋党组织又把“我们书室”改组为全县性的“救亡剧社”，该剧社办有抗日救亡小报。

三、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文学论争期态度不同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中，我们社与太阳社的步调并非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革命文学和自我的认识不同。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卷头语一诗中说：“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不论是太阳社社名、《太阳月刊》刊名，还是卷头语，他们都把自己喻作“太阳”，看成“光明的象征”，仿佛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人类，只有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够创作出革命文学来。这实质上与“唯我独革”，我“是革命的儿子”、我“是时代的创造者”、[3]以及无限夸大革命文学的组织生活与创造生活的作用、视文艺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月刊的编者在卷头语中则把自己的作品比

作“战鼓”，这鼓声既“不悦耳”，也“不和谐”，既“没有节奏”，也“没有韵律”，但它可以“给同情我们者”以兴奋、沸热、勇气和启示，又可以“给背叛我们者”以战栗、恐怖和死亡。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支笔，就会使它从另一方面蓬勃起来。”[4](P26) 用笔作武器宣传革命，鼓舞民众，使革命运动再度蓬勃起来，这是洪灵菲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的初衷。《太阳月刊》的封面画的是金光四射的太阳，《我们》月刊的封面则绘着一只健壮的手臂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太阳”和“火炬”，这也许正是太阳社和我们社在对待革命文学和自我认识上差异的形象标志吧！

其次，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同。我们社、太阳社和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倡导革命文学，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阶级性、描写对象、与革命的关系及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痛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把文学活动同时代和作家使命感结合起来，顺应历史的潮流，将注入新质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起到了鼓舞作用，这些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但是，由于太阳社、创造社受到了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却突如其来地发动了一场对鲁迅的批判。从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第1期上发表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开始，指名道姓地嘲讽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的时代“落伍者”。之后，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接踵而至，以至到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给鲁迅头上扣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参加了这场反对鲁迅的“大合唱”。蒋光慈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文章，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通通斥责为“旧作家”、“不革命的作家”，认为他们“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不能承担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3] 甚至认为他们不可能变为“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传习的背景，“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5] 尤其是钱杏邨发表在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和《我们》月刊创刊号上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非难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是革命文学的障碍”。并说“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企图“踢开”鲁迅。实事求是地说，太阳社的有些观点比创造社还要偏激。

然而，我们社却不同。笔者查阅了《我们》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刊物，并未发现我们社成员直接攻击鲁迅的文章。戴平万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上发表《他的精神活着》，文中评价鲁迅说：“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余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虽然鲁迅死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他的精神仍是长留永在。”从戴平万的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社对待鲁迅的态度。不仅如此，2006年1月，在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社成员李春蕾的女儿李魁庆向大会提交了《我所知道的我们社》一文。文中写道，她在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杜国庠永远活在我心中》时看到：1928年的一天，杨邨人以太阳社代表的身份来到晓山书店，我们社正在开会。杨邨人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杨邨人话音刚落，杜国庠就气愤地说：“鲁迅是人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合作。相反地，我们还要团结鲁迅，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接着，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和支持杜国庠的意见。杨邨人坐着不敢说话，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以上事实说明，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对自我的评价，以及对待鲁迅的态度这些重大问题上显然步调不同。

四、我们社与太阳社在创作上的差异

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也是普罗文学的权威代言人。蒋光慈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6](P62)“革命+恋爱”公式的始作俑者，[6](P76) 还在于他最早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并开拓了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崭新的表现领域。其

小说以工人为描写对象，反映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短裤党》、《最后的微笑》和《田野的风》。蒋光慈的“工人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普罗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三级跳”。从思想内容看，城市暴动→工人反抗→工农联盟的武装斗争；从人物形象塑造看，模糊的群像→侠客式的个人英雄→成熟的革命领导者形象。这两条轨迹清楚说明，蒋光慈以阶级分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情工农大众的价值判断标准，热情礼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卫眼光，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线性的情节结构和粗犷直率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革命文学新文本，使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彰显了普罗文学的现代性、鼓动性和稚气，奠定了蒋光慈革命文学开山祖和普罗文学代言人的地位。

洪灵菲是我们社的中坚，被誉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7](P87) 从1927年到1930年上半年，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及翻译作品约200万字。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基本上都出版在我们社时期。其出版顺序为：《流亡》，1928年4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前线》，1928年5月20日上海晓山书店出版，并同时发表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转变》，1928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但是，从作者实际人生经历、小说反映的时空纬度和历史事件固有的时序来看，则呈现出逆时性。《流亡三部曲》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知识青年的沉迷、挣扎、觉醒和反抗为叙事话语，努力表现觉醒者与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重大主题，从“五四”落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香港大罢工、“4·15”政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的性质，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坛的翘楚之作。《流亡三部曲》是自传体小说，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的特征，蕴含着作家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这显然是受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因为洪灵菲就是郁氏门下的高材生。但不同的是，《流亡三部曲》没有郁达夫小说中的伤感和颓废，自戕和沉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在革命的召唤下崛起和抗争，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壮潮密切相连。这正是新兴的普罗文学与此前的“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显现。洪灵菲在处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或者恋爱至上，因为恋爱脱离了革命；或者一心革命，因为革命抛弃了恋爱。而是坚持革命第一，恋爱第二，“不以恋爱牺牲革命”的人生原则。在他看来，惟有革命才有光明的未来。这是洪灵菲作为“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的耀眼之处。[8](P66)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蒋光慈的小说多描写工人运动和工人形象，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其文风粗犷豪放，激情喷涌，豪侠浪漫，鼓动性大于审美价值。而洪灵菲的小说则带有自叙传色彩，反映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恋爱的执著追求，具有自我暴露，不事雕琢，华美凄艳，浪漫抒情，精芜俱存的个性特征。

五、造成我们社与太阳社差异的原因

我们社、太阳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1928年前后，正值国内外“左”倾文艺思潮泛滥时期。国际上，苏联“拉普”派认为，“以往时代的文学都渗透了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了王公贵族、富人——一句话，‘成千上万上层人物’的习惯和感情，思想和感受。”[9](P15) 他们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创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过去迥然有别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他们还把小资产阶级文学统称为“同路人”文学。“拉普”派从庸俗社会学和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排斥“同路人”作家，甚至连高尔基也被看成了资产阶级作家和市侩文人。在日本，受福本和夫、藏原惟人的“理论斗争”、“分离结合”等“左”倾思想影响的左翼文坛，派系林立，内战不已。“纳普”派认为艺术只是政治煽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激情，可以最率直、最粗野地大胆表现出来，”旧的形式和技巧“从根本上威胁着经过苦难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艺术。”[10] 因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艺术进行批判。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期间，苏联的“拉普”派正在崛起，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他与“拉普”派是否有过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从他思维逻辑的定势和理论架构的起点来看，与“拉普”派极为相似。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曾说：蒋光慈在苏联学习期间，“能够相当熟练地阅读俄文资料。他的重要观点与《在岗位上》杂志（“拉普”派的重要刊

物——笔者注）及其续刊（《在文学岗位上》——笔者注）的撰稿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11](P158) 后来蒋光慈到东京看病，还亲自到藏原惟人家拜访，并从那里借到佐宁的《为普罗写实主义而战》等书。

太阳社的重要理论家钱杏邨，他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力的文学”的理论依凭，一方面来自苏联“拉普”派成员佐宁的《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书；另一方面来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和《再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文章。尤其是在和茅盾的论战中，钱杏邨是“搀着藏原惟人，一段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12](P241)

另外，蒋光慈留苏时就十分喜爱文学，与瞿秋白结为慕友，1927 年“4•12”前付梓的《俄国文学概论》便是他们合作的论著（此书出版于 1929 年），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武汉形势逆转后，蒋光慈回到上海，曾就创办《太阳月刊》的意图向瞿秋白请示，“秋白同志都同意了。为了研究问题，阿英（钱杏邨）和蒋光慈也一同去找过瞿秋白，在太阳社成立那天，瞿秋白等都参加了。”[13] 太阳社成员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社内建有基层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闸北区委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太阳社不仅受到了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也受到了党内瞿秋白“左”倾思想的直接影响。

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林伯修虽然留学日本，但在 1919 年时已回国。他在留日期间受惠最多的是河上肇。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25 年 11 月他在家乡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是受了东征来潮汕的周恩来的指示，1927 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汕时，林伯修在汕头又会晤了周恩来、郭沫若（林伯修与郭沫若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但两人性格、学术兴趣不同）。洪灵菲、戴平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了许甦魂的影响。许是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6 年国民党“二大”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外事部秘书；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 年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 年 9 月在红军“肃反运动”中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惨遭枪杀，1945 年中共“七大”后平反昭雪。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洪灵菲、戴平万都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与当时的“左”倾思潮无缘。事实上，在《我们》月刊所发表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理论文章中（如：王独清的《祝词》、石厚生的《革命文学的展望》、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钱杏邨的《朦胧以后》），在我们社同仁翻译的苏联文学、日本文学的译文中，以及在洪灵菲、戴平万等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左”倾印痕。我们旨在说明的是，在当时我们社比太阳社受到的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要小得多。由此，我们社与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及在创作实践上的“同中有异”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参考文献]

[1] 贾植芳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 [M]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

[2] 倪墨炎. 现代文坛灾祸录 [M] . 上海：上海书店，1996.

[3] 蒋光慈. 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 [J] . 太阳月刊，1928，(4).

[4] 洪灵菲选集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蒋光慈. 现代中国社会与社会生活 [J] . 太阳月刊，1928，(1).

[6]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 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 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 蒋光慈. 异邦与故国 [M] . 上海：现代书局，1930.

[9] “拉普”资料汇编：上 [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 刘柏青.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 [J] . 文学评论，1981，(6).

[11] [斯洛伐克] 玛利安•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2] 鲁迅全集（4 卷）[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戴淑贞. 阿英与蒋光慈 [J] . 新文学史料，1983，(2).

责任编辑：陶原珂

•文化与传播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 梅琼林　连水兴

[摘　要] 文化人类学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理论渊源，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具有一致性，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亦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文化人类学对传播学中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经典学派的创新、仪式派的产生及大众传媒研究都有贡献。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　传播学　主体性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 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 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 communication 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 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P114) 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

作者简介　梅琼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连水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430072）。

①就目前所见的文献而言，国内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刘强　《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一文（载　《雅阴师专学报》1997 年第 4 期）对本文写作启发颇多，特此致谢。

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 (communication) 与社会 (community) 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P2-4) 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P4) 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 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

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P250)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P23) 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P187) 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P2) 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 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 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①R.埃德格顿、L.朗格奈斯《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方式》，旧金山，1974年，第4页。转见〔俄〕IO.叶梅利亚诺夫《文化人类学的现状和前景》，由之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 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 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 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 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 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 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 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 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

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 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 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 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海龙、何勇. 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 [M] .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 刘强. 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 [J] . 淮阴师专学报，1997，(4).

[3] 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 传播学概论 [M]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 [M]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5] 胡翼青. 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 [M] .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 王铭铭.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 [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 佩克•库西著，张晓翔等译. 人，这个世界 [M] .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 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 文化模式 [M]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 怀特著，沈原等译. 文化的科学 [M]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 常燕荣、蔡骐. 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 [J] .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2期，2005年3月.

[11] 蔡骐、谢莹.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 [J] . 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号.

[12] 郭建斌. 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 [J] . 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3] 蔡骐、常燕荣. 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14] 孙皖宁. 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 [J] .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

[15] 萨拉•迪基. 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 [J] .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文版)，1998，(3).

责任编辑：陶原珂　王法敏

①B.S.巴维斯卡的评语见 [美] 柯克•约翰逊《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展明辉、张金玺译，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近代报业怪杰　文界革命先锋

——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

◎ 许翼心

[摘　要] 郑贯公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一位重要的民主革命派宣传家。1900 年至 1906 年间，他先后参与六家报刊的编辑，其中包括：创办并主编第一家海外留学生期刊 《开智录》，主编近代报纸的第一个文艺副刊 《中国日报·鼓吹录》，创办和主编第一家文艺性革命小报 《有所谓报》。他率先将通俗文艺引入报刊，并编撰了最早的一部政治小说 《瑞士建国志》，创作了大量反帝反封建的新粤讴。他堪称中国近代报业怪杰，文界革命急先锋。

[关键词] 郑贯公　近代报刊　文界革命　政治小说　新粤讴

〔中图分类号〕 G21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7) 07-0153-05

在 《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界革命》[1](P74-87) 一文中，我曾经指出：21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以香港 《中国日报》社的记者编辑为主体，粤港地区形成了一个革命派的作家群体，他们在鼓吹民主革命，改革各种文体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而黄世仲和郑贯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对于黄世仲，近年来文学界已开展多方面的研究；而对于郑贯公，除了报刊史上给予肯定外，他在文学革命和创作上的成就，却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全面评价。

一、游学东洋，创办首家留学生期刊 《开智录》

郑贯公 (1880-1906)，原名道，字贯一，后改字贯公，别号自立，广东香山 (今中山) 人。少年在家乡读私塾，“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名”。16 岁时因家贫辍学，东渡日本，在其族人所在的洋行当帮工。工余时间常借阅 《时务报》、《知新报》等维新思潮书报。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横滨大同学校和 《清议报》，郑被推荐到大同学校免费读书，后又转至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初步接触了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受到平等、自由、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1900 年 12 月，高等大同学校改组后，他又被推荐到 《清议报》当助理编辑。是年 8 月，唐才常领导的自主军在汉口起义失败，大同学校的十多位同学殉难。此事对郑的震动很大。因不满康梁的保皇党所为，他很快由维新转向革命，与冯懋龙 (自由)、冯斯栾 (自强) 等组织开智会，创办 《开智录》，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他不久又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兴中会。

《开智录》是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前三期原称 《开智会录》，油印出版；12 月得到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资助，改为铅印半月刊。郑贯公利用他在 《清议报》工作的方便，随 《清议录》一道印刷发行。开智会以“开展民智为宗旨，倡自由之言论，伸独立之民权，启上中下之脑筋，秉中东西之善法”。本着这一宗旨创办 《开智录》，表示同仁们

“久怀概愤，故于瀛海一偶，合众志士，兴起倡论，以争自由发言之权，及输进新思想以鼓盈国民独立之精神为第一主义。虽或声低颈短，不能高鸣天外，但苟有志士，能应声起和，则亦其庶几乎！是所幸望”。[2]

《开智录》由郑贯公主编。冯自由、冯斯栾、秦力山、蔡锷等为撰稿人。该刊先后译载了卢梭的 《民约论》以及 《自由原论》、《民权真义》和 《法国革命史》等专著。陆续发表了 《论帝国主义发达及 20 世纪之前途》、《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等政论文，在中国报刊上率先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并对其侵略

作者简介　许翼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广东　广州，510610)。

本质予以揭露批判。郑贯公在《论阅新闻纸之益》一文中直言不讳地道出："欲使国为文明之国，国民为文明之国民，当先革除野蛮政府，欧美其先开先河矣！"[3] 显示出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此外，该刊还注意刊发具有文艺色彩的作品。如冯自由译述的政治小说《贞德传》和郑贯公编撰的《摩西传》，以及像《戡为十八省秀才讨康有为檄》这样讽刺性的谐文和地方戏曲作品，真正做到"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在海外华侨社会风行一时。正由于此，大大触怒了康梁保皇党，郑贯公被逐出《清议报》，不准该报馆承印和发行《开智录》，致使该刊在公开出版了七期之后被迫停刊。

二、回港编报，编撰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

1901年3月，经孙中山安排，郑贯公来到香港《中国日报》社任记者、编辑。《中国日报》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机关报，由孙的挚友陈少白主持，于1900年1月创刊。当时正拟改版，而又缺乏新锐人才。据冯自由称："维时香港新闻界尚极幼稚，主持笔政者多为旧学中人，立论陈腐，颇为新学士子所齿冷。贯一至港，乃尽量发挥其新名词及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为读者欢迎"。[4](P84)

郑贯公在《中国日报》的主要工作是主编副刊《鼓吹录》。该报和当时的众多报纸一样，都没有开设固定版面的文艺副刊，只在附刊《中国旬报》的刊末开设《杂俎》栏目专登文学与科学小品。第11期后，《杂俎》改名《鼓吹录》，专登粤讴、南音、班本等戏曲作品。1901年3月，《中国旬刊》停刊，《鼓吹录》移入《中国日报》作为固定的文艺副刊，开创了我国日报开设文艺副刊的先河。郑贯公接手这个新版的副刊，将它进行全面的改版，先后分设《小说》、《杂文》、《谐文》、《史谈》、《粤讴》、《南音》、《班本》和《词苑》、《杂俎》、《博物》等专栏，形式多种多样，亦庄亦谐，文字浅白，通俗易懂，很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既增强了宣传效果，又扩大了报纸发行数量。

这期间，郑贯公还编撰了一部白话通俗小说《瑞士建国志》。这很少有人注意的近代最早的一部政治小说，过去只有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中列具，云："瑞士建国志（十回），郑哲著，光绪壬寅（1902）香港中国华洋书局刊"。[5](P152) 直至90年代初，《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才收入这部小说的内容提要。其后，该《总目提要》执行编纂欧阳健所著《晚清小说史》中，在论及政治小说的章节里，才有一段评述，肯定它是一部写得较好的政治小说。其余各种文学史、小说史均未提及，也未见单篇评价文字。就是上述书目和评述中，也都只提"郑哲著"，而不知郑哲为何人，也不知《瑞士建国志》的本事出自何处。笔者前几年在翻阅40年代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时，在第三集《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中，偶然发现"郑哲"原来就是郑贯公！《一览》中赫然写道："瑞士建国志　辛丑（一九〇一）香港　郑贯公"。[4](P152)

至于这部小说的本事，作者在《例言》中表示：

"是书故事，初由西文译成日本文，复从日文译其意，著为小说。转接之多，增删遗略，在所难免。然小说不比历史，事不必尽有，而理不可无，总求写情写景，明白了利为近旨。"[6]

这里并没有说明原作和译作的作者、书名和体裁。之后经过反复考证，原来先出自18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席勒所作历史剧《威廉·退尔》，而且是根据日文译本改编的，只是将主人公的名字翻译成"维霖惕露"，把侵略者奥地利写成日耳曼而已。《瑞士建国志》共分十回，回目如次：

第一回　异国官毒下害民手　耕田佬大有爱国心　　第二回　对妻儿同心谈国事　与朋友矢誓复民权
第三回　残忍兵持势夺耕牛　爱国士传檄招人马　　第四回　驾扁舟乘风破巨浪　唱歌曲苦口励群心
第五回　亚鲁拿募无渡山河　华禄也随父过市镇　　第六回　悬冠冕人民须下拜　折木柱父子被擒拿
第七回　命射果假手杀英雄　求棹舟天心救好汉　　第八回　脱危险乘势诛贼臣　趁时机举义复旧国
第九回　成大事共和立国政　奠中兴上下得平权　　第十回　祭伟人万民歌大德　建遗像千古留芳名

对照原剧作和小说的改编本，可以看到：小说基本上保持了原作的框架和风貌，保持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传奇色彩，但有两处却作了重大的改动。一是原剧作主人公并不是一开始就投入人民起义，而是被"逼上梁山"才被拥戴为义军首领的；而小说主人公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组织策划人民起义。二是原剧作在赶走

侵略者恢复故国之后，并没有废除君主制，只是参加起义的贵族主动解放农奴，废除奴隶制；而小说中却是复国后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由民间召开议会选举总统。这些重大的改动，在今天看来是违反历史主义的，但在当时却是出于鼓吹“排满革命、建立共和”的时代需要。原作者席勒当年积极参与狂飙突进运动，是个热情的浪漫主义者，有时为了宣扬理想而往往将主人公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在郑贯公的作品中就显得甚为突出。然而，由于原剧本提供了非常坚实的文学基础，而且人物和情节极富传奇色彩；而改编者又有相当的想象力与文字功力，因而在当时的第一批政治小说中，《瑞士建国志》仍不失为可读可传之作。此外，席勒晚年的另一部爱国历史剧《奥尔良姑娘》，也被冯自由（署名“热情爱国人”）改编为章回小说《贞德传》，先后在《开智录》连载（已刊七回，未完），1902 年上海新民社出版单行本，改题《女子救国美谈》。二者异曲同工，可谓姊妹篇。

至于郑贯公另一部曾在《开智录》刊载的改编自基督教《旧约全书》故事的《摩西传》（他曾自比“中国的摩西”），则未见续完和出版单行本。

三、独立办报，《有所谓报》风行一时

郑贯公是个性情中人，性格热诚豪迈，为人特立不羁，喜欢结交青年朋友，纵情诗酒；在政治上也是个急进人物，观点有时颇为偏激，甚至同情虚无党，赞成暗杀行动。这就与政治上持平稳健，经常联络上层人士以争取他们支持革命的陈少白难免产生矛盾。1903 年底，同情革命的基督教徒谭民三等愿意出资办多一家报纸。于是，郑贯公便辞去《中国日报》的职务，应邀担任这家新创办的《世界公益报》的总编辑，并且邀请了黄世仲、黄鲁逸、李大醒等人加盟。

《世界公益报》于 1903 年 12 月 19 日创刊，在郑贯公的主持下，它公开提出“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号召“投袂而起，光复中国”，被称为“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郑贯公还将文艺副刊扩大为附刊随报发行。该附刊取名《一噱报》，开设多个栏目，专门刊登杂文谐文、粤讴歌曲、讽刺漫画等，引人入胜。后因刊发《扬州十日记》龙舟歌，引起当局告诫，部分股东怯于情势，而郑贯公坚持原则，意见不合，遂辞职而去。该报仍继续支持革命，直至 1917 年才停办。

随后，郑贯公邀集同仁李大醒、黄鲁逸、黄世仲、陈树人等，筹资创办另一家大报——《广东日报》。该报以开智社名义出版，由郑贯公任总编辑兼督印人，于 1904 年 3 月 31 日创刊。《广东日报》仍沿习《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的革命传统，而言论更加开放，是为香港第三家革命党报。该报亦附出文艺副刊，取名《有所谓》，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批判专制，鼓吹革命。出版一年后，经济不继，只好转交他人接办，李大醒、黄鲁逸留下任主笔，又维持一年后，因内地禁止发行而停办。

脱离《广东日报》后，郑贯公又邀请开智社同仁，以同人集资的方式，另办一份小型文艺性革命报刊《有所谓报》，仍由郑贯公任总编辑兼督印人，于 1905 年 6 月 4 日创刊。《有所谓报》比前三家大报，内容更加激进开放，形式更加生动活泼。该报创刊词——《开智社有所谓出世之始声》开宗明义表示：要“以语言塞异族独夫之胆，以批评而递夺一般民贼之魄、政界之荆棘，培民权之萌蘖”，“抒救时之策，鸣惊世之钟”。[1] 创刊号告白表明：

“本报之趣旨：监察政界之现象，改良社会之魔氛，伸民权，抒公理，淋漓大笔，慷慨悲歌，体备庄谐，赏兼雅俗，不负本社之命名”。

“本报之内容：报内体例，先谐后庄，分门别类，只贵其精。一《题词》，二《落花影》，一切游戏之文属之，三《骨稽魂》，一切笼淡属之，四《官绅镜》，五《小说林》，六《他山石》和《金玉屑》，或《格化谭》，或《前人史》，七《新鼓吹》，八《社会声》，九《风雅丛》。其余庄言时事之门类如下：一《情议》，二《短评》，三《访稿》，四《要闻》，五《电音》，六《调查》，另附民族小说《洪秀全演义》一篇”。[2]

仅从以上告白中，便可以看出《有所谓报》的基本风貌。其中《新鼓吹》专刊粤曲、班本和龙舟说唱，《社会声》刊登粤讴、南音与歌谣，用粤语方言写作，最受大众欢迎。郑贯公在首日《新鼓吹》发表《生笔登台》，用唱本的形式，生动说明办报的宗旨与想法。故该报甫一出版，便一纸风行，很快成为省港

澳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有所谓报》出版不久，便遭遇了一场波及沿海各省区和海外华侨社会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当时，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禁止华工、歧视华工的政策，引起海内外华人的抗议，各地掀起拒绝禁约、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期间，省港新闻界发挥了宣传和鼓动的积极作用；而郑贯公和《有所谓报》更是一马当先，郑贯公本人就发表了《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等一系列政论和短评，以及大量粤讴、班本等通俗作品，与兄弟报刊同人一道评击美国政府的横蛮，揭露批判官商勾结破坏爱国运动的行径，甚至还公开批评同一阵营内的软弱言行。

1905 年 9 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亲自到香港建立南中国总部——香港支部，亲自为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人监誓入盟，推选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干事。后孙中山又再次抵港，调解陈、郑两人矛盾。

郑贯公积极宣传"推满革命"，也引起了保皇党人的极为不满和仇视，1905 年 11 月 13 日《有所谓报》曾发表《出资购人行刺本报记者之详情》，揭发保皇党人企图暗杀郑贯公的阴谋。保皇党没害死郑贯公，但郑氏因护理爱妻疾病而被感染，不幸于 1906 年 5 月 10 日病逝，年仅 26 岁。

四、庄谐并举，创作与编选新粤讴

从 1900 年 7 月至 1906 年 5 月这六年间，郑贯公先后参与了六家报刊的编辑，其中有四家是他自己创办和主编的。他创办和主编了第一家中国留学生的刊物，主编了中国报纸的第一个文艺副刊，又创办并主编了第一家庄谐并重的文艺性革命小报，的确是中国近代报业一怪杰。郑贯公才思敏锐、多才多艺，不仅长于报导、政论，特别擅于运用通俗讲唱文学，无论是小说、戏曲、歌谣，他都能够将旧形式加以改造，注入新内容，可算是文界革命的先锋。他在主编的各家报刊中，从最早的《奸智录》开始，就率先登刊了大量的通俗讲唱文学作品，而且自己也创作了不少粤讴、班本，流传很广。这里仅举出在反美拒约运动中发表的一首新粤讴《真正系苦》：

"真正系苦，我地华工，谋生无路，逼住要四海飘蓬，离乡背井，走去求人用。不过想觅蝇头，岂敢想话做个富翁。点估外国工人，嫌我地日众；佢话土人权利，失去无穷。故此想禁华工，随处煽动，想得赶绝我地华人、不准我在佢嘅埠中。试想我地在本国嘅系咁艰难，来到外埠又咁苦痛，真正系地球虽大，无处可把身容。今日我听见续约问题，心甚恸，唉！愁万种，热血如潮涌，但得汉人光复呀，重驶远地为佣！"[8]

岭南文化学者冼玉清在《粤讴与晚清政治》中，高度评价郑贯公的新粤讴，认为"它与过去粤讴不同的地方，即是除去一些华丽的词藻"，而这一首"用第一人称口吻写出，质朴无华，通俗易晓，是能道出华工苦难心境的一首好讴"。她还赞扬郑贯公"与陈天华烈士，是当代革命派杰出的爱国宣传家，是晚清新闻界具有多方面才能、为民主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战士"，"不仅仅因为他在改造粤讴方面的贡献，而且因为他在 1905 年反美抵货爱国运动中，始终站在战斗的前列"。[9]

郑贯公还写过许多其他题材的粤讴，如当清廷废除科举之后，他就写了一首《哭科举》，形象生动地揭露了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士子们的可悲可怜心态：

"唔怪得佢喊，我亦替佢心焦，半生希望，付与江潮。睇吓平时用尽苦心，捱得咁紧要，真正日无停刻，夜又通宵。心血耗清，精力渐少，若果系博得个功名，怕乜俾命一条。亏我运滞时乖，天亦不吊，依然故我，两鬓萧萧。估话大器晚成。还可以自表。个阵青云得路直上扶摇。点估颁来上谕，真系唔通窍。佢话政府从今、把科举废晓。我一见个道明文，魂魄亦失了。苦极从何叫？不若作个学堂教习，或者可以顾得食饭根苗"。[10]

1906 年，郑贯公还仿照流行的《岭南即事杂咏》的体裁，将当时报刊上属于"游戏文章"的通俗文学作品，分门别类加以选辑，编成一部《时谐新集》出版。该书分为：一文界，二小说界，三诗界（附歌谣），四曲界（其中分粤讴、南音、小调、班本）。除了省港报刊的作品外，还选录了在上海的《新小说》杂志中"珠海梦余生"的粤讴、梁启超的《劫灰梦传奇》，以及吴研人的几则笔记小说等，内容极一时之盛。郑贯公在《时谐新集·序》中云：

"仆几度东游，半生西学，执世上新闻之笔，隐豹频年；读人间未有之书，斩蛇何日？才非倚马，尽伸正则骚牢；时未获麟，终切杜陵忧国。读张均之小说，稍任笔劳；学宋玉之大言，或资捧唱。五千直扫，寓褒贬于毫端；十万横磨，诛奸贪于纸上。遁计能言鹦鹉，终自囚笼；为要开道骅骝，不甘恋栈。既编小报，复辑时谐。非救世之敢言，亦伤时之难已。"[11]

不料这半生的自况，却成了他终身的墓铭。

郑贯公走了，他的未竟事业自有人继承。就在1906年5月，他的挚友黄世仲接任了他的香港同盟会支部的庶务干事，并同时创办了与《有所谓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香港少年报》。一年后，黄世仲又接着编印《时谐三集》。

五、三点启示

郑贯公逝世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近百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学也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的历程。回首百年，郑贯公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作的历史探索，为我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至今仍然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一) 民主革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维新派还是共和派，他们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将启蒙（开启民智）和救亡（振兴中华）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启蒙先于救亡也好，救亡压倒启蒙也好，两者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并且成为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主题，于今犹是。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宿命，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

(二) 为了启蒙与救亡，中国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抛弃民族文化传统，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而是力求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意的方式方法。他们倡导文界革命，也没有走向欧化，而是努力向民族民间文艺吸取养料，力求创造出雅俗共赏、庄谐兼备、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今天，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又给民族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 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人们思维方式和文学体裁的变化。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给文体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平台：报章文体、报导文学、专栏文字、连载小说……各种新文体的出现，让文学从小众走向大众。今天，以现代科技手段为载体的电子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又给文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让我们永远谨记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参考文献]

[1] 许翼心. 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界革命 [C] . 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上册）.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

[2] 开智会录缘起 [J] . 开智录（第一期），1900-12-21.

[3] 贯庵. 论阅新闻纸之益 [J] . 开智录（第三期），1901-1-20.

[4] 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M] .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5] 阿英. 晚清戏曲小说目 [Z] . 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6] 郑哲. 瑞士建国志•例言 [M] . 香港：香港中国华洋书局，1902.

[7] 郑贯公. 开智社有所谓出世之始声 [N] . 有所谓报（创刊号），1905-6-4.

[8] 郑贯公（仍旧）. 真正系苦 [N] . 有所谓报，1905-6-13.

[9] 郑贯公（仍旧）. 哭科举 [N] . 有所谓报，1905-8-13.

[10] 洗玉清. 粤讴与晚清政治 [J] . 岭南文史，1983，(1-3).

[11] 郑贯公. 时谐新集•序 [C] . 时谐新集. 香港：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1906.

责任编辑：陶原珂

·学海酌蠡·

“朱崖”即珠崖考

◎ 李 勃 (海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海南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海南 海口，571158)

〔中图分类号〕H1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158-01

《后汉书》卷40《班彪传附子固传》引班固《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畼四裔而抗稜。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聋水慄，奔走而来宾。”这里的“朱垠”所指何地？《后汉书》历代注家都付之阙如，惟唐代李善注《文选·班固〈东都赋〉》云“南方”。新版《辞海》“朱垠”条释文，也完全按照李善注文。其实，这里的“朱垠”当指“朱崖”(即海南岛)，而非南方。理由有五。

其一，班氏这段文字，讲的是东汉王朝政治势力所及和四夷宾服情况。西、东、北三裔所及之处既然都有具体位置，则南裔之“朱垠”显然也是具体地名，而非泛指南方。

其二，“南趯”，《文选》做“南趯”。《说文解字·走部》：“趯，躍也。”《火部》：“耀，照也。”若按唐·李善所注，则“南趯(耀)朱垠”，意即南部跃过(或照耀到)南方。可见此注明显错误。

其三，“垠”与“厓”、“崖”同义。如《淮南子·本经训》：“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远。”汉·高诱注：“崖，垠也。”《汉书·叙传》：“研、桑心计于无垠”。唐·颜师古注：“垠，厓也。”又《广雅·释丘》：“隒……漘、陴、涘、垠，厓也。”《集韵·佳韵》：“厓，或作崖”。按上所载，则“朱垠”即朱崖。

其四，大量史志明确记载东汉时期海南岛在东汉王朝版图之内。诸如：《晋书·地理志下》交州载：“(汉武帝)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并珠崖。元帝初元三年，又罢珠崖郡。后汉马援平定交部，始调立城郭，置井邑。”又《旧唐书·地理志四》广州“南海县”下注：汉武帝灭南越国，以“其地立九郡”，曰：“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后汉废珠崖、儋耳入合浦郡”。既然领有西汉珠崖、儋耳二郡故地，则海南岛显然在东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又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37琼州载：“东汉置朱崖县，属合浦郡。”此又见《宋本方舆胜览》卷43琼州及吉阳军、《纪纂渊海》卷16琼州、《大明一统志》卷82琼州府等。这说明《后汉书·郡国志五》合浦郡之属县“朱崖”，显然在海南岛。

其五，宋代也有以“朱垠”称海南岛的。如郭沫若点校的清光绪《崖州志》《艺文志一·记》收录宋代知昌化军邢梦璜《节录磨崖碑记》说：“渺矣朱垠，重溟绝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412页。)意为：遥远啊！海南岛，南海中的孤岛。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断言：班氏所谓“南趯朱垠”，意即“南逾朱崖”。这说明当时海南岛在东汉王朝的版图内。

责任编辑：陶原珂

Main Abstracts

Re-comprehension of Marx's Criticism in Ideology

Zhao Kairong 5

Generally speaking, we understand ideology in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 so, the ideology in common with consciousness has no special value except true and false or right and wrong. Most people comprehend ideology in three meaning sides: commendatory sense, derogatory sense and neutral sense. But Marx thought that ideology is not only consciousness but also practice power. That is an important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ideology; however, many scholars did not follow that with interest. Though Marx's idea of ideology is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hases, we could understand that Marx emphasized its economic base in his early years, but re-understood it again in his later period for the question was so specific. That had a new signified direction in understanding ideology. Just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commonness, generalization, simplicity and universality, ideology may reveal historical individualit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Whereupon, the long-term dispute on true Marx or pseudo Marx does not have special value, but that point of view must be quite revolutionary.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Mode of Ideological Theory: a comparison among Adorno's, Horheimer's and Marx's theories

Zhang Xiuqin 13

Ideology theory is a core in Adorno and Horheimer's social critical theory. From some view, we may say that their ideology theory is nothing but their social critical theory, and both of them are based on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ideology theory. Their mode of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embodies their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of ideology theory.

On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Paths of Enterprises in Traditional Industry Clusters

Yue Fangmin 42

Through observing SME clusters, one can find some broadly existing imitation, especially in thos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gulations. Due to the low cost and high return overturned by imitation and the adverse effect in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may be restrained by imitation in SME clusters. Hence, 'Lemon Market' might appear and clusters might go towards recession. However, most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the world are developing and growing prosperously and have become a dynamic sourc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 output of clusters has been well known for its fashionable, differentiated and individual features. One issue in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luster is how an enterprise could go from imitation towards innovation. Firm imitation has an endogenous mechanism, which is indicated by convergence of 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which forms cluster; while efficiently imitative mechanism that reduces transaction cost and production cost legitimatize the imitation existing. And in the initiative period of both firm and cluster, the imitation may become the way of learning for a firm and is useful for a cluster to develop. Cooperative and innovative mechanism lies in firm clusters by spilled over knowled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firms and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s. Moreover, competitive pressures cause competitive innovative mechanisms. Both those mechanisms can promote innovational ability of firms, and can push firms to perform innovation, so that clusters become innovative environment. Four paths for firm innovation can be found: the promotion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firm, that reli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enter establish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hat relied on core enterprise and that strengthening external connection, which means to step into global value chains.

The Scientization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Concept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Li Xibin 59

The systemic integration principle of '1+1≠2' discloses the essence of evolution law of the nature and the human society. Basing on the principle, we can lead to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are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productivity. Therefore, the fundamental exposi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are two unseparated aspects in social production' in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s questionable.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explanation of attributing the defects of the central planning systems to exceeding current production level is wrong as well. Those specious explanations are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widely observed arguments of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 integration principle, 'the indeterminism of human society long-term evolution' can be concluded. Theoretically, that proposition defines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ntrolling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it restores to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riginal versions about the future society.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in the sense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s a fake and unworthy proposition.

The Theory of City Governance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

Yuan Zheng 63

City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highlight point presently in some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city planning studying, human geographic studying, city management studying, city society studying, administration studying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city governance and the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analyzes the city governance and its practice in China. Analyzed some practices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of city governance in China, such as the governance applied differently in space and time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the policy system background of city governance, 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pattern of city governance. At the end,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city governance in China.

A Comment on Zhang Fengxiang, a Legendary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on the Letters and Telegraphs Collected by Him

Kong Xiang ji 83

As a legendary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Zhao Fengchang served as an assistant of Zhang Zhidong for a long time. After dismissed by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Zhao remained active in the political circles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ny important political event, such as the Mutual Protection in the Southeast China in the Incident of 1900, the Probationary Constitutionalism from 1950 to 1908, and many great ev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During his political lifetime, Zhao collected a large number of letters and telegraphs writtern by himself and other persons, a part of which consists of 109 volumes packed in 36 cases and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Rare Books Sectio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Some interesting letters and telegraphs are shown in the paper.

Another Textual Study on the Chinese Maps Stored in English National Archives concerning the Hard Fight in the Hongbing's Rebellion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Zheng Yonghua 95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ps stored in the National Archive, U.K., are the firsthand files concerning the force of the Hongbing's rebellion during the Xianfeng period (1851-1861)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ontain a great deal historical information. Based on other documents stored in the First History Archive of China and consulted with other recordation, the paper reveals some details of two maps numbered F.O.931/1911 and F.O.931/1954.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al Tricks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 Qiang 103

The case of 'Jin Zou Yuan' prison, happened during the Qingli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caused a great influence at that time due to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scene. Those persons related to the case were punished because of assembling and drinking at important departments of the state, though they occupied certain official positions. The stern punishment to the related scholars under the order of Song Renzong showed that the cosmos should be strictly obeyed. Seemingly as an economic case, it was set for scholars' flippancy. Actually above all, it prohibited scholars from surpassing their right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in illegal ways. So, the cas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lars mentality during the Qingli period.

Relaxation of the Curfew Rul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

Cao Shenggao 110

The curfew rule was neglected betwee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ts basic causes we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economy and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 class. The immediate cause was the relax situation in the Lantern Festival Day that inspired the entertainment demands of those lower populace, urging initial prosperity of the folk entertainment industry. Under this background, entertainment without curfew gradually civilianized and conventionalized. It did not only impel the formation of citizen culture, but also caused change in the literary interest, becoming the forerunner of the literary configur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学术研究》读者评议表

尊敬的读者：您好！

《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您的支持和帮助，为使我们的刊物能够更好地满足您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您对我们刊物的评价和建议。请将以下问卷填妥后寄至：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学术研究》杂志社（邮政编码：510050），或（Fax）020-83846177。联系电话：020-83846307、020-83846163，电子邮箱：bjb@gdskl.cn

我们将不定期邀请热心读者召开座谈会，对刊物的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的读者，我们将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您所提供的个人资料，本刊将予以保密。

姓名：_____ 单位全称：_____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请务必填写）：_____ 手机：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箱：_____

1.在本刊所有学科中，您最关注的学科是：_____

2.在本期您所关注的学科中，您最喜欢的文章是：_____

3.在您所关注的学科的文章中，您在其选题意义、文章内容、学术价值、研究的创新程度上的评价是：

指标	评价
选题意义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文章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学术价值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创新性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4.您认为本期《学术研究》在栏目设置、校对水平、版式设计和印刷质量方面做得如何？

指标	评价
栏目设置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校对水平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版式设计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印刷质量	□ 1/很差 □ 2/较差 □ 3/一般 □ 4/较好 □ 5/很好

5.您认为今后《学术研究》还应该增加哪些栏目和内容，或是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_____

_____

6.您认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主要应表现在哪些方面或今后应该做哪些改进？（请填写）

_____

_____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请继续关注《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编辑部

2007 年 7 月

岭南人文图说之四十三——



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是广东开平华侨乡土建筑群体，现存1833座，建筑风格中西合璧，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令人震撼的建筑文艺长廊”。因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丰富的遗产价值和科学价值，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开平碉楼主要用于防匪、防涝及居住。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常有洪涝之忧；历史上属边远交界之地，时有盗匪之扰，故早在明朝后期就有乡民建筑碉楼，以为防涝、防匪之用。至清代，大批开平人为了生计远赴外洋打工，使开平成为著名的侨乡，大多数华侨挣到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汇钱回家或亲自回国娶妻、买地、建房。开平碉楼一般是以数家或以村为单位集资建造的公用碉楼，较为富裕的华侨、归侨则独自兴建。20世纪20、30年代是侨居建筑的鼎盛时期，碉楼建造高峰期全市多达3000多幢，后由于诸多原因大量废弃。现存的1833幢分布于不同城市和乡镇，其中，塘口536座，百合385座，赤坎200座，蚬冈155座，金鸡19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侨汇减少直至最后中断，侨房建设基本停顿，碉楼的建设停止下来。



▲ 蚬冈 瑞石楼（1923年建）

开平碉楼以我国古代乡村“角楼”为基础，融入了西方城市、教堂建筑中的塔楼造型。建筑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硬山顶式、悬山顶式，也有国外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巴洛克式等等，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是名副其实的近代建筑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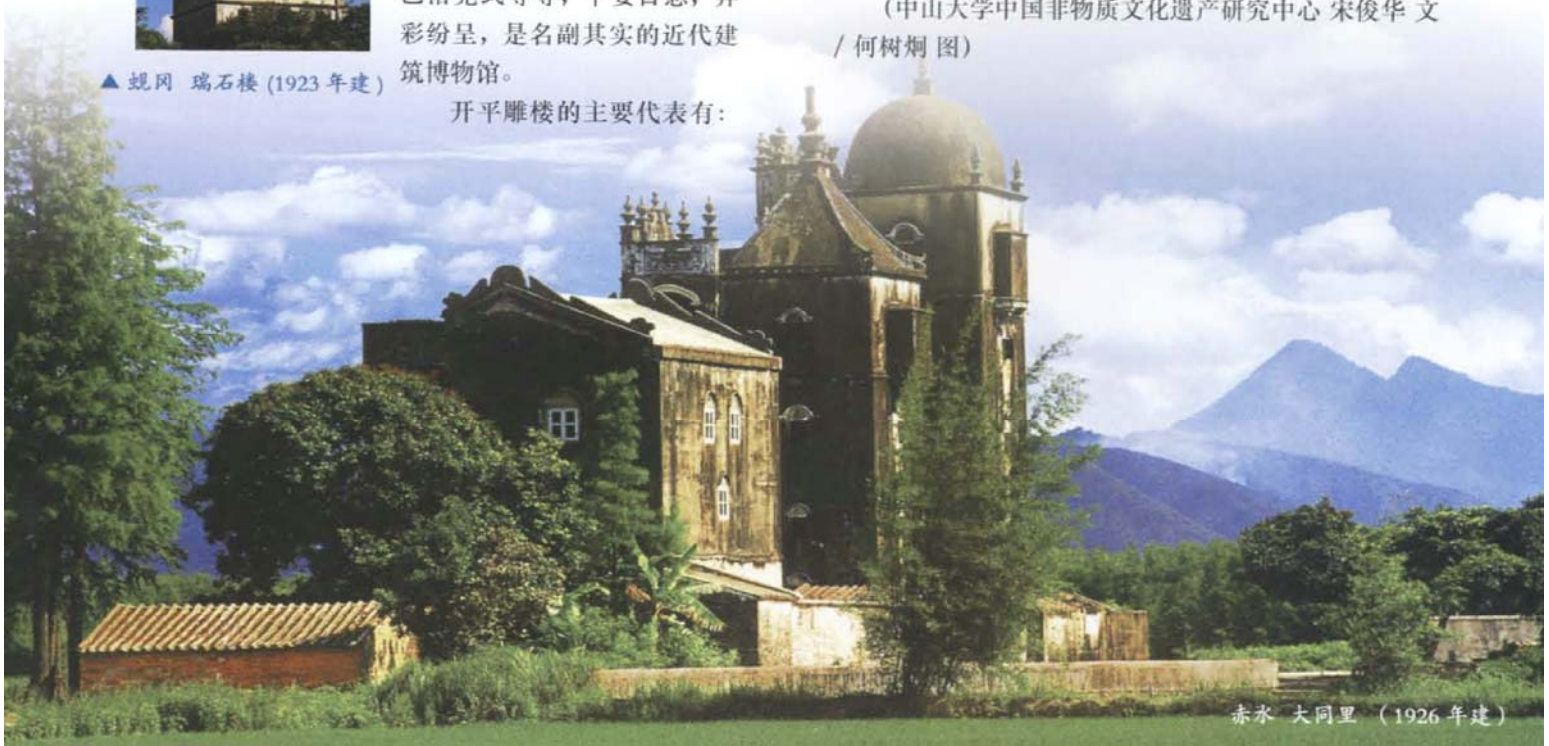
开平雕楼的主要代表有：



▲ 雁平楼（1912年建）　▲ 塘口 自力村（1919–1948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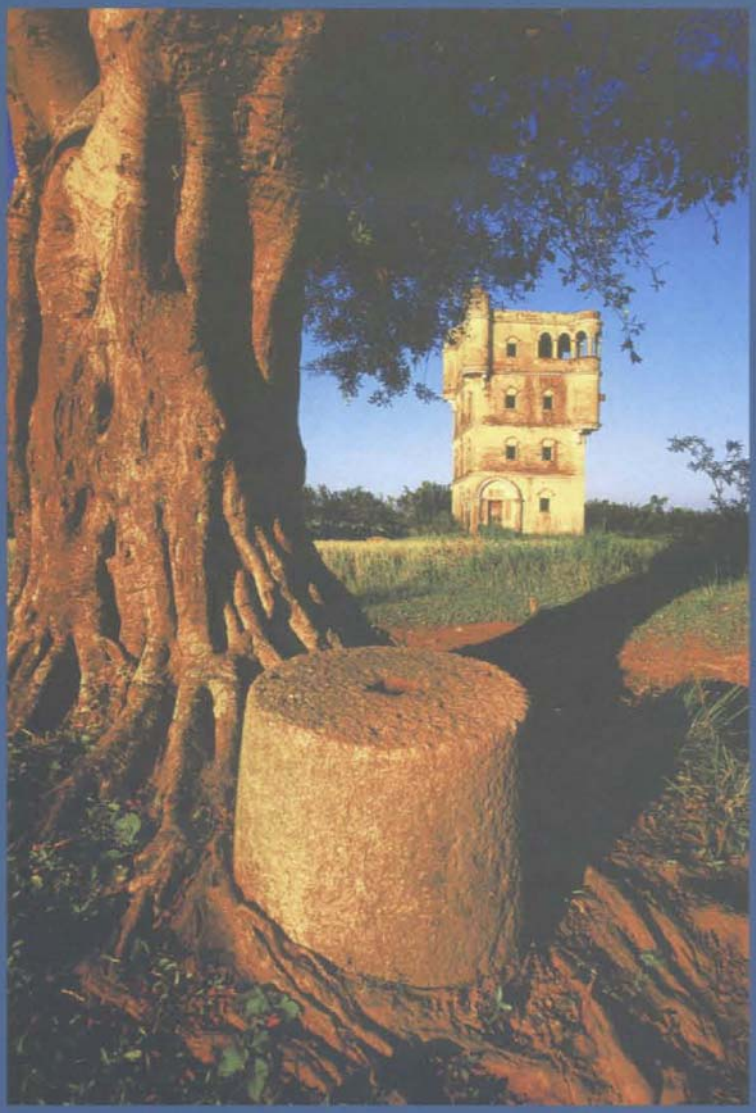
（一）迎龙楼，位于赤坎镇三门里村，明嘉靖年间关氏十七世祖关圣徒夫妇出资修建，是开平现存最早的碉楼。（二）锦江里碉楼群，位于蚬冈镇锦江里，清光绪年间黄氏家族建成此村，村后有瑞石楼、升峰楼、锦江楼3座碉楼。（三）自力村碉楼群，位于塘口镇自力村，有15座碉楼。（四）马降龙碉楼群，位于百合镇百合墟东南面，为黄、关两姓家族于清末和民国初年兴建，有13座碉楼。（五）方氏灯楼，位于塘口镇塘口墟北面的山坡上，1920年由今宅群、强亚两村的方氏家族共同集资兴建，原名“古溪楼”。（六）适庐，位于百合镇厚山村委会虾边村村中，建于20世纪20年代，是“三合土”碉楼的代表作。（七）雁平楼，位于百合镇齐塘村委会河带村，1912年旅居加拿大华侨为防止匪盗而兴建，是当地最高的建筑，号称与天际飞雁齐平，故名“雁平楼”。（八）日升楼与翼云楼，位于赤水镇大同村村口，始建于1926年。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宋俊华 文 / 何树炯 图）



赤水 大同里（1926年建）

Academic Research



余坎　金宏楼（1890年建）　何树炯　摄影

刊物名称：《学术研究》
出版单位：学术研究杂志社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主编：叶金宝
地址：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编：510050 电话：020-83846163
出版日期：2007年7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0349
印刷：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期刊基本参数：CN44-1070/c*1958*m* 大16*160*zh* P* ¥8.00*3200*26*2007-07

网址：www.gdskl.com.cn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内总发行：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邮发代号：46-64
国外代号：M268（北京399信箱）
刊号：ISSN1000-7326
CN44-1070

ISSN 1000-7326
9 771000 732000 07
定价：8.00元